

目录

[理想國譯叢序 8](#_Toc55141531)

[作者說明 12](#_Toc55141532)

[風景畫 14](#_Toc55141533)

[一　“從圍城到世界之城” 25](#_Toc55141534)

[二　1991——擁抱自由開放 33](#_Toc55141535)

[三　印度式全球主義 37](#_Toc55141536)

[四　離鄉背井的波西米亞 44](#_Toc55141537)

[五　時髦的私立醫院 50](#_Toc55141538)

[六　婚姻的分崩離析 59](#_Toc55141539)

[七　男性的焦慮和女性的掙扎 66](#_Toc55141540)

[八　1857——消逝的沙賈漢納巴德 72](#_Toc55141541)

[九　1911——英國人的新德里 79](#_Toc55141542)

[十　1947——邁向獨立 88](#_Toc55141543)

[十一　旁遮普的商業帝國 97](#_Toc55141544)

[十二　巴爾斯瓦的垃圾山 107](#_Toc55141545)

[十三　經濟難民的痛苦深淵 116](#_Toc55141546)

[縮影 127](#_Toc55141547)

[十四　1984——甘地之死 137](#_Toc55141548)

[十五　印度精英的新帝國主義 150](#_Toc55141549)

[十六　上師與富人 163](#_Toc55141550)

[十七　中產階級的焦慮 171](#_Toc55141551)

[抽象畫 181](#_Toc55141552)

[致謝 192](#_Toc55141553)

[許可聲明 193](#_Toc55141554)





【英】拉納·達斯古普塔　著　林盼秋　譯

資本之都：21世紀德里的美好與野蠻

南京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資本之都：21世紀德里的美好與野蠻 / 【英】拉納·達斯古普塔著；林盼秋譯.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3052-0499-9

Ⅰ. ①資… Ⅱ. ①拉…②林 Ⅲ. ①中等資產階級－研究－印度－現代 Ⅳ. ①D735.16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0150097號

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南京市漢口路22號， 郵政編碼： 210093

　　網址：www.njupco.com

責任編輯：盧文婷

特邀編輯：梅心怡

裝幀設計：陸智昌

內文制作：陳基勝

目錄  
 CONTENTS

[理想國譯叢序](#Li_Xiang_Guo_Yi_Cong_Xu)

[作者說明](#Zuo_Zhe_Shuo_Ming)

[風景畫](#Feng_Jing_Hua)

[一 “從圍城到世界之城”](#Yi___Cong_Wei_Cheng_Dao_Shi_Jie)

[二 1991——擁抱自由開放](#Er__1991____Yong_Bao_Zi_You_Kai)

[三 印度式全球主義](#San__Yin_Du_Shi_Quan_Qiu_Zhu_Yi)

[四 離鄉背井的波西米亞](#Si__Li_Xiang_Bei_Jing_De_Bo_Xi_M)

[五 時髦的私立醫院](#Wu__Shi_Mao_De_Si_Li_Yi_Yuan)

[六 婚姻的分崩離析](#Liu__Hun_Yin_De_Fen_Beng_Li_Xi)

[七 男性的焦慮和女性的掙扎](#Qi__Nan_Xing_De_Jiao_Lu_He_Nu_Xi)

[八 1857——消逝的沙賈漢納巴德](#Ba__1857____Xiao_Shi_De_Sha_Jia)

[九 1911——英國人的新德里](#Jiu__1911____Ying_Guo_Ren_De_Xin)

[十 1947——邁向獨立](#Shi__1947____Mai_Xiang_Du_Li)

[十一 旁遮普的商業帝國](#Shi_Yi__Pang_Zhe_Pu_De_Shang_Ye)

[十二 巴爾斯瓦的垃圾山](#Shi_Er__Ba_Er_Si_Wa_De_La_Ji_Sha)

[十三 經濟難民的痛苦深淵](#Shi_San__Jing_Ji_Nan_Min_De_Tong)

[縮影](#Suo_Ying)

[十四 1984——甘地之死](#Shi_Si__1984____Gan_Di_Zhi_Si)

[十五 印度精英的新帝國主義](#Shi_Wu__Yin_Du_Jing_Ying_De_Xin)

[十六 上師與富人](#Shi_Liu__Shang_Shi_Yu_Fu_Ren)

[十七 中產階級的焦慮](#Shi_Qi__Zhong_Chan_Jie_Ji_De_Jia)

[抽象畫](#Chou_Xiang_Hua)

[致謝](#Zhi_Xie)

[許可聲明](#Xu_Ke_Sheng_Ming)

[索引](#Suo_Yin)

# 理想國譯叢序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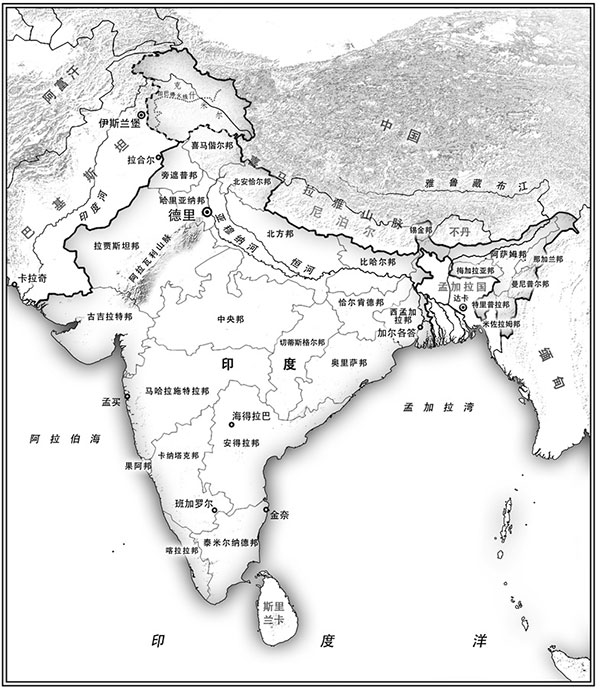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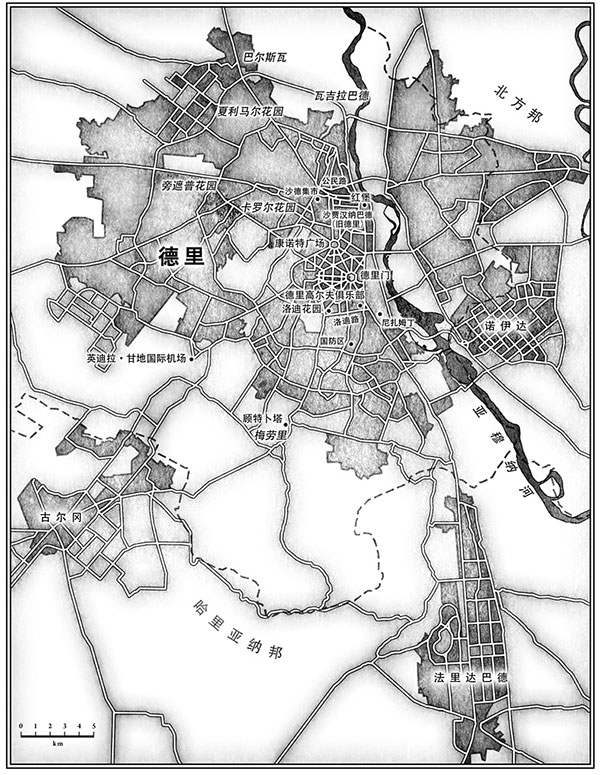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本書由微信公眾號【Kindle圖書共享】（ID:DZSGX8）制作分享，  
  
 掃一掃下方二維碼關注我們，免費下載更多優質Kindle電子圖書。   
  
    
  
 你不是一個人在讀書！  
  
 掃碼關注我們，與兩千萬書友一起享受閱讀。   
  
 （本書僅供個人學習之用，請勿用于商業用途。如果閱讀后覺得好，請購買正版書籍！）





# 作者說明

本書得以寫成，完全有賴于幾位德里（Delhi）居民愿意大方地和我談他們的生活、想法和經歷。由于我們討論的內容往往非常私密，所以除了公眾人物以外，所有人的名字都做了更改，好幾處細節也有變更，避免他們被認出來。我希望大家尊重他們的坦誠，不要嘗試尋找他們的身份。如果有知情人士，請不要透露他們的身份信息，因為有時他們和我談話是冒著風險的。

德里是這樣一個世界，人們很大程度上根據一個人掌握英語的水平來判別他的智力。我選擇讓這本書里所有的人物都講一樣的“標準”英語，這樣他們參差不齊的英語水平就不至于成為問題。現實中，英語是很多人的第二甚至第三語言，而且他們的英語并不標準。還有一些人根本不會說英語，我們的采訪都是在翻譯的協助下以印地語進行的。

按照印度人的說法，大額貨幣以lakhs（10萬）和crores（1000萬）計量。一個lakh是10萬盧比（Rupee），約2000美元[[1]](#Quan_Shu_Zuo_Zhe_Shi_Yong_De_Lu)。一個crore是一百個lakhs，或者1000萬盧比，約20萬美元[[2]](#Yi_2012Nian_De_Hui_Lu__1000Wan_L)。我保留了這些用語，以便保存印度人談錢時候的那種獨特味道[[3]](#Ben_Shu_Zhong__You_Yu_lakhHe_cro)。

在世界上的有些地方，“小屋”（bungalow）就是一棟普通甚至很小的平房。但在曾經的英殖民地印度，英國人用這個詞來指殖民地官員的獨棟別墅，所以多數情況下，這些房子反而又大又寬敞。這種用法在現代德里很盛行，這個過去英國統治的中心到處是這樣的房子。本書也遵循了這樣的用法。

《資本之都》講的是印度城市人口中正在崛起的富人，他們把自己視作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和受益者。現在這些人通常被叫作“印度新中產階級”，我也會用這個詞。然而，盡管他們的生活方式已經很接近歐美的“中產階級”，但這個詞用在印度的國情下卻有點別扭。

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那些年收入超過50萬盧比（大約是1萬美元）的家庭占總人口還不到10%，這意味著在印度，所謂“中產”無論在物質還是理念層面，其實指的都是精英群體。印度的經濟結構調整以這個新興階層的購買力為中心，這種調整引起了對土地和資源的爭奪，而受害者多為農村地區的窮人，這些人的數量大大超過中產階級，其中很多人的年收入不過500美元左右。所以我們需要有個很重要的意識，即印度中產的利益并不是低調或無害的。“資產階級”或“布爾喬亞”才能更精確地描述他們的狀況，而實際上我有時也使用這些詞。與此同時，許多人之所以自認為是“中產階級”，是因為他們發現這個詞帶著“努力工作”、“對社會有建設性”的意味，也因為他們希望把自己與另外一個更小的精英團體區別開來，那個團體遠比他們更富有、更有權力。中產階級認為這些政要和商界大亨自私、魯莽，并且從根本上對社會是有破壞性的。這兩種團體間的區別也很大，所以我基本上以常用的“中產階級”和“精英”來指稱他們，即使這些“中產階級”根本不是真正處于社會的“中層”。

注釋

[[1]](#_1)全書作者使用的盧比對美元匯率為1盧比約2美分，這是2012年初的匯率。同時期1盧比約人民幣1角2分，即10萬盧比約人民幣1.2萬元。因匯率隨時變動，本書未保留原書的美元參照。——本書腳注如無特別說明皆為編注

[[2]](#_2)依2012年的匯率，1000萬盧比約人民幣120萬元。

[[3]](#_3)本書中，由于lakh和crore在中文中沒有約定俗成的譯法，難以保留印度用法，所以本書中lakh將直接計算為“10萬”，crore將直接計算為“1000萬”。——譯注

哦，阿拉巴馬的月亮

該告別了

親愛的老媽媽已經走了

路上錢可不能少，啊，你知道為什么。

出自《蒙哥馬利城興衰記》（1930）

作者：庫爾特·魏爾/貝托爾特·布萊希特

# 風景畫

3月是最美的月份，生命力頑強的雞蛋花完美無瑕地盛開著，巧妙地點綴在院子里，和站崗的保安頗為合拍。我向著房子駛去，保安揮手示意我繼續往前。

一天已經結束，只有夜里開的花兒在空氣中搖曳著香氣。絲絨樣的天空下，我眼前的這棟玻璃大樓就像一個巨大的黃色水族館般熠熠發光。

我按保安的指揮停好車，沿著燈光昏暗的小道走去。每個轉角都有保安等著，把我指向下一個轉角。這些保安接力一樣地把我往下傳，在我身后，對講機不斷傳出確認的聲音。我到了。

這個建筑好像是兩個空間站，一個玻璃的和一個石頭的，相互交錯。其中一個不著地懸浮著，一座閃閃發光的橋不知道通向哪里，它下面閃爍著好似降落信號燈的光芒。

這里每一樣東西都古樸得令人難以置信。轉角的地方筆直而銳利，小路兩邊圍著裝飾性凹槽，里面整齊地鋪著碎石子兒。

保安讓我穿過房子去后面的游泳池，他們指向一條有地燈的走道。走道前的滑門拉到一半，遮住了入口的一邊。我往另外開著的那邊走，就在一瞬間，我聽到保安大喊不要過去，但我已經直接撞上了一塊玻璃。這玻璃門太干凈了，一點反光也沒有。就算我被撞得跌跌撞撞，整個人彎下腰捂著自己的鼻子，我還是沒覺得面前有門。

保安們哈哈大笑起來。有一個跑來幫助我這個笨客人，他讓我不要從玻璃進去，而是從門進去——正常的那種門，不是滑門。他示范了怎么開門，好讓我不至于再一次弄傷自己。

穿過房子，豁然開朗。我面前是一個大廳，裝修得像一個設計師酒店。顏色鮮艷的絲絨燈罩從高高的天花板垂下來，好幾個水晶桌旁圍放著許多設計師沙發。墻上掛著巨幅的帆布畫，是類似“DJ跳舞之夜”那種活動海報上能看到的荷爾蒙爆棚又有點隱晦的色情畫。整棟建筑的墻壁里都藏著喇叭，放著沙發音樂。

我出來，走到房子的另一邊。這里的私人泳池泛著幽幽藍光，把所有東西都照得神秘又色情。我被帶到泳池邊的一個位子，侍者在我面前放了一個玻璃杯和一瓶沒開封的水。

“先生馬上就來。”

在這個充滿委婉語的城市，這種地方被稱為“農舍”。

不過，這里當然沒有什么農作物。在20世紀70年代，根據規定，這里整個土地帶是作為農業用途保留的，但當時德里的精英開始奪取城市南邊的大片土地來建造私人房產。為了在名義上符合規定（哪怕事實上不符合），他們把自己的新房子叫作“農舍”。這很重要，因為最早的很多“農舍”恰恰就是那些制定法規的官僚和政治家建的。他們行事必須非常正確，對他們來說，名字不合法就是對其機構的冒犯。

那以后的幾十年里，德里南邊的“農舍”數量大增，往往幾經易手，時間足夠長以后，之前搶占來的土地都獲得了合法性。不但如此，這些“農舍”還變成了來自城市、擁有廣闊人脈的富豪們的生活象征。只有在這樣高級的地產上，令人咋舌的派對、汽車收藏、雕塑花園和大搖大擺的澳洲野生動物才可能實現。印度其他城市的都市精英都不像德里的精英這樣，如此沉浸在田園牧歌式的安寧里——這便是德里的首都氣質。德里的富人實際上是一群典型的大都會氣質的人，他們永無休止地在數量眾多的俱樂部和各種走廊里社交，錢也都是這么掙來的。所以他們居然選擇遠離都市的生活，讓人很驚訝。不像孟買或紐約的富人，夢寐以求的是坐擁璀璨城市景觀的公寓，俯瞰自己的財富之源，德里的富人反而對街上、人行道上的熙攘喧囂都不感興趣，盡管這些東西是令19、20世紀的大城市非常驕傲的部分。不，他們喜歡醒來時看著空蕩蕩、修剪過的草坪，一路延伸到頂著鐵絲網的圍墻。

現代德里誕生于印度災難性的分治，這場災難使德里的文化變得傾向安全和自給自足。最富有的市民從社會躲避進自家的庭院，而這些庭院僅僅是更普遍的孤立主義精神最奢侈的體現。畢竟，德里是印度私人城鎮的先鋒，這里的生活由各種公司管理，被柵欄圍繞。因此，這里的人與整個國家更大的潮流分隔了開來。古爾岡（Gurgaon）是房地產巨頭DLF（全名為“德里土地與金融”，Delhi Land ＆ Finance）在20世紀90年代建造起來的德里郊區，是亞洲最大的私有鎮，而且現在全印度都有模仿它而建的鎮。三十年前，這里還是一大片農地，古爾岡令人壓抑的公寓街區和各種鋼塔現在看著好像是從一個以未來為場景、背景顏色過度飽和的電子游戲里冒出來的。它完全不把自己偽裝成“公共”空間，大量窮人在這里的住宅或辦公室里做清潔工和保安，但無法住在這里。住在古爾岡意味著住在一個規劃小區里，外面由安保攝像頭和武裝保安保衛，居民付錢給各種公司以獲得基本需求的服務，比如收集垃圾、供水，甚至當國家電網斷電時（這種情況經常發生），私人公司會負責發電。因此，這個地方吸引了這樣一群人，他們尋求高效、后公共生活的飛地，對他們來說企業似乎已變成比國家更高產的社會組織。

我現在慢悠悠地喝著瓶裝水的地方是一個莊嚴的所在。一千多年以來，人們在我腳下的土地上生活。從池邊我坐的位置，抬頭就可以看到沖天的顧特卜塔（Qutab Minar）塔身。某位古代中亞侵略者征服德里之后，建起了這座勝利紀念碑。巨大的塔呈鋸齒狀，已經在這樣的夜晚佇立了八個世紀，即使到了現在，也是這慵懶靜謐的天空中唯一的人造物。

這個經過造景設計的院子里，所有的美化都是為了遮住土地，但是在附近的叢林和荒地里，在路的兩邊，華麗的陵墓、宮殿和清真寺仍沖破往昔，倔強佇立。在四周漸漸涌來的黑暗中等待時，我甚至能透過21世紀堅硬的水泥地感受到大地所釋放的靈魂。數百年來，就在這片土地上，他們放牧、種糧、拜神、建屋、作曲、請愿、埋葬亡者。而現在這里只是條寂靜的小道，平坦而完美，土地被封存在翠綠色的草坪下。

從漂白粉消毒過的泳池深處，涌起了一些別的東西——關于一個夢的回憶。八個世紀前，離這里幾步之遙的地方，蘇丹伊勒杜密什（sultan Iltutmish）[[1]](#Yi_Le_Du_Mi_Shi__Shams_ud_Din_Il)正睡著。突然，他的沉睡之門猛地打開，出現在他面前的是騎在天堂飛馬巴拉克（Buraq）上的先知穆罕默德。巴拉克望著蘇丹，臉忽而是男人，忽而是女人，忽而又變成了馬；它強健的翅膀上下拍動，扇出猛烈的風。蘇丹感覺受到召喚，當馬和騎手離開時，他便追隨他們而去。到了某個地方，飛馬用蹄子敲打大地，地面隨之噴射出了一個水柱。

夢之柜的門再一次關上了。

早上，蘇丹前往夢中他被帶去的地方。到了那里，他看到地上有一個標記，正是巴拉克的蹄印，于是下令挖一個新的蓄水池。之前，那里就已經建了一個壯麗的人工湖，湖的中心有一座清真寺，能坐船到達。湖岸邊圍繞著許多豪華別墅，還有一個很大的營地，擁有音樂家集會演出所需的一切。人們都感謝統治者的智慧及其輝煌的杰作。

伊勒杜密什也在附近建造了一座五層深的階梯井，周圍環繞著有列柱的陽臺，大家可以在水邊見面聊天。數世紀后，旁邊挖了第二座階梯井，構造的規模甚至更宏大。所以，這個夏天異常炎熱的地方，卻因為豐富的水而在旅行者中聞名。

這些水井之所以這么宏大和它們的位置有關。它們位于一條長長的石頭斜坡末端，斜坡把水從阿拉瓦利山脈（Aravalli）上引下來，這條古老的山脈縱貫印度，幾乎從古吉拉特邦（Gujarat）一路延伸到德里。在這煙霧繚繞、灌木叢生的山區，階梯井都建造在森林中，土壤被樹根緊緊地固定住，沒有被吹走或堵塞水系，而是像海綿一樣把水儲存起來，甚至還起到了過濾的作用。因此，超過六個世紀的時間里，村莊里的水井都滿滿是水。直到20世紀60年代，這些水井都還是村里男孩子們的運動場，他們會以驚人的靈巧潛入水底，打撈硬幣。

而現在這些井只不過是干涸的環形山，井底都是塑料袋或死鴿子這樣的垃圾。

經過數世紀愈發密集的抽水，這里的地下水水位急劇下降。不僅如此，幾個世紀以來，這個烤爐一樣的地方聚集的人口已經升至近兩千萬。與此同時，這些井本來依靠廣闊土地精妙的毛細作用，但這塊土地現在已經被現代建筑瓜分了。大面積的水泥表面阻礙了土地對水的吸收，而土地里毛細血管般的水道本來就因為森林的消失已大幅退化。工業排水系統把水從古老的水道帶走，而柏油路面阻斷了古老的泉水。

現代人的耳朵很少聽到這些斷裂聲。這些后來的強加之物已經成為我們自身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讓我們很難欣賞其他做法的偉大之處。那些不同的做法已經消失了。我們自然而然地認為現代之前的工程是幼稚的，并對中世紀帝王們的夢充滿懷疑，但當你看到現代城市的婦女從滴滴答答的水管或者積水的水坑里汲取家庭用水，那些夢的宏偉和以那些夢為名的偉大工程會再度讓你印象深刻。

此刻坐在泳池邊，我感覺到一種深深的恰如其分。是因為這些歷史嗎？畢竟，水池是德里幾個世紀以來的救贖。在迷信的時代，水是信仰，不是科技。現在舊水池干涸，建造它們的記憶被遺忘；居民幾乎不知道自己用的水來自哪里，每個人都拼命地從土地里抽取任何還能抽得出來的東西——這個平靜而豐饒的泳池散發著某種頹靡的優雅氣息。

拉凱什（Rakesh）小跑著出來。我們之前從沒見過，但我立刻感受到他的魅力。這種魅力部分來自于他和你說話的方式。他毫無保留，說話的時候直視我的眼睛，頻繁地直呼我的名字。他為我點紅酒，并確保我喜歡。這種風度對德里的商界人士來說是禮節上所必需的，他們都是說服別人的大師，但就算如此我也相當受用。

“坦白說，我之前一段時間都在回避你，”他向我微笑，“我從來不談自己或者自己做的事。我做事不是為了讓世界知道。如果我做了什么事，那是為了自己、家人和朋友，不是為了別人。別人怎么想都不關我的事。”

這時兩盤豐盛的開胃菜拼盤被端了上來。我們每人一盤。

“但后來我和米奇（Mickey）聊了聊，討論了你。他說你挺好的。所以我決定把自己的故事告訴你。”

正式和非正式之間只有一步之遙，這是德里的商界家庭讓我驚訝的地方。他們的大門安全地牢牢緊閉，但一旦打開，所有的一切都向你開放。如果你是獲得了一個朋友的認可而來，你就自動成了“哥們兒”。這種氏族做派有時候可愛，有時候也讓人很不爽。德里的很多地方都是按照這種做派來運作的。

而在這個包容一切的時代，即便是名女性也能被稱為“哥們兒”。

“我從來沒喜歡過美國，”拉凱什說，“我在英國念完書，不在美國。另外，英國有我的家人，而美國離家太遠了。總體上來說，我從來沒喜歡過美國文化，太機會主義了，太缺乏文化氣息了。”

“本科念完商科后，我本來應該從英國回來，跟著我父親干。但我不想回來。幸好我們家有一個很好的朋友，他是德里人，在阿姆斯特丹開了家服裝公司，和我父親的生意還有我現在的生意都很不同，他讓我在那里實習兩年。”

他帶著一種溫柔憐愛的語氣講述著自己的過去。遠處，他的妻子牽著還在學走路的兒子，在大理石步道上繞著院子散步。

“后來我父親來阿姆斯特丹，讓我回去。那時我在阿姆斯特丹過得很開心，但是他勉強說服了我。好吧，也不算勉強。所以我加入了他的公司，做起了汽車生意。我當時想著，‘我一點汽車也不懂。’然后我告訴自己，最好的學習方法實際上就是用自己的雙手制造產品。所以我就在車間做操作工，干了一年四個月。這是我自己的決定，完完全全自己的決定。因為這是我能學到東西的唯一方法。

“我在日本呆了九個月，在一個叫作浜松的地方，離東京大概一個半小時車程，是鈴木的總部。我跟你說，沒有那種學習我永遠沒辦法搞懂一切。我是說如果我沒去過那里，現在坐在這兒的我會是一個不同的人。我那時常常5點就起床，房間小到連個熨衣板都放不下，你知道的，日本人對紀律非常嚴格。兄弟，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很不真實。

“我工作的公司剛開始和我父親合作。我們的關系非常好，通常日本人是很保守的，所有的事都很保守，但我一到那里公司主席就把我認作兒子。我的辦公桌就在他的旁邊。他們的辦公室是開放式的，沒有小隔間。那家公司當時市值3億美元，我說的是1990年。但我只有晚上才會用到辦公桌來寫報告，整個白天我都在車間、經銷店和其他地方。”

拉凱什的家族過去一百二十多年來一直做著北印度的珠寶生意。對過去的那個商人群體來說，生意的意義遠不只是謀生：生意是一種氣質、一種生活方式和一種社會身份。他家祖先的生意網絡不僅跨越印度次大陸，還沿著貿易路線西至阿拉伯半島，東到中國。這些網絡由單線交易構成，這樣的設計是為了克服因信任產生的障礙，因為整個網絡涉及許多不同的社區、宗教和語言。障礙也來自珠寶交易本身的性質。由于貨物價值非常高，珠寶供應鏈的每一環都存在信用問題：商人通常不可能在收到貨物前先付款。整個跨國交易系統由各個交易人交付價值連城的貨物，收到的只是將來會付款的承諾。問題很明顯：大家怎么確定一個被如此信任的人不會一走了之？

毫無疑問，違規者會受罰。整個交易團體會聯合起來，確保違規者支付違規的款項。或者再不濟，大家會不再和違規者交易。商人們大力打造自己的聲譽，而這種聲譽會直接轉化成生意機會。他們生活奢侈，出手闊綽，這樣別人就會知道他們的財務狀況良好。他們向清真寺、廟宇和窮人捐款，雇詩人來頌揚自己的財富和正直。在生意場上談判時，他們會夸張地表現出驕傲受到了傷害：“我？你這樣看我？你可把我看錯了。”

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們用各種方法把純粹的商業關系發展成各種形式的相互依賴的關系，以盡量杜絕欺騙。為了拴住合作伙伴，他們會送禮、幫忙、熱情招待，甚至聯姻。他們相互之間會變得非常親密，平常說話都像朋友甚至兄弟一般，除非他們的生意出了問題，否則這種親密確確實實在感情的深度和質量上都相當于友誼或者兄弟情。他們的生活中沒有“生意”以外的東西——日常生活和家人都是用來支持和增進業務的，同時還提供可信的伙伴和繼承人，他們對于友誼和社會生活的追求與建立生意人脈從來都不分開。

現在德里的商人家庭里，這種精神有所改變，但沒有被完全取代。讓人震驚的是他們中有很多人的靈感來自于日本企業，這點對印度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發展影響巨大。因為對于大量印度商人來說，日本人的工作原則是對小圈子里的人非常好客忠誠，這是德里的商人能夠理解和尊重的。而在美國的企業里，為了實現企業活力，似乎在個人層面有一種吝嗇的感覺，人和人之間保持著不愉快的距離。如果說當代印度企業看上去像是一張令人困惑的網，聯結著各種個人和裙帶關系的話，這其中部分是曾經重要的跨國商業傳統遺留下來的產物，雖然這些傳統可能被世界通行的公司文化蒙上陰影，卻仍塑造了印度企業文化的根本形式。

“我父親退出了珠寶生意，和兄弟一起開了一家成功的紡織品公司。到1993年，他們友好地分了家：‘你有個兒子，我有個兒子，我們分開走自己的路吧。’很得體對不對？所以父親新開了家公司，生產汽車座椅系統，后來又制造汽車鏡。1999年我們設立了塑料制品部門，我就是那時候去日本當學徒的。他讓我全權負責建立塑料制品部門和頂篷部門。”

“頂篷是什么？”

“就是車頂的內飾。有點像紡織品，但不是紡織品。是一整塊很厚的合成材料，是聚氨酯，不是編織物，包含有很多東西。有一個流程會把它們疊在一起，然后壓合，用水射流切割機切割，最后做表面處理。那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我們的轉折點是2005年。之前我們只有一個客戶——馬魯蒂鈴木（Maruti Suzuki）[[2]](#Ma_Lu_Di_Ling_Mu__You_Zuo__Feng)。當時我們在制定戰略，研究如何擴張。我們有機會收購了一個金屬零部件公司，是鈴木的合資企業之一。你知道，鈴木進入印度的時候，沒有供應鏈，他們得自己開發。要開發一條供應鏈，他們就得提高大家的積極性。為了激勵大家，他們就開設合資公司，其中一家就是我父親的。我們收購的是另一家合資公司，生產燃油箱、排氣系統、懸掛系統和車軸。那次收購拓展了我們的客戶群。現在我們是五六家大型汽車企業的供應商。”

這時候夜幕開始降臨，透過房子的全景玻璃，可以看到里面燈光璀璨。拉凱什指給我看他的父親，他正走過休息室，看上去體魄強健，正當壯年。這家三代人一起住在這棟房子里——商業世家強烈堅持這樣的傳統。

“目前我們是一家市值260億盧比的公司，并且我的目標是在接下來的四年里把我們的市值翻一倍，也就是超過10億美元。你知道那意味著什么嗎？我們花了十六年獲得今天的成績，而我要在四年內完成同樣的事。有些會通過戰略性收購來完成，其余的將會來自我們自身的有機增長——這些都在我的中長期規劃里。

“我希望，兩年以后我們30%的收入來自印度以外。現在這個數字大概是5%。現在印度市場的增長太快了，讓你不需要尋求在海外市場發展。走向世界需要堅實的基礎，我們還在做準備。進入全球市場并不簡單，每天我都有一些收購機會，但你知道，最簡單的無非是上去抓住這些機會，然后就死翹翹了。我們準備好了以后，就會進行收購。目前我們正在準備中東和歐洲地區的收購，但只有知道這個收購真的行得通時，我們才會去做。”

“你的公司歸誰所有？”

“公司完全專業化運營已經有段時間了。我們有管理董事會、監事會，所有這些東西。但公司的所有權很清楚。金屬部門是我的，百分之百。內飾部門是我父親的。我們計劃兩年內，由我接管整個內飾部門。我和父親說得很清楚，不希望有任何權屬不明確或混亂，肯定不能有別人干涉我的生意。除此之外，他想做什么都行。”

這時候有個男人步態悠閑地走過來。拉凱什把他介紹給我，這是他的姐夫。他穿著尖頭鞋，一件嶄新的T恤，戴著很多金首飾，正準備出門。他身上的香水味濃過了周圍的花香。透過窗子我能看見穿著制服的侍者們正在布置晚餐餐桌，他們在白色的長桌上準備了十二人份的餐具，其他已經到了的客人在房間里喝酒，感覺像一個夜間儀式。我產生了一種印象，很多人習慣在這里結束他們的一天。

“在印度，好的一面是我們的經濟基本面很強勁。唯一會拖后腿的是基礎設施和教育。要不是這些當權者，孩子的教育不會有問題，路也不會還沒造好。還有腐敗！你知道這些污染檢查員嗎？他們勒索你。我有十九個制造部門，就算每個部門都百分之百符合環境法規，他們還是能把你搞死。這不是開玩笑的，真的不開玩笑。他們能查封你的公司，然后你就完蛋了。

“因為我每個小時都得向客戶提供產品，從不停頓。我只保留三到四個小時的庫存。你知道我平均每天向多少汽車供應零部件？猜猜看，大膽地猜。好吧，我告訴你。每天五千五百輛車。你能想象中間涉及的東西嗎？供應鏈、保底利潤、原材料……汽車這行讓你要用最高標準的精確度來工作。你不能亂來，生產質量不好的零部件，有人為因此沒命的。你得非常精確。我不能告訴客戶我做到了他們要求的99.9%，如果質量差的零部件出去，導致汽車召回，我整個集團都會垮。”

“你是怎么學會這些東西的？”我問。

“幾乎每樣都是從鈴木學來的。對我來說，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公司。毫無疑問。看看他們的系統、他們的流程、他們的員工，還有他們管理供應鏈的協作方法。不是那種‘你搞砸了，滾’。如果你搞砸了，如果你好學，如果能虛心接受自己犯了個錯，而且心態開放，他們會說：‘我們會教你的，我們會和你一輩子在一起。’這就是那些人的做法，日本式的做法。”

拉凱什注意著屋里陸續到來的朋友們，有些走出來用印度口音的英語和他打招呼。他的下屬不時過來就各種安排詢問他的意見，之后，他都順著剛才被打斷的地方繼續講下去。我想象著他工作時的高效率，迅速專心地一件一件處理事情。

但他要去派對了。我們站了起來。整個房子像一個實景劇場：透過玻璃是被照亮的舞臺，各種角色穿著各式各樣的戲服。舞臺的一頭，朋友們靠在深深的沙發里，穿著意大利皮鞋的腳伸出來抖動著。另一頭，一個穿著白色制服的侍者在往大理石噴泉里放鮮花，讓它們在里面漂浮，頭頂上是亮藍色的穆拉諾玻璃制造的巨大水晶燈。

“我過著兩套生活，”拉凱什注視著眼前的一切，“我一邊做汽車生意，同時還做房地產生意。白天我穿著該死的工作服，而且我執行的管理政策是辦公室的大門對任何人敞開，你能想象對于260億的生意這意味著什么嗎？但現在你面前的一切是我的房地產生意賺來的，不是汽車生意。我們已經投資房地產相當長一段時間了。有些是繼承得來的財產，有些大的投資是我父親已經做了一段時間，這些都賺翻了。兩套生活。我絕不會混在一起。”

他對自己的房子很自豪，想在我走之前展示一些最精華的部分。很明顯，這房子的靈感來自各種五星級酒店。有一個按摩房，還有一個用于按摩后放松的房間、一間美麗的客廳和一個鐵板燒餐廳。

他很快地到處走，指給我看各種細節：“一開始我就想在餐桌旁邊有點水的裝飾，所以就有了這個噴泉。”他糾結于各種小瑕疵，談起建筑師，越說越尖刻（顯然因為建筑師可能有自己的想法）。“有時候你要的就是對方能明白你腦袋里想的是什么，然后做出來。”為防我低估他的遠見，他迅速向我解釋我現在看到的不是房子的最終版本——雪茄室還要再裝一套通風系統，水療設施也還沒完成。

房間里坐著的男人中，有一個看到拉凱什馬上站起來。他們握了握手。

“這是我的藝術家，”拉凱什對我說，“他給我搞了很多麻煩，但他還行。”

這個“藝術家”給拉凱什送來他設計的派對邀請樣張，拉凱什遞給我看。這是一張大大的卡片，手感柔軟，上面有燙銀的框紋。“這是為我的一個大型派對做的。我每年都會辦一次。”

“在這兒嗎？”

“我家？絕對不行。他們會把這兒拆了的。派對在馬路對面另一棟‘農舍’里。我們會玩到瘋。”

說到派對，拉凱什興奮起來，他已經喝了好幾杯紅酒，送我出去的時候，還想著欲念那檔子事。他在手機里找了一會兒，然后遞給我，屏幕上是一張照片。

“這是我在倫敦的樣子。看看，藍色的隱形眼鏡。看那時候我有多少頭發。”

這是一張很誘人的照片，十五年前拍的。我把手機還給他的時候，他盯著屏幕，眼里充滿了渴望。

“你知道，現在我結婚了，要出差，要吃飯……生活壓力很大。壓力有很多，我經常把自己和生意往最壞的地方想。你可能覺得我們已經有所成就，但我的野心遠遠比這些大。我沒辦法放松。兄弟，這就是個要命的事。多數時間我每天工作十二或十三個小時，一周六天。唯一放松的時候是做按摩。有的周末我也去度假，但哪怕是在海灘上我也放松不了。”

我們到了前門。如果我之前撞到玻璃留下了任何痕跡，現在都已經被擦掉了。

“說到底，拉納（Rana），唯一重要的就是價值觀。現在，做父母的沒時間管孩子，他們做的就是給孩子很多錢。所以孩子們沒有任何價值觀，把錢大把大把地花在亂七八糟的東西上，卻沒有任何進步。他們只知道錢，但錢不會把你變成一個胸懷寬廣的大人物。錢只是意味著神之前對你還算偏愛。”

“每個人都在努力工作，每個人。你看那個趕牛車的人，他很努力。那為什么我在這兒他在那兒？都是因為神。所以你要尊重這點。你是被選中的那個。神對你很仁慈，如果你不分享這些財富，這些財富有什么好處？我愛我的父母、我的家庭，我會為他們做任何事。我也會為米奇做任何事。如果他過來說，‘滾出這房子，我想搬進來’，我會為了他搬出去。”

米奇就是我們的介紹人，一個非常優秀的房地產大亨，比拉凱什更年輕、更富有。我問他們是怎么認識的。

“你知道，從日本回來以后，我們除了做汽車座椅，也做禮堂座椅和娛樂場所的座椅，用各種多重紋理材料。那時候他正在建他的第一個購物商場，我為商場里的電影院供應座椅，所以我去他的辦公室和他的下屬見面。我下樓梯要走的時候，他正走上來。他問我是誰，然后就在這樓梯上的三十秒里，發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那年，我給他寄請柬，請他來參加我的派對。結果我們家那些混蛋保安忘記把他的名字放到放行名單上，他在門口被趕走了。他甚至提都沒提這件事。哥們兒，他的優雅和謙遜太讓人贊賞了。第二年，我再一次邀請他。那個派對真正鞏固了我們的關系。那天晚上，我們走得非常近，而且之后一直如此。”

我站在外面的夜色里。拉凱什說：“但事實是在這個壞人當道的世界，你有可能會對別人太好了。他們把你的好當作理所當然。我對別人很好，我不是那種無情的人，真的，我不是無情的人。這可能是我的一個缺點。我應該無情無義一點。”

然后，他解釋性地補了一句：“我們赤條條地來到這個世界，然后再赤條條地回去。”

我穿過停車場，里面停滿了拉凱什朋友們的跑車。月色明亮。我坐進自己的車里，開上車道，保安為我示意指路。我一路上經過幾臺為這里供電的巨大發電機，接著是保安室。最后，大門打開，我開上了外面的馬路。這條路兩邊豎著高墻，有點荒涼，沿路蜿蜒穿過各種“農舍”之后，我開上了嘈雜的主路，往城里的方向駛去。

在德里，道路是人們對整個城市的視覺感知的來源。這是一個有種族隔離的城市，一個有階層和氏族忠誠的城市，幾乎沒人愿意看到社會區別的消失，無論他們來自何種社會階層或群體，這里沒有真正的民主空間。德里住宅區的名字都很奇怪，因為很多來自于英殖民時期，這些住宅區與人們對社會階層和安全的偏執聯系在一起，很能說明這座城市的人對家有什么樣的期望。他們住在以街區劃分的小區和房產里，這些街區本身也是社會階層、群體以及殖民地的再次分割。在富人居住區，大門和保安把任何不速之客擋在分隔線以外。社會生活也是一樣。德里和孟買不同，孟買的居民在酒吧和餐館里隨便就會和陌生人聊起來，但在德里，介紹是必須的。人們在接納你之前想要了解你是誰，所以在社交場合的談話中，很多內容都是談論自己認識某位名人或者住在某個區域。如果希望能享受恰當的社會地位，人們就必須宣傳自己的關系網和靠山。在高端人群中，社會空間通過價格標簽來迎合人們把自己和別的社會階層隔離開來的愿望。這就是為什么那些普普通通的夜總會門口會大排長隊，而人們會等著支付2萬盧比的門票入場。

即使是德里曲折蜿蜒的地鐵也無法消除這種隔離。雖然每天有兩百三十萬人搭乘地鐵，但這種交通工具卻被最貧窮和最富有的人忽略。德里的主干道就像我現在開的這條，高低起伏，到處都是喇叭聲，煙霧騰騰——差不多每個人都被迫和我一起移動——而德里的居民可能會從這樣的道路獲得城市給他們的啟示：整個城市，是安排好的。

也許，人們在德里首先會發現的一件事是：這里不怎么適合步行。過去的十五年里，像高速公路一樣的道路越來越多，所以德里有時候被拿來和洛杉磯作比較。這些道路都是為了汽車而造，毫不考慮其他所有的交通需求，因此出行如果靠走路會出奇艱難。來自其他城市的中產“新”德里人有時候會試著在這里步行，但甚至不用等熱心的老德里人沖過來告訴他們這有多不合身份，他們自己就會發現，人行道就是個騙局。這些搖搖晃晃的人行道走著走著就斷了，若人們還是堅持走下去，他們會發現自己爬過了一大堆一大堆的碎石頭，遇到了一大攤一大攤的污水塘，要往里面扔磚頭才能踩著過去，然后還得像瘋了一樣穿過八車道的公路。最后他們很快決定，還是買輛車吧。這就是德里在印度火爆的汽車市場中不成比例地占了很大一部分的原因，也正是這蓬勃的汽車銷售為拉凱什雄心勃勃的增長計劃添了一把火。在街道狹窄的孟買，有很好的火車服務作為城市交通的延伸，讓開車的好處越來越少。而在德里，路都是寬闊、放射狀的大街，只有自己開車才是最方便的。所以在這個首都，1980年時汽車牌照號碼只是四位數，但現在整個城市都因為堵在路上的車子的重量而沉降了。

因此，中產們是透過車窗玻璃來觀看德里這座城市的景象的。如果一個畫家要畫這種中產視角，就像許多19世紀的畫家試著從全新的、有都會感的林蔭大道的視角來描繪巴黎一樣，那么相應地，德里不會有柔和或親密的感覺。正如印象派畫家們不會仔細描繪人物服裝和姿態的細節，畫德里的畫家也不會耐心地表現投在路人臉上的咖啡店的燈光，不會捕捉公共空間中陌生人之間很難察覺的互動。這些都不會出現，有的只是許多閃光燈照亮的毫不相關的瞬間：《名利場》（Vogue）或《汽車》（Autocar）雜志的封面在窗前一閃而過，因為賣雜志的小販們在等紅燈的車輛之間穿梭；被風吹得頭發亂飛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坐在飛馳而過的摩托車后面；流浪狗被車頭燈照亮的一只眼睛；婚慶樂隊里金光燦燦的樂器和舞蹈隊伍的旋轉，還有新郎不可思議的白色高頭大馬；一群變性人把臉貼上車窗時留下的口紅；公路中心分隔帶上蓋著毯子的模糊人形；另一輛車里的人臉上來自拐彎時后視鏡的反射而略過的條形光斑……還有很多其他不成型的印象和難以分辨的動物和人。

以下是我開車時的視野。每個方向上都交織著車燈，都是能把人照得什么也看不見的大燈。眼前飛快地閃過各種昏暗的人影，在夜色里無從辨別。車喇叭不斷地響著，因為車流不是讓你隨波前進的順流，而是需要劈出一條路來的叢林。人們開車的方式好像別人都是敵人，而事實也正是如此：凡是沒有開足馬力搶占的空間或機會，都會立刻被其他人搶走。你在這里會看到，紅燈時，每個人都在到處張望，以確保別人不能耍滑頭搶占自己的先機。

有些在前面的車就這樣直接開過路口，穿過對向的車流——這些人希望在諸如交通信號燈這種對老百姓的限制中維護自己的自由。其他車也都一心一意地往前挪，占領每一寸能占領的路面，努力擋住旁邊的車，不讓別人在紅燈滅了的時候超到他們前面去。一堆車就這樣擠著往前，慢慢涌向路口。

等紅綠燈的時候可不是休閑時間。恰恰相反，戰場的焦慮正是在這段“停火”中爆發的。司機們飽受焦慮的折磨。他們點煙、罵娘、拍打方向盤，徒勞地按喇叭。這種緊張的等待讓人無法忍受。

燈終于變綠了。就在這一刻，前面車的發動機開始醞釀，眼看就要起步了，卻失去控制熄火了。

這時候身后響起一片憤怒的喇叭聲，好像哀嚎著：燈綠了，綠燈的承諾卻沒有兌現，太糟糕了，我們一直都知道這世界會變成一個騙局……然后熄火的發動機踉踉蹌蹌地起死回生，這一大堆車開走了。

這是種奇怪的“行為焦慮”。

有一次我開車的時候，旁邊坐著位以色列的心理學家，這種情況令他很困擾。“以色列有過大屠殺，”他說，“但我們沒有這樣的行為。我們把那些經歷放在身后。我在這里看到的是奴隸的行為。這是一種求生模式。為什么他們這么害怕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印度其他城市的人不是這樣開車的。但德里是這樣一個地方，當地人普遍認為（甚于班加羅爾［Bangalore］或孟買），整個世界都在全盤否定他們，所以如果要過好日子，就需要不斷爭搶、篡改規則。每個人，包括我自己，用行賄和個人關系獲得自己需要的東西——簽證、駕駛證、快速了結官司、上學、邀請函。如果一座城市的生活看上去完全要靠社會地位，那這是有很好的理由的——權力、財富和關系網能讓生活輕松美好很多。學校和醫院的管理者很多時間都不是花在管理上，而是用來關照那些重要的大人物和他們的依附者，那些叫囂著要獲得優先對待的人。在學校和醫院這樣的地方，整個系統都變得和道路交通一樣混亂不堪，但沒人想做一無所得的無名大眾。可能有人認為，像德里這樣一個不平等根深蒂固的地方，會孕育出對民主的渴望，但事實不是這樣。德里人的幻想是封建式的。即使是那些幾乎沒有什么社會權利的人，也非常尊重有權階級的特權。他們或許是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同樣享受那凌駕于法律和習俗之上的特權吧。看看我們周圍所有的廣告，這些廣告把大眾文化和貴族派頭亂七八糟地攪在一起——一件輕易可得的消費品能把你變成所向披靡的人，而其他人則被擋在身后。

特權也控制著道路。對行駛機會的爭奪并不是平等的。染色玻璃車窗后的人，其地位和身份或許難以精確辨別，但這個新時代用“價格”這一單一且四海通用的標準，把在過去相對難以解釋的身份和地位形式重寫了一遍。現在一切變得很簡單，優勢屬于最貴的車。梅賽德斯們狂閃馬魯蒂，示意它們讓路，好讓自己開過去，馬魯蒂們則順從地開到一邊。寶馬車的隔音效果太好了，好到乘客們甚至聽不見司機蠻橫地按喇叭，趕走一切擋在他們面前的東西。淺黃色的悍馬沖破堵得一塌糊涂的車流，越過水泥路肩，開到空著的公共汽車專用道上，然后加速超過旁邊的車。這當然是違法的，但交警扭過頭看也不看，他們憑什么拿自己的生活來冒險，挑戰這些富家子弟的特權？沒錯，如果需要，這些按照品牌排名的特權會以暴力實現：現代車的司機從車里出來，踢著馬魯蒂的車門，因為他被一直擋在后面。同時，梅賽德斯里的年輕人追著一個開塔塔（Tata）[[3]](#Yin_Du_De_Ta_Ta_Qi_Che_Gong_Si)的司機，他居然敢隔著車窗罵他們。他們追上他，扇他的耳光，仿佛他是個不聽話的孩子。所以，很容易就看出來為什么大多數人只要買得起就不會開一輛便宜的車。在能力范圍內買輛最好的車，這種投資帶來的好處實實在在。

可以想象，這一切把所有其他人置于什么境地。汽車霸道地在路上占了主導，卻只承擔不到兩成的道路運輸。大多數人出門是坐機動黃包車、公共汽車和小型摩托車，還有為數眾多的市民在這些擁擠的道路上騎自行車或者步行。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經濟底層，機動車很少在意他們。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數在德里高得嚇人，這些人就是其中的主要群體。因為當車子一天到晚撞在一起，車速倒很少高到使自己的乘客受傷，但這個速度足以對這些在鋼筋鐵骨前毫無防護的血肉之軀造成嚴重傷害。

對無數德里居民來說，街道并不只是通道，而是家。他們的血肉之軀從來不會離路上的車很遠。

現在這個時間，我已經能看到他們在晚上的休息地安頓下來。很多人是因為“開發”或“房地產”而成為難民。他們過去過著相對穩定的生活，后來在印度的經濟繁榮中出現的新工廠和私人城鎮把他們從自己的家園趕走。還有一些是勞工和宗教朝圣者，他們來到這座城市做完自己的事，然后離開。他們背井離鄉，窮到甚至沒法兒給自己搞個帳篷，所以他們就睡在這里，在車燈強光的流轉中把頭埋在毯子里。

這條繁忙道路中央高起的隔離帶大約是兩個成年人能躺下的寬度。也許看上去不像一張舒適的床，但兩邊的車流擋住了野狗和其他動物的干擾。當然這個地方不能抵御炎熱、寒冷或蚊蟲，而且對于那些清醒的人來說，晚上只能半睡半醒著。半睡半醒是因為永遠不能放松警惕，畢竟窮人也會被搶劫，而且即使再有經驗的露宿者也可能滾到路上去。即便她沒有滾到路上，那么她的孩子也有可能，孩子們在夢里更多動。

人力車夫和他們的車睡在一起。車子提供了些隔離，但帶來另外的問題。腳踏人力車的座椅雖然比人行道要軟，卻只夠半身大小。司機們因此以各種奇怪的、體操般的睡姿扭曲在一起。現在你能看到他們的腳和腿要么伸出車子的欄桿外，要么勾在樹上垂掛下來的繩子里。

這些流動人群把自己的財物用品存放在城市的“家具”里。晚上，你會看到人們爬上屋頂，把早晨扔上去的鋪蓋拿下來。幾乎每根樹杈、每個水泥壁龕里都塞滿了街頭生活者的衣服和塑料瓶。每堵墻上只要有凸起的地方，都掛著布袋子。從已拆的帳篷中留下來的防水布和竹竿被捆扎在樹冠上，準備成為另一個建筑。

對成千上萬居無定所的人來說，這個城市的外在功能是他們巨大的臥室、浴室和櫥柜，這賦予公路和街道一種破敗的氣息。但這些磨損的邊緣角落卻是這條熱鬧的路上最有畫面感的景象——有人靠墻而睡，磨蝕了墻上的卡通畫，釘子上繞著繩子，欄桿上曬著被子。讓這座城市運轉起來的那些人的建筑同樣破敗，甚至更慘。比方說我現在開的這條路，最近拓寬了，兩旁一排排房屋的前立面都在拓寬的過程中被拆掉了。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這段路看著就像是戰區。沖擊力更強的是，每個開車經過的人都能看到：在被挖斷的房間里，生活照舊。即使在較高的樓層，上面的人可能從地板斷裂的邊緣掉下來摔死，但房間里仍然亮著燈，桌子靠墻放著，職員們打電話的時候，捂起耳朵隔離街上的噪音。卡車開過的風把墻上的日歷吹得翻起來，天花板上的電扇則攪動著汽車尾氣的煙霧。

外面，枯萎的樹杵在碎石堆里，像燒過的火柴棍。

我從一座斑駁的立交橋下開過。德里這些用立交橋連接的道路，像過山車軌道一樣上升下降。這些巨大的石頭工程這里一個、那里一個，感覺不像是一個系統，它們每一座都宣告著不同的交通規則，而且和下一個看上去一點也不像。它們是由好幾個不同的建設公司所造，每座設計都不一樣：用的磚頭不同，街燈也不同，裝飾風格各成一派。從一座開到另一座，你會發現路一會兒變寬，一會兒莫名地變窄，讓人一會兒往前沖刺，一會兒又只能慢慢挪，德里交通的很大一部分都是這種節奏。有兩座立交橋的下匝道出口在同一個地方，好像根本沒有通知對方，于是快速行進的車流變成了一攤參差交錯的大堵車，要二十分鐘才能從里面掙脫出來。

像這個城市里很多其他基礎設施一樣，這些露天的立交橋盡管剛剛建成，但看上去已經很老舊了。德里最近耗費幾十億美元進行城市美化，這些工程在2010年英聯邦運動會（Commonwealth Games）舉辦前剛好及時完工，可現在已幾乎看不出來了。在主要路段中間，大量新建的隔離墻已經破損，倒在路面上。體育館生銹的屋頂也在往下掉，停車場破破爛爛、空空蕩蕩。為了調和大量新水泥建筑硬邦邦的感覺，當時種了幾千棵樹，可這些樹枯萎已久，好像本來就沒打算用到運動會以后。在德里，時間令人毛骨悚然。這里的時間是一種強力溶劑，使公車站和公寓甚至在完工之前就開始漏水掉磚，讓新建好的道路凹陷出水坑（這些路只在通車剪彩的那一刻是完好的）。這里的時間能使剛建成的大路變得多余，這些路蠻橫地穿過貧民窟，通向頂級的體育場館設施，但這些設施早已關閉荒廢。存在于在德里，就是存在于這種時間里，每一樣東西都未老先衰，每一樣東西都已經向腐朽和荒蕪低頭。

沒有什么是持久的，每件東西都在人們眼前逝去。在這種大趨勢下，任何東西的靈魂都很難保存。也許這就是拉凱什古色古香的私人花園那么奪人眼球的原因。以德里的情形，它的力量幾乎是存在主義的。拉凱什似乎寄希望于每一塊被園丁們掃回原處的碎石，試圖讓自己擺脫這普遍的無常。

我拐彎穿過舊時英殖民德里的中心，這里仍被保留為城市的行政中心，所以基本不受這個城市其他地方拆除和重建工程的影響。在這里，頭頂上的樹木郁郁蔥蔥，交通暢行無阻。我經過了兩頭大象，它們穩穩地沿路漫步，這里停停那里停停，把樹枝拽下來，一面放到嘴里安安靜靜地嚼著，一面跋涉回家。汽車的頭燈照到它們膝蓋的位置，被照亮的只有它們彎曲的腿。又圓又大的象背上坐著昏昏欲睡的馴象人，象背上升，高過一切，遁入黑暗。

每次看到這些動物，我心里瞬間就會涌起對德里滿滿的愛。就算在這樣一個大都市，這些象看起來還是大得驚人——大得足以成為城市沖突的洗滌槽，如雨林一般驅散空氣里的毒氣。

就在大象上方，看上去有個東西在緩慢地移動。那是一個巨大的水箱。德里有一大片區域（不只是貧窮的區域）沒有自來水，所以必須用卡車灌滿住家的水箱。這種方法又貴又費人工，而且這些水箱都漏得一塌糊涂。這好像是這個城市冷幽默的一部分——在這里，水是如此珍貴，甚至有專門的水資源委員會來管控，但是這些水卻在塵土飛揚的路上灑掉了一半。

這輛又銹又破的卡車下面有好幾個地方不時地會有水漏出來。仿佛是為了增加喜劇效果，操作人員未關上車頂的灌水口，所以一剎車就會有很多水晃出來。

這輛車在交通信號燈前停了下來，我也和它一起停下來。

交通信號燈是紅燈，黃燈也在閃。在德里，我還看到過黃燈亮著綠燈在閃、紅燈和綠燈同時亮著，或者所有方向的黃燈都在閃。你可以把這種拓展開來的交通信號燈語言視為歡快喜慶的，但它的出現確實源自政府的無奈和憂慮，因為他們無法阻止司機晚上經過這樣的路口時，不管信號燈是什么顏色都高速沖過去，害了別人也害了自己。想要阻止金錢、酒精和當代的匆促，傳統的紅燈太靜態，或許太過時了，所以要用一些更新鮮帶勁的東西。同時閃爍不同顏色的信號燈可能只是給人們一個刺激，就算他們不停下，至少得猶豫一下。

另一些情況下，威力漸弱的信號燈會加上文字來助陣——“紅燈不準動，綠燈才能走”。

堆在人行道上的是大批上一代信號燈生銹的尸體。

一個斷臂男人到停下來的車窗前乞討。很明顯，他沒辦法接錢，但他把褲子口袋伸給任何想表現一下大方的人。我想的是，一個沒有手臂的人怎么吃飯，怎么解開褲子的紐扣？

這是一個很大的路口，周圍閃爍著光線強烈的霓虹燈。道路被突起的三角形路島分隔，上面都是在睡覺的人。一輛空調大巴從我面前橫穿而過，上面坐滿了退休的歐洲游客，有的在讀旅游手冊，有的也在睡覺。

路口周圍全是大幅廣告牌。有一塊是個新的商用房產開發項目，叫“好望角”，上面是電腦畫的效果圖，有光線通透的公寓、停得整整齊齊的寶馬車、漂亮的花床，還有淺色皮膚的富豪們在泳池邊歡笑。十年前，這樣的項目會取個美國地名，但那段時間德里的消費者變得越來越世故，他們意識到對自己的品味來說，美國郊區太民主、太開放了。他們追求的是華麗魅惑，于是就轉向了南非、俄羅斯和迪拜，在那里控制的力量更強些。

另一塊牌子是個大商場的廣告，上面有一個因為能試穿很多不同衣服而心情大好的男人。廣告語是“變化把無聊趕走”。我看了一會兒才看懂這句話是什么意思。我剛剛開了四十分鐘車，穿過一座千瘡百孔的城市，現在立刻被帶進了一場腦力訓練，被帶進轉變期的德里在意識層面上打開的巨大裂口。但我接著意識到，這個廣告說的是一個新詞——無聊。在這個充斥著暴發戶和帝國野心的忙碌都市，十五年前還沒見過微波爐的人們現在開著蘭博基尼——顯然，最大的威脅是倦怠。

廣告牌旁邊有一個巨大的垃圾堆，豬在塑料袋和腐敗的食物中拱來拱去。我看了下垃圾堆上那塊臟兮兮的牌子，上面寫著“大便不限”。我吃了一驚，又看了一遍，這一次上面的字變成了“優秀無限”。

我一定是累了。

信號燈變了。水箱顛了一下，又一波水從后面翻出來打濕了路面。我在一個洞穴般的立交橋下拐彎，這里晾著一排排衣服，大人在睡覺，小孩拿著棍子玩。我馬上就能到家了。

忽然間，周圍的車子都在剎車或繞行。面前的車都分流了，我看見我所在的車道上站著一個穿得破破爛爛的年輕人。我把車速慢下來，期望他能讓開。但他站著，傲慢地看著我，向我舉起手掌，我只能停車。我停在離他只有幾英寸的地方，有那么一會兒，我們互相瞪著對方。他大概十六歲，頭發亂糟糟的，脖子上帶著好多串亮閃閃的花環，上面裝飾著神力元素圖案，有迦梨女神（Kali）、杜爾嘎女神（Durga）和濕婆（Shiva）[[4]](#San_Zhe_Jie_Wei_Yin_Du_Jiao_De_S)。真的有很多串，整捆東西從脖子一直堆到耳朵，遮住了他半張臉。

在這些花環上面，他戴著差不多數量的公司門禁卡，這些磁卡穿著編織帶，上面印著數碼照片，是許多企業員工掛在脖子上用來進出辦公室的。他戴著三十到四十張卡——這些是通往新全球網絡的鑰匙。

這是一種技能，對長久以來生活在這個被嚴重掠奪的地方的人而言，這是有利的。這個技能就是：掛著你信仰的舊神，但也別忘了新神。

我看著他，他抓起一張卡片，大搖大擺地舉到我面前，“我說你能走，你才能走”。他瞪著我的眼睛，容光煥發的樣子。我們互相瞪著，不知道過了多久。他毫不躲避我的目光，直到滿意地認為我已經接受了他的權威。然后，他慢慢走開，走到了車流的快車道里。我看著他走掉，把腳從剎車上拿開，再一次啟程往家開去。

注釋

[[1]](#_1_1)伊勒杜密什（Shams-ud-Din Iltutmish，1211—1236年在位）是德里蘇丹國（Delhi Sultanate）庫特布·沙希王朝（又稱奴隸王朝［Mamluk Dynasty］）的第三任蘇丹，任內大幅擴張領土。

[[2]](#_2_1)馬魯蒂鈴木（又作“風神鈴木”）是印度國有企業馬魯蒂·烏德西葛（Maruti Udyog Limited）和日本鈴木合資的汽車公司，為印度家用車市占率第一的品牌。

[[3]](#_3_1)印度的塔塔汽車公司（Tata Motors），為當地商用車市占率第一的品牌，曾推出全世界最便宜的汽車Tata Nao。2017年位列《財富》雜志評選的全球五百強企業的第二百四十七名。

[[4]](#_4)三者皆為印度教的神。濕婆為三大神之一，為毀天之神，兼具生殖與毀滅、創造與破壞之雙重性格，形象為三眼四手。濕婆之妻為雪山神女（Parvat），有兩個兇相化身，分別為迦梨（又作“時母”）及杜爾嘎（又作“難近母”）。前者有四只手臂，全身黑色，脖子上掛一串人頭；后者有十手三眼，手持多種武器、法器，職掌降魔。

## 一　“從圍城到世界之城”

有人說，印度城市中，加爾各答（Kolkata）是英殖民時期的首都，擁有19世紀；孟買是電影和商業中心，掌握著20世紀；而德里，作為政治活動的所在地，是21世紀的主人。

在1911年英國人把行政機構全搬到德里前，印度的首都是孟加拉邦（Bengal）東部的加爾各答。當地人和英國人在那里交流互動了幾十年，創造了一個英國化的中產階級，為英屬印度提供了大量官員和專業人員。我的祖父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個會計，為北印度的很多英國公司工作過。

1947年的印巴分治將英屬印度領土分為了兩個新的國家，即印度和（東、西）巴基斯坦。那時，祖父生活在拉合爾（Lahore）[[1]](#Wei_Yu_Ba_Ji_Si_Tan__Ceng_Shi_Mo)，是商業聯合保險公司首席會計。我父親的記憶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的。所有的記憶都很美好：家庭富裕、城市和諧。回憶往昔，父親滿是深情。他記得學校里不同種族的同學相處愉快，有印度教徒、穆斯林、錫克教徒，還有親切的穆斯林校長。但很明顯，從他十歲起，寧靜的生活就被政治打破了。隨著印巴分治的到來，拉合爾的警察總長（也是祖父的橋牌搭檔）阿拉丁·汗（Allauddin Khan）開始擔心他這位印度教朋友的安全。他用自己的車把父親全家送到火車站，然后派警衛陪他們一路到了分治后屬于另一邊的阿姆利則（Amritsar）。阿拉丁·汗或許真的救了他們的命，因為在隨后的暴力騷亂中，父親家住過的房子被燒毀，印度教房東全家也遭到殺害。

父親一家回到孟加拉——孟加拉東部當時也在鬧分治，發現自己來到了游戲的另一邊。他記得被屠殺的穆斯林像戰利品一樣被排列在加爾各答街道的兩旁，那種場面不像是真實世界的人能做得出來的。

經歷了這些劇變，祖父心里好像有什么東西斷了一樣，變得喜怒無常、沉默寡言。他順利獲得了另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卻因為堅持原則而離職，這個有九個孩子的家庭忽然間沒了收入。家里被斷電，也買不起食物和蠟燭。祖父從放債人那里借錢付賬單，債主派流氓來討債的時候，十三歲的父親不得不在街上替祖父懇求他們。不想面對這一切的祖父，把自己關在房間里抽煙，讀英語間諜小說。

朋友和親戚都躲著他們。后來父親找了一份工作，挨家挨戶賣食用油，使全家不至于挨餓。

他先是賣給認識的人。一天，他敲開一個親戚阿姨的門，阿姨看他那么瘦，就拿了午飯給他吃。接著他把貨又拿到了另一個阿姨家，她也給他吃的。父親接受了，坐下來吃飯，因為他不知道什么時候才會再有下一頓，但剛吃到一半時，第一個阿姨正好過來看到他又在吃東西，嘴里塞得滿滿的。即使是六十年后說起這個故事，父親依然因為羞愧而顫抖，因為他當時的境地是如此絕望，無處隱藏。

后來情況好些了。祖父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在一家英國拖拉機公司做首席會計。因為職位在德里，所以全家就搬去了首都，住在一個叫卡羅爾花園（Karol Bagh）[[2]](#BaghZai_Yin_Di_Yu_Zhong_Shi_Hua)的區。從名字就可以看出，以前這里是一個莫臥兒花園。20世紀初，因為要建英式城市而被拆遷的村民們到這里住下，后來很多因為分治成為難民的人也來到了這里。但到20世紀50年代，這個地方依然綠意盎然。父親記得上學的時候會走過公園和慵懶的街道。“德里那時候很美，”父親說，“我經常借輛自行車，騎在寬闊空曠的路上，跑遍整個城市。”

那個年代，每個印度中產家庭所認為的理想狀態就是家里有人有一份終生的工作，但祖父的這個差事只干了一年。他嫉妒自己的蘇格蘭上司麥克弗森（McPherson）先生，決定向在加爾各答的總經理投訴他。他利用自己是高級會計的機會，脅迫出納從備用金里拿出錢來買了一張到加爾各答的頭等火車票，去尋求滿意的結果，但他立刻就被解雇了。

祖父是個親英派。他最著名的育兒理論就是：“他們必須說英語。”他要求晚飯時必須說英語；出門時，他會用優雅講究的英語給孩子們寫信。但離開拉合爾失去所有根基之后，他在英國公司里的狀況似乎暗暗地、深深地折磨著他。他陷入沮喪，由于覺得受到侮辱，時不時爆發，而這些侮辱有時候是真實的，有時候是他想象出來的。整個家庭再度陷入貧困，搬回了加爾各答。祖父后來又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有個英國上司要求祖父不要在辦公室里抽煙，被他看作反印度人的蔑視，于是甩手走人。

我的祖母出身于富裕家庭，那幾年快被逼瘋了：因為恐懼和饑餓，因為社會恥辱，也因為孩子們只能在樓梯間學習——孩子們學習的時候，有個好心的錫克看門人會特地為他們把燈留著。她不停地回憶拉合爾，那里現在屬于巴基斯坦。在那里，他們的生活曾經富足快樂。

這種情況下，父親想了個計劃來挽救家庭的危機。當時德國為愿意去做外籍勞工的人提供廉價交通，而且保證就業。父親決定以此作為跳板去英國學習。他覺得，等他回來就不會再有失業或饑餓的問題了。

父親出發前的幾個禮拜，親英的祖父坐在陽臺上，朝著來往行人驕傲地大喊：“我兒子要去英格蘭了！”

父親在孟買上船，那是他人生中最無憂無慮的兩個禮拜。船航行穿越了阿拉伯海，經過蘇伊士運河到地中海，最終在熱那亞靠岸。父親從那里坐火車到斯圖加特（Stuttgart），作為無技能勞工在一家造紙場干了一年。1962年，他到了倫敦，開始學習會計，為英國鐵路公司工作。他用第一份工資為祖父買了一支派克筆。祖父寫信感謝他說：“我可以充滿信心地說，你送我的鋼筆是印度最著名的鋼筆。至少在加爾各答，沒有一個長眼睛的人沒看到過它。”

父親去東倫敦一對年輕的猶太人夫婦家看房子。這家的妻子是希特勒統治時期的難民，是全家唯一從納粹集中營里活著逃出來的。父親喜歡這對夫婦，他們也喜歡他。但另一間房間已經租給了一個南非來的白人，他發現父親想要搬進來之后很警覺，慌忙把女主人拉到一邊說：“我不能和有色人種住在一起！”

女主人回答他說：“那你今天就可以走了。”她把南非人趕了出去，而后父親在那棟房子住了很多年。

他原來的打算只是在倫敦暫住。他的家在加爾各答，那是他會回去的地方。他想念深愛的印度斯坦尼音樂（北印度古典音樂）。那時候這種音樂正在加爾各答風行，他青春期的很多時光都是整晚流連在音樂會場地的窗口外，不買票聽音樂度過的。而且，他也不反對家里在出發之前為他安排的婚約。大人們希望他在離家期間不要受到西方女孩兒的關注，他們覺得這會害了他。

但20世紀60年代初的倫敦讓父親興奮不已。他一直都想要擺脫束縛，現在發現自己身處一個可以隨心所欲的世界——可以認識各種人、體驗各種經歷。他閱讀歐洲史，喜歡上了爵士樂，去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聽艾拉（Ella）[[3]](#Zhi_Ai_La__Fei_Zi_Jie_La_De__Ell)和路易斯（Louis）[[4]](#Zhi_Lu_Yi_Si__A_Mu_Si_Te_Lang__L)。他發現自己身處一個很專業的體制中，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升職，一切都簡單得讓人開心。很快他就能給家里寄錢了。他周圍也都是和他一樣新來的人，都是忽然之間擺脫了所有羈絆準備好要努力生活。他交了女朋友，也去看了電影和西區的表演。

1965年11月12日，父親午休時買了一份報紙，讀到羅德西亞（Rhodesia）[[5]](#Hou_Lai_De_Jin_Ba_Bu_Wei__Zimbab)宣布從英國獨立的消息。新聞是前一天通過電報傳回倫敦的。經歷了之前印度從英國的突然獨立，又一個國家大膽獨立的消息讓他非常震驚。他走進一家餐館，被領到唯一的空位上，對面坐著個漂亮的年輕姑娘。父親一直沉浸在報紙上的新聞里，直到發現服務生把他和姑娘點的餐弄混了。兩個人大笑起來，換回了盤子，開始聊天，約定第二天再見面。

其實，這段關系開始時，更值得一提的是我母親。父親二十七歲，遠離家鄉，而且已經有了些見識。母親當時才十八歲，是一家保險公司的職員，仍然和工薪階層的父母一起住在埃塞克斯（Essex）的一個小鎮，生活里就是宗教節日、鄰里八卦和只有魚吃的星期五餐點[[6]](#Yi_Ju_Tian_Zhu_Jiao_Chuan_Tong)。1965年遇見父親的那天前，嚴格地說她只見過一個印度人。她身邊的很多人都被這段新的友誼嚇到了。她的父母很生氣，朋友們不再和她說話，但這段羅曼史堅持了下來。他們去意大利度假，父親給加爾各答的家里寄照片，展示他現在有能力過歐洲的田園生活。他把照片剪掉一半，這樣家里就看不見和他一起旅行的西方女孩兒了。

父親仍然抱著玩樂的態度，覺得一切都是暫時的，自己終將回家。但隨著時間推移，他發現自己陷了進去。不久他就結婚了，住在肯特（Kent），在村里的板球隊打球。又不久，他有了孩子，在一個跨國公司里獲得了很好的職位。他很快安頓了下來。

父親的事業很成功。他把兩個孩子送去牛津念書，還因為對國家的服務受到認可獲得了大英帝國員佐勛章（Memb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在很多方面，他堪稱成功移民的楷模。但這不是故事的全部，因為這一切無法解釋他退休后的無精打采。他總有一種感覺，覺得從來沒有真正“到達”。這也不能解釋他依然矍鑠的外表下隱藏的早年的苦痛——一種甚至都無法真正說清的苦痛，只有在他關上門躺在浴缸里聽印度斯坦尼音樂的時候，它才出來肆意游蕩。這是一種放逐的苦痛，雖然并不是強加于他的，甚至是無意識的，但卻和真正的放逐一樣。這種放逐是來自生活于某地，而那里的人完全不明白那些塑造他的強大經驗——那些折磨人的經驗。這還是一種“再也回不去”的放逐——因為對加爾各答的家人來說，他慢慢變成了一個難以理解的外國人，他們的生活無法溝通。在他身邊，他們變得手足無措、謹小慎微。祖父和祖母很早都過世了，一些兄弟姐妹去過他在劍橋的家，但他們的到來從來沒有真的為父親帶來他渴望的完滿。生活的物質面——房子、照片、各種物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沒能表達生活本身，甚至在他自己家也會發生不理解的情況。與此同時，他自己的加爾各答之旅，在那個他仍稱為“家”的地方，更讓人失望。因為半個世紀過去，他長大的地方已經了無痕跡，在那里他找不到任何自己。這些日子里，連名字都變了的加爾各答[[7]](#Jia_Er_Ge_Da_Xian_Ming_Kolkata_J)眼看著父親長久地徘徊在憤怒的邊緣：這不是它應有的樣子，大家都變了，他無法告訴兄弟姐妹自己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甚至在這座房子里，墻上頗有儀式感地掛著父母照片的地方，也沒有一個人懂他。

在這一切發生之前，回到1963年，父親最開始到倫敦的那段時間。那時候，他還沒認識母親，事業也尚未成功。有一天，他在倫敦坐地鐵，從面前黑黑的車窗上看到自己的樣子。同時在余光里，他看到了別的東西：在加爾各答，去世的祖父被放進一輛靈車。一切生動得好像就發生在地鐵車廂里一樣，他甚至能看到車子側面殯儀公司的名字。到了朋友家，他告訴他們剛才的事情，然后失控地大哭起來。他的朋友們一下子不知道要怎么開口告訴他剛剛收到的電報，一直到那天深夜，他才知道祖父真的去世了。

那時，父親離開加爾各答才十八個月。這是他覺得自己的成功并不完滿的另一個理由：為了那個人，那個他反抗的人，他一心逼自己有所成就，而那個人卻沒能活到他功成名就之日。

本世紀伊始，我在紐約的一家營銷咨詢公司工作，漸漸地，工作成了負擔。我越來越沉迷于自己晚上寫的小說，還愛上了一個女人，她住在地球的另一端——德里。所以，2000年底，我向著反方向，走上了與父親相仿的旅程。

我帶著一個行李箱到了德里，還有一盒為寫作收集的筆記和文章。所有其他東西都寄放在新澤西一個叔叔那里。我覺得自己不會待很久。我不知道寫一本小說要花多長時間，但肯定不會超過六個月。我沒有想待在德里，小時候去加爾各答的路上經過德里好幾次，記憶里這是一個污染嚴重、毫無吸引力的大城市。我一點也不懷疑能說服我的愛人放棄這個地方，和我一起回到璀璨的曼哈頓。

但到德里以后，這種想法很快就變了。不能簡單地說我愛上了這座城市，因為同時我也深深地憎恨它。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完全淪陷在這里。德里有一種吸引力，仿佛它的魅力超越了單純的讓人喜歡或不喜歡。2000年，我所有安住于過去的舒適和安穩將被打亂。這座城市是一個關乎預言和可能性的漩渦。純粹是碰巧，我被卷入了這個時代最洶涌的洪流之一。完全出乎計劃地，我留了下來。

現在我還在德里，在這里。十多年過去了，新澤西的叔叔每次搬家都得把地下室里我的那些落滿灰塵的東西搬到下一個家的地下室。

我到德里的時候，這里已經歷了十年由1991年“自由化”帶來的變化。也就是說，自印度獨立起，打破封閉的措施和對中央計劃經濟的改革打開了印度的國門，把這個國家開放給全世界的產品、媒體和資本。

我來之前的十年，這個城市的生活里發生的主要是所謂“軟件”的變化，而它的“硬件”相對來說變化不大。中產階級的房子里回響著新的廣告和外國電視節目，陌生的夢想在白色的房間里展開，但原來的建筑——分別為夏天和冬天修建的背陰房間和陽臺——仍然原封不動。以前只有那些有海外關系的人才能買到的進口牛仔褲現在在商店里隨處可見，但這些牛仔褲仍然要么放在康諾特廣場（Connaught Place）老舊狹窄的屋子里（那是英殖民時期的商業街），要么放在20世紀60年代建造的已經搖搖欲墜的本地集市中。一場大規模的拆除和重建運動還未發生，它即將主宰我熟悉的德里，以追求全球主義之名，大肆拆除這個城市的硬件設施。一家主流報刊給這場運動起了個口號——“從圍城到世界之城”。

那場拆遷將使很多已經在德里沉淀下來的東西消失殆盡。幾十萬窮人被迫搬家，空出來的地方則用于建造商廈和公寓——大量財富和資源從城市最貧困的人那里轉移到最富有的市民手里，很多窮人在自己的城市里成了難民，工薪階層的生活總體上更邊緣化和動蕩。21世紀初，以美化市容之名，很多小本生意被毀掉了。比如那些非正規的茶攤兒，在那兒你能花2盧比點一杯甜甜的熱茶，坐在一把塑料椅子上，感覺自己與周圍的人和車流神秘地隔絕開來。拆除的大潮中，大量富人房主的房子也被拆掉了。他們的情況是，在那十年的房地產繁榮期里，他們拆掉自己原來的房子，建造公寓出售，從中套現獲利。這些新公寓為了獲得最大的建筑面積并提升售價，不像以前的建筑那樣會建陽臺。住客的生活退回到有空調的室內，從前各家在午后的陽臺上聊著家長里短的場景不再有了。

但在2000年，這些都還沒發生。這座城市的很多地方，人們繼續生活在一種老式的時光里。分治難民從自己的家鄉小鎮把這種無精打采的狀態帶到這里，堅持在自己多年前建立起來的生活氛圍里度日。我發現，那年冬天自己占據的這間小小公寓位于一個原本分配給這些難民的街區。從公寓望出去，我能看見他們——現在都是老人了，裹在披肩里，坐在室外，在屋頂上、陽臺上，一動不動。印度北部的冬天很冷，為夏天設計的屋子有石頭臺階，卻沒有暖氣，屋里的溫度和外面一樣。所以我的鄰居們和他們農村里的祖輩一樣，同樣珍惜冬天的慰藉品——手里冒著熱氣的姜茶，還有下午照在臉上的淺黃色陽光。他們的子女們外出工作，孫子輩在學校上學，這些散發著莊重氣質的鄰居給我周圍帶來了另一個時代的寧靜：收購廢紙和玻璃的人騎著自行車，不緊不慢地穿梭在房子之間；賣蔬菜的小販推著推車在陽光斑駁的街道上叫賣，耐心而平靜。有時候，一個老年婦女會叫住他，要一點菜，談一個價錢。她會把錢放在一個籃子里，從自家樓頂放下去，小販拿了錢，把菜放進籃子里，她再慢慢把籃子拉上去。

過去的德里休息得也很早。現在已經難以記起那時的情況，因為來這里之后的幾年里，我的記憶里都是這座城市各種燈光閃耀的咖啡店、餐館、酒吧和俱樂部。現在周末的晚上，城里街上擠滿了泡吧的人，寸步難行。但2000年的時候，這些都還不存在。那時候，以往的保守氛圍統治了這個城市的夜晚。很多地方的商店9點左右就關門了，之后街上空空蕩蕩。我的鄰居們絕對是相信家庭美德和早起早睡的人，晚上幾乎不會出去干什么。分治帶來的恐怖和損失深刻地塑造了德里這一代的中產階級，他們生活節約，對外出疑心重重，覺得在餐館吃陌生人做的菜是一種詛咒。這就是我到達時候的德里，一個和我剛剛離開的紐約非常不同的城市——這座城市很少企圖引誘或娛樂你，每天一結束就送你回家。

即使是現在我身邊的這些波西米亞分子，那時候的夜生活就是待在家里，和過去幾十年沒什么兩樣。我們晚上不出去，因為沒有地方可去。大家在各種公寓里聚會，這些公寓又小又簡陋，而且很便宜。房間里因為抽煙而煙霧騰騰，我們墊著墊子坐在地板上，圍著一堆朗姆或者威士忌酒瓶談話。

所有的談話都被其所在的時刻充滿。正是通過那些聊天的夜晚，我意識到自己在一個非凡的時期來到了一個非凡的地方。

我發現自己身處德里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之中，他們說話的那種感覺我之前從來沒有在別的地方碰到過。實際上，在那之后，就算在同一個地方，那種感覺也再沒出現過。當然，他們是一群才華和創意都無與倫比的人，但他們談話中那種熱烈的能量也來自外面的這座城市。舊的正在死去，新的正在醞釀，我們生活在這之間，沒有什么已然決斷，一切皆有可能。每個人都試著吸收、想象這座城市會變成什么樣，自己會變成什么樣。他們餓著肚子，用書本和談話果腹——因為當所有邊界和約束都不復存在時，那些來自穩定時代、被看作正式而遙遠的思想形式會變得切題而有必要。人們需要哲學，因為他們迷失，不知道如何理解自己身上發生的劇變。他們需要更多創意、更多詞匯、更多語言。他們投入到談話中，絲毫不在乎睡眠。

其中有些是來自本地的奇妙能量。這座城市正在以令人吃驚的方式改變，有一種感覺是這里的生活會變得奇妙，它將擺脫過去的束縛獲得解放，很多未知的美好會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有一位新人作家寫了一首詩叫作《德里地鐵的最初歲月》（“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Delhi Metro”）[[8]](#Vivek_Narayanan___In_the_Early_D)，這個題目抓住了那些年里那種劃時代的感覺以及新的地鐵系統帶來的巨大的理想主義。就在我剛到德里之后，這里就開通了第一條地鐵。在沒有出現任何這種項目通常會有的扯淡和腐敗的情況下，高科技的列車和車站似乎開創了一個高品質公共基礎設施的新紀元——沒錯，印度也能做到！不僅如此，地鐵輕快地在城市地面下滑行，繞過德里道路上你爭我奪的喧鬧，飛速穿過那些或富有或貧窮的區域，似乎預示著一種新的流動性，也是社會和經濟的流動性。因為這座城市傳統上對于界限和層級有著深深的迷戀。

但那些年里的期待超出了這個城市本身的范圍。它來自一種普遍的感覺：這里將要發生的事會改變整個世界。

我遇見的人都是世界主義者，他們樂于見到圍著印度的墻倒下。他們蔑視民族主義，并且熱愛那些通過網絡結識的新興富人。但他們忠于自己的懷疑主義，忠實于這片土地上的反帝國思想傳統，所以他們同樣批判西方社會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他們最不希望從此刻印度的開放中產生的，就是建立起一個和西方相似的社會。他們很多智識上的靈感來源于西方資本主義內部的批判者——從美國的免費軟件理論家到荷蘭的寮屋居民運動，從英國藝術家對大眾食品系統和財產權文化的挑戰，到哈佛和牛津的法學學者對于種子、圖像和創意所有權的其他可能的想象。對于后自由化的印度來說，沒有什么比在這些領域的探索更相關的了。這里的一個大問題，正是“所有權”。印度生活的許多領域里，最基本的資源比如特定類型的土地、知識和文化，一直以來都是沒有所有權的。但是當印度簽署了國際貿易協定，私有化這些曾經是“公共的”東西成了趨勢。在我的德里朋友中有一種看法，認為雖然公司文化標榜自己是創造豐足的秘方，但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根據印度的情況進行調整，這將預示著一種新型的稀缺。

而且大家有一種感覺，通過這種調整適應，也許能想象出一種新的混合制的資本主義，不只在這里為印度提供靈感，而是在所有地方都能變成一種激勵。畢竟，正是在這個時期，紐約遭受了“9·11”事件重創，西方社會開始感覺到對伊斯蘭焦慮的壓力，而他們的多元文化主義（實際上是他們的優越感）似乎脆弱不堪。這種多元文化主義可能已經接納了許多來自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人，但也期望他們能接受一種深層次的同質性，即每個人都應該遵守一個單一的法律系統，比如摒棄一切與國家高效、節制的社會氛圍不符的行為。在德里，這里的一千五百萬人已經習慣了和其他那些與自己的生活毫無交集的人生活在一起。這里的生活景象比西方社會更多樣、更矛盾，甚至到了深不可測的程度，然而德里依舊讓人覺得運作順暢。這座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擁有一種無條件擁抱模糊和晦澀的能力，這種能力不是“讓我理解你，然后我們可能共存”，而是“我會無條件和你共存，因為我永遠理解不了你”。這種能力似乎不僅僅在深層意義上更人道，而且作為一種全球化下的普遍風氣也更有前途。因為它很清晰，在全世界互相聯結的時代，我們全都和不相識或不理解的人糾纏在各種關系里。也許，這座長久以來被視作荒蕪和絕望之地的第三世界的城市，實際上暗藏著會讓所有地方都受益的知識形式。

這不只是說說而已。德里的新文化也在崛起。我意識到對寫作來說，德里是一個比紐約能提供更多靈感的地方。因此當我坐下來寫第一本書的時候，我發現周圍所有的人都在做相似的事。有一個德里作家叫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是其中第一個獲得國際關注的，她最近贏得了布克獎。仿佛忽然之間，在這座一點兒也不文學的城市里，所有年輕人都在寫書拍電影，其他二十幾歲或三十幾歲的人開始成立出版社、雜志社和報社，而咖啡店和酒吧則決定用詩歌朗誦活動和電影放映來吸引更多顧客。

其中最有活力的是萌發中的藝術圈。各式各樣的人被德里高質量的大學和租金便宜的工作室吸引到這里。有些人也許只是單純地聽到這座城市耳語般的承諾，說它會讓你看到一個新的自己。但在那些日子里，這個承諾十分切實。我記得早年在一棟廢棄的房子里有一場實驗表演，房子的地板上有水塘，昏暗的照明讓人在走廊里只能摸索前進。大家在浴缸里聊天，藝術作品畫在浴室墻上或藏在廚房的抽屜里。表演抓住了這座城市在那些日子里的分崩離析，以及即將涌現的神秘而美妙的新現實。那場表演酷得不容置疑，看到碧安卡·賈格爾（Bianca Jagger）在場也一點不覺得怪，她穿著一件樸素的白衣服，穿過那些潮濕的房間。大家現在依然會談起那個晚上，那天我們見證了一些即將到來的東西——之后的幾年內，當時在場的藝術家中有幾個成為了國際藝術界的寵兒。全世界的藝術品藏家都期望擁有一件代表印度崛起的作品——一件能把東方崛起的傳言和孟買股票市場飆升的吸引力變得更有形的東西。藏家們購買鋼和大理石的雕塑，這些雕塑尺寸巨大，似乎訴說著它們誕生于史詩般的大環境。藝術家們搬去像飛機倉庫一樣的工作室，憑著自己的實力跨越國境：像所有21世紀優秀的公司那樣，在中國制造作品，然后以一次1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他們迅速從社會邊緣的頑主變成了精力旺盛的有錢人，即使是在這樣一個看不起藝術的社會里，這整個過程也不可能不引起關注。很快，藝術家們在印度名流中受到歡迎。由于他們已經是有錢人了，人們想當然地覺得他們從來沒想過別的事情。但我以前就見過他們，那時候財富還沒一點兒影兒，他們唯一想的就是如何將形式賦予一個偉大的聲音——在這里，早年德里的地鐵里，那個聲音咆哮著，我們那么多人都聽見了。

十年以后，當時這些烏托邦似的喧囂不復存在。

驚人的早年歲月似乎已經很遙遠。未來已經到來，而且沒什么可驚艷的。這個城市四處都顯得無精打采，德里似乎再一次成了無關緊要的外圍城市。如果我們曾經認為這座城市可以教給世界其他地方如何在21世紀生活的話，現在我們要失望了。土地搶奪和習以為常的腐敗后來變得明目張膽；精英的權力以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肆意擴張；所有曾經的緩慢、私密和獨特都變成了快速、巨大和同質——已經很難再夢想一個能給人驚喜的未來了。金錢統治著這個地方，我們周圍所見的新興生活方式是一種對于西方社會生活方式無聊而拙劣的復制：辦公街區、公寓街區、商廈，還有所有周圍的建筑，數以百萬計的人從未進去過，也許除了作為清潔工進去拖地。

城市里暴力激增，而且表現形式非常駭人。情節惡劣的性犯罪一再發生，讓人難受，并且在大范圍里引起了對這個飛速變化的大都會里正在成型的社會的驚慌失措。數萬人走上街頭表達對受害者的同情，憤慨于現在每個人在自己城市馬路上的不安全感，德里變成了一個充滿自省迷思的地方。有些人希望在現在這個印度經濟崛起的時期，能永遠埋葬那些來自殖民時期影響印度人和外國人的態度；這些態度認為印度文化是低劣、返祖的。德里報紙上的殘忍報道使他們對這種希望的合理性產生了深深的懷疑。現在這座城市不再是正建造一個能鼓舞世界的天堂，而是努力把自己從地獄的邊緣拉回來。

在那個十年結束之際，我決定寫一本書，寫這座我選定的城市，部分原因是為了理解它轉變的本質，因為我和數以百萬計的其他人一起在生活中經歷了這種轉變。我的感受是，作用于其中的是非常狂亂的人類能量，這些能量不僅關乎金錢、改變和野心，還關乎焦慮、苦行和歷史創傷——只有詢問住在這里的人實際上如何生活、做何感受才能發現這座城市的現實。人們喜歡用統計數據來討論印度的改變，否則還有什么別的方法能表現如此迥然不同的10億人的存在？但印度繁榮時期平滑向上的圖表曲線，根本沒有表達出每個新的一天到來帶給這座城市居民的緊張。這種緊張來自深深扭曲的日常生活，存在于愉快和恐怖之間、舊的和新的價值體系之間、自我實現和自我消滅之間。沒有圖表能總結一個正在全球化的社會所經歷的痛苦，而對于統計數據的熱忱以及隨之而來的對于矛盾、夢想和懷疑的忽略，正是部分問題所在。人們總是假定：一個明顯正在致富的群體，其內心生活應該和外部的經濟指標一樣一帆風順，但在這個新興世界的大都市，加速的變化經常成為一場讓人混亂的狂風暴雨。人們賺的錢越多，事情越不可理喻。

但問題并不必然出在現實里，同樣關乎想象。德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還沒有被賦予想象。不像那些住在巴黎、紐約、孟買等地已經對城市擁有豐富概念的居民，在德里的我們就像還沒有寫出代碼的程序員，無法整理周圍亂糟糟的數據。這座“城”還沒有存在：現在的它只是一個力場，充滿原始暴力的刺激源——這也是它讓我們所有人如此暴躁疲憊的原因之一。“毫無意義！”當地報紙每每要表達對新事物的厭惡，就列出這樣一個大大的標題，重申在德里流傳了幾千年的一種古老智慧：每件事從根本上而言都是沒有意義的。但我很想知道是否能為歷史找到一個新的角度。盡管我們正遭遇變化的漩渦，但意義似乎無所不在，哪怕是“恐懼”都好像有東西要表達。個人，即使對他人絕望，也必然對自身的重要性深信不疑。我決定從個體開始，從德里內部生活的洪流開始，尋找那里的節奏、歷史和關聯，從這些東西里可能會浮現出一座城市的輪廓。我覺得，一切都是有其意義的，確實有一座“城”是可以被描寫塑造的。

但我開始寫的那本書只有部分是關于德里的，整本書有一大半寫的是全球系統本身。我不覺得對于周遭的所見所聞僅僅關乎此地，也不覺得這些見聞是全球系統里“原始”的那部分，正在掙扎著要“趕上”先進的西方。這里更多讓人覺得是超現代的場景附帶著些變體，被復制到了當代全球資本主義表面世界的別處。確實，開始時我寫的東西感覺像是一份來自未來世界的報告：這些“新興的”中心錯過了對國際資本主義最具包容和希望的20世紀中期，而似乎只有在這些中心，人們才能更好地觀察全球最新的脈動。我覺得，不再是在西方，而是在這樣的地方，來自全世界的人才能找到對自己命運最清晰的書寫。

從這層意義上來說，我仍然忠實于自己早年在德里奉行的普世主義。但這是普世主義里較黑暗的一種，它必須更努力才能揭示其內在的理想主義。

我搬去德里的時候父親很緊張。他一輩子花了太多時間來逃離這個國家，并不是為了看到自己的兒子淡定地搬回去。但隨著時間過去，他開始從這意料之外的情況中看到可能性。我成了一條通向過往的道路，成了他青年生活和成年生活之間的使者。當他和母親來德里和我住的時候，表現出了我從沒看到過的輕松愉快。他少年時期的自己又跑出來了：他開始說印地語，離開德里后他幾乎再也沒說過這種語言；他逛音樂商店，瀏覽自己喜歡的印度斯坦尼音樂CD。有一天他情緒很好，叫我帶他去20世紀50年代全家在德里住過的房子。

父親、母親和我，我們一起出發去卡羅爾花園。“15/64西延伸區，阿吉馬汗路。”他坐在后座鄭重地說出地址。我們開過政府辦公區域寬闊流暢的街道，然后向卡羅爾花園方向拐彎。已經是傍晚時分，路上都是卡車，為卡羅爾花園數不清的商店裝貨卸貨。1947年搬來的旁遮普（Punjabi）商人生意越做越大，現在整片區域擁擠不堪：商店和倉庫擴建到外面的路上，公寓能利用到每一處空隙，要么往上蓋，要么往外面蓋，剩下的地方都停滿了車。我們錯過了應該拐彎的地方，要掉個頭，為了這個錯誤我們多花了半個鐘頭。我們坐在車流中，看著人力車在前方穿行，在紗麗店門口把女乘客放下。在德里煙霧繚繞的市場里，汽車是最不合適的工具，而且沒有一個市場比卡羅爾花園更煙霧騰騰。

我們在市場收市的喧鬧里越陷越深，父親越來越氣憤。“卡羅爾花園以前真的是座花園，”他說，“一座花園。我以前在這些路上騎自行車。到底怎么回事？”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詢問地址。“15/64西延伸區？”沒人知道。母親讀著路邊的門牌號碼，眼看就要到了，號碼卻跳掉了，又從一個新的數字序列開始。那個門牌號碼好像已經不在了，應該是房子舊址的地方現在是一排鋼門面的倉庫。一次又一次掉頭讓人很累。“我們回家，”父親激動地說，“在這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里根本沒法開車。走吧。”

回去的路上，父親一路沉默，這是又一次令他失望的回鄉之旅。當時我想，他的震驚其實并不必然是因為六十年沒有回來過。哪怕那些從沒離開過卡羅爾花園的人，那些過去六十年來見證了這里每個變遷的男男女女，現在回想起過去也會出現片刻的猶疑。實際上，你會常常聽見一些老人試圖告訴那些沒在這里生活過的人，以前這里是什么樣的，但他們往往也說不清楚。語言和回憶交織，亂成一團，因為人體組織有很強的適應性，會用一種神秘的能力重新調整自己來適應已改變的環境。于是，要記起以前的樣子，或者過去自己的樣子就變得難了。這個調整適應的過程在21世紀初的德里飛快加速。變化發生的速度讓人目瞪口呆，以至于不管是哪個年紀的人都和自己最近的經驗發生了斷裂。現在，他們看著各種大得讓人不適甚至有點害怕的巨型商場，甚至想不起來以前這里是什么，或者為什么自己那么強烈地抗拒這些商場。父親失敗的重訪故居之旅只是普遍情況中的一個例子：沒有人，哪怕是年輕人，能重訪塑造了自己過去的德里，因為那個德里已經消失了。

我們傾向于把人口遷徙看作空間中的活動，但從某些方面來說，時間上的遷徙是一種更宏大的、向前出走的側向步伐，這種更宏大的出走是“在時間平原上的遷徙”，每個生活在資本主義洪流中的人都涉入其中。

因此，我覺得父親上了年紀之后喜歡收集鐘這件事很有意思。他沒有收集其他東西，比如能代表對于失去之地的執著的地圖。像很多移民一樣，他一直都著迷于“傳家寶”這種概念。因為公司的成功，他進入了英國資產階級家庭的圈子，那些人的家里擺滿了祖上傳下來的東西：柜子、裝飾品、畫和花瓶。相比之下，他沒有一件能展示自己根基和傳承的東西。所以，素來簡樸的父親近幾年開始大把花錢，收集法國19世紀的旅行鐘。他不是狂熱的親法派，這個愛好對他來說也并不浪漫。（浪漫之處只有一個，就是根據鐘表制造史，這些鐘是在巴黎制造的。）重要的是，這些鐘從他出生甚至更早之前就在走，悠長的歷史使它們不僅曾在整個獨立印度的歷史時期中報時，還曾在之前的英國統治時期報時。所以，當高低參差的鐘聲在劍橋的家中響起時，所有缺席的過往得以重現。這些古老莊重的鐘讓時間沉靜而完整，它們收集起所有歷史并保存起來，永不消散。

注釋

[[1]](#_1_2)位于巴基斯坦，曾是莫臥兒帝國（Mughal Empire，1526—1857）首都。——譯注

[[2]](#_2_2)Bagh在印地語中是花園的意思。——譯注

[[3]](#_3_2)指艾拉·菲茲杰拉德（Ella Fitzgerald），20世紀最重要的爵士樂歌手之一。——譯注

[[4]](#_4_1)指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爵士音樂的靈魂人物。——譯注

[[5]](#_5)后來的津巴布韋（Zimbabwe）。——譯注

[[6]](#_6)依據天主教傳統，星期五是不食肉的齋戒日，故常以魚代替肉。

[[7]](#_7)加爾各答現名Kolkata，舊名Calcutta。——譯注

[[8]](#_8)Vivek Narayana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Delhi Metro’, 2005, in Sudeep Sen (ed), The HarperCollins Book of English Poetry (HarperCollins India, 2012), p. 528.

## 二　1991——擁抱自由開放

我現在對自己是印度人感到很驕傲。小時候，別人問我從哪兒來，我說是印度的時候會很尷尬。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有些東西變了。現在我會非常驕傲地說我來自印度。你知道，以前這里什么都沒有，而且這個地方很臟。現在我們的路上有寶馬車。到我五十歲的時候，印度的時代會真正來臨。我們的下一代會見證一切。現在到處欣欣向榮，一派活力。

這一切正在這里發生。

——英迪拉（Indira），珠寶設計師

1991年7月24日，印度的新財長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在發布預算時宣布——他的祖國將接受開放市場和自由企業的經濟原則。生活一下子改變了，甚至連最基本的元素都發生了變化，新的景觀出現了，正如有人告訴我，“之前，我從來都沒見過粉紅色”。

可以說，印度放棄自獨立以來一直施行的正統中央計劃式封閉經濟，這一步來得很慢。畢竟，印度的傳統榜樣蘇聯早已成為歷史。自由市場的信條“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上一個十年已經掌控了世界權力的中心，導致很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的經濟體制接二連三地被迫轉變。而在印度國內，自由市場的倡導者們自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推動放松國家的管控，比如曼莫漢·辛格（他自己就是備受尊敬的經濟學家），但這些訴求被認為是“利商”和“反平民”的，缺乏政治可行性。即便是1991年前推行的親市場優惠政策，也經常會因為選舉需要而被撤銷。事實上，任何政治家如果站出來說所謂的“社會主義”系統不起作用，就暗示著他或她背叛了國父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留下的神圣財富。

像半個世紀后的曼莫漢·辛格一樣，尼赫魯在劍橋上學。他在印度獨立過程中的對手英國國王喬治六世（George VI）以及印度總督蒙巴頓公爵（Lord Mountbatten）也在劍橋讀書（尼赫魯是三人中唯一完成學業的）。去劍橋之前，他念的是哈羅公學，1905年到1912年本科畢業期間都住在英國。比起之后由他統治的三億五千萬印度人民，他在任何方面都和被自己趕出去的英國統治者更接近，但他自己要在印度建設的社會愿景和離開的英國統治者完全不同。在劍橋，啟發他的不是大英帝國的自由放任主義，而是費邊社社會主義（Fabian Socialist）知識分子的社會工程。他不喜歡英國大地主貴族、實業家和銀行家的過分奢華，認為他們在現代共和國里沒有立足之地。他希望印度不僅擺脫英國的統治，也擺脫英國用來剝削這個國家的經濟體制。1757年到1947年，印度的人均收入一點都沒有增長過。[[1]](#Mike_Davis)

尼赫魯的個人觀點并不缺少贊同者。印度獨立運動部分源于1901年出版的《印度的貧困和去英國統治》（Poverty and Un-British Rule in India）一書，書里對印度的經濟流動進行了細致的分析，發現當代印度貧困的主因是英國統治時期對其財富窮兇極惡的榨取。無論是17世紀還是當時，這些財富都相當于全球GDP的四分之一，數量驚人。作者達達艾·納奧羅吉（Dadabhai Naoroji）不是個頭腦發熱的外行，他是一位作家、出版商，同時也是孟買大學和倫敦大學學院的教授。納奧羅吉還是一個成功而富有的棉商，并成為第一個在英國設立子公司的印度巨頭。除此之外，他還成立了一個協會，是最早致力于提高印度人民地位和利益的幾個協會之一。隨著越來越多地涉足政治，他成了巴羅達市（Baroda）的市長，之后又成為芬斯伯里中央選區（Finsbury Central）的自由黨（Liberal Party）國會議員。作為第一個被選入英國國會的印度人，他在倫敦的權力機構中闡述了自己對大英帝國在印度和愛爾蘭不公正統治的分析。尼赫魯從劍橋回國時，納奧羅吉也回到印度，第三次擔任印度國民大會（Indian National Congress）主席，該組織最后成了獨立運動的政治馬車，也是后獨立時代國大黨（Congress Party）的前身。國大黨主導印度民主直到20世紀70年代，尼赫魯自己后來也成為其領導人。

尼赫魯在回到印度十年后開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得知“十月革命”的消息后，他欣喜若狂。在整個獨立運動中，他是支持中央計劃經濟的最響亮有力的聲音。尼赫魯是一個現代派，滿心現代夢，夢想著整個社會中的不公正、不公平和所有人類的低劣本性都將被完美的國家體制擊敗。1927年，他到蘇聯參加了“十月革命”十周年慶典，這次訪問讓他充滿希望和激動。后來他寫了一本關于那次蘇聯之行的書，里面洋溢著對蘇聯成就的敬畏——工業、藝術、品格高尚的官員，這個國家太偉大了，以至于難以對其敗缺做出太嚴苛的評價。在俄國，尼赫魯沒有或者說沒能見到奢靡的少數凌駕于悲慘的多數之上，留在他印象里的是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米哈伊爾·加里寧（Mikhail Kalinin）作為一國之首，穿著農民服裝，領著和工人差不多的薪水。“所以我們對俄國感興趣，”他寫道，“他們也許能幫我們找到某些方法，應對如今世界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我們感興趣，尤其是因為兩國的國情一直以來都沒什么特別的不同。兩個國家都是農業大國，剛剛開始工業革命，都要面對貧窮和文盲。如果俄國能找到滿意的解決方法，我們在印度的工作就更容易了。”[[2]](#Jawaharlal_Nehru)

于是，作為印度總理，尼赫魯開始著手一項大膽的實驗，其中的不協調之處只有他和自己獨特的光環還在的時候才能確保不會壞事。一方面，他令人不可思議地在這個大部分還是封建制的國家迅速地、無一例外地推行民主化。憲法不理會反對者的意見，賦予成年公民普選權，雖然全國只有12%的人識字。反對者認為，把國家的命運交給這些完全不了解民主的人是危險而且不必要的，因為這些人甚至永遠都不會主動要求民主。尼赫魯和制憲會議的同僚，也就是憲法的起草者、令人尊敬的自由主義者，他們心懷動人的信念，毫不猶豫地給予所有公民公正、公平和自由的保證，同時給予媒體自由。事實是，這場關于民主和穩定的自由主義體制的冒險取得了成功，并延續下來，被理所當然地看作印度政治奠基人的非凡遺產，使清廉和遠見成為尼赫魯身后近乎神化的光環。

另一方面，尼赫魯學習了在日本和蘇聯發生的高速工業發展，覺得只有國家才有能力高速推動經濟擴張到足夠的程度，為雛鷹初啼的祖國實現恢弘的夢想。受蘇聯經濟體制啟發，他制定了一種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計劃通過一系列“五年規劃”來實現印度的增長和現代化。這些規劃會駕馭國家資源，形成協調向前的推力。其中“第二個五年規劃”在學術嚴謹性方面達到了頂峰。這個計劃由一個名叫普拉桑塔·錢德拉·馬哈拉諾比斯（Prasanta Chandra Mahalanobis）的人構思，他是印度統計所（Ind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的創始人，擁有眾多尼赫魯必然喜歡的背景，包括對大型體系的欣賞、劍橋物理學學位以及對古代印度哲學的熱愛。他在規劃委員會的任期內訪問了英格蘭、美國、法國和蘇聯，與世界一流的統計學家、經濟學家討論國家投資怎樣才能在恰當的時機以恰當的量，最優地進入需要的行業和部門來確保整體經濟長期的增長。

在馬哈拉諾比斯的概念中，基本的戰略產業，如：石油和天然氣、核能、防務、航空、鋼鐵、發電輸電、重型電機、電信、煤炭和戰略礦產由國家專屬專管。在第二類行業中，國家和私人企業都可以運營，包括化學、醫藥、化肥、紙漿和紙張、公路運輸。剩下的行業——例如消費品，則向私企開放，但私企應受到嚴格管控。沒有政府的特定執照，企業不能引進新產品、設立新工廠、開除員工或進行大筆投資。這是一個非常嚴格的體制，卻對現有利益集團回報頗豐，因此印度的大企業普遍都不反對。國大黨嚴密地關注著那些從國有化中逃脫的大企業，為回報他們的順從，便以寬松的條件向他們發放商業牌照，消除市場競爭，保障他們即使在實際產品質量極差的情況下也能獲得高額利潤，而且這種情況非常普遍。（那些年印度在物質生活方面的缺陷反而成了之后為這個體制進一步辯護的理由，因為如果開放市場，外國公司就會涌入印度，帶來幾乎完美的產品，那么本土公司在印度的土地上也將不復存在。）

但尼赫魯并不特別在意消費品的質量。他深深沉醉于紀念碑式的感受。他喜歡和大壩一起拍照。大壩帶來了兩種對發展必不可少的力量——電力和灌溉，因此他對宏偉的巴克拉大壩（Bhakra dam）滿懷激動之情，認為它將自己奉獻給了國家，把它稱為“印度復興的新神廟”——因為尼赫魯不僅篤信現代化，還是一個世俗主義者。那幾年里建造的三座大鋼廠也同樣深得其心，因為它們展示了印度在沒有外來幫助的情況下，利用自身礦產資源生產重要工業原材料的能力。他渴望讓印度擁有令人驕傲的優秀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因此撥了一大筆錢給在劍橋受過教育的理論物理學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后者設立了兩所高階研究機構——印度塔塔基礎研究院（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和特朗貝原子能研究所（Atomic Energy Establishment, Trombay）。他自己則建立了奢華的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印度管理學院（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等學術體系，為未來實現技術專家治國而培養有本國教育背景的領導者。

事實上，直到這個世紀，這些機構都還持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里面出來的很多人不僅成就了印度的技術繁榮，實際上還成就了美國的技術繁榮，因為很多人最終去了硅谷。但總的來說，尼赫魯關于如何繁榮經濟的愿景不如他在政治方面的愿景持久。從最后的結果來看，即使對于他那些如此天才的規劃者來說，實際的經濟過程還是太復雜了。第二個五年規劃被廢棄了，因為其理論在未預料到的現實世界發展面前一敗涂地（比如當時出現的外匯短缺和通脹）。到1964年尼赫魯去世的時候，也就是第三個五年規劃的末期，早年的承諾看上去已經很遙遠了。經濟體系里的很多行業由于法規制約和缺乏資金而停滯不前，同時國家遭受著嚴重的農產品短缺問題。尼赫魯留下了失敗的經濟，經濟復蘇成為接下去近三十年間被激烈爭論的話題。

然而，爭論之所以持續那么長時間，部分原因是尼赫魯設想中的印度繼續在理論層面享有很高的威望——雖然基于此理論的經濟體系已經萎縮了。這是一個崇高的婆羅門式的構想，鄙視追求金錢和世俗虛榮，將私人企業、買賣消費品特別是奢侈品視作俗物，在這些方面人們甚少有自由，也鮮有尊重。這個國家自身是愿望的一個適當載體，封閉的經濟是某種禁令，也反對過多的人居住在外面的世界。隨著尼赫魯的世界主義在他死后逐漸消散，即使對于受過教育的人和富人來說，更廣闊的世界也正變得更遙遠和禁閉。一種特定的、以自身為中心的結構進入了印度生活。比如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個人因私出國雖然在技術上沒有問題，但即使是買得起機票的少數人也很難成行，因為換匯的控制太嚴格了；打國際長途要提前一天預約；只有極少數的外國公司能投資印度企業或在印度設立運營機構；進口外國貨物普遍遭到禁止。

隨著時間過去，在這種壓抑中升起了對外面世界的奇思異想，就像囚犯的美夢，模糊而萎靡。一方面，任何和國外有關的事都會讓人激動異常：比如那時候出國的人變得好像來自另外一個世界，全鎮人都會戴著花環到機場歡迎他們回家，去看他們從外國帶回來的收音機和香水。但同時，人們也從心底里害怕外國會對他們使壞，那些保護印度純真的屏障看上去讓人相當安心。回想過去長期處于其他國家陰險的統治中，印度對外國的滲透和腐化保持著一種偏執——比如巴基斯坦和美國中情局就以一種超自然的方式被刻畫為會帶來霉運的掃把星。

也許這一切能讓人理解，為什么即使經濟已經明顯失調了幾十年，即使周邊的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取得了驚人的增長，印度仍然不考慮取消國家管控并接納全球資本，直到它別無選擇——僅僅是因為這種想法太瀆神了。可是到了1991年7月，現行體制已經支離破碎，確確實實沒有其他選擇了。國大黨因丑聞聲譽掃地，黨首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尼赫魯的孫子，也是前總理）剛剛被暗殺，黨內動蕩，經濟也正遭遇致命危機。官方一方面用陳詞濫調說能自給自足，但另一方面，出口額永遠不夠支付進口費用。年中，印度的外匯儲備跌至5億美元多一點，只夠支付大約三周的進口必需品貨款。為了渡過難關，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談判，獲得了20億美元的緊急貸款。貸款是有代價的——首先的代價就是純金。為了獲得貸款，印度政府被迫將六十七噸黃金儲備作為擔保抵押，其中四十七噸立刻由飛機運往英格蘭銀行，另外二十噸運往瑞士銀行。另外一個獲得貸款的條件就是馬上進行自由市場改革。

曼莫漢·辛格被指派為財政部長，正是因為多年來他一直呼吁進行這樣的改革，甚至是在這些改革被視作反印度禁忌的時期。而且，他似乎是最有能力實施這些改革的人。他在1991年宣布的改革對當時的危機來說，事實上遠遠超過了必要的程度。改革包括構建一整套體系，一套他自60年代起就在心里設想的體系，他的博士論文就是關于對外貿易的。這套體系預示著一個經濟新紀元的到來。正如他在其劃時代的預算案演講中明確表示的：這套體系不能實施得過快——“政府和經濟都不能年復一年地超出自己的能力運作；借貸或拖延時間這樣的操作空間都不再有了；任何對于宏觀經濟調整的進一步拖延和逾期，都將意味著現在已經相當艱難的收支平衡會變得更難以處理，同時已經很高的通脹水平會超出可容忍的限度”。

自這個講話以來，印度經濟年增長率達到10%，超越加拿大和俄羅斯，躋身為世界十大經濟體之一。所以回想起來，辛格推行他的改革體系時的謹慎和謙遜很異乎尋常。以我們的事后之見，這個體系的出現是必然的，但他做出了最奇怪的表現，把自己的觀點放到了很低的姿態。盡管給出了清楚的計劃，要深思熟慮地全面瓦解舊的經濟制度，他卻用各種對社會主義和尼赫魯的贊頌作為鋪墊，就好像要展示出這種分道揚鑣的唯一可行方法就是把它表述成一種“延續傳承”，甚至是既有成就的頂峰。他似乎非常迫切地想要表達他的計劃有很深的印度根基，而且印度對外部世界的“傳統”態度會被保留下來——比如他反復強調大家熟悉的對于“我們從西方富裕社會借來的盲目無情的消費主義”之厭惡。最終，在宣布印度將加入全球化經濟后，他發布了自己的戰斗號召：“我們要戰勝一切。”這句話來自一首著名的抗議老歌，盡管他或許是用這句話向他的聽眾再次保證過去的價值觀不會改變，卻和當時的情形完全不協調——現在指的是要反抗哪個壓迫者？但這個演講中的混亂使其愈發具有啟發性，因為如果辛格的隱喻在當時的情境中讓人困惑的話，那是由于這些隱喻是從尼赫魯那兒穿越而來的。辛格自己并不擅長演說，從他的抑揚頓挫里可以看出，這位財政部長很明顯地試圖向這個國家偉大的演說家尼赫魯堅定地表示忠心：

……正如維克多·雨果曾說的，“當一種想法的時機已到，這個世界上便沒有一種力量能夠阻止它”。我向莊嚴的議會建議，印度作為世界主要經濟力量的崛起就是這樣一種想法，要讓全世界聽到它的響亮和清晰。印度現在已經覺醒。我們將壓倒一切，我們將戰勝一切。

辛格使用了一種不太合理的表達——他引用了尼赫魯在紅堡的城垛上宣布印度獨立時的講話。1947年8月15日就要到來的時刻，尼赫魯慷慨激昂地說道：“當午夜鐘聲敲響，當世界還在沉睡，印度將覺醒于生命和自由。”由于印度在1947年的覺醒異常矚目，1991年當然也是有些略為平淡的東西可以宣布——那就是這個國家仍然是覺醒著的，但是你可以看出辛格想要做什么。

辛格有充分的理由為要如何解釋清楚這場革命而焦慮。已經有人對這個國家的黃金流向前殖民者的金庫感到非常憤怒，而且現在對于新的經濟戰略和外國人（IMF）在戰略制定中的角色也彌漫著不安的情緒，如《紐約時報》寫道：“在印度，這個仍自視為不結盟社會主義運動領導者的國家眼里，經濟改革被視為是痛苦的，甚至是難堪的……它將會被看作對印度自治的一種干涉。”[[3]](#New_York_Times)

在這個時代，我們忘記了曾由蘇聯發起的世界體系的強權，也忘記了尼赫魯倡導的“不結盟運動”，我們只認可一種“全球化”。因此，對我們來說，很難再去更多地想象一個大國本來可以選擇把自己從這個特定的全球主義形式中抹去，也很難再想起僅僅是二十年前，擁抱這種全球主義的前景也許會顯得多么危險和不守信。印度進入全球化體系，就像同一時期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并不如我們現在在無縫的資本主義世界中想象的那樣，是順暢地回歸一個自然狀態（現在的這個資本主義世界已經失去了太多對于多樣化和非主流的理解和同情）。在許多方面，進入全球化體系的過程對于這個國家所有偉大的根基來說是一場恥辱的潰敗，并且產生了一種自相矛盾的后遺癥。印度“繼承了”全球化，就如同某人“繼承了”一項遺產——既充滿了新的經濟可能性，又滿是撕裂的喪親之痛。金錢會到來，但一切高貴和滋養都不在了，替代它們的是如洪水般涌來的卑劣。

注釋

[[1]](#_1_3)Mike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Verso, 2002), pp. 9–21.

[[2]](#_2_3)Jawaharlal Nehru, Soviet Russia: Some Random Sketches and Impressions (1928), p. 3.

[[3]](#_3_3)New York Times, 29 June 1991.

## 三　印度式全球主義

我開車路過一塊廣告牌，上面是一個商業電視頻道的廣告，廣告畫面上是一個女商人容光煥發的臉，廣告詞是這么寫的：“觀看一小時，臀線有改變。”

照片里只到女人的脖子，看不見她的“臀線”，我估計這句話其實想說的是“底線”[[1]](#Ying_Yu_Zhong__Di_Xian___bottom)。但這個女人看上去確實對某些事很得意。

“我們面試的第一批人沒有接受我們的工作邀請。因為他們覺得我們一定是瘋了，居然幻想能為在外國的國際企業工作。他們都覺得印度的標準太低了。”

我坐在Quatrro公司的CEO拉曼·羅伊（Raman Roy）[[2]](#Ci_Wei_Zhen_Ming_______Yuan_Zhu)的辦公室里，這是一家做業務流程外包的公司。拉曼戴著小圓眼鏡，穿著休閑格子襯衫，五十歲出頭，整個人有著一種長輩式的慈愛，待人的態度異常平等。

“很多人都不相信，”他繼續說，“他們不相信我們能達到那種質量。他們從根本上就有問題，不能想象印度人能做白人的工作。在這個國家，我們還是把白皮膚的人看得高人一等。”

但是結果恰恰相反。

“有時候，我們的員工不得不道歉，就因為他們比教自己的人表現得更出色。這改變了他們的看法，他們意識到不需要覺得自己不如別人。”

尼赫魯關于印度獨立講話的開頭是21世紀演講中被引用最多的段落之一，但其中有一個很明顯的錯誤。

印度的午夜時分，“世界”并非在沉睡[[3]](#Ni_He_Lu_Jiang_Hua_Yuan_Wen___Da)。印度的午夜是倫敦的下午茶時間，是洛杉磯早上的咖啡時間，而且1991年之后將有數百億美元的生意建立在這個最基本的地理事實之上。

如果說有一種商業項目成了印度全球化的新標志，那就是“業務流程外包”（BPO）。其背后的想法是：基于現代通信，一個公司的不同職能不需要全都在一個地方執行。這些職能現在可以被分配到全球各地，運作順利，絲毫不受影響。這樣公司就能把非核心業務轉移到薪酬較低的地方，節省大量成本。盡管這種職能的重新分配已經在別的國家開始出現，但卻是市場自由化之后的印度企業家們首先把這種理論變成了改變世界的現實。拉曼·羅伊就是其中之一。

印度市場自由化時期，拉曼在美國運通公司工作。這家公司是自英殖民時期以來一直留在印度的外國企業之一。在20世紀90年代的新環境下，拉曼協助說服了他的美國上司們，加強公司在亞太地區的會計工作，因為這里的成本更低，而且有很多受過教育且能說英語的人。

也許現在很難回憶起這種情況的出現在當時是多不可能。印度對于大部分美國人來說既遙遠又原始，而且退一步說，把一個美國金融巨頭的一大塊業務搬到那里也不合傳統。但就像很多古怪的點子一樣，這個想法讓那些對此有所擔心的人們用一種不同的方法看世界。隨著時間推移，美國運通公司把越來越多的“后勤”業務轉移到了德里——于是拉曼意識到，這里面有一種迄今為止還沒有被挖掘的價值。

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大量企業集中進行這項小小的實驗。由于印度持續快速地解除各種對商業和資本的限制，大量投資掀起了一股創業浪潮，有一類公司異常迅速地崛起，它們就是新興的IT公司。這些公司大部分創立于印度南部，其中最耀眼的就是總部位于班加羅爾（Bangalore）的印孚瑟斯（Infosys）。這家公司1999年在納斯達克上市，一年后估值達到了300億美元。這些公司的優勢并不僅僅在于他們能以美國同行一半的價格向跨國企業交付軟件系統，不——他們的所在地印度不僅能讓他們壓縮成本，同樣重要的是，還能壓縮時間。印度籍的顧問和美國客戶一起在美國白天的工作時間里工作，然后把簡報發給印度，印度的軟件團隊在自己的白天（美國的晚上）工作，這樣美國客戶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就可以看到結果。于是，一個工作日就變成了兩個。到了拉曼·羅伊想到把美國企業的職能分割并放到不同地方的時候，他知道印度還有其他幾個人也在用差不多的方法試圖改變世界。

在一個過去由國家控制的封閉經濟體里，這種想法的出現并非偶然。從這樣的環境中走出來的企業家充滿改革熱情，非常樂于抹去他們童年生活中無所不在的國界。實際上，從一定程度上來說，當很多美國人和歐洲人后來發現自己生活中的很多事務是由地球另一端在處理時，他們覺得很焦躁。這些印度企業家非常聰明，善于打破成規，相信科技和企業，希望用這些力量顛覆幾乎所有1991年前的東西。但他們仍然是印度人，看待美國商業世界的時候，他們用的是一種奇怪的外國觀點——“他們怎么會從來沒想到要這么干？”他們喃喃自語，然后就著手去創造改變了。

也許，他們的靈感來自自己的家鄉，那里做貿易的家庭數世紀以來都把家庭成員分散到不同的地方打拼自己的商業天地。當你和這些家庭的成員談話時，即使那個人在個人習慣方面非常狹隘（比如為自己的孩子安排種姓內的婚姻），你也會常常發現他們對地點和距離出人意料地不在乎。實際上，正是家庭結構的管制性使他們不受地點約束，并與其保持一種靈活且不摻雜感情的關系。只有成本和收入才是他們關心的事實，如果后者超過前者，那就是一筆好買賣，無論地理上看有多奇怪。

這種印度式全球主義釋放的時刻使它正好可以和全球經濟的另一次重大轉型相融合，這并不完全是巧合。過去十年，美國企業一直在把需要人工的工作轉移到海外，既作為一種降低成本的做法，也作為對美國工人的政治攻擊。美國本土的工人比那些遠在印度的工人享受著更多討價還價的權利，而后者正越來越多地取代他們。當時，這種分散在全球的低損耗企業形式對美國以及很多歐洲公司的董事會有著極強的吸引力。隨著新通訊科技開始縮短不同地點間的信息距離，他們很自然會問，是否有其他不需要人工操作的職能可以轉移到海外，以在財務和政治方面獲得類似的利益呢？由于這些職能很多都需要大量能說英語的人，印度——鑒于其大大低于其他地方的成本基礎，成了顯而易見的選擇。用印度人而不是美國人——軟件開發公司展示了這個想法的巨大潛力，條件已經為美國企業創造好，他們開始剝離自己內部運營的各種部分，向印度轉移。

外包業務在印度興起的另一個要素是：這里有一個巨大的高科技不動產區。這個區域就在首都德里的外圍，所有從美國剝離的職能都可以在這里落地。這便是古爾岡新區。20世紀80年代早期，房地產開發商DLF就開始在德里的西南邊緩慢而持續地購入農田。外國公司進入印度的限制取消后，這片地區釋放出了驚人的價值。古爾岡為在印度的主要全球企業提供了必要的基礎設施。這里位于和德里相鄰的哈里亞納邦（Haryana），離首都國際機場很近很方便，對于企業來說遠遠優于德里的另一個鄰邦北方邦（Uttar Pradesh），那里以犯罪活動高發聞名。到了90年代末，各種企業陸陸續續進駐，很多都是從擁擠的商業之都孟買搬來的。

引領這場向哈利亞納邦灌木叢搬遷的驚人大潮的是通用電氣（GE）。這家世界第七的企業宣布它將在古爾岡設立一個新的運營公司，名字叫作通用電氣金融國際服務集團（GE Capital International Services，簡稱GECIS）。這個新的實體將為通用電氣金融服務公司（GE Capital，通用旗下的金融公司，后簡稱GE金融）運營全球的后勤業務。1996年，拉曼·羅伊接到一個電話，問他有沒有興趣在GECIS進一步發展他在美國運通的實驗。他去了德里的歐貝羅伊酒店（Oberoi Hotel）和GE金融CEO加里·溫特（Gary Wendt）討論這項業務的前景。

在一個企業能量熠熠發光的時代，溫特是一個推動者，他深知全球放松管制帶來的全新機遇。在他任期之初，GE金融在美國以外沒有運營機構，而到他來德里的時候，這家公司已經進入了四十五個國家。在他的帶領下，金融服務成為通用電氣集團最大且最賺錢的部分，超過了這家以制造業起家的公司的其他所有部門。溫特的成就部分歸功于在運營方面的天才，他了解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該如何徹底重組成本和營收。

“那是個特立獨行的家伙，”拉曼說，“他太快就意識到了我們在美國運通做的事的潛力。他問我，‘你覺得如果這事兒沒成，我們會損失多少？’我在原來已經談過的數字上加了300萬，說‘1000萬’。‘好的，’他說，‘這就是點小錢。我會把錢打到一個賬戶給你，沒人會過問你怎么用這筆錢。你就弄一個和你給美國運通做的差不多的東西。’如果不是他，一切永遠不會發生。我永遠不可能有這么多錢來買衛星天線和其他的東西。”[[4]](#1000Wan_Mei_Yuan_Dui_Jia_Li__Wen)

拉曼進入GECIS的時候，他已經在外包業務的最前線干了十年，對外包的未來發展比他的美國上司們有著更具體的概念。1998年，他在古爾岡辦公室進行了一個臨時實驗。那是印度的第一家國際電話中心，在那個辦公室里，員工們負責接聽信用卡客戶從美國打來的電話。通用電氣駐印度的董事會成員已經明確表示禁止他的這個實驗，所以他瞞著他們進行，并邀請加里·溫特過來看看。

“我把那地方弄得像那種老式理發店。我在員工之間裝上簾子，把他們隔開。如果有同事看到這些，我肯定就被炒了。屏幕上會有敏感信息，而且整件事非常不牢靠。我沒有預算，開始的時候只有二十個人。

“加里·溫特來了，他看了看這個理發店，驚呆了。我看到他一邊下樓一邊搖頭。他說：‘我覺得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開始了怎樣的一場革命。’他走后就開始在通用電氣大力推廣這一實驗。我們的單位成本比當時原有成本的一半還低，而且質量更高。在美國，他們雇的是輟學者，而我們雇的是有大學學歷的人。很快我們就不只服務于GE金融，而是為整個通用電氣集團服務。

“做到那種程度需要大量的游說工作。國際電信業務仍然由政府壟斷，他們的疑心很重。我第一次去給那個理發店申請國際寬帶的時候，他們覺得我肯定是在搞間諜活動，因為之前從來沒人申請過那樣的高速帶寬。而且，盡管可以租用一條私人國際線路，但把它和任何公共網絡連接起來都是違法的，因為繞開了政府的壟斷，罰款是大概每天15萬美元。我們花了八個月拿到了罰款豁免，而且那個許可只能用于試點。他們不明白我們在做什么，我們不得不從網上找了‘話務中心’的定義，打印出來給政府官員看，然后他們才理解了我們要做的事。”

拉曼是那些滿足于看著自己安安靜靜的成就變成全球革命的人之一。他說：“開始時，我們的雄心是最終實現大概一千人的話務中心。但公司的發展遠遠超過了這個設想，變成了幾十萬人，并改變了整個社會。”很快，這里的職位熱門到每次公司開招聘會都被迫要通知警方的程度。人們帶著全家從很遠的地方趕來，他們會在辦公室門外坐好幾天，公司只好給他們發放食物和水。

GECIS為通用電氣的下屬公司提供一系列范圍很廣的服務。顧客服務電話只是被轉到印度的很小一部分企業職能。這部分業務隨著時間推移變得更復雜、更專業化。系統和培訓都發展到了一個高效的水平，并且印度雇員并不只是做簡單重復的工作，很多人去了美國述職，然后成了受這家跨國公司重視的員工。

過了一陣，拉曼開始覺得正在錯過一個更大的機會。“在企業里待著很不錯，能開豪車、去俱樂部，還有各種各樣別的好處，但我看到了能做一番大事業的機遇。我告訴通用電氣，真正的機會是為其他公司提供外包服務，但他們希望獨享這項業務。所以我在2000年成立了Spectramind（印度最大的后勤服務外包公司），為所有大企業提供這類外包服務，其中包括微軟、戴爾、惠普、思科、美國在線、美國運通和花旗銀行。幾年后，通用電氣也跟著學樣，他們賣掉了GECIS，它于是變成了一家叫簡柏特（Genpact）的獨立公司，對外提供外包服務。”

簡柏特的總部仍然在古爾岡，現在它的年收入超過10億美元，和客戶中一些財富一千強的公司相當。它收購了其他一些外包公司，這些公司遠在危地馬拉、中國、波蘭、南非和菲律賓，并在全世界雇傭了超過五萬人，以差不多三十種語言提供外包服務。簡柏特在外包方面的能力太強了，甚至開始在美國進行大型并購。公司的專長使其在運營非核心企業職能時，比大部分企業自己做的效率和質量都更高。它還接手了實體業務，比如沃爾格林（Walgreens）的會計部門，把其作為美國的外包職能運營。

Spectramind被印度計算機巨頭威普羅公司（Wipro）收購后，拉曼依舊不安分于大公司文化，他離開公司創立了Quatrro公司。隨著印度的工資上漲，同時一些更基礎的外包工作被轉移到其他國家，Quatrro公司在價值鏈上的探索愈行愈遠。公司雇傭了數千人，有醫生、律師、工程師和記者，用自己的專長為全世界的公司服務。Quatrro公司的目標是另一個不同的市場。“那時候沒人為美國的中小企業服務，”拉曼說，“這些企業需要各種服務，但他們不想自己做，原因各種各樣——從風險管理到報稅。這樣的公司非常多，他們付的費用很少，平均我的每個客戶每月只付5000美元。但是我有一萬個客戶。”

拉曼估計已經積累了大量個人財富，但這似乎不是他最在意的事。令他激動的是“改變”。他從自己的財產里拿出錢來投資更年輕的創業者，因為他覺得企業家精神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救贖力量。

“外包行業是催化劑。現在在印度，這個行業大概賺了150億美元，雇傭了八十萬人，間接創造了四百萬個就業崗位。人們開始寫關于這些人的小說，拍攝有關電影，這都不是偶然。因為在很多方面，他們都是新印度的開路先鋒。他們工作努力，精通技術，而且他們身處全球環境，是巨大變革的一部分。

“直到20世紀90年代，工作機會都太少了，所以很多人一直在學校里學習。學一個文科碩士就為了面子，掩蓋他們找不到工作的事實。所以GECIS成立的時候，我們發現德里有一個很大的受過教育的群體在等著我們去吸收。但我們很快就招完了德里本地的人，只能到更遠的地方去招人。那時候，古爾岡超過一半的公寓里都住著從別的小鎮搬來的人，他們都在我們行業做事。

“這些人想過不一樣的生活。那時候，年輕人受電視節目影響，有了新的抱負，我們正是得益于此：忽然之間，年輕人開始想要工作，有自己的錢。在外包行業，大家能在年紀很輕的時候就實現財務獨立，這完全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尤其是女性。對于年輕的單身人群來說，這里是印度第一個有熱鬧夜生活的地方。這里的夜生活很棒，和德里的很不一樣，那里都是由官員和富人家庭主導的。但如果去古爾岡的派對，你會遇到更多聰明和謙遜的人。這里是未來開始的地方。”

在我們那個世紀之初，有一個年輕人來到了德里。這里有許許多多和他一樣的人，所以他可能來自任何地方，但是他來自加爾各答。他的名字叫悉達多（Siddhartha）。

那時候印度大量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在很多城市里晃蕩失意，悉達多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家里呵護著長大，那幾年曾經試著投身于貿易大潮，但失敗了。他的個性非常適合收入豐厚的公務員鐵飯碗，但那個年代很早之前就結束了。靦腆的個性和普通的成績讓他完全無緣進入企業高層，而那些人正是中產階級成就的新代表形象。

“我們來的時候對德里一無所知，就帶了一包衣服，住在一個很小的公寓里。公寓是我們一個朋友的，那里是穆斯林區，而我們是印度教徒，碰到任何出乎意料的事都嚇得要命。那里的街道很臟，到處都是牛。我并不是找了工作而來，而是我們在加爾各答活得很累，覺得這里的前景可能會更好。在加爾各答，人們常說一個人在德里和孟買會發展得更好。對于中產階級來說，德里比孟買更吸引人。上班族更喜歡德里，演員則更偏愛孟買。”

悉達多做出這個大膽的決定并不容易，但弟弟的經歷鼓舞了他。弟弟僅僅是在外面閑逛，到各個店里去詢問，就在一個星期里找到了工作。

“這就是我來這里的原因。但是要找到一份符合你期望的工作并不容易，之前我沒意識到這點。那時候，我母親是加爾各答一家服裝店的助理，弟弟在德里的一個書店找到了工作。當時我覺得，如果我也在一家商店工作，我們全家就不會有任何出息，所以我想試著進入企業。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廣告招聘銷售人員，就去面試。我坐著公交車，一路穿過德里，然后就徹底迷路了。最后我到的時候，滿身是汗，當場就被拒絕了。其他所有來面試的人都是騎著摩托車來的，而且帶著所有應該有的東西。我什么都沒有。

“過了一段時間，我不知道該做什么，而且花光了積蓄。于是我去了歐貝羅伊酒店，那里在招門童，薪水是一晚上200盧比，從晚上11點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7點。

“第一天晚上，我到了那里，他們讓我穿上制服。我穿了，但覺得非常別扭。干了三四個小時以后，我想，‘這不是我’。于是我把制服脫下掛起來，凌晨3點離開了酒店，一路走了十五公里回到家。一路上，我都在想，我要怎么辦。如果我的自我這樣重要，我要如何生存下來？”

絕望中，悉達多有機會拜訪了家里的一個熟人，在他的裝修公司里獲得了一份工作，工作內容是到各個工地上去檢查油漆和木工的工作進度，工資是每月2500盧比。

悉達多討厭這份工作，但工作很清閑，空下來的時間多到足夠讓他聽說了一個以前從來沒聽過的詞——“業務流程外包”。

“我理解的‘外包’就是‘呼叫中心’——我不知道公司還把很多除了客戶服務以外的職能也外包出去。所以我想去呼叫中心工作。我英語說得很流利，但是去那些國際呼叫中心面試的時候，他們說，‘你的口音太重了’。所以我就去印度客服中心，在塔塔公司（Tata Indicom）找了份工作。我上班的時間是從晚上11點到第二天早上8點，會有一輛巴士把我們送到呼叫中心。顧客們遇到了問題就會打電話來，比如他們的短信功能不好用了，他們的電話斷了，等等，我們會幫他們解決。我主動申請晚班是因為白天的來電量太大了，而且如果我晚上上班，白天就有一整天的時間來找其他工作。有好幾個月我幾乎都沒怎么見到弟弟，因為我回家的時候他正要出門上班，而他回家的時候我就要走了。

“上晚班很好玩。我們上晚班的都是男的，打電話來的顧客中一半是想要聊天的女性，大家會發展出固定的關系：慢慢地我們能認得出對方的聲音，會把電話轉給她們想要聊天的人。你會聽到房間里有人大喊：‘卡西克（Karthik），桑托希（Santoshi）女士要你打回去。’‘哦，對。今天是她生日，我答應過要打給她的。’這些電話不會很長，因為一切都在監控中。但是這些調情中有一些變成了真正的戀愛關系。

“晚班也有不好的地方，主要就是經理從來都見不到你，你就是一個人頭數目。所有上白班的人都升職了，所以我決定要去面對面地見一下經理。在企業里，如果不要求，你就得不到想要的。

“一開始，他們讓我過幾天再來。我過幾天再去的時候，他們說‘我們不會給你升職的’。我說，‘為什么？你們提出的要求我都滿足了。’不知道那天怎么搞的，反正我非常堅持。最后他說：‘你要么干要么走，總之沒有升職。’所以我說：‘那我不干了。’就走了出來。”

此刻我們正坐在悉達多的公寓里。他住的小區是德里開發局（Delhi Development Authority, DDA）造的，被叫作“DDA公寓”。這種公寓的構思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以蘇聯集團的公寓復合建筑群為樣板。新的DDA公寓小區遍布德里，其設計一直到80年代都幾乎沒有大的變化，但隨著DDA的理想主義逐漸消失，后幾年建造的建筑質量大大下降。早期的開發項目，比如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座公寓，寧靜的氛圍和施工質量依然讓人驚艷，但后期建的房子已然在頹敗。

對于那些在60年代到80年代間搬到首都的中產家庭，也就是那些在德里新興的大機構里工作的人，比如老師、醫生和學者，DDA公寓提供了家庭景觀的完美典范。公寓有長長的黃色點畫墻、一排排的信箱；院子里的草坪郁郁蔥蔥，上面開著花，還有小孩子的秋千；迷宮般的樓梯上經常標著批量刷上去的相同的數字，其中許多數字的油漆現在只剩了一半——這一切是許多德里人童年生活的背景。

一個周末的午后，我們坐在可以俯瞰花園的客廳窗戶前。花園里，有個園丁正在給一排排盆栽植物澆水。悉達多的母親在廚房里準備午餐，他弟弟在看板球。

“事后，我意識到自己犯了多么大一個錯誤。我又回到了起點，我不知道要怎么辦。我不能回去說，‘對不起，我不是這個意思。’所以我開始試著找另一份工作。工作真的很難找，我整天坐在家里，對在加爾各答的母親撒謊，對她說我要去上班了，因為我還沒把發生的事告訴她。”

最后，悉達多在報紙上看到一場招聘會，他一個人去了，獲得了去古爾岡參加GECIS面試的機會。

“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去古爾岡。為了能在9點準時到，我早上6點就出發了。我得到了那份工作。我的當班時間是美國的白天，也就是說我從德里晚上8點開始工作，一直到早上4點，處理所有的保險理賠電話。

“我非常快樂，我是說所有人都興高采烈、得意洋洋。我在外企工作了，拿的還是月薪。之前，我是外包員工，工資不是由塔塔公司而是它的服務商呼叫中心發的。所以面試的時候我問通用電氣的一個問題就是：我的工資是不是由他們發？那就是一切的開始。

“我開始在GECIS工作后不久，通用電氣就賣掉了它的股份，公司換了名字叫作簡帕特。公司不再是通用的一部分，也可以為其他公司提供服務了。我開始在業務開發團隊工作，接觸諸如輝瑞、美聯銀行和吉百利這樣的公司。由于我們已經為通用電氣服務了很多年，很容易就說服了其他跨國企業把后端流程轉到古爾岡處理。”

悉達多的機會來了。他管理簡帕特為輝瑞公司提供的服務，獲得了體面的收入。他的弟弟那時候也在一家呼叫中心工作，兩個人每月一共能賺大約1500美元，他們把其中的一半存了起來。

“我的母親辭掉了加爾各答的工作，搬來和我們一起住。之前，我們兩個單身漢很多事情都是將就一下，但家里有女性了就不能這樣。我們搬到一個更好的公寓。我會去歐洲和美國出差。后來，我進了巴克萊銀行（Barclays Bank）。我們在加爾各答買了塊地，造了一棟房子，搬了進去，就是現在這個地方。”

悉達多并非對自己的好運氣沒有概念。

“由于全球化，對中產階層來說每件事都變了。加爾各答更早的一代人，也就是我還是少年時三十多歲的那代人，他們從來沒找到過工作，大學畢業以后都成了私人家庭教師，那是他們能找到的唯一工作。偶爾有人在公司里找了份工作，從加爾各答搬走，大家都會把他們當作談資——他們是特例。但現在，因為這個‘外包’世界，找工作很容易。這樣來說，年輕人的生活變得非常好。”

悉達多的媽媽叫我們去吃午飯。我們走到餐廳，桌上已經放好了三份餐具，是給我們三個男人的。他媽媽會先照顧我們吃飯，自己之后才吃。我們坐下來，面前放著米飯、雞肉和扁豆湯。

“我跟他說，”他母親一邊往我們每個人的盤子里盛飯，堆得像小山一樣，一邊說，“該結婚了。現在我們過得很好，該想想找個老婆了。十年了，他們兩個除了工作，其他什么事都沒做，自己什么都還沒有享受過。”

悉達多什么都沒說。他等著他媽媽離開房間。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沒想過結婚，因為不希望任何人打擾我工作和存錢。現在我想結婚，但結不了。包辦婚姻對我來說不可能，因為我不能和一個女性聊一小時就做出關乎一輩子的決定。而且所有和我同齡的女孩子都已經結婚了，更何況我不是那種很會和女孩子相處的人，不知道要怎樣出去和年輕的女孩子聊天。

“現在二十多歲的那些人不知道真實的印度曾經是什么樣的。他們生活浮夸，因為他們從來沒見過現實，也從來沒見過生活的艱辛。大家已經不再嚴肅地對待生活，因為他們知道找個工作很容易。我不喜歡和這代人講話，我覺得和年紀更大的人講話更愉快，他們經歷過艱苦的日子，他們說的話更有意義。”

悉達多心里對這個為他提供物質基礎的世界懷著巨大的矛盾情緒。對他來說，這個世界好像充滿了道德威脅，他沒結婚這件事只是他在工作之外維持的一般性的、近乎修道士般隱居的一部分。盡管在過去十年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從新的商業機器中獲取回報，但同時，他也一直渴望能把這個商業機器的社會和精神影響拒之門外。年輕的同事們組織了很多派對和郊游活動，他從不參加。在首都待了十年的悉達多對這里文化的不信任一點都沒有變。他希望有一天能回到加爾各答，再一次和那些有相同價值觀的人生活在一起。

“在德里，我沒有發現那些價值觀。我絕不會和一個穿著露肩裝來上班的女人結婚。一個女人不必暴露自己也可以非常有魅力。在加爾各答，你幾乎很少看見女人穿著暴露。穿這樣的衣服到底是為了什么？印度是有文化的國家，我們不是美國。印度有自己的文化，但是我們正在失去它。我們不再重視任何事。現在一切都來得太簡單了，大家想的全都是花錢和找樂子。”

也許這就是在德里住了十年之后，悉達多和他的弟弟幾乎沒買什么貴重東西的理由。這間公寓空得引人注目。除了房主提供的基本家具以外，幾把折椅、一個小電視機、一個空調幾乎就是兄弟倆添置的所有東西。每個房間的墻上都有電子鐘，除此之外什么都沒有。他們母親的房間里有一個小小的神龕和她過世丈夫的照片。衣服和個人物品鎖在鋼制的衣櫥里。客廳角落有個嵌入式書架，上面只有很少幾樣東西，好像只為了顯示這個客廳有多大多空。書架上有個埃菲爾鐵塔的小模型，一套從來沒從包裝盒子里拿出來過的杯墊，上面畫著巴黎的地標和大道，還有一尊象頭神甘尼許的雕像，一盆塑料盆栽和五本孟加拉語小說。

一切都讓人覺得他們好像一直都住在“暫時”里，不想要任何可能阻礙他們回歸的東西——從這個沒有文化的地方最終回歸。

“印度得有一些從祖先那里繼承的文化。拿這些酒吧來說，印度文化從來就不習慣這些。現在的年輕人去酒吧，而且還變成了他們的生活方式。所以如果以前他們一個月2萬盧比就夠花了，現在他們需要3萬。不是說不應該去酒吧，而是你不能迷失自己，丟掉自己的文化。否則這就會變成一個狗咬狗的世界。”

最近悉達多在家里的安排下結婚了。參加他婚禮的時候，我想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很顯然他保留了先輩的文化。悉達多其實是我的表親，我們的祖父是同一個，很久之前就過世了。祖父幾乎神經質一般地崇拜英語，以至于我們整個家庭的英語能力傳承至今，且在很多年以后這種能力還幫助悉達多在德里的呼叫中心找到了工作。

注釋

[[1]](#_1_4)英語中“底線”（bottom line）的拼寫比“臀線”（bottomline）多一個空格。——譯注

[[2]](#_2_4)此為真名。——原注

[[3]](#_3_4)尼赫魯講話原文：“當午夜鐘聲敲響，當世界還在沉睡，印度將覺醒于生命和自由。”——譯注

[[4]](#_4_2)1000萬美元對加里·溫特來說確實不算什么錢，他當時是美國收入最高的經理人之一。認識拉曼·羅伊的后一年，他向前妻勞納支付了2000萬美元作為離婚費。2000年，他成為金融服務巨頭Conseco的主席和首席執行官，成為全美為數不多的年薪過億的高管。加入這家公司后，他首先做的幾件事中，就包括將Conseco所有的后臺運營工作全都外包給了印度。

## 四　離鄉背井的波西米亞

第一次去德里的派對，我看到一對情侶在接吻。我問自己，怎么會有人公開干這種事？我很震驚，但又覺得不錯。我明白了這里會有什么樣的機會等著我。我將擁有打破陳規的青年時代和事業。

——拉梅什（Ramesh）

企業的出現解除了封印，生活，尤其是年輕人的生活中注入了強大的新能量。1991年后，整個資本主義的基礎都需要建設，每個行業都有激動人心的工作。作為印度新聞業的中心，德里成為報紙、雜志、電視臺和廣告公司爆發的主場。年輕人學的一些專業，比如英國文學或歷史，以前被認為是沒用的，但現在他們發現自己在管理公司可以得到高收入，于是他們非常努力地工作。他們很多人的父母在政府部門工作，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個小時，對自己的孩子晚上11點才從辦公室回家，只是為了接不睡覺的老板的電話而感到困惑。這些家長也不能理解為什么孩子能不以為意地每年都跳槽，而且每次收入都會更高。他們成長中的信仰是：避險是最重要的準則，如果找了一個好工作就干一輩子。但這些年輕人似乎受到某種無法抗拒的吸引，就是要褻瀆現狀，好像只有依靠這樣，才能得到資本主義的真正保佑。

很多年輕人在辦公室待到很晚，不是因為必須，只是因為喜歡。這個年代，公司似乎常常能用一種家庭做不到的方式賦予人生命的活力，所以很多年輕人轉而向公司尋求和工作完全無關的需求，包括（很簡單的）一個逃避回家的地方。企業的使命是全新的、英雄主義般的，而且能提供看上去無畏而深刻的同僚關系。年輕人常常會說他們的父母或配偶不理解他們是誰，在做什么，有什么意義。在企業熱潮興起的最初幾年，公司本身常常變成了家庭，年輕的主管們開始發展出一種做作的企業說辭，意在把自己同血親的氣質區分開來。他們有的不再是聲譽，而是一個品牌。他們做得好的事叫核心競爭力。他們不再思考，而是進行頭腦風暴。他們的DNA來自公司，他們試圖越來越多地把公司的特質化為自己的。

人們通過這種來自公司的能量從全球資本主義的新制度里尋找目標感，而這種能量和過去理想的凋敗有很大的關系。事實上，人們觀察到受這種對企業的狂熱影響最大的，正是那些之前最全心全意擁抱節儉、服務和國家思想的家庭。當原來的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失去了遮掩的帷幕，許多那樣的家庭最終感到失望，似乎帷幕下沒有任何東西能拯救以權力和金錢為追求的掙扎，而且也不再能輕易地蔑視那些看重權和錢的人。許多失望的中產階級從高尚的尼赫魯愿景中醒來，后遺癥之一就是懷疑理想典范本身。很多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成年的人嘲笑上一輩對抽象概念的信仰，而自己則放心地投身于利益至上原則。這是一個新的現實原則，他們重塑自己，急切地集結在這個原則周圍。

拉梅什的父親在拉賈斯坦邦（Rajasthan）一個小鎮的政府部門工作。拉梅什對童年那個保守狹隘的世界感到非常壓抑，所以他離家去德里念MBA的時候懷著一種特殊而鄭重的心情。之后他留在德里，在幾家報社做行政工作，完全沒有什么目的性。直到進入廣告業工作的時候，他才好像被打了一針興奮劑。

“我開始做廣告的時候才發現了真正的自我。之前，我的工作朝十晚五，而且5點一到你就收東西回家，和家人坐在一起度過一整個晚上。做廣告的時候，我凌晨1點才回家，有時候兩三天都不回去。我在車里放著毛巾和牙刷。因為我的工作太刺激了。”

拉梅什看上去快樂得不得了，幾乎到了荒唐的程度。我幾乎從來沒見過任何人能這樣完全正面地看待世界。而他把這一切都歸功于工作，他說起工作來好像在說一種關乎靈魂的學科。

“唯一有效的（工作）方法就是你把那些品牌當作生活，把它們當作自己。這就像佛教。它進入你的每個部分，也接管你的個人生活。我把自己負責的品牌解釋給父母聽，解釋給妻子和朋友聽。這些幾乎是從我身體里涌出來的，因為我把這些品牌裝在心里。”

拉梅什的妻子懷孕時，希望他倆能離開德里回老家。但他做不到。

“在那里我很受打擾，我找不到任何內心的平靜。所以我說服妻子留在德里，否則我會憋屈死的。對她來說是很艱難，她希望我在身邊，可我每天半夜才回家。她花了很長時間適應這種情況。我用類比法一點一點讓她理解，就像是做廣告活動。她懷孕的時候常常抱怨我的工作時間，我說，‘你看，你身體里面有一個生命，我也有，而且是每天都有。我每天都能感覺到我的廣告活動帶來的痛，所以我了解你看見生命在自己體內成長的那種幸福。’然后她就理解了，現在她很為我做的事感到高興。”

毫無疑問，拉梅什工作很努力，但他也有很多時間花在同事關系上。

“我們是個十二人的團隊，而且非常親密。我們互相支持，如果任何一個人在生活里遇到什么事，我們全體都會支持他。我們工作都很努力，就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工作中有好事發生的時候，我們會作為一個團隊去喝酒慶祝。”

拉梅什這樣的年輕人很快就轉向兩樣世界性的企業資本主義毒藥——咖啡因和酒精。

21世紀初最顯眼的新消費設施或許就是連鎖咖啡店了，因為購物中心建造的速度根本來不及消化那些四處找去處的年輕人。人們在咖啡店里談論各種話題：家里的、辦公室里的；到了周末，里面坐滿了歡快聊天的人。和暗示著酒精和深夜活動的酒吧相比，咖啡店對保守家庭的年輕人來說是背棄家庭邊界的一個相對無害的理由。家的邊界，對于很多這樣的保守家庭來說，代表著一種分隔線，線里面是健康和積極向上，外面是有毒腐化；而新的咖啡店交際給很多年輕人帶來了一種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感覺。像其他印度大都市一樣，位于印度北部的德里在歷史上和咖啡沒有任何特別關系，卻突然之間到處都是咖啡。每座商廈和辦公樓都充斥著咖啡香，這種棕色的液體涌入缺乏睡眠的新一代人的血管里，他們往往和自己的美國同事一樣，不是從一個杯子里“喝”咖啡，而是從一個密封的無臭容器里“吸”，仿佛依偎在資本主義的塑料胸脯里。

但下班以后，許多年輕人確實需要些更讓人陶醉的東西。這十年里，對于酒精的猶疑煙消云散，盡管很多年輕人還是選擇不告訴父母他們到底干什么去了。20世紀初，一幫年輕人一起在酒吧里公然喝酒仍然會感覺不自然，而且很奇怪——女孩子們坐在桌子一邊，互相嬉笑，男孩子們努力讓自己看上去不那么緊張，每人手里都拿著啤酒瓶，不太自在的樣子。但這很快就過去了，新的工作和社交文化帶來了自己的麻醉節奏。女性也開始直接跳過酒單上原本為她們準備的“無酒精雞尾酒”。對很多人來說，無論男女，酒精成了幫助他們應對工作和家庭壓力的必需品。那段時間酒吧遍地開花，每天晚上里面都坐滿了上班族，這些在21世紀被再造的印度人正在大肆發泄。

在波西米亞圈子里，年輕人正經歷著一場對既有價值觀和社會結構更大規模的質疑。我到德里時，認識的大部分人十七八歲就離開父母獨自生活，這在印度北部的中產家庭里并不常見。多數情況下，邁出這一步需要很大的勇氣。即使過了好多年，這種做法還是不被接受：那些父母從來不去子女的公寓，那里的生活得不到認可，他們甚至常常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住在哪兒，和誰住在一起。而在自己的圈子里，父母覺得有義務為孩子不在家編造種種借口。只有結婚能挽回這種情況，可這些年輕人似乎少有結婚的。他們中的許多人最初就是因為討厭結婚壓力而被迫離家。他們渴望做有創意的工作，往往很少獲得父母的贊同和理解，而這樣的渴望只是更廣義抱負的一部分——他們渴望的是重塑生活本身。創造力即是全部，創造力不僅僅是生產出創意產品的職業才能，還是生活的指導原則，指向對倫理、情感和人際關系的大規模再想象。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成長過程中見證了父母并不幸福的婚姻，有些人在家里見過虐待兒童和其他暴力行為，而這些暗地里的行為卻不受責罰——一種普遍的看法是北印度社會的外在體面已經變得偽善，正崩潰瓦解。這些年輕人選擇從事藝術工作，以藐視崇尚規避風險的家庭文化，并潛在地放棄了本可在1991年后的經濟發展中憑自身天賦獲得的物質回報。選擇非傳統的生活方式，背井離鄉并將情感信念置于自己選擇的新家庭——顯然，他們試圖盡可能少地復制上一代的社會風氣。他們實踐種種隨性的浪漫關系，著手建立一個有同性戀的社會場景，探討“友誼”并向這個問題注入豐富的想法。家庭才是一切，友誼只是暫時、投機的事件——有著如此觀念背景的許多德里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尋求將友誼作為一種更絕對和原生的羈絆進行重新想象。

這些人中有些在德里長大，另外一些則不是。但是對他們所有人來說，那些年德里提供了輕松的賺錢機會和便宜的生活成本，這對任何地方的藝術家群體來說都是必要條件。能寫作的人從全國甚至很多其他國家來到這里，在新的雜志社和報社工作賺錢，這樣他們下班以后就可以做別的項目。藝術家們給迅速壯大的廣告業做平面設計，以獲得收入保障；做電影的在做電視新聞，那時候新的電視頻道要填滿二十四小時，卻很缺哪怕只懂一點點怎么用攝像機的人。有些人為了支持自己的簡樸生活和另類性取向，借用自己的創造力為城里的富人們操辦奢靡的婚禮派對。德里一流的大學和研究機構是另一塊吸引這些聰明年輕人的巨大磁石，也能為這些非主流人群提供合適的就業機會，其他能提供就業的還有首都的外國大使館和文化中心。

20世紀90年代的生活開銷很低。在城市最安靜的區域，很多房子的屋頂上都建有小公寓留給家里的傭人。這種安排反映了早期富人家庭和家里員工之間的家長制關系。但現在情況變了，這種關系也變得越來越單純。現在德里有很多農村來的移民，他們方便地住在離富人區很近的貧民窟，這樣富人可以花很少的錢就獲得需要的服務，而犯不著給傭人提供住宿或承擔照顧他們整個家庭的責任。（富人們還常常要求拆掉自己附近的貧民窟；有時候，有些貧民窟真的被拆掉了，他們卻又驚又氣地發現家里的阿姨不來上班了。）作為替代，他們把這些留給傭人的公寓出租。這些頂樓公寓對一個家庭來說太小太不方便，但很多都帶有夢幻般的陽臺，是冬天在陽光里抽煙的最完美空間。那時候，這些公寓每個月的租金約五十美元，這個價格對于很多有技能的人來說很容易掙到，同時還能留下多余的時間給自己。所以，這些房子里住滿了想要獨立地過一種創意生活的年輕男女。

按照定義，這些人屬于亞文化群體，并不能代表整個城市。這個群體能在德里壯大起來的部分原因，實際上是因為沒人對他們有興趣。這個中產階級城市漠然、冷淡，只顧自己的文化，讓那些過去一直生活在過度監視和議論中的人在其熱衷于自己想法的飛地里發現了一種珍貴的自由——匿名。

但是這些人很多精力旺盛、天賦非凡。當名氣和影響力與日俱增時，他們的舉足輕重在這個城市的文化中顯得不成比例。如其中一個杰出的藝術家所說，他們是德里的“雜種”，沒有立場或傳承，他們把自己的生活押在一種不同的未來上，而且確有很多人出人頭地了。年輕一點的人尊敬并仰慕他們，因為他們為這座刻板城市的生活增添了一系列新感受和可能性，把荒瘠的官員和移民之城變成了21世紀印度的文化中心。

曼尼什·阿若拉（Manish Arora）[[1]](#Ci_Wei_Zhen_Ming_______Yuan_Zhu_1)現在是一位成功的時尚設計師，但1991年來德里的時候，他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當時他一心想離開父母在孟買的房子，獨自生活。

“在我們家，自己住并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你會和父母一直住到結婚。哪怕表達一下我可能想去德里學習的想法都是件很大的事。”

“那性呢？”

“我從十三四歲起就有性經驗。那不是個問題。我猜想來德里的話性會更容易。但這不是我來的理由。那時候我十七歲，在孟買學商業，我不太擅長學那個，過得并不開心。當時正好在報紙上看到這個學校的廣告——國家時尚技術學院，然后我想，‘為什么不申請呢？’我有表親在德里，他們把申請表格寄給我，然后我來參加入學考試，根本沒多想自己在做什么。我去了，發現有上千個申請人，他們都帶了很多繪畫工具，而我口袋里全部的東西就只是一支筆，我甚至不知道考試要七個小時。我記得中途休息的時候，我跑到一個公用電話打電話給母親，告訴她我還活著。

“后來他們邀請我去德里面試，即使是那個時候我都沒多想。我父母也沒多想，他們覺得‘這是他去找表兄弟們玩的借口’。甚至面試結束了，我都沒有想過自己會被選上。但是當我回到孟買，已經有一封信在等我了，上面說我被錄取了。那時候，學校只有一個校區，每年在整個印度只招三十名學生。我非常非常開心。但哪怕到了開學的時候，我都沒怎么把學習當回事兒。第一個學期我沒及格。但到了學制中間的時候，不知道發生了什么，我忽然覺得找到了自己正確的位置。然后，一切就開始了。”

從曼尼什設計的服裝，就能看出它們出自一顆異常自由的心。這些衣服靈動而不拘一格——有一種馬戲團的感覺，融合了孟買的媚俗和波普藝術，同時讓你覺得樂趣無窮。但服裝的剪裁、刺繡和縫制都如微縮畫一般精致——曼尼什也是一個傳統主義者，他對于悠久的印度技術的絕妙運用展示了他是多么深刻地吸收了這些技術的要點。這種自由和約束之間的平衡，在他身上激發出噴薄的生產力。除了自己的品牌“曼尼什·阿若拉”，他還設計了一個叫作“魚苗”（Fish Fry）的運動服裝品牌，由銳步生產，同時他還為其他公司做過數不清的一次性設計。

最近，他應邀到巴黎擔任帕科·拉巴納（Paco Rabanne）的創意總監，他的事業又更上了一層樓。這是法國時尚品牌第一次把創意控制權交給亞洲設計師。事實上，這個品牌選中曼尼什來復興其衰落已久的時尚財富，不僅很能說明他的原創性，也說明了法國時尚和世界之間正在變化的關系。曼尼什現在在巴黎和德里兩頭生活。

“雖然說我父母現在在孟買，但他們其實來自旁遮普。他們的家庭都經歷過分治。我父親已經在孟買工作了四十年，但他們完全沒有受到這個城市一點點的影響，他們仍然和旁遮普小鎮上任何人的父母一樣。我的母親從未出過國。他們非常淳樸。

“我是獨生子，對他們來說我的成功非常重要。現在他們不太介意我沒結婚，所有結婚的事一下子都被忘掉了。這也是我必須保持事業順利的一個原因，這樣他們就會對我非常滿意。但他們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只是很開心看到我的照片登在報紙上。比如說，他們不知道我和帕科·拉巴納一起工作，他們只知道兒子在巴黎工作，對他們來說這已經足夠了。現在你懂了，他們就是這種類型的家長，他們甚至不知道帕科·拉巴納是誰。這樣很好，我也很開心。

“但我小時候有過很糟糕的經歷。我父母關系不合，而在我們家根本不會有離婚這種事。就算現在，像我老家那樣的地方也不會有人離婚，夫妻吵吵鬧鬧，但還是和對方一輩子生活在一起。當然，現在他們年紀都大了，所以沒什么事了，但我的童年毀了。這也是我離開孟買的一個原因，因為還是孩子的時候我的心理就已失常。我愛德里，因為它使我擺脫那段經歷，給我自由，給我友誼，還給我獨處的空間。”

曼尼什帶著諷刺的意味笑了笑，來緩和這段嚴肅的對話。他是個小個子，我們互相看著對方的眼睛，他的長相讓人有種說不上來的感覺——下巴略尖，收窄的地方有一簇山羊胡，眉毛挑得神氣活現，眼睛深陷，隱約顯得有點兇相。你會有一種感覺，他的自信來自于生命的某個時刻，他用了很大的自給自足的力量來度過一切。

“但我覺得今天我能說，那就是我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原因。如果童年時代我的家庭一切順利，或許現在我會成為一個最無聊的人。我可能就在做些蠢兮兮的生意，和一個女人結婚，掩蓋自己是同性戀這件事。但是不，我想離開，而且我把今天的自己獲得的很多榮譽歸功于離開這件事。因為我在內心深處告訴自己，我想擺脫這一切，為自己感到驕傲。或許，我不太受父母關注這件事讓我去尋求其他人的關注，也就是說，在你自己的領域做出成就，并獲得贊賞。你可能就會像這樣貪心。有時候，你努力工作僅僅是為了被欣賞。也許那就是我從來都對錢不感興趣的原因。我對于生活的需要是：人們不斷地告訴我，我在工作方面很厲害。并且我已經真正地獲得了這種欣賞，而不是因為我在一個電影里演了個角色接著就一夜爆紅。我猜這就是我的追求。因為我沒能在孩童時代獲得很多贊賞。

“我在德里另一段非常極端的經歷是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有好幾年，我完完全全地迷戀著一個人。為了他，我什么都可以做，簡直到了瘋狂的程度。那不是小打小鬧，而是持續了五六年。朋友們說我瞎了、著魔了，但是事情就這么繼續下去。很可怕。然后五年之后的一天，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忽然擺脫了出來，我想著以后的生活，說，‘哇哦。現在……’你懂嗎，那種時刻？你需要拯救自己。這些事逼我成功，并追求遠遠不止是金錢的東西。

“我并不需要很多錢。我沒有孩子要養。只要能見到朋友我就很開心。我不是那種想要買豪車的人。典型的德里男人，無論直男還是同性戀，想要的都是開著豪車到酒店，停在門廊，然后在眾人的注視下走出來，他們買保時捷就為了這一刻。也許我在法國待得太久了，我不在乎這些。在巴黎，你去一個著名藝術家的派對，最有錢的人和最窮的人都會有，都在同一個水平。沒人關心這些。或者你很有錢，但還是騎著最老式的小型摩托車，因為你就喜歡它。這里不是這樣。在這里，如果你有錢，即使不喜歡車，你還是會買，因為你就該買最好的車。我喜歡法國的那一面。他們不會只根據你有多少錢來評價你。而在這里，大家都是直接問你：‘你做什么工作？’這經常是別人會問你的第一個問題。”

意料之中，曼尼什是個工作狂。

“我為工作而生。我相信這點，沒有別的事能插得進來。我完全專注在工作上，這使我有機會涉入時尚的整體業務，而不只是設計。我有時間做所有的事。在巴黎，設計師是一個工作。這是個工作，就像律師也是個工作一樣。在巴黎，我早上6點半起床，從8點半開始工作。我自己拿自己的服裝，我帶著好幾箱衣服去坐地鐵。你能想象這里的設計師自己拿服裝嗎？這里的設計師都覺得自己是大明星。他們忘了自己的工作是每一季做出更好的衣服。這是份工作，非常難的工作。即使你天天上報紙，你也不能忘記，你也不能像個明星一樣。你看到報紙上有多少關于時尚設計師的報道嗎？他們沒別的更好的事可以做嗎？

“印度的藝術氣息還不濃。沒人了解時尚。沒人對自己有足夠的了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現在的情況是大家有錢了，開始對品牌有了概念。你在德里遇見那些所謂的時尚達人或者時尚女神，他們手里拿著正確的產品，但他們什么都不知道。不像日本，即使那邊的時尚歷史并不長，但是人們了解時尚。在德里問一個拿著LV包的女生，她會告訴你這是應該背的包。而如果是問一個日本女生，她會告訴你LV的整個歷史。

“但我在德里起步的時候，這些無知很有用。現在我在巴黎，我太覺得自己是在對的時間、對的地點起步的。那時我在德里給印度的著名設計師們當助理，每個人都很天真。我邊干邊學會了所有的東西，因為我什么都不懂。比如說（這很傻但這是真的），在我的衣服上《訪問》（Interview）雜志之前，我從未看過這雜志。我沒有被雜志嚇倒是因為我從來沒看過。我的天真爛漫對我很有利，因為我總是有太多要學的東西。如果是一個倫敦的設計師，他起步的時候已經了解所有的事了，對他來說就更難做出自己的東西，并且要一再證明自己。如果我是在倫敦的話，現在大概早就精疲力盡了。”

他拿出手提電腦，給我看他最新一場在巴黎的秀，這場秀做成了魔術的形式。他給我講解怎么辦秀，怎樣構思一個能同時兼顧歐洲、美國、亞洲和中東買家的系列。他一上來就說，“我知道你不感興趣，但是……”然后他就繼續講材料和質地，講怎樣縫，怎樣在電腦上進行設計然后用激光剪裁。他還講了他給Lady Gaga做的衣服。

“我希望父母能了解我做的事，但這是我和很多人之間都有的問題。因為經歷的關系，我成長得太快了，沒有人能理解這些。每天獲得的知識讓我的內心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敏銳，讓我能夠處理所有的情況、應對各種各樣的人。我給Nespresso設計了兩百家店鋪——想象一下和一家咖啡公司打了八個月交道。我也看過他們參與制造奔馳車。學到這么多東西太神奇了。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有驚喜。每一天。帕科·拉巴納覺得我的熱情難以置信。我讓他們驚喜，因為在印度長大，你對什么情況都習慣了。你知道嗎，沒有什么事會成問題。我可以聽十個人講他們的觀點，然后說服他們，最后還是做我想做的。兩年前，我做不到這樣。這來自和像Nespresso這樣的品牌的合作。他們有各種限制、制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這些都讓我學會了圓滑處事，現在我什么都能搞定。

“我仍然對自己說：‘天！我是帕科·拉巴納的設計師！’我就是這么覺得——為什么我不應該分享這種感覺？這感覺很棒的。能有這種感覺是很爽的一件事。沒錯，我是得像個婊子那樣地工作。但是我準備好了。”

他的朋友在別的地方等他，已經給他打了一陣電話。

“我不再像以前那樣愛德里了，”他說，“十年前，我真的很愛德里。或許那時候我不太知道周圍都發生些什么事。但現在，你打開報紙，這里發生的事情太可怕了。我明天晚上就要飛回巴黎，我都迫不及待了。但是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現在這里的同性戀場所非常贊。整個星期，每天晚上都有派對，有時候會有成百上千的人去參加。我剛來德里的時候，沒有這些。男同性戀唯一能發生關系的對象就是那些饑渴的出租車司機，因為他們把老婆留在老家的村子里沒有帶來。沒有可以找到其他男同的渠道，能找到的只有那些性壓抑的異性戀男人。男同會去康諾特廣場的公園，那里有壓抑的卡車司機等著別人給他們口活。現在要遇到同性戀就很容易了。沒有其他的印度城市在這方面能和德里媲美，而且我會說，這里比很多西方城市都更好。我男朋友是博洛尼亞人，現在如果是要去同性戀派對或者同性戀酒吧，德里的選擇比博洛尼亞更多。而且現在這是合法的，大家都更有自信。那些酒吧里會有一些年輕人其實是去不起那種地方的，但他們存下所有的錢就為了去那里，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有權利去。這太棒了。”

曼尼什準備走了，作為結束語，他告訴我，我穿得很糟糕，并且建議我從頭到腳換個新形象。我有點受傷，因為來見這位時尚設計師之前，我還花心思打扮了一番。

我們結賬的時候，我問他是不是找到了自己在尋求的那種欣賞。

“我在東京有個粉絲。我愛東京，那里的人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不一樣。我的頭號粉絲就來自東京。她太瘋狂了，一點都不夸張地說，她連呼吸都是為了我。一知道我生病了，她就開始哭。無論我在哪里表演，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她都會從東京飛來，只待一天就為了看這場秀。去年她生日，我給了她一個驚喜，他們安排我特地飛去參加她的生日派對。她是一個真正的粉絲。如果全世界只有一個人愛我，那就是她。”

有一種說法，有的人只需要一個人愛他，有的人需要很多人的愛，還有的人需要被整個世界愛。但即使是最后那類人，似乎也只有擁有了某個人的單獨關注，才看得到其他多數人的愛。[[2]](#Cai_Fang_Guo_Hou_Ji_Ge_Yue__Man)

注釋

[[1]](#_1_5)此為真名。——原注

[[2]](#_2_5)采訪過后幾個月，曼尼什·阿若拉和帕科·拉巴納因未公布的原因分道揚鑣。

## 五　時髦的私立醫院

過去七個月來，兩姐妹把自己關在諾伊達的住所，生活在一種非人道的環境里,于周二被當地警方救出。這對姐妹都四十多歲，據悉她們被緊急送往醫院時，其中一人已因嚴重營養不良和脫水導致病情危重。

兩姐妹都有博士學位，而且之前都事業有成。據說，她們的父親是一名軍官，一年前過世，她們因此陷入了嚴重的抑郁。她們還有一個久未聯系的兄弟，獨居在德里。據報道，在過去四年里，他和他的家人都沒有和她們聯絡過。據說兩姐妹家里的一只寵物狗幾個月前去世了，這也因此加重了她們的抑郁。此外，她們的母親也在更早之前就去世了。

醫院的一位醫生說：“這對姐妹被送來的時候極度消瘦。姐姐沒有意識，體內和口腔都在流血。妹妹對時間和空間都嚴重喪失了辨知力。”

——新聞，2011年4月[[1]](#The_Hindu)

在全球市場的老牌中心里，觀察家們覺得他們完全了解遙遠印度的發展意味著什么。科技公司、咖啡店、下班后一起喝酒的男男女女、非主流的生活方式——美國人一眼就認出來，這些都是美國的東西。熟悉印度的出版物，如《紐約時報》，通過卡布奇諾咖啡飲品的盛行，向讀者“解釋”這個正在崛起的亞洲巨人是什么樣的：卡布奇諾越來越流行，這個國家正以飛快的速度變得越來越像美國。有一篇報道的標題是“印度是如何變成美國的”[[2]](#Akash_Kapur__How_India_Became_Am)，文章里這樣寫道：

最近，星巴克和亞馬遜都宣布將進入印度市場……如一家印度報紙所寫，這將是“全球化的最終標志”。對我來說，盡管這兩家公司的到來不僅象征著美國的消費主義，也象征著美國西海岸科技文化已經滲透進印度自身蓬勃發展的科技行業之中，它們的到來其實標志著一件更加不同尋常的事，即印度超凡的美國化進程的最新篇章。

2000年3月，印美兩國間的冷戰猜忌歸于平息。彼時，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訪問印度，這是自1978年來美國總統第一次對印度進行國事訪問。訪問正值納斯達克科技股一派繁榮的巔峰之時，克林頓迅速認可了印度人對于美國資本主義這個非凡時期的貢獻。他說：“現在，僅僅在硅谷，印度裔美國人負責運營的公司就超過七百五十家。”他還特別提到并贊賞了印度的科技教父們，其中包括維諾德·科斯拉（Vinod Khosla），他從德里的印度理工學院畢業后就去了斯坦福，然后和別人共同創立了Sun Microsystems[[3]](#Yuan_Zhong_Wen_Ming_Wei__Tai_Yan)；還有維諾德·達姆（Vinod Dham），之前就讀于德里工程學院，后來移民美國，是英特爾奔騰芯片背后的開發主力。但是這位總統又補充說：“印度正從人才流失轉向人才回流，因為很多人正在回國發展。”他引用成功公司的例子比如印孚瑟斯，認為印度“正在飛速成為計算機軟件世界超級大國之一，這證明了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里，發展中國家不僅能成功，還能領先”。[[4]](#Yin_Zi___Clinton_Urges_Indian_Hi)

克林頓的祝福不像是來自一個冷淡的置身事外的超級大國，更像是來自一個情緒激動的老大哥。畢竟，美國和印度的DNA有很多相似之處，美國也是從英國贏得獨立（雖然比印度早一百七十年）；而且事實上現在兩國間非常緊密的商業聯系也部分源于這段殖民歷史留下的共同語言。兩個國家都是民主國家，都極度多元化，其統一都基于一部自由憲法，而且兩個國家似乎都同樣表現出對自由企業的先天傾向。在一份聲明中（可以被看作是對這種不可或缺的兄弟情的宣言），克林頓總結道：“我們未來的很大一部分取決于我們是否和印度建立了正確的合作關系。”

這是一個印度理論家將在接下來的十年里精心發展的主題。隨著中國的崛起，以及和伊斯蘭的戰爭使美國涉入印度鄰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事務，印度的精英們熱忱地為自己的國家和這個超級大國間的“天然”伙伴關系做出證明。“在政治實驗的規模和雄心方面，只有我們是能夠和美國相提并論的。”印度歷史學家拉馬錢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對《時代》雜志如是說。[[5]](#_Obama_s_Passage_to_India__What)當然，這個論點可能完全服務于自私的目的，其最引人關注的結果——2008年的印美核協議就是一個證明。由于印度拒絕簽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印美核協議實際上與美國現行法律是相沖突的，但在那段亞洲局勢動蕩的日子里，印度很有技巧地把游說的基礎建立在印度的利益即是美國自身利益的前提上。“核協定被印度視作對其大國地位的認可”，《新聞周刊》的專欄作家、著名的印美關系促進者法里德·扎卡瑞亞（Fareed Zakaria）如是說，而且即使協定打破了全球核平衡，也不需要因此焦慮，因為“印度的目標和美國是完全一致的”。[[6]](#_The_Prize_is_India)

隨著美國的全球優勢受到越來越多方位的挑戰，美國也發現把印度想象成“美國第二”能有所安慰。如果全球力量的中心要轉移到亞洲，如果美國的霸權將要衰落，也許印度能保證美國的價值觀可以繼續盛行。未來，管理世界的經理人可能看起來有所不同，但他們的內在是完全一樣的。換句話說，將來的世界不會有不愉快的驚喜，將來的世界會和現在一模一樣。

但美國報紙田園牧歌式地描寫商場里的情侶，還有企業高管喝著波旁威士忌聽著爵士樂，這些描寫的重點似乎對于真正身處印度轉型中的人來說，完全是外國人的視角。“全球化”不是同質化，更不是美國化。事實上，印度是一個遠比美國貧窮的國家，它和西方資本主義的關系充滿了和歷史相關的矛盾情緒，美國品牌的出現不會對這一事實有任何改變，而且現在印度正在萌發的東西是從來沒有在美國出現過的。那些在商場里喝咖啡的印度人獲得的滿足感和地球另一邊在商場里喝咖啡的人的滿足感，是非常不同的。商場只是印度割裂景觀的一部分，這種割裂既是外在的，也是內在的。因為商場里面的世界和它墻外的世界沒有連續性。顧客們走出商場，等著他們的是小販、棚戶區和堵塞的交通。此外，商場本身就是作為貪婪的經濟洪流的一部分出現的。這條洪流把一切攪得天翻地覆，摧毀了人性和神性，把各種東西和能量搞得散亂不堪，在一片殘垣斷壁中放下了舶來品和外來儀式。全球資本主義也許在其古老的中心地帶顯得寧靜而文明，但這與它在某個新的地方突然壯大的感覺是不同的。這就是為什么這個體系沒能在其邊緣造就出平和溫良的公民——西方人往往假設這是全球資本主義內在的一部分。

對于印度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來說，簡單生硬的唯物主義敘事認為他們現在的收入已經是二十年前的很多倍，他們的快樂也一定會增加很多倍。但很多把生活里的快樂奪走的東西也在那段時間里相應膨脹，實際上，很多人在精神層面并沒有任何獲益。人們確實能愉快自由地賺錢和花錢，但相應的保障卻很少——如果發生了什么壞事，只能自己應對。從新的自由市場獲益的中產階級往往太晚才意識到，盡管收入可能很高，但在很多方面他們的生活比社會中最窮的人都更脆弱。

我把車停在德里一家新商業醫院的停車場，然后朝醫院大樓走去。在大樓前，我被嚇到了。在大門口有一個已經死去的婦女，臉朝下躺在擔架上。門被她堵住了，我只能繞過她進去。她身材敦實，是個中年人。我在候診室坐下，等著見幾個人。他們還沒來，我透過玻璃看著擔架，一直很擔心，于是決定出去看看情況。

站在死者旁邊的是一個年輕男人——她的兒子。

“她在醫院住了三個星期。他們讓她出院后，我們就把她帶回家了，但她的病情惡化，今天早上過世了。我們不知道要怎么辦，就把她帶到這里來了。”

他一直在哭。他擺弄她身上蓋著的圍巾，幫她把臉遮起來。

“我們要了一個擔架把她從車里抬了出來，但我們要把她抬進去的時候他們不讓。他們說她已經和醫院沒關系了。所以我們不知道要怎么辦。”

我們兩個都為她擔心，因為她正躺在早晨炙熱的太陽下。

一輛車在入口前停了下來，下來了一個人，是這個男人的兄弟。他下了車，兩人一起把母親從擔架上抬起，試著把她放進車子的后座。她塊頭很大，這輛車卻很小。這兩個苦惱的男人沒辦法彎曲她的腿，他們不能硬把她塞進去。這真是一個讓人難以承受的場面。

就在這時，他們家另一個親戚開車過來了。他匆忙擁抱了這兩個男人，然后思考著眼前的場面，感到非常憤怒！他沖進醫院，接著和醫院的兩名工作人員一起出來。他們大吵起來，期間醫院的代表一再重復：“她不是醫院的病人。我們沒辦法為她負責。”

“他們的母親剛剛去世了！”那個親戚大喊著。“他們需要你的幫助！你要他們怎么搬得動她？”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形勢變得對醫院工作人員很不利，他們只好認輸讓步。幾分鐘后，開來了一輛救護車，死去的女人被裝了進去，一小群人離開前往火葬場。人群散了，我繼續回到候診室坐著。

房間里人很多，就像全世界很多這樣的候診室一樣，這里有精良的設備，但掛著很糟糕的畫。入口的地方有一幅標語（每個印度醫院都有這條標語），告訴病人“產前胎兒性別檢測”是違法的。盡管并不是完全管用，但這是反對婦女墮胎的一項重要措施。由于這里是一家私立醫院，所以房間里還有各種各樣有用的企業風格的東西，比如有一個意見箱，還有一個信息咨詢臺，上面放著一個友好的標志寫著“我能為您效勞嗎？”，有個顯示屏上滾動著能在這里購買的醫療服務。海報上的廣告有關于激光矯正視力的，還有各種對疤痕、妊娠紋和皺紋的治療；海報上的照片里是快樂健康的家庭，就像許許多多當代印度廣告那樣，是個白人家庭。

像這樣的私立醫院在印度是一個很顯眼的新事物。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所有的醫院都由國家運營。印度的醫療普惠做得非常好，而且還有好幾家優秀的公立醫院，比如德里的全印醫學科學學院（All-India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簡稱AIIMS）。這家醫院由尼赫魯于20世紀50年代建立，作為國家的旗艦研究機構，在全世界以極高的醫療水平聞名。這些相對較老的機構仍然為大部分人提供醫療服務，但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無法提供中產階級從醫療主題的美劇里所了解和熟悉的尖端醫療儀器。為了獲得這種“一流的”醫療服務，富人們轉向新的私立醫院，這些醫院幾乎都由那些商界的億萬富翁家庭所有。這些家庭都是權力根深蒂固的精英階層，在政府有關系，能夠獲得在城市建造不動產的必要土地。三個這樣的醫療大亨住在德里，而且屬于同一個旁遮普家庭。這個家庭就像德里大多數最富有的商人家庭一樣，因為分治而變成難民來到德里。他們同時擁有金融公司、保險公司、臨床研究公司、電影制作公司和航空公司，還有數以百計的醫院，不僅僅是在印度，而是在全世界。在印度，這些私立醫院為印度的中產階級創造了煥然一新的醫療健康體驗——時髦、設備齊全，當然價格也很昂貴。不僅如此，這些醫院還通過巡診和遠程醫療，成為全球醫療健康市場上的先鋒。

候診室里擠滿了人，到處都能看見虛弱的登革熱病人，身旁陪著一臉焦急的家人。現在雨季剛剛過去，正是蚊蟲高峰期。我對面是一位坐在輪椅上的老人，他的太太正拿著手機打電話，兒子輕撫著他的手，在耳邊安慰他。我旁邊是三個澳大利亞婦女，穿著印度服裝，腳上的腳環叮當作響。她們在爭論應該什么時候到機場。

有個樣子很顯眼的女人從前門進來，向我招手。她穿著一件紗麗，戴著很大的眼鏡。我只在一個派對上見過她一次，她叫阿爾蒂（Aarti）。她帶著兩個年輕人走過來，大聲地為我介紹：

“這是阿米特（Amit），我和你說過的，”她說，“這是他的表妹希巴尼（Shibani）。”

我們互相問好。希巴尼禮貌地微笑，阿米特好像不太自在。我提議一起去醫院的咖啡店，于是我們就往那個方向走。我們經過所有等在門診室外面的人時，阿爾蒂一直在和我聊天。我看到一個穿著長袍的阿拉伯家庭，心想總是在醫院里才會讓人意識到，這座城市里住著多少外國人。我們去了一間知名的連鎖咖啡店，彌漫著和其他分店一樣惡心的味道——這是麥芬的味道，他們會用微波爐把它加熱到發燙，然后配上刀叉端來。

電視靜音了，放著MTV臺。每個人都點了卡布奇諾。

“你們都是在這個醫院認識的，對嗎？”一邊問，我們一邊坐下。

“我們是在重癥監護病房認識的，”阿爾蒂說，“那時候我們天天都在那里，分享彼此的故事。”

我覺得她快六十歲了。她是德里有錢的旁遮普精英，說話聲音很大，而且很自信。和她相比，阿米特講話的聲音就和老鼠一樣。

“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再到這里來。”他說。

我問他，他的母親怎么了，他讓表妹來回答。

“他母親去世以后，他受了很大的打擊，”她說，“好幾個月不能工作。現在他工作很努力，因為他不想再待在家里了。”

她開始講述細節。幾年前，阿米特四十四歲的母親開始覺得吞咽困難，他就帶她去了德里一家大型私立醫院。他們在那里的兩個月做了各種檢查，還是查不出問題。醫生建議帶她去看全印醫學科學學院的專家，但那里沒有病房了，而且專科醫生也沒有時間，因為一半的專科醫生都辭職去一家私立醫院了（也就是我們現在坐著的這家）。有一位專科醫生讓阿米特來這家醫院掛他的號，阿米特照做了。醫生花了三天時間做各種檢查，做出診斷說他母親得的是多發性肌炎，一種肌肉炎癥疾病。

希巴尼和阿米特大約二十四五歲。希巴尼安靜嚴肅，穿著修身的“莎瓦爾克米茲”（salwar kameez）[[7]](#Yin_Du_Chuan_Tong_De_San_Jian_Sh)。阿米特穿著襯衫和牛仔褲。希巴尼說話的時候，他默默地給我看手機上一張他母親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子穿著紗麗，胖胖的，在微笑。

“那是她生病之前，”希巴尼繼續之前的故事，“醫生馬上告訴我們他要給她做注射，要花40萬盧比。阿米特沒那么多錢，所以他給他叔叔打電話，問能不能借錢。醫生告訴我們注射這種藥物能恢復他母親的肌肉，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所以我們只能同意了。”

他建議的是靜脈免疫球蛋白注射，這種注射有助于多發性肌炎的恢復，但醫學界對其原理所知不多，而且很少在使用類固醇藥物之前就做這種治療。注射后，醫生讓阿米特的母親回家，并告訴阿米特和希巴尼通過鼻胃管喂她蛋白粉。但回到家以后，她的肺里都是唾液，既咽不下去也咳不出來。他們害怕她會噎死，半夜馬上把她送回醫院。醫生給她戴了氧氣面罩，并且診斷是肺炎。第二天，更多化驗表明她的腎臟也感染了。她馬上被轉到重癥監護病房。

“那個醫生一直很鎮定。他說：‘我知道會出現這種情況。但如果我告訴你們這些免疫球蛋白的所有副作用，你們就不會做了。’”

他給阿米特的母親做腎臟透析治療。最后她手臂上一根臨時的管子被胸腔一根永久性的管子代替。然后醫生開始處理她呼吸系統里的唾液。他又給她注射了一劑免疫球蛋白，增強她肺部的免疫功能，然后切開氣管把唾液從氣管里吸出來。

“他們說只需要治療十五天，”希巴尼說，“但是十五天以后，他們說她需要裝一根永久性的管子，現在只是臨時性的。永久性的還要再出7.5萬盧比。

“我們花了很多錢。重癥病房每天收費是1.6萬盧比，氧氣和透析每天4.5萬盧比。每天晚上，阿米特只能去德里所有親戚家借錢。有親戚把準備用來結婚的錢都借給我們了。

“你不知道該怎么辦。當那個撫養你長大的親人躺在病床上，你會非常激動，沒辦法思考。他們就是這么得逞的。

“一連好幾個星期，他們每天都說，‘你母親正在好轉。’我們就會燃起希望。然后他們又說，‘她沒有好轉。’”

我們幾個很安靜。希巴尼的聲音很軟，我們都圍著湊近聽她說。阿米特一邊看著喝了一半的咖啡一邊聽，阿爾蒂則注視著外面這個炎熱的清晨和修剪過的花園。

“同時她的血小板水平降到了很危險的程度。唾液還沒有控制住，所以她都不能再說話了，更不用說自己吃東西。醫生建議用另一種藥，要17萬盧比，號稱能恢復她的身體系統，控制唾液分泌。但結果還是沒用。醫生說，‘當然沒用。所有的藥都被透析沖走了。’

“那里像地獄一樣。重癥病房里病人的死亡率非常高，時時刻刻都很慌亂，沒人照顧阿米特的母親。醫生從不去看她，他們和病人之間沒有任何聯系。我們不能進去看她，他們從來不告訴我們任何事，只會說‘她需要用更多藥’。我們除了付賬單以外，什么都做不了。每天晚上，我們會收到白天的賬單，然后用從親戚那里借來的現金付清。你去會計部的時候，能看到大把大把1000和500盧比的鈔票被送去銀行。”

阿爾蒂一臉挖苦地大笑起來。希巴尼繼續說，“我們要求帶她離開重癥病房，那里太貴了，所以他們就把她安排進普通病房，我們總算可以和她在一起。但她的情況非常差，得了褥瘡。她一直在哭，說的話只有一句，‘帶我走！’

“我們問醫生要怎么辦。他們說，‘她不吃東西，我們要在她胃上開一個洞，這樣就能喂她了。’就在我們和醫生討論的時候，一個護士進來，告訴我們阿米特的媽媽走了。”

希巴尼回憶這段的時候，阿米特淚如泉涌。

她說：“然后你知道那個醫生說什么嗎？他說，‘也許如果我們把她送回重癥病房，給她用呼吸機，她就會活過來。我們可以試試。’然后我說，‘有個條件，我要一直在她旁邊看著。’醫生說，‘家人是不能進重癥病房的。’于是我們說，‘那我們不做了。’醫生說，‘沒問題，如果你們不希望你們的母親活過來……我是說她有1%的希望可以活過來。你們是什么人，能決定她不應該活下來？但是如果你們沒錢了……’

“但我們不干了。一切都結束了。我們這么告訴醫生，他就走了。

“我們進去看阿米特的母親，馬上有人來收剩下的治療費。他們隔著她的尸體對我們說，‘你還有20萬盧比沒有付，請先付清。’沒有表現出一點尊重，他們在她的尸體前就這樣說。在印度，我們尊重死者。你知道嗎，他們很無禮。”

阿米特插進來說：“火葬我母親的時候，祭司告訴我們，她的骨頭都變成粉末了。”

隨著這些回憶的涌現，希巴尼開始變得非常憤怒。

“人們無緣無故地死去，”她說，“至少我們還有點錢。我們遇到過有些人保險金用完了就被趕出醫院，醫生連刀口都懶得給他們縫上。當然，一點錢都沒有的人連一點機會也沒有。”

“這些醫院完全就是腐敗，”阿爾蒂說，“病人只是他們獲取利潤的工具，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任何診斷不了的病，他們都說是癌癥，因為這樣就可以給你用最貴的藥。人性正在從這個崇尚宗教和靈性的國家消逝。現在這里行善少，作惡多。”

“你丈夫怎么了？”我問她。

“他也是在這里去世的，在阿米特母親去世之前。他是一個很好的人。我們在一起生活了四十三年，非常美好。現在很少有人能這么說了。我嫁給了一個一直都為我著想，而且照顧著我的男人。”

我意識到阿爾蒂的年紀肯定比她看上去的要大。

“他的家族很有名望。他家有著名的記者和學者，還有電影明星。他事業很成功，我們也進入了很好的社交圈，德里的權貴我都認識。”

阿爾蒂得花一分鐘來講清楚自己的階級地位。她的故事格外有分量，因為她是有來頭的人。

“我家這邊也很有名望，”她說，“我外公和祖父都是有爵位的。祖父來自賈郎達爾（Jalandhar），后來成了國家鐵路的首席工程師，被封為爵士，還獲得了大英帝國官員勛章。他們家族在德里很有名，以前和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8]](#Ni_He_Lu_De_Nu_Er__1966Nian_Chen)很熟。我母親的家庭來自拉合爾，1974年他們失去了一切，隨后搬到了德里。我外公在商界非常成功，在使館區買了一棟很氣派的房子。”

她太德里了。我都快瘋了。

“我丈夫從來沒生過病。他身高約一米八五，很魁梧。他從來不戴眼鏡，這輩子沒看過牙醫，所有牙齒都是自己的，沒一顆義齒。他打羽毛球，七十歲的時候，連三十五歲的年輕人都經常不是他的對手。他從來不午睡。我們結婚的四十三年里，除了幾次感冒，還有一次嚴重受傷，我不記得他生過什么病。

“2009年10月，所有的事都亂套了。11月4日，他開始住院，第二年的2月5日，他就走了。

“到底他是什么問題，一直都沒弄清楚。我把他的報告給很多醫生看過。一開始說是病毒性發燒，后來他變得很虛弱，又持續了一段時間的低熱。我們做了很多檢查。他們讓我們去看內分泌科，醫生開了很貴的藥。他吃了藥以后一開始是出冷汗，然后就中風了。

“你看，他這輩子從來沒吃過什么藥。以前如果一定要吃阿司匹林，他會切一半吃。他不能吃那么多藥。他們開始往他身體里注射抗生素，一天四次，就因為每次要5000盧比。我說，‘你們在干什么？你們只知道用藥賺錢，但是我愛他，我能看到這些東西在他身上起什么作用。’

“他們沒做診斷就開始化療！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醫生們都很有名，我覺得他們說什么我就得做什么。但是每次聽他們的話，我丈夫的情況就更差了。只有我不聽他們的時候，他才好一點。

“我把他從那家醫院接出來，去了另一家醫院。我把他所有的報告都帶過去了，但他們仍想把每個指標都重測一遍，絕對是很夸張的過度化驗。他們說想給他做淋巴結活檢，結果因為用了太多藥，他的淋巴腫起來了。這個檢查應該就是在局部麻醉下進行的簡單操作。

“做那個檢查的前一天晚上，我睡在病房里。中間我忽然醒了，病房里很暗，肯定已經是凌晨1點了，我看到房間里站了一個很美的護士。如果你看見她，你會說，‘多美的一個女人！’我睜開眼睛，看見這個美麗至極的女人站在我丈夫床邊。她拿了一張表格給他簽字，讓他同意醫院用全身麻醉做一個貴得多的檢查。你能想象嗎？我丈夫因為那些藥幾乎都神經錯亂了，他難道能在半夜醒過來看見房間里這位天使并在一張紙上簽字？我讓她走，我對她說醫生不是這樣說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帶著我丈夫離開那家醫院了。”

印度醫療體系陰險地結合了價格高昂和信息透明度低的特點，導致病人們極度恐慌，這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病人們會去看二十個醫生，因為他們哪個都不值得信任。于是他們中斷治療，更換醫院，結果就是無法獲得持續的治療。

“我們去了另一家醫院，我丈夫開始好轉。他們開的藥少一些。我們來這里之前，他的血小板降到了每微升四萬五，正常值應該高于十五萬，但是他的血小板又開始上升了。過了幾天，他可以出院了，可他們想從他身上賺更多錢，于是就在驗血結果上造假。

“他已經準備要出院了，他在戴圍巾。他討厭在醫院里，很高興可以走了。往常，驗血結果會自動顯示在房間的顯示器上，那天早上卻沒有。他已經穿好外套，化驗結果出來之前我們不能走。沒理由擔心——在那家醫院，他的血小板已經從四萬五升到了九萬。

“我去問結果為什么沒出來，沒人能回答我。醫生說：‘我來給化驗室打電話。’他看著我，完全沒有聽電話那頭在講什么，然后就告訴我，我丈夫的血小板降到四萬三了，他需要緊急輸血。

“我一下子就慌了。如果他的血小板在十小時里降了那么多，那接下來還會降多少？如果回家的話，他肯定會昏迷的。‘對不起親愛的，’我說，‘但你要輸血。’我很慌亂，完全沒想到可能有任何不對勁的地方。我得馬上找一個獻血的人。我侄子從古爾岡趕過來獻血小板。他太貼心了，盡全力趕過來。知道要獻五升血的時候，他臉都白了，但他還是獻了。現在他就像我的第三個兒子，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做的這件事。

“到了晚上，所有獻血的準備工作都做好了。開始前，他們按照流程又驗了一次血。這次我堅持要看結果，結果我丈夫的血小板是九萬。也就是說，從一開始他的血小板就沒有降過！那天早上他們不給我們看化驗結果，這樣他們就能賣掉一次要5萬盧比的輸血療程。

“整個過程中有一個在德克薩斯的錫克教醫生一直在監控我們的情況。他是一個癌癥專家，給我的一個朋友看過病。他是唯一一個真正把我送去的報告放在心上的醫生。每天晚上，他會自己花錢給我們打電話，詢問情況。他的聲音非常善良。他知道會發生什么，而且給我建議。他說：‘他可能會開始肺部積液，你們要當心一點。’于是我告訴這里的醫生們，但他們一點也不在意我們說的，這群混蛋——后來他的肺部就積液了。德克薩斯的醫生告訴我一定不能給他用類固醇藥物，但這家醫院給他用了很多，造成他整個生理系統衰竭。

“是這家醫院殺了他。他們太喜歡亂開藥了，就這么殺了他。之前，他已經開始好轉。他來這里的重癥病房之后，這個病房（也就是我認識阿米特和希巴尼的地方）了結了他。我就離開了幾分鐘，回來的時候他渾身都是管子。他大聲呻吟，喘得很厲害，脖子兩邊都有燒傷的痕跡，這些我從來都沒得到過解釋。我把他從重癥病房帶出去，我說他會死在我的懷里，而不是在這些盯著他的陌生面孔前。他們給他做中心靜脈置管，因為他們沒有耐心處理輸液造成的水腫。我查了病歷，發現管子放進去兩分鐘后，他的心臟就停止跳動了。

“他走了以后我自己展開調查。開始的時候，每次只能做一點，因為會痛苦得要崩潰，但現在我開始更加嚴肅地做這件事，我研究每樣東西。知識是從來不會被浪費掉的。錢會被浪費，派對狂歡會被浪費，但知識從來不會。

“二十年前，我丈夫的姐姐說服他們的父親簽字把家里的房子過戶給她，這樣她不用我丈夫同意就能把房子賣給開發商。當時我就進入了戰備狀態。那時候我自己的生意經營得很好，但我把工作都放在一邊，投入到這場法律糾紛中。我丈夫沒辦法做這件事，看到姐姐和父親背叛他，他已經準備放棄。整整兩年，我別的事都沒做。我看教科書，自學法律，學會了整個體系是怎么運作的，學會了從法官和律師的關系入手。我自己打了那場官司，對方是一大幫建筑商和地產商，但是不到兩年我就贏了。那段時間，我把他們每個人的生活都弄得一團糟，最后他們一起求我放過他們。沒人相信這種官司能在兩年內結束，一般都需要二十年。沒人相信我拿得出那些很久以前在舊德里就已遺失的產權文件。

“那時候我學會了法律，現在我也能學會醫學的。我自己的官司之后，我已經幫助了至少二十個人打官司，一旦弄清楚我丈夫的事以后，我會幫助更多的人。我渴求知識，崇拜知識。對我來說，只要能回答困擾我的問題，不管是誰，他都是一個優秀的人。

“我們沒有醫療保險，所有的費用都是我們自己出的。醫院想讓他用一個月呼吸機，這樣他們就能收費300萬盧比。他們還想讓他做透析，因為他們有一個新的透析機——但他的腎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可怕的事情一直都在發生。我遇到一個婦女，她來看心臟病。由于做了各種化驗測試，她的兩條手臂從手腕到肩都發青。一個心臟病人需要做多少化驗？但你不能問這種問題，法律上醫生完全可以不回答。他們讓你在每個階段簽各種表格，好讓自己免責。他們經常給你開些奇貴無比的特效藥或者其他什么萬能藥，你花了四五百萬盧比傾盡所有之后，他們交給你一個死人，讓你滾出去。”

我們的咖啡涼了。

希巴尼和阿米特在一旁點頭。這對表兄妹的默契里有些特別的東西很引人注意。希巴尼外表很溫順，給人感覺很有力量，印象深刻。

“你們已經為母親、為阿姨做了一切能做的，”我對他們說，“這些對她來說一定很有意義。”

希巴尼看了阿米特一眼。

“實際上我們不是表兄妹，”她說，“我們在戀愛。但因為還沒結婚，沒人覺得我在阿米特母親的事情上能扮演合法角色，所以我們說自己是表親。一開始那些醫生和我說，‘她不是你媽，你們也沒結婚，所以你是什么人要這樣照顧她？’但是我得照顧阿米特的媽媽，因為他要工作。”

聽到他們故事里這個突如其來的轉折，阿爾蒂很驚訝，但她沒說什么。背后咖啡研磨機轟鳴了幾秒鐘。我們的對話沉默了，大家都耐心地等著，沒人愿意先開口。

阿爾蒂說：“我丈夫以前跳探戈、跳華爾茲，還是個運動員。他是一個非常健壯的人，熱愛生活。剛開始生病的時候，他對我說，‘如果我的腿沒有了，我就不想再活了。’我對他說，‘我會照顧你的，我們一起過了四十三年的健康生活，如果現在我們其中一個生病了又有什么關系？我們還能在一起過很多年，我會放下一切來照顧你。’

“我們那樣過了三個月，我從來不留他單獨一個人。我從來不讓他們把他的病床停在走廊里，他們經常那樣做。我說，‘他不會睡在床上在走廊里排隊，讓每個人都能盯著他看的。他會待在自己的房間里，醫生準備好了才會下來。’

“但最后，當我在這里的重癥病房看到他渾身都是管子時，我的精神垮了。我說：‘走吧，走吧，親愛的，不要再多留在這個世界了。這不是你要的生活。’我把他帶回自己的房間，放著我們錫克教優美的傳統禱告音樂，整晚為他按摩頭部。他很安詳，沒有喃喃自語也沒吵鬧，他只是靜靜地走了。我一整晚都在他旁邊，但那個時候他還沒走。他知道，如果他走的話，就只剩我一個人了。他一直等到第二天下午，所有的人都來了，圍著我們的時候，他知道可以把我交給這些愛我的人。甚至連死亡他都那么周到。

“我給了他一個美好的離去。所有這一切里，這是我唯一滿意的一件事。”

阿爾蒂說這些的時候態度非常實事求是。沒有外露的情緒，除了（也許）某種熱忱，因為她是一個在逆境中反而被激起能量的女人。

“這四十三年里，”她說，“每年情人節他都送我玫瑰。有一年我們在孟買，買不起十二支，他就買六支。其他的時候他都會買十二支甚至二十四支。

“今年，有一次我和在倫敦的姐妹聊天。我說，‘我得要習慣情人節沒有玫瑰了。’但是14日那天，我晚上到家的時候收到了她送來的很大一束玫瑰。她在卡片上寫道：‘阿爾蒂，他從來沒有離開你。他會永遠愛你。這些是他送你的。’”

對世界上大部分人來說，大病醫療是財務危機最大的原因，印度也不例外。但在經濟自由化之前，醫療成本相對低了好幾個數量級，不僅因為醫生收費較低，還因為整個醫療體系相對地不那么依賴于科技。比如說核磁共振造影設備非常少，大部分醫生在沒有這種昂貴檢驗的情況下做出診斷。藥品也是相似的情況。在經濟自由化允許世界各大制藥公司進入印度前，藥物只有基本的品種，價格也更便宜。所以如果有人得了重病，有段時間免不了遇到財務壓力，但對于中產人群來說，開銷水平基本上是能在家人和朋友的財力范圍內解決的。

那時候醫療體系運轉順利的另一個原因是醫生們有很高的聲望和信譽。盡管很多公立醫院的醫生通過晚到病人家私人出診來賺外快，但他們在醫院的工資是固定的，收入不會和診斷治療掛鉤。在病人眼里，他們的醫療判斷是毋庸置疑的。病人看病時有充分的理由覺得有安全感，相信醫生和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

自由化以后，這種平衡被打破了。公立醫院那時的資源已經變得非常匱乏，中產階級全都涌進了新的私立醫院。但在私立醫院，如果病情非常嚴重或者耗時很長，其收費水平可能讓一些人傾家蕩產。盡管在同一個時期中產階級開始投資私人金融機構發行的新型健康保險產品，但這些保險通常只能覆蓋范圍相對較小的治療項目。即使最全的保險也不涵蓋幾種慢性病，包括某些癌癥、所有HIV引起的疾病以及被保人六十五歲以后發生的疾病。而且單一病人一年內的最高理賠額度也很低，通常在5000到2萬美元之間，完全無法保障最具摧毀性的那部分支出。

這種情況已經相當危險，而私立醫院明顯的盈利動機帶來了新的疑心，使情況更加嚴重。毫無疑問，這些醫院是企業，它們看上去像企業，以企業的速度擴張，互相收購賣出，而且還由這個國家的一些主要金融寡頭管理經營。這些醫院里的病人完全能感受到大型印度企業運營時的侵略性。他們也知道公司類似于封地，其所作所為基本上不受任何獨立機構的審查，因此自身遭遇中的不確定性令他們深受折磨。花的錢是治療必要的嗎？還是說這個企業就是想榨干他們的錢？

眾所周知，搬到另一個國家生活的時候，新的醫療體系往往是最后才能習慣的事。在印度，醫療體制的轉變本來就可能會引發疑慮，即使其正當性無可挑剔。而在很多情況下，這個新體制確實引起質疑。醫療機構內部也有很多不安，許多醫生也承認了病人心里所擔憂的并不是無端臆測。一家一流公立醫院的外科醫生認為，自己的職業完全受到新的私立醫院的威脅。

“它們都是賺錢機器，”他說，“它們追求的是收入最大化，簡單純粹，而這已經導致了醫療判斷和倫理的危險淪喪。

“我給你舉個例子，我工作的公立醫院有個主任外科醫生離職去了一家大型私立醫院，給他的年薪是2400萬盧比，是他之前薪水的十倍。但他要負責為醫院每年賺取1.2億盧比的收入。現在，即使他把一年的手術量做滿，也還是沒辦法達到這個數字的一半，所以其他業績要由診斷化驗來貢獻。這就是化驗數量大大增加的原因。病人被要求反復做核磁共振，這樣醫生才能完成指標。有些病人因此受到了極大劑量的輻射。

“有些病例根本沒有需要手術的跡象。但是任何人如果上腹疼痛，就會被做膽囊切除手術。這些手術中的四成是不必要的，但病人不知道。基本上，病人不可能發現任何不當治療的跡象。

“看看剖宮產手術率吧，有些著名產科醫生接診量的七到八成會采用剖宮產。這座城市幾乎很少有醫院提供順產服務了。為什么？因為剖宮產比正常生產賺的錢要多。更重要的是，這樣醫生就能安排日程給更多婦女接生，這樣更有效率。

“醫藥器材行業在選擇治療方案的決定中扮演了很有分量的角色。因為很多醫生直接為這些公司工作，而病人們并不知道。醫藥公司會給腫瘤科醫生10%的化療費用回扣，一個月療程的常見回扣金額是1000萬盧比。胰腺癌是醫生最喜歡的，因為如果是已經到了需要化療的地步，無論如何你都只有六個月可活了，那醫生愛怎么給你治就怎么給你治。

“這些醫院很黑，甚至在商業層面也是如此。政府為這些醫院征地，付出極高的征地補助，通常還為醫院的建立捐款，條件是醫院要為窮人保留三分之一的床位。但醫院從來不會兌現承諾，他們肯定會把這些好處一筆勾銷。隨后，他們把公司股票賣給公眾，獲得數億美元，于是報紙歌頌他們是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但他們的財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公共財富之上的。”

他說話的時候很平靜，但充滿了憤怒。

“你應該整本書都寫這個，”他對我說，“這件事我不能做，因為這些人都是我同事，但得有人把這些寫出來。你假裝成病人，看看會怎么樣；去告訴別人你要買個腎，看你會被帶去哪里。在我工作的醫院里，有個麻醉師和德里一個很大的腎移植黑市有牽連。腎移植很簡單，在普通公寓里就可以做了。而且印度是世界糖尿病之都，很多人不可逆轉地向晚期腎病發展，非常悲慘。同時有很多窮人希望賣掉一個腎，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

“整個行業已經變得非常邪惡。比方說，到哪里去找醫用尸體？有了這些新的制藥公司和研究實驗室，對尸體的需求大幅增長。組織庫需要尸體，移植公司也需要在尸體上做測試。根據1958年邁索爾解剖法（Mysore Anatomy Act）的規定，只有無人認領的尸體才能被用作醫學實驗。但大規模商業制藥的需求遠遠超過了合法尸體的數量，所以現在到處都有尸體被偷。尸體從辦葬禮的人家消失，最后出現在外科醫學院和公司。”

我告訴他，最近我遇到一個人，他給口腔醫學院提供尸體。我問他是從哪里獲得的尸體，他告訴我，是從亞穆納河（Yamuna）的一條叫欣登河（Hindon）的支流釣上來的。他每天就坐在河邊，等著尸體從上游漂下來。

醫生笑了。

“那條河流經加濟阿巴德（Ghaziabad），那里有很多人在財產爭奪戰里被對手殺掉，尸體最終被先進的牙科行業所用。這也是對如今醫藥行業的恰當描寫——利用我們社會的混亂，把它們變成利潤。”

注釋

[[1]](#_1_6)The Hindu, 12 April 2011.

[[2]](#_2_6)Akash Kapur,‘How India Became America’, New York Times, 9 March 2012.

[[3]](#_3_5)原中文名為“太陽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現已被甲骨文公司收購。——譯注

[[4]](#_4_3)引自 ‘Clinton Urges Indian High-Tech Leaders to Help Poor’, Washington Post, 25 March 2000.

[[5]](#_5_1)‘Obama’s Passage to India: What He Needs to Do’, Time, 2 November 2010.

[[6]](#_6_1)‘The Prize is India’, Newsweek, 20 November 2009.

[[7]](#_7_1)印度傳統的三件式的日常服裝。上衣“克米茲”（kameez）是及膝的寬松長衫，下身“莎瓦爾”（salwar）是上寬下窄的褲子，另配一條披巾。因源自旁遮普一帶，故也稱為“旁遮普服”。

[[8]](#_8_1)尼赫魯的女兒，1966年成為印度史上首位女總理。

## 六　婚姻的分崩離析

一個男人向我講述他婚姻的分崩離析。故事的一部分是他妻子在辦公室有了外遇。從他講述的方式，我不太相信有這回事，所以我故意說得很直白，看他會不會堅持自己的說法。

“所以她出軌了，”我說，“那一定……”

“至少我覺得她在出軌……”

“你覺得她出軌？”

“她覺得我在出軌。所以我覺得她在出軌。”

我意識到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的妻子并沒有出軌。但他還是這么覺得，這是一種報復。

這個時期，不滿是德里城中揮之不去的刺激物，就像寄居在城市肚子里的壞香料。

通常，這種不滿是一種非常實在而且明顯的不滿。占少數的富人群體覺得廣告里描述的那種寧靜、有產的生活方式是為他們準備的，但大多數人開始意識到在新印度的生活并不會自動變成那樣。無憂無慮的大人、寬敞的廚房、有錢的年輕人——沒有一樣看上去會如他們被引導相信的那樣來得容易。實際上，這些東西似乎變得越來越遙遠，因為房地產價格上漲的速度甚至比中產階級的收入增長速度還快。

這種特定群體感到不滿的問題是尖銳的。那些年里，中產階級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覺得財富是他們應得的——因為那是之前承諾要給他們的。而現在的承諾是：這是印度的時刻，而且這樣的時刻可能不會再來。這就解釋了那段時間報紙上記錄的中產階級“非常規”的賺錢方式：學生通過偷竊或者賣淫來賺外快，更普遍的是創業公司的員工用巧妙的方法將公款中飽私囊。

但也還有很多其他形式的不滿，這些不滿更神秘莫測，對于人們的生活或許有著更深刻而苦痛的影響。比方說，很明顯，家庭就處于巨大的壓力之下。家庭是印度社會象征性的支柱，許多人以家庭之名，把家作為累積狂怒的首要之地。在父母和孩子之間、男人和女人之間仿佛是這個新系統的扭矩在不對稱地運行著：家庭中的不同單位被朝不同方向扭動，牢固的聯系變形并被打破。這種情況明顯地體現在中產階級的婚姻中，那些年婚姻破裂猶如結婚時候放的許許多多喜炮爆炸一樣。

“我覺得如果我們夫妻和他母親分開住會更好，”薩克溫德（Sukhvinder）說，“至少不會經常吵架。而且分開住的話，我丈夫對新想法的態度會更開放一點。在這個家里他好像被困住了，總是用同樣的方法做同樣的事情，不存在‘改變’這種事。”

我們坐在德里一家高端商場的樓頂，頭上頂著地中海風格的陽傘。別桌的人有的在用手機打電話，有的在啜飲顏色鮮艷的飲料。

樓下的商場外圍是一個舒服的天井，開著各種咖啡店和餐廳。有塊廣告牌，一面是一張大過真車尺寸的奔馳S系的照片，另一面是放著時尚廣告的屏幕墻。整棟建筑模仿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繪畫中體現出的完美幾何學的城市——有古典的圓柱和柱廊，還有方形的廣場，人們很愜意。廣場中間有噴泉，隔段時間會有表演，伴奏著約翰·施特勞斯的華爾茲，音量很大。這時候人們會中斷談話，看噴泉的水柱起伏流轉，像合唱隊女孩子那樣互相追逐——他們也沒別的可看。華爾茲最后在一堆激昂的和弦中結束，所有的噴泉同時噴射，感覺這個時候好像每個人都應該結婚，或者接吻，諸如此類。但大家繼續剛才的談話，廣場也回到了之前的樣子。

德里很晚才有商場，而且最初的商場規模都很小。21世紀初，商場吸取了這座城市越來越多的資源和注意力。大片公共土地被放給私人開發商，后者瘋狂建房，飛快地掩埋（比方說）所到之處的古代遺跡。到本世紀初第一個十年結束的時候，這片平原上有著數千年歷史的宮殿目錄里，已經增加了好幾個有空調的大型消費者據點。

我們現在所在的新商場就建在機場旁邊，所以頭頂不斷有低飛的飛機轟鳴而過。從很多方面來說，這座商場吸收了所在之地的精氣神。地下停車場的指揮人員好像是從隔壁的飛機跑道上借來的，他們揮舞手臂給你的信號讓你感覺自己像是坐在飛機的駕駛艙里。商場就像機場一樣，與周圍的空間完全隔絕。如果我們往陽臺另一邊看，越過沿墻的那排樹，就能看到豐饒的外圍景觀，和商場又是草坪又是噴泉的景象相比，外面就像CNN里常出現的那種殘垣斷壁的鏡頭。現在，有一輛卡車正過來給下面的大型貧民窟送水，婦女和兒童從家里跑出來，手里拿了盡可能多的塑料容器。

商場里有許多戴著飛行員墨鏡的男男女女，延續著這種機場的感覺，仿佛購買法國時尚產品或者美國科技產品需要的勇氣僅次于駕駛戰斗機。每樣東西都有種航空的意味，就好像能在這里購物的少數群體，他們的會員身份自帶一種愿望，希望從當代印度城市的混亂中起飛，飛到空中某種與外界隔絕良好的免稅店里。這座商場折射出歐洲大都市成就的記憶——意大利的廣場、維也納的舞廳，商場似乎把自己作為理想城市悠長歷史中的一部分來呈現。但這座完美的城市當然根本不是城市，它甚至沒有真的“在城里”，因為這里只通高速公路，所以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來這里。入口處要安檢，所有的交易似乎只為了一個同樣的目的。正如對許多德里的富人來說，理想的家就得像五星級酒店，而理想的城市似乎就是一座機場。

“碩士一畢業父母就開始為我物色丈夫，”身材高挑、機靈搞笑的薩克溫德說，“我是錫克教徒，所以我們結婚一般不會拖到很晚。”

不要把家里安排的婚姻想象成守舊的父母把“傳統”強加給不情愿的“摩登”子女，因為事情往往比這復雜得多。很多情況下，現在為子女安排婚姻的那些父母自己卻是自由戀愛結婚的，而且他們也沒有強迫子女。因此，很多包辦婚姻的出現不是來自傳統，而是來自于當代環境的匆促。在這些充滿不確定和變化的日子里，選擇單打獨斗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太孤立、太危險的前景。遠離父母的孩子們覺得應該有某種事物把自己牽絆住。包辦婚姻在一個非常缺乏保障的時代提供了很多保障——在這樣的聯姻里，夫妻對于財產和幸福的責任不只屬于自己，還屬于兩家的結合體。

但對于薩克溫德來說，還有額外壓力。她有腭裂，所以她的父母覺得給她找個丈夫會更難。德里有數以千計的家庭團體，隨時都坐在德里的餐廳或酒店里和另一個家庭面對面，嘗試搭訕攀談，薩克溫德也加入了他們。

“每個周末我都要去相親，每次坐在那里我都完全提不起興趣。因為你知道，你心里對想要嫁給什么樣的人有概念，但我見過的所有對象都傻不拉嘰的。我不知道為什么每個人表面上都裝得很現代，但是內在都是些白癡。他們會出去派對，打扮入時，戴很貴的墨鏡，諸如此類。但他們一開口講話，你心里的獨白就會是‘我的天。’”

家長們會用很多辦法給子女找未來的配偶。職業媒人服務于一個特定的種姓群體或社會階層：他們來回傳遞相簿，里面滿是單身男女的簡歷和照片；特別是女孩子的照片，本身簡直就是小小的杰作——照片上的妝容由專業化妝師完成，精心造型的發型由美發沙龍的風筒吹出。但這些媒人只能為少數特定人群服務。長期以來，報紙上的“婚姻”版是大范圍昭告整個城市的主要方式，而且對于守舊的人來說，這仍然是唯一可以信賴的方式。但過去幾年中，網絡婚姻中介橫掃了市場，部分原因在于他們也提供額外的服務，比如偵探調查和占星。偵探會調查一個人的婚姻和性方面的歷史，并且核實對方提供的信息，比如說他們是不是真的HIV陰性、是不是真的吃素或者視力良好。占星家則確保未來要成家的兩人的生辰星象不會太犯沖。

“我想和一個能聊得來的人結婚。很多男生說完‘嗨’以后就沒話可說了。‘不要把真正的自己展示出來，’我父母一直這么和我說，‘不要把嘴張得太大。’所以我努力閉著嘴，坐在那里聽這些男的說話，然后他們就會說，‘那么你會做飯嗎？’我就說，‘做飯？不會。我一直上班的。’‘哦。’”

薩克溫德模仿那些男生和她對話，那種遲鈍的語調很難用文字表現，但她的表演讓我笑得眼淚都出來了。

“然后他們會說，‘你愿意辭職嗎？’‘不。’‘哦。因為我們家的女人都不工作的。’我說，‘我覺得這事現在和我沒關系。’‘哦。你很有主見。’我就說，‘是啊。’然后對話基本上就結束了。”

薩克溫德和她的姐姐在她們父親的公司擔任總監，公司為印刷行業制造設備，她負責運營，這意味著下班時間經常很晚。她反應很快，而且很有決斷力，很容易就看出為什么她做什么都做得很好。

“所以最后我認識了德魯夫（Dhruv），我現在的丈夫。第一次和他見面，我說不出他有什么真的不好的地方，而且他家也不太愿意我們多見面。因為我很愛說話，所以沒意識到他不怎么說話。他就是問什么答什么，但他自己真的沒什么可說的。我父母希望我盡快結婚，因為我姐姐當時婚姻不順利，如果有什么事的話，我就更難嫁出去了。所以事情進展得很快。我父母看了他們家的房子，覺得挺好。父親還去看了他們家的工廠，看上去也不錯，盡管后來發現根本就經營得不好。

“事情一開始就往壞的方向發展了。我們是非常不同的人，結婚前我就告訴他，‘我抽煙喝酒，而且沒打算戒。我了解你的家庭背景，如果你覺得這是個問題，現在可以告訴我，那我們就不結婚了。我們還沒有訂婚，我也沒有愛上你，而且我敢說你也不愛我，所以我們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說。’‘沒問題，這方面我絕對沒意見’，他說。我說，‘那好。’

“我們去度蜜月的時候，我帶了五盒煙。我們在新加坡中轉，我很想去抽煙，但他更想購物，所以我就沒抽。然后我們到了巴厘島，入住酒店之后的第一件事，我就點了一支煙，走到陽臺上，一邊看風景一邊想著這個美麗的假期。他看著我，嚇了一跳。之前他從來沒見過我抽煙。他說，‘你就不能把煙放下嗎？你不想休息會兒嗎？你不想躺下看看電視嗎？’

“我說，‘我知道蜜月是會做很多愛的，但不只有做愛。我們要計劃下在這里干些什么，因為我們以后大概不會再來了。’我從機場拿了很多小冊子，希望他和我一起看看，然后決定想要干什么。

“他這個人非常沒意思。我不得不拖他去潛水。這家伙不會游泳而且很緊張，所以當我發現他需要準備很久，我就自己跳進水里，開心地玩了二十分鐘。上來的時候他還坐在船上，他說，‘我正要下去。’于是我又下水了，回來的時候他不在了，我知道他肯定下水了。我累了，就上了船，船上有個男的在抽卷煙，我問他還有沒有。

“所以我丈夫浮上來的時候，我正坐在那里抽煙。他看著我說，‘這煙哪里來的？你沒帶自己的煙來啊。’我說，‘沒有啊，煙是他的。’他真的驚到了。他說，‘但是你不認識他！’我說，‘好吧，對不起。’然后就把煙滅了。

“其實煙已經抽完了。我不浪費煙的，不會為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人浪費煙。

“我說，‘我們別糾結這事了。’

“然后我們就去購物。你知道的，通常新婚夫婦第一次去旅行，會給對方家里帶禮物，所以我就把他家和我家所有的親戚都列了一張表。他自己想買一個木刻雕像，就在那兒看雕像看了四十五分鐘。我都瘋了。他說，‘別不耐煩。’不耐煩？我想拽他頭發！我說，‘你選你的雕像吧，我去買禮物。’我去買了二十五件禮物，回來的時候，他還在看他的雕像。

“他說，‘我只是不像你那么亂花錢，我對錢很謹慎。’我說，‘對錢謹慎是一回事，我也對錢謹慎，但是浪費神賜給你的時間是另一回事。’

“那天我意識到，我以后再也不會和他一起去買東西了。我們回到德里以后，我量了他所有的尺寸，以后他需要任何東西，我就自己去給他買回來。因為我不能忍受浪費時間在購物上。

“但是后來我發現他的財務狀況并不好，所以花錢的時候才那么別扭。他的生意經營情況不佳，我發現之后，在兩個人出門的時候，我會故意把他的錢包留在家里。這樣，如果他看上了什么東西，我們就能直接買了，他也不用猶豫太久。再后來，我開始不在他面前買東西，這讓我有一點負罪感，因為多半我得偷偷地把東西拿回家，還要對買東西的時間撒謊。但他在錢方面漸漸產生了一種真正的自卑感，這成了我們之間的一個問題。

“有一次，我正好撞見他叔叔對他說，‘你可以去接手她們家的生意，然后一切都是你的了。她們家有那么多財產，最后都會是你的，你真的能從你老婆身上賺一大筆錢。’我一點也不喜歡那段對話，因為在我們家，比起錢，我們更重視彼此的關系。哪怕當爸爸的生意剛起步的時候，我們過得很難，錢也從來都不是問題。我們有過父母為了省錢每天只吃一頓的經歷，但這對我們的生活并沒有產生什么影響。

“錢對我們來說，真的從來不是件事。有就有，沒就沒。但在他家，錢就真的是一件大事，大過人和人之間的情誼。我真的覺得這樣很奇怪。為什么有人會優先考慮某些明天可能就沒有的東西，而不是那些可能在你老了會幫你或為你做其他事的人？但他就是那樣的，所以他的自卑就冒出來了。因為這個，我們開始常常吵架，而且說的話都很難聽。”

太陽正在下沉，夜晚的感覺落在陽臺上。白天的暑氣蒸發了，于是高速公路上的轟鳴在某種程度上更響了。頭頂上很多烏鴉叫著，服務生過來在桌子上放上了蠟燭。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成群結隊，下班了過來小酌一杯——就像這座商場里其他人一樣（除了那些清潔工和保安），他們都是高種姓、淺膚色的。

有個女人在用手機給她的同事拍照，每次閃光燈都亮得不可思議。她背對著我們，我能看到她米色西服里黑色皮帶的精致輪廓。

“搬進丈夫家不久以后，”薩克溫德繼續說，“我發現他和他母親對彼此的依賴感很強，這讓我非常不舒服。特別是因為他父親很多年前就過世了，對他媽媽而言，他又像丈夫又像兒子。我絕對不反對母子之間關系好，但他母親會干涉我們關系的方方面面。有些事應該是保留在夫妻之間的。每次我和德魯夫說了什么，他媽總會在第二天來奚落我。我經常很驚訝，‘你也知道那件事！你還知道什么？’于是我就和我丈夫談，但他完全不愿意聽我說關于他母親的任何事。

“我以前常和她一起坐下來——我是一個開放的人，相信談話能解決很多問題——所以我經常坐在旁邊和她講話，覺得自己能成為她的朋友，因為她沒有人陪。但這完全是打自己耳光。每次我和她聊完，她就會到我丈夫面前說，‘她說你壞話。’

“她覺得我要把她兒子從她身邊帶走。她認為我家更有錢，所以某天我會收買她兒子，搬到另一個房子，讓他徹底把她忘掉。這真的很怪。我經常都說我們永遠都不應該搬出去，因為那樣他母親會很孤單。她另外一個兒子從來不和她說話，對她很差。所以我對我先生說，‘我們對她有責任，我們會照顧她的。’

“但她會對德魯夫說，‘你不知道她在搞什么鬼，我聽到她打電話了，她壞透了。’這太荒唐了。那之后我從來不在家打電話，因為我知道在家打電話的后果。

“我常和德魯夫說：‘她并不相信她自己，也不相信她給你的價值觀，也不相信被她塑造的那個你。否則她為什么這么沒有安全感？你照顧她，她知道你關心她，她到底害怕什么？一個進了你家門的女孩子？我不是來破壞你家庭的。’

“他們覺得我應該每天早上起床后做飯，準備每個人的午餐盒，開車一個小時去上班，管理工廠，然后準時下班，為晚飯買菜，然后在7點前到家做晚飯。開始的時候，我不會做飯，她教我，我仍然感謝她這件事。但是如果我7點01分才到家，她就會在廚房里不讓我進去，然后就會鬧成一件大事。我只能在7點前到廚房，這樣德魯夫回來的時候就不用面對某種可怕的場面——沒人希望下班回到家里發現吵成一團。我意識到，我唯一能幫到德魯夫的就是準時回家。有段時間我下午4點半就從辦公室走了，我的意思是說，因為是自己的生意，我能有一定的自由。但是這成了個大問題：你不能太過分了。

“后來，有一次他告訴我他媽媽不喜歡我去上班。我對他說，‘我以前就告訴過你，我不會放棄工作的。’但這就把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毀了，整整一個月我都沒去上班。

“他們不允許我有社交生活。我唯一的社交是有時候回我父母家住兩天，或者是下班回家的路上，給朋友打打電話。在家里，他們討厭任何打給我的電話。有時候設備發貨后中間耽擱了，我是負責人，我不能說‘我在家不能打電話’。所以我就會接電話，處理事情。然后我婆婆就會說，‘她就是在炫耀自己比我兒子的工作多。就因為她管著那么多人，并不代表我兒子不好。’這樣的事情會讓德魯夫心里有疙瘩。要不是她這么說，他不會真的那樣想。

“我還不能擁抱男孩子，就算是自己的兄弟也不行。我就是不能擁抱任何人。在我家里，我們非常喜歡肢體表達。你知道嗎，如果我父親要出門，我們會擁抱還會親吻。有一次德魯夫出門上班，我擁抱了他。結果他說，‘不要這樣，媽媽在那兒站著呢！’我說，‘該死的，我們是夫妻好嗎？’然后他說，‘不，等會兒她會和我說，你不應該在外面做這些事。’

“她完全是另一路的想法。就像有一次我下班回來，把車停在外面，然后街上有孩子在打羽毛球，我就拿了一個球拍和他們一起打。她打開門直接就朝我喊，“快滾回來！”進門之后我們大吵了一架，她說，‘這個家的媳婦兒不會做這種事！真不知道你父母是怎么教你的。’

“另一件事是性。其實他這方面挺開放的，比我開放。我結婚的時候不是處女，盡管我必須裝作是，因為我知道自己要進的是什么樣的家庭。但一開始，他母親不讓我們關臥室的門。從第一天起，她就希望我們有孩子，旁遮普家庭想要的就是這個。于是我對她說，‘你都不讓我們關門，我怎么給你們生孩子？’如果我們把門關上，她會捶門，用‘敲門’這個詞來形容她就太禮貌了。

“她會說，‘干什么你們要關門？如果你們不是在做壞事，就不應該關門。’我們就是在里面睡覺，或者很難得的情況下我們在那兒聊會兒天，她也會過來大喊：‘請把燈開一下，我不喜歡你們關著燈在里面。’

“德魯夫倒完全不覺得有什么。‘這有什么問題嗎？’他會說。‘我們會開門的。’有幾次，我對他說，‘你什么事都告訴你媽，為什么不告訴她你和我試了什么體位？’我常拿這個開他玩笑。”

她說話的時候有個男人走到我們這桌，一句話也沒說就在她旁邊坐下來。她沒怎么在意這個男的，所以我推測她知道他會來，但我還是稍微有點驚訝，對任何人來說，這都算是缺少反應。我們決定來這家咖啡店之后，薩克溫德就沒碰過手機，所以她不可能告訴他，而他還是能找到這里，一句話都沒有就在旁邊坐下來。我很喜歡他們兩個對對方在哪兒表示出的無動于衷。我不知道這個男人是誰，肯定是她非常熟的人，因為她繼續在他面前講很私密的事。

“德魯夫家不信錫克教。他們是西旁遮普來的印度教徒，屬于婆羅門種姓，喜歡去見祭司和占星人。我們結婚四個月后，我婆婆開始對德魯夫說她的祭司覺得我是股邪惡力量，有我在家里會不順利，他的生意是因為我才失敗的，諸如此類。

“她開始對他說我在用黑巫術，我就大笑，因為我甚至都不相信這些。但是他們開始用各種儀式來保護他們家。我到家的時候，門口經常會有奇怪的用來阻止惡靈進門的東西。但因為我們家是錫克教，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那些東西是什么，我會把它們撿起來扔掉，這更使得他們相信我是邪惡的了。我婆婆非常害怕會有外面的壞東西進來，除了到街上一個小販那里去買蔬菜，她從來不出家門。出門的時候，她要準備三雙鞋，會從一雙換到另一雙，保證家里面的東西和外面的沒有接觸。

“有天她翻我的東西，找到一個穆斯林朋友給我的護身符，上面有伊斯蘭符號。我覺得挺有意思，挺喜歡的。她把護身符拿去給她的祭司看，祭司說，‘這就是你所有問題的根源。’然后他們就作法要凈化這個護身符。她把這件事告訴家里的每個人，于是所有人都開始避開我，整個家都看不起我。他們是一個‘分治’的家庭，這就像分治一樣，我就是分治里的巴基斯坦。讓我傷心的并不是其他人都相信這種瘋事，而是德魯夫相信了。他不會質疑他母親說的一切。

“我真的不希望自己的婚姻失敗，所以任何能做的事我都嘗試了。我以為自己可以改變一切，讓每個人開心。我婆婆從十五年前她丈夫過世起，就一直很傷心。你不會相信的，我搬進他們家的時候發現整棟房子里一張他父親的照片也沒有。這讓我覺得，他們還沒有接受他已經不在世的現實，而且我認為這就是他們這么不正常的原因。所以有天我們出去買東西，我買了一個很漂亮的相框，沖洗了一張照片，然后把照片放在客廳。她看見的時候整個人都歇斯底里了。她尖叫著，‘把它拿走！’我說，‘看，這個相框很漂亮，他的這張照片也很美。我覺得這會讓你高興的。’結果她朝著德魯夫大喊，‘這女孩子就希望我一直哭不停。’

“她睡覺的時候會把房產證壓在屁股下面，因為覺得我想偷。我不喜歡這么說話，但私下里，我對她說：‘你見過我家的房產嗎？我自己已經有好幾棟房子了。你的房子會平分給五個孫輩，你覺得我會在意偷這個破房子的五分之一？’不過我覺得，既然她這么在乎錢，也許可以用錢讓她開心。于是我開了個戶頭，根據自己當月的收入情況，每個月存5000到1萬盧比進去。我把提款卡給她，對她說，‘你要用錢的時候不需要找德魯夫，這些錢給你，我也是這個家的一分子。’但是我猜我從來都不屬于這個家。她天天都不高興，而且對我很惡劣，只有到我要打錢的那天，她會突然對我非常非常好。你知道，這很明顯，那種好是讓人感到惡心的那種。但我無所謂。我覺得，‘如果這樣能在這個家買到太平，你可以拿走我所有的薪水。’

“家里關系惡化的時候，我常對婆婆和我丈夫說：‘你們到底想讓我做什么？你們希望我怎么待人處世？給我列張表，我照著做好嗎？因為無論我做什么你們都不高興，而我要是不做了，你們還是不高興。’一年以后我對她說，‘每個星期我都坐下來和你一起，問你希望我做什么，每個星期你都會告訴我某件特定的事。我其實把每件事都記下來了，但每次你讓我做的事和前一個星期都是矛盾的，好像你就是故意不想讓我做好。’

“德魯夫有個弟弟嗓門很大，他對他母親非常粗魯，吵架的時候還會打她。這真的讓我很震驚，因為第一次看到他打她的時候，我就想，如果他連自己的母親都這么不尊重，有一天他也會殺了我。那天我完全嚇到了，他一直在踢她打她，我上去護住她不讓她受傷，因為她有急性關節炎。但在她心里，她兒子是完美的，第二天早上她給一個親戚打電話說，‘薩克溫德昨天要打我。’我心里當場罵娘了。你個婊子！她永遠看不到兒子做錯了什么，如果他們做了壞事，她馬上就忘了。

“我無法理解這些，而且我總是錯在太誠實了。如果我丈夫和婆婆在吵，德魯夫就會把我叫過去問，‘你覺得我們誰對誰錯？’那我覺得你既然問我了，肯定對我的回答是有準備的。所以我會說，‘我覺得她這里錯了，你那里錯了……’然后他們兩個就都怒了。他們會同時忘記在吵架這件事，簡直要把我生吞活剝。他會說，‘你怎么能這么說我媽？’然后他媽會說，‘你怎么能這么說我兒子？’

“總之，有一次我下班回家真的很晚了。每年我們都會參加一個貿易展會展示我們的產品，我得一直在那兒工作，所以我從展會回來時已經非常晚了。我真的很想上衛生間，于是我進門的時候，完全忘了要換鞋這件事，直接跑進了衛生間。我婆婆非常生氣，和我說了各種奇怪的話。我說，‘對不起，我真的忘記了。我只是想去上廁所。’‘不是的，’她說，‘你是想使壞。’我說，‘不要這樣想，你說的完全沒道理。’于是我就去洗澡了。

“洗澡的時候，我聽到婆婆和我丈夫在外面很大聲地說話。出來的時候德魯夫說，‘你不應該和媽媽吵架。’我和他解釋了整件事。他說，‘不，你打了她耳光。’我說，‘我打你媽耳光？’他說，‘是的。’他又說，‘好吧，你沒打她。但是你要打她。’我說，‘我們結婚一年半了，如果你覺得我能打你媽，那神保佑你。’然后我就去廚房做飯了。

“他跟著我進了廚房，抓住我的手，把我拖到餐廳。他說，‘我們現在就得解決這個問題。’我說，‘我知道自己比你年輕，但我懂得一件事，就是生氣的時候不應該講話，因為這樣只會吵翻。你會說出并不是真心想說的話，事后又覺得抱歉。我也會回敬你，事情就會變成比賽看誰傷害誰更多。’‘不，我們現在就得解決。’‘好吧’，我說。然后我們就開始談，我們只是談話，然后他直接朝我臉上揮了一拳。

“他真的很高，約一米八八，很壯。他打了我，我昏倒在地上。

“事后我完全懵了。我打電話給兩個女性朋友并去和她們見面。我不停地號啕大哭，我問她們：‘這正常嗎，這樣正常嗎？這是大家庭里普遍會有的情況嗎？’因為我朋友都是在大家庭里長大的，而我們家是核心家庭。然后她們說，‘沒關系，他就是真的很生氣。’她們只是想讓我鎮靜下來，因為我真的失去理智了。但她們很憤怒，你知道，我能從她們臉上的表情看出來。我沒把這件事告訴其他任何人，甚至沒告訴父母，因為那時候我不知道這算不算一件大事。我完全迷失了。

“我想我就試著忘記整件事吧，把這一頁翻過去重新開始。但每次我們再吵架，我都真的很害怕，因為我覺得他可能會再動手。有時候確實又發生了，有時候沒有。但時間一長，他打我的頻率越來越高，讓我非常恐慌。后來我得了抑郁癥。然后有一天，大概是我們結婚四年后，我離開了，再也沒回去。

“那時候我還沒告訴父母他打我的事，還有所有這些，所以我花了大概三個月說服他們。除了德魯夫和我自己，還有他的一個阿姨，沒人知道發生了什么，我以前常和那個阿姨說心里話。我覺得和父母說他們家發生的事不合適，所以我說，‘有的事情你們不知道，我能保證這不是我一時沖動做出的決定。’但最后，我試著說服他們幾個月未果，我告訴他們經常被打的事。他們非常憤怒地去和德魯夫家討說法，而我再也沒回去過。

“有段時間我很憤怒，我真的很想讓他和他母親坐牢。但最后我冷靜下來。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希望能狠狠地扇他們兩個耳光，哪怕就一次。但現在我甚至都不想這么做了。那是他的生活。我相信神和公正。我知道在我的婚姻里，自己沒有做任何壞事導致他們那樣對我。所以沒關系，我覺得沒關系。

“我已經盡自己所能做到最好了，甚至超出了我對自己的認識。但我對他的尊重沒有了。我不信任他，之后事情就結束了。在培養出愛情之前，就已經結出了苦果。所以我們之間絕對什么都沒有。

“你知道是從哪次開始我真的不再尊重他，而且知道我們之間徹底結束了？不是他打我的時候，奇怪吧？是另一件事。

“我總是喜歡打開所有窗戶，但他家喜歡把所有窗都關死。我常常覺得很悶。我有哮喘，有時候真的很嚴重。有一天晚上，我醒過來，發現不能呼吸了。我很慌張，于是把德魯夫搖醒，讓他把吸入器遞給我，因為吸入器在他那邊的床頭。但他不肯去拿，我就昏過去了。那之后，事情再也無法回頭了。”

她講了很久，天已經黑了，人們進來又離開。我們隔壁桌是一個非常胖的扎著馬尾辮的男人，他和一個很漂亮的女人坐在一起，女人比他高一個頭，腿上趴著一只吉娃娃。

我們結了賬，走回商場里。我和薩克溫德道別，并和陪她的男子握了手，盡管我還是不知道他的身份。

我思考著她的故事，走進電梯去停車場。有個男人和我一起進了電梯，手里拿著一個古馳的袋子，袋子非常大，使他渾身上下透著一股炫耀勁。這是個奇怪的現象：德里這些商界家庭的男人們，總是喜歡用手袋來展示自己的男子氣概。

電梯門開了，我走進燈光黯淡的地下車庫，這里又熱又臭。空調把商場里變得涼爽適意，而北印度平原的熱度仿佛被存在這地下了。很快我就開始冒汗。

我上車開到出口的收費亭，一邊把停車卡交給亭子里的男人，一邊想他每天得在這個地下烤爐待多少時間。“50盧比。”他對我說。我開始在錢包里摸零錢。

正摸著，他從窗口伸出手，在我的擋風玻璃上撿起個東西：一朵巨大的紅色花朵，是從我屋外的一棵木棉樹上掉下來的，它卡在雨刷里，和我一路從郁郁蔥蔥的城市來到這城外的不毛之地。

男人翻來覆去地仔細看它，好像這花是剛剛從外太空來的一樣。

“能給我嗎？”他問。

“當然。”

他把花放在亭子里面的架子上，著了魔般地凝視著它，仿佛樹早已滅絕，只存在于兒童書里。

## 七　男性的焦慮和女性的掙扎

穿著庫爾塔[[1]](#kurta_Yin_Du_Wu_Ling_Chang_Xiu_C)戴著頭巾，那個政治家微笑著站在臺上。“這里有人能告訴我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女兒的名字嗎？”會場里每個人都舉起了手。“英迪拉·甘地!”他們喊道。“對！”政治家滿臉笑容。

“那現在誰能叫出圣雄甘地的兒子的名字？”

臺下一片難堪的沉默。沒人舉手。政治家裝作很驚奇，“多有意思！”他說，“每個人都記得一個女兒的名字，卻沒人記得一個兒子的名字。”

他走到臺邊，向觀眾提問。

“那為什么我們要殺死我們還沒出生的女兒，我的朋友？為什么我們的男孩子長大了找不到女孩子可以結婚？”

當廣告希望向你展示某些新鮮、當代的東西時，總會借助一個穿著西裝的女性形象。

年輕的職業女性是新印度的代表性標志。女性的工作通常在經濟體的最底層，雖然也有不少在最頂層，但這些在印度市場自由化后就職的中產階級女性，許多人從事的工作和以往全然不同。很多人不得不和自己的家庭做斗爭，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然而，總的來說，這場革命很快就勝利了。部分原因在于，即使是那些不喜歡這場革命的人，也能看到所有的變化與其所想背道而馳。

印度市場自由化之后的幾年里，中產階級的總體自尊大大提升。自尊來自工作和收入，也相應地削弱了家庭主婦和媽媽這種沒有報酬的角色的力量，而在20世紀的神話里，這些角色是顯得非常崇高的。年輕女性滿腔熱情地追隨時代潮流，因為對她們來說，從家里搬出去利遠遠大于弊。因此在很多方面，她們是新印度最決絕的擁護者，這就是她們的心意那么堅定的原因，也是她們在職場那么成功的原因。企業的世界比設想中的更平等，印度的性別平等和西方的性別平等的結構從來都不一樣，企業辦公室里的情況和家庭里的情況也不相同——女性很快就升到了印度企業中的最高層級。她們在很多方面都是企業里的模范員工，因為她們和老一套體系沒有牽扯，能冷靜客觀地分析情況，并且對于變化無所畏懼。

男性就不一樣了。男性確實和過去的體系有更深的糾纏。他們內在的平靜來自這樣一個想法，即女性在家主持家務，這種關系的深刻程度超出了他們自己的意識。忽然之間，女性整天都在外面，還和他們掙的錢一樣多，而且從這個重要的意義上來說，她們不再需要男性的支持。因此對男性來說，印度社會的變革附帶著威脅。如果在這本書里，男性比女性出現得更頻繁，只是因為印度變革中巨大的矛盾心理常常在前者身上更直接可見罷了。女性不得不忍受這些備受困擾的男人們的爆發，其遭遇常常是非常痛苦的，但她們的心卻更忠于自己。薩克溫德在自己的故事里是有自制力的“現代”女英雄，所以我們不需要費什么力氣就能認同她。但如果真希望弄懂21世紀早期的德里在價值觀和情感上的痛苦亂流，我們就必須試著了解她周圍的那些人都在想什么。

薩克溫德是“現代的”，并不意味著她丈夫和婆婆是“傳統的”。年輕女性和婆婆之間的摩擦在妻子和丈夫家庭同住的家庭體制里肯定是根深蒂固的。畢竟，很多婆婆自己也是在某個時刻被帶到一個不熟悉的家庭，遭遇了各種各樣的懲罰和羞辱——這樣的循環常常悲劇性地重演。更早些時候，當年紀大些的婦女自己的地位更安全一些，她們可以扮演導師的角色，指導向她們求教的媳婦。[[2]](#Li_Ru_Ke_Li_Xi_Na__Suo_Bu_Di__Kr)

但在21世紀初，像薩克溫德的婆婆這樣年長的中產階級婦女，她們自己的地位可能遠遠談不上“安全”。她們時常覺得自己的知識在這個新世界里沒什么價值，現在所有的價值似乎都消失并且讓位于單一的價值觀：金錢。年輕女性拼命工作，頻繁社交，穿著大膽，對家里所有的禮儀和家務都不感興趣，而這些卻是讓婆婆一直以來受到尊敬的緣由。這些女性似乎代表著一種暗暗的詆毀，詆毀婆婆的地位所倚仗的一切。而婆婆們會覺得（有時候這種感覺是對的，有時候是錯的）自己在為生存而和這些年輕的女性作戰：“如果我兒子學會了愛這樣一個女人，他就永遠不會再愛我了。”終極噩夢就是：這個沒什么價值的媳婦兒，受到新的毫無根基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過度影響——這種生活方式中，自由自在的雙收入夫婦不顧所有其他羈絆——媳婦可能因此堅持和丈夫搬出去住，拋棄丈夫那對沒用又惹人生氣的父母，甚至切斷對他們的財務支持。而很多情況下，這些父母退休后除了依靠兒子外，確實收入微薄。諸如薩克溫德婆婆那樣的女性，她們在自己的生活中被剝奪的自由現在由活躍在職場上的“新”女性所享受，而這些女性進入了她們的家庭，這一事實只會使她們感到更強烈的不安。作為職業女性的兒媳就像一個活生生的提醒，提醒著她們自己不能自由去做的事。還有，兒媳面對自己擁有的自由表現出的不以為意，看上去純粹是一種傲慢。

年輕的已婚男性自然常常和自己的妻子（而不是母親）有更多的共同點。通常，妻子的生活節奏和生活方式和他們相似，而且能和他們討論許多母親完全不了解的日常事物，比如出去玩、各種產品以及工作上的事。但恰恰是這種世俗生活讓男性非常矛盾。即便在享受著由兩份工資帶來的生活方式時，他們也經常為自己的妻子涉足外部世界的程度而感到煩惱不安。這些男人往往已經從自己母親那里形成了對家庭女性那種單一的印象。他們的母親從來沒和外界有什么接觸，她們尋求的是：為在男性世界中競爭和掙扎的男人們提供慰藉的家庭港灣。因此，在年輕職業女性身上，男性可能會感到一種令他們不安的誤識。這些年輕的女性甚至連外表都不像上一代的女性了。消費主義和與之相伴隨的節食、健身以及纖瘦的模特，帶來的不僅是不同的服裝，還有截然不同的身材。這樣的外表充滿誘惑，但也可能引起和墮落有關的感受。年輕男性經常困惑地發現，他們無法在女性伴侶身上感受到他們覺得自己應該有的感受。

這種母性精神的至高無上看上去可能有些奇怪，但它確實擁有最高的權威。印度教中，宇宙中活力和生產力的能量是女性的而非男性的，而在生殖活動中，每一個母親個體都引導著整體的宇宙力量。她們的母性來自一種原始能量，正是這一神力給予了印度的“政治之母”——英迪拉·甘地和她之后其他有紀念碑式意義的女性政治家如此令人敬畏的高度。母親們或許只不過是待在家里，但在兒子們心中，她們是溫順謙恭的代名詞。是她們為兒子的成就提供了所有的原動力，還保護他們不會受到外面無處不在的邪惡力量的傷害。北印度的男性很喜歡引用拉迪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話：“神不能無處不在，所以他創造了母親。”這樣看來，母性精神絕對不是虛無的。

因此，妻子和母親間的矛盾讓男人們害怕。實際上，很多男人最重要的擇偶標準，就是未來的妻子要像自己那樣尊重自己的母親。因為他們知道，如果她們爭斗起來，自己會被這兩股女性力量從中間撕成兩半。男人對這兩個女人都有同情和共鳴，但就像流行的視覺游戲一樣，給你一張圖讓你分辨是兔子還是鴨子——男人可以理解另一方的觀點，但沒辦法讓兩個觀點共存，他們通常沒能力把兩個觀點綜合起來。他們可能贊同妻子的話，說房子里的老鼠有時候會在衣服上咬洞，但當母親給他們看T恤上的洞就在心臟位置的時候，他們無法否認這就是邪惡黑巫術的證據。在母親面前做兒子和在妻子面前做丈夫，是兩件無法共存的事，他們也在巨大的壓力下必須做出選擇。這兩個位置間的斷層線分裂了他們最原始且不可言說的部分。很多情況下，他們迅速站到母親那邊，因為對母親的背叛是更不能想象的。而且，不管是溫和還是蠻橫的男性都常常會對妻子訴諸暴力，因為他們無法用語言來反駁頭腦更清醒、表達更清晰的妻子。

這種新爆發的情況，即在家庭內部懲罰女性，只是對女性更廣泛的厭惡逐漸加劇現象的一部分。這在印度北部，尤其是德里最為嚴重。如果有一種犯罪能為這座21世紀的首都代言，那就是強奸。報紙把德里稱為印度的“強奸之都”，由于以性侵聞名，其他城市的女性都害怕到德里去。

當然，強奸并不新鮮，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強奸案一直都在發生。然而在德里，歷史上的強奸案主要都發生在家里，因此強奸的程度和事實有很大一部分被掩蓋了。21世紀早期的強奸與以往的不同之處在于，其發生的場所是公共場所，并和虐待結合在一起，相當可怕。每樁強奸案似乎都在竭力挖掘殘忍的可能性，同時聳人聽聞的性暴力越來越多地占據了這座城市的媒體和居民的談話內容。婦女遭到綁架，并以半儀式的方式被強奸。有一些被丟在街上的受害者受了重傷，樣貌悲慘，讓人更多想到的是報復、滅絕和戰爭，而不是性犯罪。

這就是重點。發生在德里的是一種層次低、傳播廣的針對女性的戰爭。女性新近擁有的行動自由不僅使她們成為印度社會和經濟變革的偶像，更成了其替罪羊。

強奸是攻擊女性最戲劇化的表現，但在一些很平常的場合，也能看到相似的報復性恐嚇。女性獨自在街上走的時候畏畏縮縮，低頭看地，避免受到眾多男性的直視，因為直視也被視作一種威脅。電影明星和模特在網上的性感照片經常受到評論，比如，“告訴我為什么我們不應該強奸穿成你這樣的女人？你父母把你養大是為了讓你穿成這樣嗎？”評論的男性都留了名字，他們顯然不認為在網上瀏覽這些內容并留下這樣的評論是對別人的侮辱。女性晚上獨自在城里走路，或者一個人坐在酒吧，經常會有男性過來問“多少錢？”在這些場合或者太多其他情況下，會有很多男性努力去提醒女性，家才是她們應該待的地方，即使這種斗爭在他們現在生活的社會里已經顯得很奇怪了。

但是女性應該在家的這種想法，在印度有一種特別而重要的地位，這種重要性來源于這個國家的殖民歷史。19世紀時，男性和女性的性別角色開始分化。商業和政治受到殖民控制，意味著男性為了從事自己的事務不得不妥協并改變印度式生活——在外屈服于英國的法律、語言、著裝、技術和社會習俗。于是，民族主義的責任落到了女性身上，她們要代表其他人來保持印度的純正存在，這意味著要置身于已經腐化的公共領域之外。女性要留在家里，把家維護成一個精神純凈的堡壘，能夠抵御對靈魂的殖民，成為已婚男性獲得重生的庇護所。在殖民時代的背景下，女性這樣的角色未必是消極的，正如一位歷史學家寫道：

我們想要把這稱為“保守主義”，僅僅視其為一種對于“傳統”規范的防衛。但這是錯的。殖民時期的情況以及民族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回應，賦予這些指稱全新的本質……世界是歐洲權力挑戰非歐洲人民的地方，并且歐洲憑借優越的物質文化征服了非歐洲人民。但是它沒能侵入東方內在和本質的身份人格，這種身份人格來自東方獨特而出眾的精神文化。這是東方未被統治的部分，這部分的東方獨立并主宰自己的命運。……在國家掙扎的整個階段，最重要的需求是保護、保存和鞏固國家文化的內在核心，即它的精神實質。不能容許殖民者對此內在圣所的任何侵犯。在外面的世界，對于西方規范的模仿和適應都是必需的；但在家里這等同于毀滅一個人真正的人格和身份。[[3]](#Partha_Chatterjee___The_National)

于是，“精神純凈”的概念撐起了一張情緒和歷史的大網，并將印度女性禁閉在其中。這就是女性形象在印度整個20世紀的大眾文化中被神圣化的原因。對于有些人來說，這是印度本身的基石。如果女性放棄了她們在家里的角色，那么印度文化將無法與世界上其他沒有宗教信仰的地方文化相區別，相當于“毀滅一個人真正的人格和身份”。而且最重要的是，男性自身無法維持這種區別，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自我意識并非來自自己所掌控的東西，而是來自母親和妻子為他們保管的東西，而她們可以在任何時候讓這些東西土崩瓦解。

就此而言，也許更容易理解為什么大量中產階級女性對于家庭的理性放棄會引起混亂的反響。畢竟在21世紀初，印度中產階級的生活已經因更一般的身份認同問題而受到抨擊，因為許多中產階級家庭的生活節奏已經和國外沒什么兩樣，而傳統上印度正是通過這種節奏上的區別來定義自己的。而且人們覺得，在某些領域，如果不努力維護印度本身的傳統的話，整個秩序將化為烏有。也是在那個時期，很多年紀較大的男性，其擁有的權利被和風險、競爭有關的新社會精神所剝奪，因此很多男性失去了地位和確定性，感到困惑。然后，每件事都動蕩不定，甚至是在其他領域情況不錯的男性，也常常感到身邊的社會正向某種災難走去。他們把這種情況理解為價值觀的喪失，并且無休無止地罵罵咧咧。女性，尤其是公共視野中的女性，就成了這種抵觸情緒的目標。發生在家里的報復只是這種普遍情況的一部分，即男性把焦慮發泄在年輕女性身上，因為后者的獨立和行動自由被視作造成不穩定的原因。

政治家和記者經常聲稱首都強奸案數量的飆升是由于數量龐大的窮困移民——在中產階級乏善可陳的想象中，那些人完全沒有文化或者價值觀。印度文化尊敬母親、妻子和姐妹，這樣想來，沒有一個“正常長大的”印度男人會對她們行為不端。但問題恰恰相反，而且遠讓人更沮喪。問題恰恰是出自“印度文化”對于完美家庭婦女形象的崇拜，因為這種崇拜在某種程度上暗含著對“公共”女性的憎惡，并且當“公共”的兩種含義（在公共場所的和公有的）被運用到女性身上時，會不可避免地被混為一談。暴力的出現并非來自沒有文化或價值觀的男性，而恰恰來自最在意這些事情的男人。比方說，很顯然，警察、法官和政客們即使被要求對此類罪行表達憤怒，他們的言論中也幾乎很少壓抑自己的感覺，認為走夜路的婦女受到任何對待都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上，大量強奸案的記錄中，犯案者都是這些政客自己。而這些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承諾過要用自己的生命來保護“價值觀”的。不幸的是，在21世紀的德里，這些男性并不必然會為女性所受到的粗暴對待而感到憤怒。

德里正處于人類歷史上最瘋狂的時刻之一。換句話說，在施暴者的想象中，這些惡劣的暴力行徑是有建設性的、有原則的。在印度市場自由化后不斷變化的世界中，對女性的暴力不僅僅來自沒有教養的少數邊緣群體，也來自主流社會以及任何社會階層，其出現根本不是因為價值觀的缺失，而是因為過度的瘋癲。

“我來自一個非常富有的家庭，”阿尼爾（Anil）說，“我叔叔是一家大型茶葉公司的老板。我們在阿薩姆（Assam）有茶場，有幾個叔叔在自己的茶場發現了石油，他們現在是億萬富翁。他們住在倫敦的一棟大房子里，有二十四個傭人。我們家的姓很少見，所以大家都知道我肯定和他們有關系。”

阿尼爾是馬爾瓦爾人（Marwari），這個社群源于拉賈斯坦邦，出了名的有商業頭腦。印度最富有的女性薩維特里·金達爾（Savitri Jindal）就是馬爾瓦爾人，她繼承了丈夫的鋼鐵王國。另一個鋼鐵大亨——英國最富有的人拉克希米·米塔爾（Lakshmi Mittal），也是馬爾瓦爾人。馬爾瓦爾人之所以出名還在于其嚴格保持飲食和家庭生活的傳統。他們在商業上的成功，實際上部分也是源自每一代人的忠誠傳承，他們傳承的不僅僅是家族生意，還有背后禁欲、勤奮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阿尼爾三十五歲左右，胖得要命，就像大胃王一樣，走路的步態都變形了。他說話的時候把話都含在嘴里，像個大舌頭，似乎所有的輔音都受到了影響。

“我母親決定讓我結婚的時候，我正在亞特蘭大工作。我要管理自己的生意，所以不能來德里，我是通過報紙結婚的。母親希望確保有人照顧我。廣告一放出去，就收到了很多應征——因為我的名字。所以我們選了個女孩，我回德里結了婚，然后去毛里求斯（Mauritius）度蜜月。

“蜜月非常完美。那時候我沒現在這么胖，實際上，我那時候是跆拳道黑帶。我們兩個跳舞都跳得很好，所以常常一起跳舞，其他人都會停下來看我們。我太太唱歌也很厲害，所以每次有卡拉OK環節她都會唱歌，大家都愛聽。她長得并不美，但我不介意。蜜月的時候她是完美的——每天晚上她會幫我按摩頭和腳，還幫我洗衣服、擦鞋子。”

我們坐在德里高爾夫俱樂部的吧臺邊。

沿著德里市中心塵土飛揚的擁堵道路開車，你不會覺察到道路兩旁高墻背后郁郁蔥蔥的景觀：只有當你站在高處，比如泰姬酒店（Taj Hotel）的屋頂往下看時，才會看到這些帶狀的貧瘠道路穿過了一片廣闊的綠地。政客們的“小屋”的草坪有數英畝之大，一起形成了巨大的花園地帶。洛迪路兩頭的莫臥兒王朝陵墓群有面積巨大的草坪和噴泉，蔓延其間的是洛迪花園（Lodhi Gardens）美麗的植物，這個花園是喜歡慢跑的外交官和未婚情侶的樂園，情侶們在樹叢里牽手接吻。

這個區域的綠化最好，面積最大的是高爾夫俱樂部，由英國人在1931年建成，在市中心占地約90公頃，是只有德里的精英才會了解的地方。俱樂部極盡奢華，與世隔絕，甚至擁有一套自己的生態系統。進門的時候你會經過一堆閃閃發光的豪華奔馳車，它們都是俱樂部的招牌。外面街道上的喧囂消逝在緩沖樹林背后，里面遍地飛舞著一對對糾纏在一起的黃色蝴蝶，這個品種我從來沒在別的地方見過。三百種不同的鳥讓整個地區充滿了鳥鳴，孔雀在草坪上懶散地走來走去，人少的時候還能看到黑鹿。還有完美的樹籬和莫臥兒陵墓群，這是城里保存得最好的陵墓群——紅色的砂巖和高爾夫綠相映，美極了。

在高爾夫俱樂部的酒吧里，坐著德里的地主、律師和商人。他們友好地握手，談笑風生。“我們從蜜月回來，她以為自己的生活會像我叔叔那樣，有二十四個傭人，住在倫敦的豪宅里。但我們不是那么生活的。我們不是家族里有錢的那一邊。我給她買了輛豐田SUV，她很失望。她以為自己會有輛奔馳。

“我們又在一起過了僅僅十二天。那幾天她說服了我媽媽帶她去放珠寶的銀行保險箱。她說，‘媽媽，我能跟你借你在婚禮上戴的那條項鏈嗎？它好漂亮！’于是我媽媽帶她去保險柜，她借了三條項鏈，每條價值1000萬盧比。我媽對她說，‘好吧，你要當心一點，因為這些值很多錢。’‘我肯定會的。’

“之后，她說要回老家和她母親住幾天。我說，好——我以為也許第一次做愛以后，女人會想要和她的母親談談。但她再也沒有回來。她一直找各種借口，然后她母親在電話里對我說，‘你好像不怎么愛她。’我說，‘你說什么呢？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只有二十八天！’

“她對我父母說，‘你兒子不愛我女兒。他只想著工作，在毛里求斯度蜜月的時候還在查郵件。’我說，我該怎么做？郵件都不能查了？事實上，她一天想做五六次愛，這不正常，我做不到。

“最后我們協議離婚了，我們付了她100萬盧比，她把項鏈還了回來。她不得不還，因為我們有所有的收據和照片。

“這件事對我影響很大，因為離婚對馬爾瓦爾人而言是很不好的。關起門來你做什么都可以，你甚至可以打你的妻子，但是不應該離婚。

“她走之后，我迷失了。我喝很多酒，開始吃肉，我以前從來沒有吃過肉。我胖了很多。也是那時候我開始和妓女有瓜葛。我想要羞辱女孩子，因為我的妻子喜歡性，我就專門對付喜歡性的女孩子。

“我不和這些女孩子睡，只是羞辱她們。如果我的任何一個朋友想叫小姐，我會幫他們安排。我會和男方說好，不管有多少人在場，我們要能對女孩子做任何事，要不然就拉倒。我會去挑選女孩子，然后讓她在車里免費給我口活，不是為了快感，只為了羞辱她。把她送到朋友那里之后，我們會坐在一起喝威士忌，然后我讓她在所有人面前脫衣服，做各種各樣丟臉的事，比如把錢放進她的私處。

“因為我為我妻子做了一切。我給了她她想要的一切，我放棄了在美國的生意和她在一起，我給她一輛豐田SUV只因為我希望她擁有這車。我讓她獲得了社會的尊重，因為她是印度這么有錢人家的媳婦。我給了她一切，她卻耍了我。我該怎么做？”

我問阿尼爾婚前有沒有交過女朋友。

“我不能說我結婚的時候是處男。但是我只在國外有過女朋友，在印度從來沒有過。婚前我從來沒碰過印度女孩兒。”

“那些妓女，她們是印度人嗎？”

“是的。”

阿尼爾固守著界限與界限中的純粹。對他來說，在國外有婚前性行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能和印度女性亂來。和美國企業以及超級保守的穆斯林做生意都可以——有些錢他是從阿富汗塔利班那兒賺來的，但他得保持身體的純潔，不吃肉不沾酒。然而，結婚使他放松了自己的界限。他把自己的私密世界開放給一個外人，獲得的回報卻是徹底的幻滅。他發現自己想象中純潔的孔雀之國女人不僅在性方面的胃口大過他，還會背信棄義。結果，他在由此產生的情感混亂中開始玷污自己的身體，還發展出對女性儀式般的虐待狂行為。

他講述這一切的時候頗為自然，一點歉意都沒有，似乎并不覺得自己在道德上有所妥協。事實上，他還會長篇大論甚至沉悶地發表道德觀點。

“你不應該有欲望，”他說，“你應該讓自己對生活給予你的東西感到喜悅。我每天都通過靜坐來控制自己的欲望。比如說，我可以抱怨自己在德里，并且希望能在別的地方，但那樣只會讓我不快樂。我厭惡在德里女性不受尊重的事實，但是你得安于自己的所在。人都充滿了欲望，尤其是女人。女人不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欲望。

“真正的快樂是和犧牲有關的。愛是犧牲。當你愛上某人，你只想為那個人犧牲，就像拉達（Radha）為克利希那（Krishna）、悉多（Sita）為羅摩（Rama）所做的那樣[[4]](#Zai_Yin_Du_Shi_Shi_Zhong__La_Da)。如果有人要你的命，就把命給他。如果要血，就給他血。就像圣雄甘地說的，如果有人打了你臉的一邊，那么把另一邊臉也給他。但現在的問題是，人們沒那些耐心。

“現在我在試著改善我的業力。我已經不再找妓女了，也放棄了吃肉。當你的業是善的，自然就會遇到對你有益的人。但如果業是惡的，就會遇見對你不利的人。所以我在做一個好人，盡我所能地幫助別人。比如說，我最喜歡的按摩師來家里，他想要襪子，我就把自己的襪子給他。他很窮，他每天都來為我做全身按摩。明天，如果他想要一件襯衫，我就會給他一件。盡力做你能做的一切。善是流轉的，就像錢一樣。世界上好事和壞事的數量一直是一樣的，不增不減，只是從一個人手里轉到另一個人手里，不會永遠屬于你——你只是保管人。如果你不用，其他人就會拿走。如果我做了什么好事，我就從你這里拿走了福報，你的部分就減少了，而我的部分增多了，就像雙倍積分，取決于你盡可能多地從別人那里拿走福報。因為這就像錢，在不同的人之間流轉，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從別人那里拿。我給按摩師襪子的時候，我就拿走了他的福報。”

現在還比較早，吧臺沒什么人，所以很難不注意到有個男人朝著對面角落里的一個人大喊，問他晚上去不去一個工業大亨的晚宴。他故意把晚宴主人的名字大聲說了兩次，于是一個年紀比較大的錫克教男人站起來抗議。

“安靜點！”他的語氣里帶著威嚴，“我們都被邀請去同一個晚宴，不需要從你這里聽說。如果你想來這里，就去學學應有的舉止！”

注釋

[[1]](#_1_7)kurta，印度無領長袖襯衫。——譯注

[[2]](#_2_7)例如克利希那·索布蒂（Krishna Sobti）1966年的小說《可惡！米洛》（Mitro Marjani，自印地語譯成的英譯本名為To Hell With You Mitro）。書中刻畫了一名頗有感官欲望的女性，其對于性的貪婪給丈夫家造成了許多破壞。正是她的婆婆站在了她的一邊，面對家中男性成員（包括她兒子）的攻擊，以女性的團結維護她。

[[3]](#_3_6)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alist Resolution of the Women’s Question’, in Kumkum Sangari and Sudesh Vaid (eds), Recasting Women: Essays in Indian Colonial Hist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37–9.

[[4]](#_4_4)在印度史詩中，拉達和克利希那（又稱“黑天”）是甜蜜的愛侶，拉達唯一的欲望就是滿足克利希那的愿望。悉多和羅摩則是史詩《羅摩衍那》的主角，悉多一路陪伴被流放的丈夫羅摩，被丈夫質疑時選擇走入火堆，以死證明自己的清白，被視為貞潔的象征。悉多和羅摩的故事可見本書第十章。

## 八　1857——消逝的沙賈漢納巴德

我心不住于這被毀壞之地，

誰能在一個不穩定的世界中歡愉？

……

告訴這些遺憾去安住他方，

這顆燒焦的心哪里還有空間？

——出自莫臥兒帝國末代皇帝巴哈杜爾沙·扎法爾[[1]](#Ba_Ha_Du_Er_Sha__Zha_Fa_Er__Baha)在最后一次流放中寫的一首詩[[2]](#Gan_Xie_A_Nan_De__Wei_Wei__Tan_H)

如果說德里特別恐懼價值觀的失落，那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所在地區的價值觀被摧毀了很多次。數世紀以來，來自北方和西方的侵略者一直被印度次大陸的富足所吸引，而德里正位于侵略者的必經之路上。這一事實使一切都變得脆弱，不管是有形還是無形的東西。至今，一些旁遮普家庭中還保留著一句諺語：“吃下去的才是你的，別的都是（阿富汗）侵略者艾哈邁德沙汗[[3]](#Zhi_A_Fu_Han_Du_Lan_Ni_Wang_Zhao)的。”這樣的想法來自最壞的打算，即更好地生存下來——財富總會被偷走的，所以要用盡手上的東西，至少保證這部分不會失掉。對很多人來說，甚至對那些從中獲利的人來說，全球資本主義是另一種外國侵略。盡管它讓人們瘋狂消費，卻平息不了對于失去的焦慮。

通常，人們把德里視作一個古老的城市，認為最開始它的前身是《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中描寫的印德拉普拉沙（Indraprastha），但是嚴格來說德里并不是印德拉普拉沙。很多被認為是德里前身的城市在物理空間上并沒有連續性，沒有一個城市有機地并入下一個。這些城市被入侵者洗劫一空，無法居住，然后被遺棄。或者有的城市建設一完成，就因為缺水而不得不被廢棄，然后這些居住點的石頭就被運走用來建造下一個城市。每當一個新的政權來到這里，就換一個地方從頭再造一座新城，把之前的所有消耗殆盡，任其潰朽。這種對現有存在的不滿并沒有終結于現代——英國人在一片荒野中建造了“新德里”，而全球資本從無到有建成了古爾岡。這個地方的精神一直是不連貫的，充滿了斷裂。

莫臥兒王朝統治時期是這里最穩定的時期。這個王朝源于中亞，傳奇的財富和輝煌在17世紀到達巔峰，也是在這個時期，皇帝沙賈汗（Shah Jahan）[[4]](#Sha_Jia_Han__1592__1666_Wei_Mo_W)把首都從阿格拉（Agra）搬到了德里，在亞穆納河（Yamuna river）岸邊建起了一座新的都會。新城建立在一座14世紀被洗劫過的城市廢墟上，那是一個到處都是穹頂建筑和花園的燦爛天堂，并且令人驚訝地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迅速壯大。當時的城市叫作沙賈漢納巴德（Shahjahanabad）[[5]](#Yi_Zhi__Sha_Jia_Han_De_Ju_Suo)，現在稱為“舊德里”，這樣叫是為了區別于“新德里”，后者是英國人1911年遷都到這里之后建的。但是那些輝煌歲月里所建的帶露臺的涼亭、無節制的顯赫、令人難以置信的大道，還有大道旁散發著玫瑰香的噴泉、精品商鋪和皇家隊列，這一切似乎都是不朽的。

但是莫臥兒帝國衰亡了，衰落的速度和其崛起時一樣快。18世紀，帝國的皇權在宮廷暗斗、腐敗和軍力衰退中漸漸瓦解；帝國一些重要的部分，例如海得拉巴（Hyderabad）和孟加拉分裂并獨立了出去，其余的部分被新的次大陸帝國馬拉地（Maratha）的國王們匆匆吞并。德里不斷遭受襲擊，最具破壞性的一次是1739年，波斯帝國的軍隊在納迪爾沙汗（Nadir Shah）的帶領下，洗劫了整座城市，屠殺了兩萬居民。這場潰敗證明了莫臥兒帝國勢力的終結——納迪爾沙汗帶著孔雀王座回到了波斯，這個王座是為沙賈汗打造的，用了超過一噸的純金，上面鑲嵌了230公斤重的珠寶，其中包括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光之山鉆石。

距那次襲擊一個世紀后，一個名叫艾瑪·羅伯茨（Emma Roberts）的英國旅行者站在顧特卜塔的塔頂，眺望遠處沙賈漢納巴德晦暗的光輝。她書中的“舊德里”是那些中世紀王朝（被她統稱為帕坦人［Pathans］的王朝）和前莫臥兒帝國崩塌了的城市，即使與舊德里曾經的恢宏相比，她眼前的景象仍然讓人敬畏：

莫臥兒帝國的首都……現代城市，或者按照當地人的叫法，叫沙賈漢納巴德。這些人還沒有習慣和歐洲人一樣叫它新德里……佇立在一片沙土平原中心，四周被舊德里的廢墟圍繞，和它形成奇異對比的是一個新的郊區、居民區里歐洲人的別墅和新近為三個兵團的印度兵建起的兵營……在（顧特卜塔的）頂上，眼前是最讓人敬畏的景象。一片沙漠，上面到處是美麗異常的廢墟，包圍著這座城的每一面。這里由蛇形的亞穆納河哺育，它銀色的寬闊水面蜿蜒著，流經宮殿和陵墓的殘碎遺跡。背景里是一座古堡高高聳起的暗色圍墻和層層疊疊的塔，這座古堡是帕坦首領們的要塞。這些曾經宏偉的建筑體量巨大且依然美麗，視線在其中游走，最后落在現代城市里熠熠發光的白色清真寺和尖塔上，其郁郁蔥蔥的樹林和繁花似錦的花園與視線下方的孤單和荒蕪形成了精致的對比。

在穆斯林入侵前，（這塌陷了的城市）已經是非常著名的地方，許多殘存的印度教建筑與穆斯林征服者的建筑瓜分著這座城市——據說，在所有的寺廟和宮殿塌成無法辨認的荒地之前，人們還能在殘垣斷壁中找到屬于忠誠的十八萬名圣人和殉道者的墳墓，但現在這片荒野只顯得整個景象更為荒蕪……

從外面看（沙賈漢納巴德的）景色非常壯麗。穹頂和清真寺，塔樓和尖塔，伴隨著層層疊疊的帝國宮殿，如一座紅色花崗巖的山在樹林中若隱若現。樹林非常茂密，以至這些建筑在東方意象中被比作從翡翠海洋中升起的珍珠和紅寶石。從亞穆納河東岸往這座城市靠近，所有關于東方的壯麗想象都在此成真——清真寺和尖塔在陽光里閃耀，有些被野生藤蔓纏繞，有些裝飾著華麗的金飾，塔樓的外墻覆蓋著閃亮的金屬；從麥侖山（Mount Mejnoon）上看去（山上現在通了一條很好的路），亞穆納河的河水在遠處閃閃發光，隔開了薩林加爾（Salimgarh）古堡，然后在放著孔雀王座的廳堂和帝王們的宮殿背后消失，為整個場面增添了另一道美麗的風景……（然而）莫臥兒帝國的榮光已逐漸暗淡，他們的偉大也消逝了……夏利馬爾（Shalimar）最負盛名的花園，連同那栽著柏樹的大道、絢爛的噴泉、玫瑰色的涼亭，還有雪松的黝黑而宜人的樹蔭（據說全世界最有品位的君主沙賈汗為這些雪松豪擲了1000萬盧比［100萬英鎊］）——所有這些幾乎完全坍圮，成為一片荒蕪的廢墟。[[6]](#Die_Ji_Zi_Ai_Ma__Luo_Bo_Ci_Liang)

和周期性發作的、籠罩著整個城市的鄉愁相比，這種觸動外來者的傷感根本不算什么。艾瑪·羅伯茨到來的數年前的秋天，沙賈漢納巴德的貴族們在寫作和欣賞某首詩歌時找到了鄉愁的殘余功用：這首詩歌以比其他詩歌更夸張的方式，表達出他們對于逝去的甜蜜痛楚。詩歌由兩種語言寫成，一種是莫臥兒的宮廷語言波斯語，還有一種是烏爾都語（Urdu），后者是印度的一種土著語言，在過去的近千年間興起，是梵語中德里方言與波斯語、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這些來自西方侵略者的語言雜糅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首詩與來自侵略者土地的詩歌一脈相承，在那些詩歌里，俗世轉瞬即逝的本性（關于愛、美和歡愉）是數個世紀以來不變的主題。歸根結底，這個主題訴說的是一種全情投入的痛苦——因為虔誠的詩人必定生活在凡塵世界暫時的奇跡中，每時每刻都知道自己最終是要離開這些奇跡退入不朽的。不過，18世紀印度的艱辛生活為這種哲學氣質增添了一種特別的經驗性的東西。在這首米爾·塔基·米爾（Mir Taqi Mir）所寫的詩中，“荒涼”完全不是隱喻。1756年，波斯人又一次襲擊了這座城市，米爾被迫逃離，來到了輝煌的勒克瑙（Lucknow），在那里迎接他的是穿著長袍的詩人，后者鄙夷地看著他的破衣爛衫：

何處是我之所屬？你，東方之人，問道，

還嘲弄取笑一個可憐人。

德里，曾為這世上獨一無二之城：

神的選民和天才能人之家，

現在已被命運之錘夷為平地，淪為廢墟。

我便來自那片荒蕪。[[7]](#Gan_Xie_Ba_Sha_La_Te__Pi_Er__Bas)

這首詩很能說明德里的精神——直到現在，這種心情、這種生活在創傷中的感覺仍舊主導著這座城市的文學作品。這座城市或許是一個高速發展、人口密集到令人眩暈的國家的首都，但德里的作家始終將其視為一座廢墟之城。他們用自己的創造力來表達那種精神上的憔悴，這種憔悴來自與自己過往的隔絕。這既是德里的現實，也是德里的幻夢——這座城市總是處于一種已經被毀的狀態。大多數遠道而來的人似乎體會到一種奇怪的絕望感，而這種感覺正源于此——似乎每個人都由于在德里而變成了一個幸存者，一個失去了所有珍愛之物后仍活下來的人。盡管這本書明顯寫的是當代的內容，但或許只不過是重復這古代文學中的心緒，因為在這座沒有任何東西能長久的城市，我最根本的經歷也是恍然若失。也許，我父親也會說同樣的話。

在艾瑪·羅伯茨造訪德里約二十年后，對18世紀夸張的遺憾被強化成了世界末日，羅伯茨曾經熱切描寫的城市嚴重衰敗，而且正是被她的同胞所搗毀的。

到那時，在這片次大陸上的主要力量是英屬東印度公司，那是一家規模龐大的壟斷企業，業務涉及絲綢、棉花、靛藍燃料、硝石和鴉片等商品的生產和貿易。這樣一家企業需要大范圍地控制印度的土地、勞動力和法律。整個18世紀，這家公司以野心勃勃的軍事行動達成此目的，征服這片次大陸的許多地方，并且鎮壓了馬拉地人。莫臥兒的皇帝成了空架子，他的軍隊被解散，自己則住在紅堡（Red Fort）里，由東印度公司保護。

1857年，德里的“西帕依”（sepoys），也就是為東印度公司效力的印度士兵（羅伯茨曾從顧特卜塔看見他們的軍營），參加了一場突如其來的反對公司的暴動。德里的西帕依殺死了英國士兵，隨后官方接管了這座由城墻圍起來的城市。英國人在震驚和恐懼之下重整軍隊，用炸藥開道入城，在一場毀滅性的戰役后，叛軍被鎮壓了。隨之而來的是一場洗劫和報復，其失控程度讓肇事者自己都覺得恐怖。城里數以萬計的居民被吊死或開槍打死，更多人逃走了。盡管之前參與暴動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比例相當，英國人的嚴苛報復卻大多針對后者，因為他們控制著政治機構，也因為英國人害怕他們會以穆斯林君主的名義發動圣戰。那位君主被審判后流放到仰光（Rangoon），好幾個家族成員遭處決。大多數穆斯林難民被永遠禁止回到德里；多年后，他們仍然偷偷住在南邊莫臥兒陵墓的廢墟里，財產被剝奪，受著風吹日曬。他們中有些是最有修養的人，還有一些直到最近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沙賈漢納巴德的莫臥兒文化——花園、后宮、商人和詩歌，終結于一夜之間。

米爾扎·迦利布（Mirza Ghalib），一位穆斯林貴族，也是沙賈漢納巴德的許多烏爾都和波斯詩人中最偉大的一位，在信中描寫了1857年的慘景。由于他和英國人的關系很好，所以被允許留在城里，但他大部分朋友都逃走了：

……身后留下的是滿是家具和無價之寶的房子。這些……血統高貴的人擁有好多棟房子、禮堂還有宮殿，全都毗鄰彼此。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有人丈量他們所占的土地，即使沒有一個鎮那么大，也有一個村那么大。這些偉大的宮殿被拋在身后，無人照看，被徹底洗劫一空，棄為荒蕪，盡管有些價值較低、更重一點的東西，比如說大廳的窗簾、亭子、天棚以及……地毯，被留在那兒沒有動。突然有一天晚上……這些東西著火了。火焰躥得很高，石頭、木材、門和墻全都被火焰吞噬。這些建筑就在我家的西邊，離我家非常近，半夜我能從屋頂看見跳躍火光里的一切，我的臉能感受火的熱度，眼睛能感到濃煙，還有灰飄到我身上，因為那個時候吹的是西風。鄰居家的歌聲如昔日所說，是一件禮物；那么為什么鄰居家的火不能送來灰燼作禮物？

關于王子們，能說的就是有些成了來復槍子彈的受害者，被送進死亡之龍的嘴里，有些人的魂魄則凍在絞刑吏的繩子套索里，有些人在監獄里，還有一些流浪在這地球上。[[8]](#1857Nian_De_Xin_Jian_Yin_Zi__Ral)

對迦利布來說，這座城死了，陪葬的是它的文化和語言。英國人為了給自己的林蔭大道、兵營和軍事訓練場騰出空地，不僅摧毀了房屋和清真寺，還摧毀了無價的圖書館。因此，很多烏爾都文學的實體記錄都不復存在。很多踐行和保護烏爾都語文化的穆斯林貴族也消失了，而那些取代他們的人，在迦利布看來，是一伙粗野的烏合之眾。他引用一個朋友來信中贊美烏爾都語的句子——“我的朋友，這是德里人民說的語言”，最后這樣寫道：

朋友，“德里人”現在指的是或是印度教徒，或是工匠，或是士兵、旁遮普人、英國人。他們誰說的語言是你贊美的語言？……這個城市已經變成了一片沙漠。既然井都沒了，水也成了稀有而珍貴的東西，那么這里將會變成一片像卡爾巴拉一樣的沙漠。我的神！德里人還在因為德里的語言而為自己驕傲！多可悲的信仰！我的朋友，烏爾都市場都沒了，哪兒來的烏爾都語？感謝老天，德里不再是一個城市，而是一個兵營。沒有城堡，沒有城市，沒有集市，沒有河道。[[9]](#1861Nian_De_Xin_Jian_Yin_Zi__Rus)

“很難再理解德里這座城市，”薩迪亞·德維（Sadia Dehlvi）[[10]](#Ci_Wei_Zhen_Shi_Xing_Ming)說，“尤其是很難再理解德里的人。”

作為德里最古老顯赫的穆斯林家族之一的成員，薩迪亞仍然會回顧迦利布在1857年后的日子里所悼念的文化，并把這種文化視為自己的文化。

她已經寫了好幾本有關蘇菲派（Sufism）的書，這是伊斯蘭神秘主義的一個分支，在1200年左右從波斯傳入印度次大陸，并且在印度北部創造出一種特別有生機的知識、精神和美學文化。它吸收了印度教、錫克教和伊斯蘭教的傳統，反過來也影響了它們。蘇菲派的泛神論傾向推動了這種融合，認為區別和差異的表象是錯誤的，并宣稱至善是唯一的，沒有標簽或者偏好。蘇菲神秘主義者還喜歡避開教士的權威，發展出一種拒絕外部法則和準則的道德語言，主張正確的行為來源于內在的智慧和良知。自由主義者，尤其是年紀較大的精英們懷念蘇菲派，將它作為北印度不復存在的催情劑而銘記在心，它曾經使不相干的團體聚在一起，并從中孵化出一種擁有豐富音樂、哲學和寓言的共有文明。

“唯一一個我真正理解的地方，以及我從心底里愛的地方，是尼札姆丁·歐里亞（Nizamuddin Auliya）的神像。它代表了這座城市的連續性，至少是過去七百年的連續性，包括它的文化、靈魂、語言和詩歌。現在，如果你去那里，你會看到富人和窮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印度人和外國人——因為哈茲拉特·尼札姆丁（Hazrat Nizamuddin）[[11]](#Ni_Zha_Mu_Ding__Ou_Li_Ya_De_Quan)繼續鼓勵一種平等的文化，正如他在世時所做的那樣。”

14世紀的圣人尼札姆丁·歐里亞是德里歷史上一位形象崇高的人物，也是少數幾個能為德里散亂零落的歷史提供真正一致性的人物之一。每年尼札姆丁逝世的紀念日，仍舊會有朝拜的信徒從北印度四處趕來，在附近的街上睡一個禮拜。他們在人行道上煮飯，并為了安全，睡在載他們前來的近百輛公共汽車下方。

尼札姆丁布道克己，滿懷愛意，宣揚一切形式的精神生活的統一，他避開那些當權者，并建議他的追隨者也這么做。但他是一名直率的政治評論者，不只斥責政府的不公，也會表揚他們的明智。比如，他說蘇丹伊勒杜密什，“是因為他為德里人民建造的供水設施，而不是他的戰爭或者他的勝利為他在天堂里贏得了自己的位置。”

尼札姆丁·歐里亞最顯著的成就是通過他的弟子阿米爾·胡斯勞（Amir Khusrau）的幫助，扶植了一種被稱為“卡瓦里”（qawwali）的狂喜音樂形式，這種音樂將印度、阿拉伯和波斯的音樂風格融合在一起，為尼札姆丁在其收容所舉辦的音樂集會帶來了新意。卡瓦里成為蘇菲派表達虔誠的特色形式，這讓正統的穆斯林驚慌，因為蘇菲派是自覺的多元論，吸收了更加古老的印度教風格音樂和詩歌，因此建立起一個跨越宗教分歧的靈修社群。到今天，人們仍舊每周四晚上在尼札姆丁神像前唱卡瓦里，唱歌的是不變的幾個家庭，他們的祖先七百年前從阿米爾·胡斯勞那里學習了這門藝術。

薩迪亞的家在尼札姆丁東部附近，是以這個圣人命名的居民區的一部分。這一區有很多公園和鮮花，還有莫臥兒陵墓夢幻般的景色和散發著貴族氣質的低調店鋪，這些都讓它受到外國新聞記者的喜愛。

“我的家族自沙賈汗皇帝時代起就生活在德里。我們是成功的商人，幾乎擁有整個薩達爾集市（Sadar Bazaar），控制著大量批發交易。我們有自己的法庭，不去英國人的法庭。即使到現在，我的家族仍然會避免在官方的法律系統打官司。”

薩迪亞對于法律程序的評論很能說明她所承襲的流派。英國法律被引進后，就被莫臥兒政權視作一種來自外國的、不敬神且不合法的強加，所以蘇菲神秘主義者教導他們的信眾，說他們并沒有向英國法律陳述事實的道德責任。薩迪亞的家族似乎從那時起，就一直沿襲著這種歷史上的反叛。

英國法律體系被強烈地反對，以及這個體系從未在北印度獲得廣泛認可的事實，其實和它未能承認諸如蘇菲派這樣的當地道德權威有關。蘇菲派在莫臥兒時期的部分社會力量源于其充當了一種平民的政治力量：蘇菲派圣賢的威望之高，使其能夠對莫臥兒王權不受約束的權力進行約束。皇帝會就倫理和政治事務征詢他們的意見，并且不愿違背他們的話語，因為這些話語承載著宇宙的力量，這樣就在王權中為公正規則建立了一種雙方達成一致的公認機制，否則王權就是獨裁。

但自英國法律體系以降，近代的法制系統給這樣的中間人提供的空間更少。而如今，當政治和法律機構常常被視作腐敗、謀私并遠離普通人的需要時，仍舊有一種普遍的渴望，渴望有無所畏懼的圣人或許能帶著宇宙性的權威和統治者對話，并且只用一句話就將一切改變。

“我成長的過程中，家里總是充滿了音樂和詩歌。我們家族有個出版社，出版很多烏爾都語和印地語的雜志，包括著名的叫Shama的烏爾都語文化雜志；它的發行量非常大，所以我們很有名。我們還有一棟很美的小木屋，從前所有的詩人和電影明星經常造訪。任何稍微有點重要的文化人物都來過我們家，包括作家和藝術家，比如伊斯馬特·秋泰（Ismat Chughtai）、柯萊特林·海德爾（Qurratulain Haider）、 艾力達·普利特姆（Amrita Pritam）、 費茲·艾哈邁德·費茲（Faiz Ahmed Faiz）、古澤爾（Gulzar）、M. F.侯賽因（M. F. Hussain）、 薩迪什·古宙（Satish Gujral），等等；電影明星中的納爾吉絲·達特（Nargis Dutt）、拉杰·卡普爾（Raj Kapoor）、 米娜·庫瑪里（Meena Kumari）、狄力普·庫瑪（Dilip Kumar）、達爾門德拉（Dharmendra）……

“隨著烏爾都語的衰落，我們的雜志也一本接一本停刊。幾年前，我們賣掉了祖傳的房子，那棟房子是我的家族從老城搬來時住的地方，也是我出生的地方。房子的買主是瑪雅瓦蒂（Mayawati），北方邦的邦長。

“我對復興家族生意不感興趣。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對自己的時代很滿意。我很高興專注于自己內心的東西，并以靈性為主題來寫作。我們的城市精彩、現代。我不想消極，但我們的靈魂受到了影響。某些東西斷裂了。我說不出是什么。”

確實，也許這個已經斷裂的東西難以辨認。也許它不是源于一個事件，而是源于這座城市的某些狀態，這種每一件有意義的東西都已經被摧毀的感覺——薩迪亞悲嘆的內容幾乎與一個半世紀前迦利布的悲嘆滑稽地相似。

“如果沒人能讀懂記載歷史的語言，你怎么能期望德里在乎自己的歷史？這座城市的整個歷史都是用烏爾都語和波斯語寫的。政府在1947年以后刻意消滅了烏爾都語，因為它被當作一種穆斯林語言。但是烏爾都語和宗教一點關系也沒有——它是德里的語言，是德里每個人的語言。巴基斯坦把烏爾都語作為其官方語言，但烏爾都語并非起源于巴基斯坦的任何地區。失去這種語言，我比任何人都更哀傷。當你想要毀掉一個民族，你只需奪走他們的語言。

“德里人過去很講究語言的優美。他們熱愛詩歌，擁有真正的詩人。以前，說起德里，想到的是美味佳肴、溫柔和優美的生活。下雨的時候，店主會關了店，到梅勞里（Mehrauli）的空地上去享受這樣的天氣。他們花時間準備精美的食物，熱愛賽鴿子，也愛在賈瑪清真寺（Jama Masjid）的臺階上聽說書人講故事。他們沒什么營銷技能，所以被淘汰了。他們信仰精致，他們制造毯子和家具，裝訂書籍。在烏爾都語里，我們把這叫作‘saleeqa’，一種高雅的敏感。”

和迦利布一樣，薩迪亞非常糾結于未開化的外來者——那些對這樣的敏感毫不關心的人。

“對德里文化的第一個打擊來自英國人，然后是分治后涌進來的旁遮普人。德里的原住民不知道1947年以后重創他們的是什么，他們完全被旁遮普移民的吵鬧、好斗和企業家精神弄得驚慌失措。我父母那時候很震驚：‘他們是從哪里來的，這些人？為什么他們這么吵？他們都吃什么東西？’他們試圖保留1947年之前的文化。他們不斷地糾正我們說話的語言。‘我們有一門語言，’他們常這么說，‘我們擁有一門優雅的語言。我們要用它。’旁遮普人奪走了這座城市所有的土地，他們消滅了它的語言和禮儀。他們吃烤雞和黃油雞。黃油雞！這些東西我只在外面看到過，從不會出現在家里。

“當然，后來我變得更愿意接受其他文化。但是我很高興自己是在舊德里的文化里長大，因為這是一個很美好的文化，一個熱情友好的文化。任何人到你家門口，你都會給他水；家里來了客人，你會把自己的房間讓給他們住，讓他們吃好，給他們披肩。

“分治徹底摧毀了這座城市，永遠地破壞了它的氣質。看看我們那些雄偉的紀念碑，除了五六個被當作旅游景點，剩下的都逐漸倒塌傾頹。它們現在是垃圾場。自分治以來，幾乎沒有創造過什么美的東西。看看這些五星級酒店。要創造美，你自己必須是美的，我不認為現在的人還擁有那種內在美。現在和我們的城市聯系在一起的，是侵略性、憤怒、不平等、腐敗和個人利益，當然還有消費主義和商場。幾乎沒有空間讓人反思和雕琢心靈。我們沒有美能留給我們的孩子。”

這間房間的墻上掛滿了烏爾都語書法作品。薩迪亞十幾歲的兒子在另一個房間練習演奏音樂——他在用吉他彈奏中世紀的蘇菲派音樂。薩迪亞說話很快，在烏爾都語和英語之間轉換，她的句子一個緊接一個，因為她已經在頭腦里把這些話預演了很多遍。

“我以前很喜歡去派對，因為以前的人待人更誠懇。現在，你遇到的人一邊和你講話，一邊東張西望，心里則盤算著要給誰遞名片。我和社交文化沒有關連。“9·11”事件以后，真正的歧視開始出現。一開始我以為是自己太敏感了，但其實不是。我看到自己的朋友圈內有一部分人流露出歧視。現在我很難再和他們碰面打交道，因為他們內心有對穆斯林深刻的偏見。這些日子里，他們會說出真的很異想天開的話。他們想知道為什么我們不能不做那么穆斯林的事。”

和我們在一起的有薩迪亞的兩個朋友，一對巴基斯坦夫婦。男的開了一家公司，制作莫臥兒珠寶的仿制品，在巴基斯坦很受歡迎。但現在還有手藝能制作這些珠寶的工匠不在巴基斯坦而在印度，所以他經常過來和他們一起工作。

“我朋友昨晚去了一個派對，”薩迪亞說，“遇到個旁遮普女人——她是旁遮普人對不對？——嗯，然后她說她害怕巴基斯坦人。他們就對她說，‘你為什么不去巴基斯坦看看？’她說，‘不不，我們太害怕了。那里的人可能會在你房子里放炸彈。’然后她大笑起來。‘而且我們的丈夫永遠不會讓我們和巴基斯坦男人待在一起！’我說怎么會有人允許別人這樣和客人說話？我是說，這樣太粗魯了！如果有人在我家這么說話，我肯定會說，‘對不起，但是你不能和我的客人這樣講話！’”

她的朋友補充說：“她丈夫還去過巴基斯坦！而且回來以后還說了好多你能在巴基斯坦體會到的美好事情！”

“任何從巴基斯坦來這兒的人都得聽這些話，”薩迪亞說，“以前，那些人至少還把這些想法放在心里，但是現在他們會公開這么說了。這就是為什么我不再出去了。我沒辦法聽那些人那樣講話。

“看看穆斯林怎樣在這座城市生活。看看那些年輕的穆斯林，無論什么時候想要去租房子，都會被拒絕。你知道披薩外送不送穆斯林區域嗎？那天，我在一個朋友家，打電話叫披薩。對方說，‘女士，我們不送那幾區。’‘那幾區是什么意思？’我在電話里朝他大喊。”

她轉向那位來自拉合爾的朋友。

“昨晚派對上那個女的對你說什么來著？她問要不要送你回家，然后你告訴她你住在尼拉穆丁。然后這個女的——她還是他們的朋友！——這個女的說，‘你瘋了嗎？我不能晚上11點到一個穆斯林區去！’你能相信嗎？這些人都在最好的地方上過學。他們覺得去尼拉穆丁不安全。這些人都住在喬巴格（Jor Bagh），穿著高級時裝、喝紅酒，還送孩子去美國讀大學。他們想要相信自己是非宗教的、世俗的，但他們不是。他們不停地這么說，因為這是他們對自己的幻想。”

薩迪亞對她的巴基斯坦朋友體貼關懷備至，向他們展示至少在她家里古老的文化依然存在。他們也談起以前一起吃過的盛宴。過幾天，她要在家里辦一個蘇菲音樂之夜。她邀請我也來參加。她兒子會演奏，還會有一個她支持的年輕卡瓦里歌手以及伊朗來的音樂家。

“我最近很累，”她說，“我想要一個夜晚來充盈我的靈魂，和我愛的人在一起，有詩和音樂。”

注釋

[[1]](#_1_8)巴哈杜爾沙·扎法爾（Bahadur Shah Zafar，1775—1862）于1858年被英國殖民政府流放至緬甸。

[[2]](#_2_8)感謝阿南德·維韋·坦哈（Anand Vivek Taneja）翻譯此段。

[[3]](#_3_7)指阿富汗杜蘭尼王朝的創建者艾哈邁德沙·杜蘭尼（Ahmad Shah Durrani，1722—1772）。他曾攻打波斯、印度，征服旁遮普，洗劫德里、馬什哈德等城。民間流傳除了已被旁遮普人民放入嘴里的食物，艾哈邁德沙吞下剩下的所有食物，絲毫不留給當地人。

[[4]](#_4_5)沙賈汗（1592—1666）為莫臥兒帝國第五任皇帝（在位：1628—1658），他為第二任妻子慕塔芝·瑪哈（Mumtaz Mahal）修建了泰姬陵（Taj Mahal）。

[[5]](#_5_2)意指“沙賈汗的居所”。

[[6]](#_6_2)迭輯自艾瑪·羅伯茨兩本書中對德里的描寫，見 Scen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ndostan with Sketches of Anglo-Indian Society (1835) 和 Views in India, China and on the Shores of the Red Sea (1835); 拼寫已改為現代英語。

[[7]](#_7_2)感謝巴沙拉特·皮爾（Basharat Peer）推薦并翻譯這首詩。

[[8]](#_8_2)1857年的信件引自 Ralph Russell and Khurshidul Islam (eds), Ghalib 1797–1869: Life and Let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dia, 1997), p. 148.

[[9]](#_9)1861年的信件引自 Russell ＆ Islam, Ghalib, p. 252.

[[10]](#_10)此為真實姓名。——原注

[[11]](#_11)尼札姆丁·歐里亞的全名是Hazrat Shaikh Khwaja Syed Muhammad Nizamuddin Auliya，因此兩種叫法皆可。

## 九　1911——英國人的新德里

我不否認德里這個名字的魔力，也不否認那些附著在它身上、已經死亡且被遺忘的城市有著引人入勝的故事。但我冒險說一句，如果我們希望為將來畫下幸福的預兆，那么越少談德里的歷史越好。現代德里只有兩百五十年的歷史。它只是莫臥兒統治茍延殘喘時期的首都，它作為他們集體統治的首都只有一百多年。當然，在德里之前，那個地方也是首都，但一切都已經一一逝去了。我們知道德里的整體環境是一個巨大的荒地，滿是被遺棄的廢墟和墳墓。我認為，這些呈現給來訪者的，是你所能設想到的關于人類偉大無常的最莊嚴的場景……如果試著去創造一個生氣勃勃的未來首都，而不是談論這些已經死去的首都之過往，那么國王陛下的政府統治將更有保障。

——柯曾（Curzon）爵士，印度前總督，1912年2月

在英國上議院發言，反對英國政府當時要把印度

首都從加爾各答遷往德里的決定。[[1]](#Yin_Zi_Malvika_Singh_and_Rudrang)

隨著1857年的騷亂，似乎又一座大都市加入了德里土地上城市相似而反復的命運。在之后的歲月里，德里對于歐洲旅行者來說變成了一幅描繪關于無常和人類野心的愚蠢的肖像。1912年，一位意大利詩人來到那兒，希望通過炎熱來減輕他的肺結核。他從沙賈漢納巴德往南，穿過通往顧特卜塔的平原，展現在他眼前的是這樣一幅景象：

……從生機勃勃的城市轉換到這座死城。最終，房子里不再有人類居住，而逐漸被猴子占領……廢墟無窮無盡地延伸；整個大草原，舉目所及和所不及之處，都是一座巨大的墓場，在它之上，四千年間，一座城市被摧毀和重建了十次以上……在這里，在這垃圾的荒漠中，橫行著一種忽視和遺忘的混亂，使得研究者必定一陣頭暈，因為他們被拋回了五百年、一千年甚至三萬年的時間深淵——從偉大莫臥兒帝國最后的伊斯蘭輝煌，到令人印象深刻的早期耆那和巴利結構中黑暗的婆羅門，再到已經黯淡的吠陀原型。

我發現本地和歐洲的學者在這里工作：考古學家、專家、建筑師在制作模型，測量尺寸。英格蘭已經準備好要大干一番：進入埋藏著這些死城的藏骨洞穴，修復遺跡，然后在白天的日光下恭敬地把它們重新排序。這是一項值得做的事業，盡管我懷疑這么做是否有利于書寫承載這些記憶的詩歌。我真心感謝上天讓我能夠在今日造訪，在其還是荒涼和被忽略的時候。[[2]](#Guido_Gozzano)

但是這位詩人是透過肺結核的陰霾觀看這一切的[[3]](#Shi_Ren_Gui_Duo__Ge_Zha_Nuo__Gui)。英國人準備好的“大干一番”不是要整修。他們的項目，就像他們之前許多德里的統治者一樣，是要平整好土地再建一座新城。從那年起，這些“無盡廢墟”中的大部分被夷為平地，而下一個“新德里”展開了，就像在昨天的隔夜飯上鋪了一塊嶄新的桌布。

1911年，英國國王喬治五世宣布英屬印度的首都將從加爾各答搬往德里。加爾各答對英國人來說已經變成了一個問題中心。受過教育的孟加拉人越來越因為自己被剝奪的政治權利而灰心喪氣，他們已經把這個英屬領地的首都變成了反帝國思想的主實驗室。通過“分治”這樣的政策笨拙地嘗試控制孟加拉人的騷亂效果適得其反。英國人決定逃往別處，而德里是個明顯的選擇。總督哈丁（Hardinge）爵士在1911年的一封信中寫道：

德里仍然是一個重要且有巨大影響力的城市。它在印度教徒的心里和神圣的傳說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些傳說甚至可以追溯到有歷史記載以前……舊堡（Purana Kila）仍然是他們曾經創立的城市印德拉普拉沙所在之地的標記，距離現代德里的南城門僅僅三英里。對于穆斯林來說，看見莫臥兒的古都在其驕傲的位置被修繕并作為大英帝國的王座，將是無窮滿足感的來源。印度全境，往南一直到被穆斯林征服的地方，每一座有城墻的鎮都有自己的“德里門”……這種改變將前所未有地沖擊印度人民的想象力，并向整個國家送出一波熱忱，使英國在印度維持統治的堅定主張被所有人接受。它將受到印度北部統治長官和各個種族滿懷喜悅的贊頌，而且將受到大多數印度人民的熱烈歡迎。[[4]](#Yin_Zi_Singh___Mukherjee)

但英國人不顧這些來自德里過去榮光的吸引力，決意在那里建一座將否定它自身所有過往的城市。帝國主義者將設計一座在幾何學上非常歐洲的城市，這座城將用自己的規劃布局擊敗所有過往歲月中落后的東方主義，并為一個啟蒙的新未來搭起舞臺。

在這座英國人的城市，不會有那些狹窄的街道，沙賈漢納巴德和無數其他氣候相似的地方（從托萊多到威尼斯到巴格達）用這種狹窄的街道來使行人免受太陽的直射。這些小巷，兜兜轉轉讓人猜不透方向，兩邊的圍墻也沒有窗戶，這些都讓英國人不舒服。英國的城市理論依舊由19世紀的“毒氣”病理學神話所控制，認為疾病來源于有害或者不新鮮的空氣，而且在英國人看來，沙賈漢納巴德是一片溫床，不僅潛伏著咒語和東方共謀者——這些共謀者是白人在如此蜿蜒曲折的巷子里永遠追不上的；這里還滋生著骯臟的蒸汽、瘋癲和疾病。而英國人的城市構想是引入光線和空氣來驅散污濁難聞的空氣：建筑師埃德溫·勒琴斯（Edwin Lutyens）鐘情于英國的鄉村風格，并且受到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的理論啟發。那時，霍華德在他的書中提出了花園城市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優勢，并在大西洋兩岸都引起了一場思想運動。路特恩斯決定將德里建設成城市和鄉村的結合體，就像霍華德的烏托邦那樣：低層建筑物間隔疏松，之間有廣闊的花園；寬闊的道路和公園會令城市保持新鮮和通風；通過在亞穆納河上建起大壩來形成一個巨大的湖泊，而這個湖能為城市居住者提供水源和開闊的天空（盡管計劃的這部分從來沒實現過）。總而言之，這就是一個逆轉：沙賈漢納巴德的街道狹窄，如迷宮一般，而新德里會有寬闊的幾何形大道；老城的商業在眾多熙熙攘攘的市場，而在新城，商業會被限制在一個有立柱的圓形區域，最終被叫作康諾特廣場。沙賈漢納巴德是一座城市，新德里則可以說是一座官僚的村莊——因為盡管它有著極其宏偉壯麗的行政大樓，但是分散的田園式規劃和宏大而空曠的開放空間，幾乎沒有給城市留下任何喧囂吵鬧的空間。規劃里幾乎沒有為娛樂活動或宗教集會提供空間，也沒給商人和他們的交易提供空間，當然更沒給窮人的住宅提供空間——所有這一切都曾經是舊城顯而易見的特色。

就像之前在這亞穆納河左岸的建筑項目，新德里是一個項目，一個史詩般的事業。三萬勞工用鎬和炸藥平整土地，同時火車沿著專門鋪設的鐵路源源不斷地運來一車又一車石頭和鋼材。令人窒息的灰塵云團籠罩著約90平方米大的工地，伴隨著巨大的噪音，在那兒石頭被切割鑿磨成形，同時還有幾十個燒磚的磚窯冒著滾滾濃煙。從那位意大利詩人所謂的“巨大公墓”中浮現出了一座城市的輪廓，一座大得不可思議的六邊形廣場在其中心攤開，向外朝著德里的古城輻射出六條大道，寬得驚人。觀察者們一定會覺得這樣很傻，因為盡管這些建筑第一層的體量大得讓人神魂顛倒，風格讓人眼花繚亂，但是這座城市本身仍然是極度概念性的，沒有居民，也沒有文化。它正如所有新的開始一樣激進——它根本不管要怎樣運作起來，或者能不能運作起來。實際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耗盡了建造者的金錢和精力，因此有很多聲音要求放棄；但是建造工作仍然堅持推進——這座英屬印度的新首都在二十年內建成了。

這是一座充滿驚艷建筑的城市——這樣的建筑比同期在倫敦建成的還要多——這座城市有意識地讓人想起雅典和華盛頓的超凡壯麗。當這座外國的城市從草圖變為現實，兩邊種著樹的大道最終消失在塵土繚繞的樹林中，這座城市也為這里帶來了全然不同的氛圍。

為了把這座巨大的空城變為一座真正的城市，英國人需要人們住進來，但幾乎沒有人愿意。大部分管理建筑項目的人，無論英國人還是印度人都把家人安頓在老城，或是城墻外的公民路（Civil Lines），那里有商業、社會生活和娛樂活動。為了能讓這些人（他們提供勞力、石材、家居、酒精、食品等）搬到新城里，城市管理者以非常優惠的價格向他們提供大面積的土地。所以承包商來了，將市中心的土地一搶而空，紛紛建起自己的大廈，并囤積了大量城市土地作為投資。在建設德里的階段，這些承包商用公平或不公平手段賺來的錢已經使他們富有起來，而現在在這個將來的首都市中心擁有的房產，確保了其家庭在接下來一個世紀里的財富和聲望。這些承包商，實際上成了德里的新貴。

他們是和沙賈漢納巴德衰頹的貴族非常不同的一個群體，大多數是來自旁遮普的錫克教商人。在他們的世界中，賺錢的方式各種各樣，封建地主、貿易商、土匪，都可以。如果說他們完全成功地擠進了英國人的財庫，那是因為他們是拿下合同的大師，而且從那時起“拿下合同”就成了定義德里商業精英的標準。這些錫克教商人身材魁梧，給人印象很深，他們熱愛政治喧囂，當后代談起他們無畏的創業精神時仍然帶著敬畏。而正是通過這種創業精神，他們建立起了自己的王朝。蘭吉特·辛格（Ranjit Singh）是市政廳（現在叫作國會大廈）的建造者，還是德里豪華酒店——帝國酒店（Imperial Hotel）的擁有人，在他孫子的回憶里，他的創業精神就和英國人完全一樣。

“我祖父在柯曾路（Curzon Road）的隔壁鄰居是拉拉·史瑞·熱姆（Lala Shri Ram）爵士，德里紡織公司（Delhi Cloth ＆ General Mills）的所有者。他們兩人都習慣早上6點半在自家的草坪上喝茶。1932年的一天早晨，拉拉爵士在早茶時間匆匆來到蘭吉特家，態度里有一種不同往常的焦急。他穿著三件套西服，戴著帽子，拿著手杖，身后還跟著帶著一本分類賬簿的助理。‘你看新聞了嗎，辛格？’他大喊。

“那時候，英國人正試著從荷蘭人手里奪走亞洲的糖貿易，印度大部分地區供應的荷蘭糖都來自爪哇（Java），那里是荷屬東印度群島的一部分。1932年，英國人對荷蘭糖發動了一輪攻擊，對進口到大英帝國的糖收取高額關稅。這個舉動馬上給能在印度生產糖的人帶來了機遇。而且，由于爪哇的糖業馬上就會被毀掉，他們就能以很低的價格收購爪哇制糖廠。

“拉拉爵士告訴我祖父這一切的時候，我的祖父飛快地把這些記錄下來。爵士走后，祖父自己把數字算了一遍，意識到拉拉爵士發現了一個真正的機遇。當天他就寫了封信給他的姐夫，這位姐夫在昌巴（Chamba）的一片封地上過著悠閑的生活。祖父隨信還附上了一張40萬盧比的信用證。

“他姐夫坐火車去了加爾各答，再從那兒搭蒸汽船到爪哇。他看了四座制糖廠，選了其中最好的一座，把它拆光，然后將所有設備運回印度，并在英屬印度聯合省的盧克索（Laksar）把糖廠建了起來。他監督了整個過程，直到制糖廠完全重新裝配好，然后他就回自己的封地讀小說去了。他對制糖一點興趣也沒有，純粹是找點樂子。

“蘭吉特讓他的兄弟負責糖的生意。這家廠今天還在運轉，我還是它的股東。

“我多希望自己能用攝像機把他講這段故事的時候錄下來。因為對他來說，這件事再簡單不過了，里面根本沒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就是去爪哇，把廠買下來再帶回來。他太不可思議了。

“但是他總是維持一種簡單的生活方式。他只有一輛捷豹車。他從來沒給自己買架飛機或者類似的東西。他有薩維爾街（Savile Row）[[5]](#Lun_Dun_De_Yi_Ge_Gou_Wu_Jie_Qu)最好的西裝，但他待人處事非常腳踏實地。他拋棄了封建生活，而且他知道倒退到那種環境里有多容易。他的一個表兄弟在旁遮普有近4900公頃的土地和一整個車隊的勞斯萊斯；他看著所有的財富在幾代人手里就消失殆盡。那些封建地主們活在一個泡沫里：他們關心的只有金錢、汽車、香檳和打獵。我能和那些男人聊四小時武器。

“那是蘭吉特的噩夢。他總是告訴家里的每個人，讓他們學習和工作：‘如果你沒有正經手藝，你就會變得封建，失去一切。’這種情況確實發生了。家里有人賣掉了價值連城的財產，把錢全花在派對上。有個表親連續開了三十年的派對。”

從這最后的回憶里，我們很好地理解了德里最早的承包商們的財富多年來是如何被稀釋的。他們后代中的一些人仍然住在市中心的房產里，統治著德里的生活，但其他人已經沒了聲息。財產被分了賣掉，很多力氣都用來打官司，爭奪剩下的部分。土地就那么消失了，年復一年，大片土地被其他人占用，并在上面修起建筑，隨著時間過去，地契也搞不清了，大家也漸漸沒精力再去爭論。這些人中，很多人現在住在經過財產分割的豪宅裙樓里艱難過活，維持自己地位的方法是偶爾去很貴的地方喝茶，傲慢地蔑視那些代替了他們的新貴。他們的臉上寫滿了家庭成員的自殺、癲狂和酗酒。他們對過去有著古怪的妄想，會把威士忌藏到掛在墻上的曾祖父威嚴的肖像畫看不到的地方，他們的曾祖父是個爵士或者別的什么，建造了這座他們現在深居簡出的房子。

有法律爭議的房屋不能出售，而且維護成本太高。康諾特廣場周圍的豪宅里空空蕩蕩，電力已經被切斷了很久，里面只有些做清潔工作和守衛這疲倦庭院的人。遠離這座城市奔騰的脈搏（盡管一切只是在墻的另一邊），這些人在價值3000萬美元的房產里過著雜亂無章的生活，偶爾清掃草坪上的落葉，用木頭生火煮飯。他們撬開生銹大門的門欄，走到外面的街上，但他們幾乎從來沒有離開過。他們在陽光下睡覺，有時候抬起頭，徒勞地向一只入侵的狗扔石頭，而狗和他們一樣昏昏欲睡。他們看著自己的孩子在雜亂又破敗的院子里玩耍，又睡了過去，接著，他們看著自己孩子的孩子在那里玩。

如果說新貴是對于老一代貴族的背離，那么他們來到英屬德里也代表了對他們自己生活的一次重大背離。他們繼續獲得合同的能力取決于他們是否能成功地融入這個英式社會的新世界，他們確實做到了，并把自己曾經擁有的留在了身后。

比如說，他們曾經在庭院風格的房子里長大，這種風格是從中亞來到印度北部的。在這種風格里，空地不是在邊緣而是在中心——那里有一個露天的庭院，多數有樹木和噴泉，為整個大家庭提供了一個公共區域。院子周圍是房子，家族的各個分支擁有自己的私人房間，有的還有供家里的婦女在日間活動的獨立場所。這種風格有很大的吸引力，至今仍是一些德里老年人的夢想。他們出生在這樣的房子里，但幾乎之后所有的日子都生活在風格完全相反的住宅里。在20世紀20年代，為了迎合英國人，德里的承包商無情地拋棄了這種亞洲風格的住所，轉而建造被草坪圍繞、有大客廳的豪宅，在那些客廳里，男人和女人可以進行“英國式”的、沒有隔閡的交往。

英國化的回報是巨大的。英國人關心這些新貴族的培養，不僅獎勵他們商業合同，還獎勵他們騎士稱號和其他國家榮譽。英國人讓他們成為自己俱樂部的會員，幫助他們把兒子們送到牛津和劍橋。于是，一個新的統治階級崛起時迅速地接受了英式作風。他們將英國人的穿衣風格消化成自己的。他們打網球和高爾夫球，周末時去狩獵，他們在毯子上野餐，用閃亮的銀器喝下午茶。

但他們的成功首先取決于他們重新創造自己語言的能力。一個建筑承包商的兒子這樣寫道：

我的父親，索伯哈·辛格（Sobha Singh）……非常超前于自己的時代。他意識到，如果要和英國人相處，就必須懂得他們的語言。他登廣告找了一個輔導老師……三四年內，他就能說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語。他試著讓我母親也學說英語。他請了一個印度裔的英國人賴特（Wright）夫人教她。苦苦學了好幾個月之后，我母親只學會了幾個詞：早上好，晚上好，晚安和謝謝。她常常自嘲，還會把謝謝轉換成‘非常感謝（thankus very muchus）’。訓練她使用英語幾乎就是一場災難……父親放棄了把她英國化的戰斗。

我父親身高一米八，體型苗條。我母親身高還不到一米五。父親對自己的穿著特別講究。他穿著英國西裝：外套和條紋長褲，戴領結或絲綢領帶，還有晚禮服。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穿傳統的印度服裝，他唯一的印度服裝是晚上在家休息時穿的。他對飲食的要求很高——早飯分量很大，有玉米片、雞蛋、烤面包片和水果；午餐前喝幾杯金湯力也很重要；喝茶的時候要有蛋糕或酥皮點心；他喜歡在晚餐前喝幾杯蘇格蘭威士忌，晚餐也是一件很復雜的事情，要有好幾道菜，隨后是一兩杯干邑白蘭地。[[6]](#Khushwant_Singh___My_Father_the)

這些人在印度北部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共同文化中長大，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這個地方以其優美精巧的語言而自豪。大多數人在成長過程中都使用好幾種這個地區的親屬語言，包括用阿拉伯字母寫成的烏爾都語、印度斯坦語（和烏爾都語幾乎完全相同，只是文字用天城體）、旁遮普語（文字為與天城體相近的古爾穆奇字母）以及可能還有其他一兩種方言。語言不僅僅是一件用來做事的工具，即使對于他們這樣的商人來說也是如此。他們愛好詩和歌曲，許多人自己寫詩，通常用的是烏爾都語——雖然可能不是他們的母語，但被普遍認為是最適合寫詩的語言。然而突然之間，他們用自己最弱的一門語言來生活，或者說一門他們甚至都不會說的語言——英語。他們用英國官僚和軍人之間的黑話互相咆哮，他們與那些人（“六尺大漢”）過從甚密，而從前的文化在他們身上萎縮了。英語成了他們的語言，雖然他們給后代留下了夢幻般的財產，卻沒能讓他們繼承自己的語言。

當你看著新完成的英國行政綜合大樓的照片——巨大的、完全現代的建筑，周圍方圓幾公里一片空無，你不禁感覺到有一些妄想的東西在里面——因為有許多城市曾經建在這個地方。確實，從這個意義來說，英國人完全是“傳統的”德里統治者。在他們的故事中，他們被迫放棄自己的首都，使用的時間比建造它的時間更短。1947年，他們匆忙離開，隨后，獨立印度的管理者就搬進來了。

這些管理者有意無意地完成了英國人起頭的事——破壞北印度古老的印度教和穆斯林共有的文化。分治的毀損過去后，在極度痛苦中，新的國家決心抹去所有會讓他們想起這道傷痕的存在。那種共有文化將被遺忘，其中伊斯蘭的痕跡被消滅了。語言是一個重要的領域。

1950年的憲法為一種新語言——“印地語”——規定了明確的傳播目標。印地語是對傳統印度斯坦語的重新發明。傳統印度斯坦語是一種北印度語言，其中烏爾都語被用來進行最高水平的文學和哲學研究，是最復雜的一門。現在，印度斯坦語將被重新組織，盡最大可能去掉其中所有波斯語、阿拉伯語和突厥語帶來的影響，并用從梵語中找回或創造的詞語來取代它們。從今以后，印度人的舌頭不會再發出穆斯林的聲音。

印度人的手也不會再寫下穆斯林字母，這種語言已經不再用阿拉伯文字書寫，印地語只用印度本土的天城體（Devanagari）書寫。中央印地語管理局成立了，職責是在這種語言的街頭巷尾巡邏，同時保衛它的邊界。官方通訊比如學校教科書或者全印度廣播電臺的新聞報道，都被制作成這種新語言的展示樣品。這是一種糟糕的學術展示，因為里面梵文過多，完全不像真人在說話。

也許有人會想象，一個獨立的國家會比殖民地發出更多的聲音。也許有人把獨立想象成為這樣一個時刻——從前沉默的聲音以談話和歌曲的形式爆發。但在印度北部，真相更為復雜。人們不再閱讀印度斯坦尼最偉大作家的作品，因為里面包含了太多不被許可的元素，并且他們很快就將無法讀懂這些作品使用的文字了。從前以文學素養自豪的旁遮普人家庭，自己也開始不喜歡書籍。大多數書籍，尤其是那些對一個人的職業生涯沒有直接促進效用的書籍，成了沒有回報的支出。事實上，這些書代表著對生活在分治后的家庭的威脅，在這些家庭中，重建物質基礎是唯一正當的關切——對深奧幽微世界的關注現在被視為是危險的，父母應該保護自己的孩子免受其影響。此外，在充滿恐懼的新家庭氣氛中，父母對孩子拿著一本書自得其樂感到不安，他們希望孩子需要他們，正如自己需要孩子一樣。他們堵住了通往孤獨和遐想的道路。

德里這座城市延續著自己久已有之的名聲——語言的死亡之所。分治的難民不僅用一代人的時間就遺忘了烏爾都語，他們甚至難以把自己的旁遮普母語傳承下去，他們的孫輩中很少有人了解這種語言，除了只字片語。這里許多中產階級的成員最終哪一門語言也說不好。他們說不好英語，盡管在職場里英語用得越來越多；他們也說不好印地語，雖然在家里說，但除了日常詞匯以外也知之甚少。關心語言被看作是毫無價值和娘娘腔的，而且口語特有的模糊性和對語法的故意忽略成了一般的風格。書本和報紙上到處都是拼寫和語法錯誤，更不用提廣告和街道標志了。很難找到能在印度諸語言間進行翻譯的人，因為很少有人能夠同時掌握高水平的書面印地語和書面英語。以往的寬闊視野逐漸消失。人們對于和自己不相像的人的了解越來越少，階級和種姓變得更加孤立而可疑。

倒是來自小鎮的貧困移民往往保留了關于優美語言的觀念。登陸的分治難民計算著自己的房子和存款，面對后來到達的那些衣衫襤褸的人，他們陶醉在自己的優越感中。但有時他們聽到來自其他地方的工人階級說的話——在那些地方印度斯坦尼詩意和狂喜的元素還沒有變得陌生——他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變得多不善表達。

對詩歌和精致語言的摯愛現在失去了表達的對象，也許這些愛被轉移到了孟買的電影藝術那里，使其在分治后的幾十年里享受著偶像式的崇拜。孟買的電影制片廠，成了許多烏爾都語詩人和劇作家遷徙向往的地方。在那里，他們創造了一種蘊含著精致感覺的電影藝術。在這些電影中，英雄說的是講究的波斯印地語，情歌里的隱喻讓人回憶起烏爾都語詩歌的藝術高度。那個時代的三個超級男星，拉杰·卡普爾（Raj Kapoor）、狄力普·庫瑪（Dilip Kumar）和戴夫·安南（Dev Anand）都是從現在的巴基斯坦來孟買的。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印地語電影甚至在晚于那個年代很久出生的人之中仍然帶有這種情感力量，那是因為它成了印度斯坦尼文化中浪漫和詩意最后的避難所，而這種文化很大程度上被獨立國家更加嚴酷的氛圍趕到了地下。有一點也許意義重大，那就是孟買的電影藝術是印度公共生活中極少數穆斯林男子能享受毫無顧忌愛慕的領域之一，盡管他們起了印度藝名。

富有啟發意義的是，這種電影藝術在整個蘇聯集團里產生了狂熱的吸引力，那里的觀眾經歷過嚴厲的肅治，并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的生活里飽受滄桑。因為這是一種與日常世界有一定距離的電影，其中的生活就像以前那些更美好的事情一直都在（比如，電影故事幾乎完全不提分治，好像它并非生于那場陣痛）。對于那些失去了自己東西的人來說，這無比辛酸，不管他們在哪里。

國防區（Defence Colony）是德里南部綠化最好、最讓人喜愛的街區之一。在印度獨立之后，這里寬闊的地塊被分給了軍官。最初的居民們現在已經老了，他們以一種古老的節奏生活著：早上6點在國防區的許多公園里快步散步，有時伴隨著一陣陣充滿活力的拍手聲，或者一群人不約而同的大笑聲；接著，7點在陽臺上吃早餐看報紙。午餐和遛狗由在家里工作的“男孩們”安排，這些男孩通常是他們在軍隊時就認識和信任的仆人的兒子和孫子。下午，茶和餅干如同軍事紀律般雷打不動地被送到露臺。那些5點就起床的人早早吃過晚餐上床睡覺，但晚上也有可能到當地俱樂部喝一杯，在那里分享關于往昔的回憶。他們會聊20世紀40年代的軍事學院，那時分治還沒有將軍隊分裂成兩半。分治時，一半的軍校同學成了敵人，并和他們在三場大戰中作戰，但這并不妨礙他們的老交情（有時甚至包括越界的暗中合作：“老伙計，別打那個目標，我侄子躲在那兒。”），現在他們仍然與邊界另一邊的前同事保持著友誼。他們聊過世已久的上司們，那些被取了伍德豪森式（Wodehousian）笑話里的綽號，并能一口干掉威士忌的人。

他們是彪悍的男人和女人，同時擁有強烈的責任感和對樂趣的追求。“不打仗的時候，”有一次，一個年紀雖大卻整潔美麗的軍人妻子對我說，“那是你能想象的最好的生活。我們所有人一起在一個軍事基地，晚上喝酒、打臺球，還有許多穿制服的高個子男人……”她說話帶著桑赫斯特（Sandhurst）[[7]](#Sang_He_Si_Te_Huang_Jia_Jun_Shi)口音，面前是滿滿一杯金湯力。

他們是儉樸的人，有舒適的住宅和不錯的養老金，生活里沒有什么特別想要的。他們享有社會聲望和關系，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婚姻和職業都很好。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他們的老年時光里，他們的生活超過了普通的富足，變得非常富有。

在21世紀初的房地產熱潮中，他們生活的地塊價值達到了200萬美元，然后是300萬美元、400萬美元。社區里流傳著數字。他們中很少有人真的想改變自己的生活，但他們面臨著釋放其中價值的壓力，這些壓力常常來自他們正處于職業生涯鼎盛時期的孩子。于是，老人們搬出去到別的地方租房子住，一個接一個，房子破敗下來。這些都是很有特色的房子，大多由房主自己設計，但都有一種優雅和勻稱：房間寬敞，天花板很高，有屋頂露臺可以在冬天曬太陽，底層房間在夏季通風很好，花園由恰到好處的樹蔭遮蔽。在很短的時間里，大部分房子只剩下了瓦礫，國防區也變得走風漏氣的。坑洞里出現了棚屋，里面住著建筑工人和他們的家庭。深色皮膚的農村孩子白天在街上玩，女人們晚上用木頭升起火烤烙餅，這時你會聽到憂郁的歌聲。隨著建筑的升高，勞動者的住宿條件也迅速提高。很快，他們住到了五星級公寓里，洗好的衣物被高掛在大理石大廳，他們的歌聲也都變得更快樂了。然后工作完成了，這些家庭去了別的地方，再次住在帳篷里。

這些新建筑與舊的非常不同，它們是國際風格公寓的偉大堡壘。不再有花園了，因為這對房地產來說是不可能的犧牲；不再有露天陽臺了，也沒有陽光照耀下的白墻，沒有遮陰的樹木，沒有任何古老建筑智慧的跡象，這些智慧可是在這個氣候嚴苛的地方經過多個世紀積累下來的。這些新的龐然大物高聳入云，比樹頂還高；石頭材質的大樓冷冰冰地面對太陽；因為落地窗而產生的溫室效應被空調的強大力量所抵消。高墻、安全門禁和閉路電視攝像頭完成了“國際生活”的承諾。

原來的業主在這些街區為自己和孩子們保留了幾棟公寓，其他的以每棟1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

所有這一切解釋了當我快到歐貝羅伊上校（Colonel Oberoi）的房子時，馬路就像是一個建筑工地的原因。拆除和施工造成的粉塵撲面而來。空氣與切割意大利大理石的巨大噪音一起尖叫（事實上，這種說法是不必要的——這里所有的大理石都叫意大利大理石，不管石頭是從哪里來的）。其中一棟房子前，有一隊人在操作一個專業電鉆，要把一口非法的私人水井挖得更深一些，這些房子都有這種井，好繞過市政供水的配給。地下水水位不斷下降，這些井不久之前還只需要深入地下十五米，現在卻必須得深入六十米了。擁有鉆探專業知識和設備的公司現在業務多得處理不過來。

我去見歐貝羅伊上校的時候遲到了，而且我從車里給他打電話道歉并沒有讓他感到一點安慰。“我給你五分鐘時間到這里。”他在電話里大聲咆哮道，然后就掛了。

歐貝羅伊上校的房子沒有被拆掉，是極少數仍矗立在這里的原有房屋之一。歐貝羅伊上校自己設計了這座房子，現在這座房子顯得非常古怪——在一片滿是新德里規劃排屋的土地上，非要應用舊式庭院的設計。

“我母親堅持要有一個院子，”他說，“在50年代我們造這個房子的時候。”

對于一棟已經有人居住超過五十年的房子來說，里面的設施少得驚人。墻是裸露的，燈泡也一樣。餐具柜上有幾張孫輩的照片和軍隊授獎儀式的照片。

上校九十多歲了，已經退休好幾十年。他有點聾，所以他軍人式的嘶吼顯得更加響亮。他穿著一套皺皺的獵裝——以前印度公務員的制服。他坐下來，坐在一張寫字臺前。寫字臺上有用烏爾都語寫著筆記的筆記本，本子是他自己用使用過的A4打印紙做的，每張紙被裁成四小張，釘在一起。他示意我坐在桌子對面。

“在我長大的村子里，”他說，“房子都有院子。你從街上走進院子里，那里會有家畜和干草，還有床可以讓你露天睡在外面。房間在院子的盡頭排成一排：它們都在一樓，由泥土和木梁建成。屋頂伸出屋子的墻壁很多，所以房間總在陰影里。所有這些房間都是臥室：起居活動區域就是院子。如果有客人來，院子里就會擺上一張桌子，倒上茶。我們不在家里辦大型活動——婚禮和宗教活動會在社區中心，那里是我們所有人一起幫著建起來并維護的。”

歐貝羅伊上校在西北邊境省（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的一個部落地區長大，那里的自然美景令人嘆為觀止，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喜馬拉雅山，同時也是印度河河水最澎湃、水量最豐沛的河段。1947年8月，那個地區成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歐貝羅伊上校一家成了印巴分治區的難民。

“當時我受命在孟買參加軍事訓練。我的家人滯留在馬爾丹（Mardan），靠近希貝爾關卡（Khyber Pass）。他們無法動身去印度，因為我妻子懷孕了。我的一個穆斯林同事照顧著他們，他叫賈巴爾（Jabbar）上尉，他讓他們住在他的軍方住所以確保安全，其中有我的姐姐和姐夫、兩個表親和他們的孩子，還有我阿姨和母親。那些地方傳來的消息非常嚇人，我很擔心。獨立后兩周，我去了阿姆利則（Amritsar）的避難者組織。我的朋友在拉合爾有家人，他們由軍隊護送越過邊境去接家人，但是馬爾丹太遠了，沒辦法這樣做。我非常擔心，不知道要怎么辦。最后他們答應用飛機把我家人接出來。我還記得擴音器里播出公告的那個時刻：‘歐貝羅伊中尉的家人將會被空運出來。’

“但是我的家人還沒準備好接受空運。我的妻子不能移動，所以她不得不一直等到10月我們最大的兒子出生。那時候空運已經太晚了。于是賈巴爾上尉親自把他們護送到了白沙瓦（Peshawar），把他們交給了一個來自哈里亞納（Haryana）的將軍照顧。那位將軍把我的家人帶過邊境，送上一輛軍列。那時候的德里一片混亂——所有的火車都停了。我和他們都去不了德里。一個月以后我們才最終團聚。”

歐貝羅伊上校一邊說一邊畫了很多畫，有房屋的設計圖，也有家人活動的地圖。

“那些年我并沒有駐扎在德里：我隨著軍隊到處移動。1949年，我被送到英格蘭參加長期炮術訓練。之后，我被派到印度各地。但是我沒有自己的住所，這是個大問題。我的大家庭仍然和一個親戚一起，住在德里一棟只有一個房間的房子里。德里全是難民：有幾十萬人仍然擠在數個難民營中，住在帳篷和茅草屋頂下，政府在努力為他們安家。我的一個同事讓我去問問避難者的房產。他們給我看了一個被穆斯林家庭遺棄的房子。我到負責安置的主管那里去問是不是能把那個房子分給我。他說我不符合條件，因為我不在德里服役。‘但是我們在建一個防衛定居點，’他說，‘在那里你可能符合條件，分下一塊地。’”

政府為軍人提供分期付款計劃，讓他們很容易就能買這些地。獨立后，在德里人的概念里，這個城市是屬于品格高尚、忠于國家的人的。當局使軍隊男子很容易購買這些地塊，提供多年分期付款計劃。埃德溫·勒琴斯設計的這座英國行政城市中，新的“殖民區”迅速萌芽，遍布全城，其中比較好的區域被分給了工作對國家至關重要的非政府人員。除了國防區，還有為記者、律師等保留的街區。相比之下，商人的行當被認為更加庸俗和自私，因此被安置在德里西部相對偏遠的街區。

“我坐下來寫了一封申請書。第二天他們給我打電話，告訴我申請成功了。我買下了地。等我回到德里的時候，我們建了這棟房子。”

我來見歐貝羅伊上校是為了參觀他的這座庭院式住宅，房子建在新城，仿佛有些與時代脫節。他希望按照原定時間結束會面，但因為我遲到了，損失了一半的時間，所以我們就沒時間參觀房子。現在到他去市場的時間了。我們站了起來。

我問他，他在筆記本上寫的是什么。“這是我的詩”，他說。“你用烏爾都語寫嗎？”“我用很多語言寫。我的母語是西萊基語[[8]](#Xi_Lai_Ji_Yu__Saraiki_Shu_Yin_Du)，屬于旁遮普的一種方言，是我出生地那里的語言。我以前常常和說普什圖語的部落的男孩子一起玩。作為20世紀20年代的孩子，我每天要說六種語言：西萊基語、旁遮普語、印地語、普什圖語[[9]](#Pu_Shi_Tu_Yu__Pashto_Wei_Zhong_Y)、英語和烏爾都語。我以前寫信會用三種語言寫三份，印地語的寫給母親和姐妹，英語的寫給朋友，烏爾都語寫給我叔叔。我也寫英語詩歌。但是寫詩最好的語言是烏爾都語。”

提起詩歌，歐貝羅伊上校忘記自己急著要走了。他想讀給我聽。他到書架上拿了一堆寫滿詩歌的筆記本。

“我寫詩已經寫了七年了。”他說。

大部分詩寫在沒用過的舊日記本里。他翻著本子，尋找他想念的詩。這些本子有些令人觸動的東西，上面從左到右用灰色印著英語的日期和月份，這個字序對于拉丁文字的讀者來說是從前到后，然而本子里卻以反過來的方向寫滿了詩歌——詩歌讓時光倒流。他用一種深沉而帶著音樂性的聲音朗讀，讀完每一首詩都稍作停頓。這些是古怪的韻文，給人一種帶有不同尋常的好奇心的印象。“我們感覺到的對其他人類的所有情感，在天堂里有任何位置嗎？因為如果沒有東西把我們綁在一起，那就不是我的天堂。”

Jaise nadee ke bahaav main ek pathroon ka jaloos hai

Bahe jaa rahe hain ludak ludak

Wajood use na thahraav hai

Na lagaav hai na dosti hai

Na hai dushmanee

Chaahat nahin, nafrat nahin

Jannat hai uska naam agar jannat hamein nahin chahiye.

如石塊行進

在一條河流中翻滾跌落

沒有身份或根

沒有對友情的依戀

或是對仇恨的

沒有欲望，沒有憎惡

如果你把那叫作天堂

我一點也不想要。[[10]](#Gan_Xie_Ba_Sha_La_Te__Pi_Er_Ying)

歐貝羅伊上校的態度總的來說嚴格而死板，但我們談論詩歌時，他身上流露出了一些溫柔和甜美的東西。這部分來自這個人心中對于宏大自然的記憶，他在這個巨大的城市中已經生活得太久了，但他的烏爾都語詩歌還堅定地維護著對一種已經失去的文化的忠誠——一種像他這樣的印度教徒曾經與穆斯林共享的文化、一種多語言的大都會文化，在那種文化中，詩歌和精神的生活曾經有過更充分的表達。

朗誦完了之后，我問他：“你怎么看印巴分治？”

“最開始，我非常恨。我是說，我們期望的是獨立，得到的是什么？國家一分為二。”

然后他用了一個印度的隱喻來詳細解釋，這個隱喻之后會一再出現。

“兩個親兄弟最后斗起來，然后分了地。”

他把怨恨的矛頭指向了那些推行英屬印度分治的政治家。

“我們服役的時候有行為準則。人民和國家的福祉優先，個人利益最后。這個誓言是寫在我們軍校墻壁上的。但是政治家不是那樣的。他們考慮自己的利益，吊死了國家。”

“你仇恨穆斯林嗎？”

“我為什么要恨穆斯林？我和這些人一起長大，他們遭遇的是和我們一樣的情況。年輕的一代被教著去恨穆斯林。過去我們和穆斯林之間親人般的關系現在沒有了：年輕人聽著恐怖的故事長大。但是我們愛那些人。”

他摸著自己濃密的白胡須說：“我給你倒點茶好嗎？”

注釋

[[1]](#_1_9)引自Malvika Singh and Rudrangshu Mukherjee, New Delhi: Making of a Capital (Lustre Press, 2009), p.22.

[[2]](#_2_9)Guido Gozzano, Journey Toward the Cradle of Mankind, translated by David Uarinelli, 1913 (reprinted Marlboro Press, 1996).

[[3]](#_3_8)詩人圭多·戈扎諾（Guido Gozzano，1883—1916）三十二歲時死于肺結核。

[[4]](#_4_6)引自Singh ＆ Mukherjee, New Delhi, p. 22.

[[5]](#_5_3)倫敦的一個購物街區，以高級定制男士服裝行業聞名，被稱為“西裝裁縫業的黃金道”，包括丘吉爾、拿破侖三世、納爾遜子爵、查爾斯王子皆曾光顧。

[[6]](#_6_3)Khushwant Singh, ‘My Father the Builder’ in Maya Dayal (ed), Celebrating Delhi (Penguin, 2010), pp. 2–11.

[[7]](#_7_3)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是英國的陸軍軍官學校。——譯注

[[8]](#_8_3)西萊基語（Saraiki）屬印度-雅利安語支，主要流通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西南部，常被視為旁遮普語的方言。

[[9]](#_9_1)普什圖語（Pashto）為中亞和南亞普什圖族的語言，與達利語（Dari）同為阿富汗的官方語言。

[[10]](#_10_1)感謝巴沙拉特·皮爾英譯了歐貝羅伊上校的詩歌。

## 十　1947——邁向獨立

汽車駛近主路口的時候歡快地鳴笛，就好像街上只有十輛車一樣，就好像這些喇叭聲絲毫沒有淹沒在街上的喧鬧聲中。在發出了自己的警告以后，這輛車子看也不看，就從容地駛入了屬于一千六百萬人的狂暴街道和車流人流之中。

我覺得這個地方一點都市感都沒有。沒有哪的大都市精神是從那么多如此生活在一起的人里冒出來的。那么多創造這座現代城市的人是作為難民從小村鎮來到這里，在德里待了幾十年以后，他們還是住在小城鎮里。

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起成為自治領（Dominion of India），當時還有幾百個土邦散布全國，獨立于中央。新國家的領土看起來就像被蛾子啃過的衣服。它曾經是英屬印度帝國的一部分，大得多，而且連成一片。然而在20世紀中葉陸續出現了四個新的國家：緬甸（1938）、印度（1947）、巴基斯坦（1947）和后來從巴基斯坦中分裂出去的孟加拉國（1971）。

之所以叫作英屬印度帝國并不是因為它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雖說它曾經是——而是因為它自己本身就極大，又包含了數量眾多的國家和文化。其人口大致與全歐洲相當，語言的種類也和歐洲差不多。在其他情況下，這里完全可以出現很多國家，就像歐洲那樣，甚至比歐洲更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舊帝國提出的概念上的挑戰要比成立新國家少得多。帝國是多個民族的人造產物，這個事實不需要隱藏。相比之下，一個“國家”必須依賴于某些自然邏輯，這就成了反復出現的問題。就像20世紀數百個新國家中的大多數一樣，南亞的新生國家除了曾被同一個帝國征服外，其存在并無其他歷史依據，這些國家也不具有能給予其一致性的單一語言、文化或者種族。它們太大，也太小，無法與任何經驗范疇對應——而且這些國家的新管理者，一門心思尋找象征和口號，把這種不自然的結合重新定義為不言自明的家園。

“巴基斯坦”這個名字就是這樣一個嘗試，嘗試從差異中像變戲法一樣地變出一致來。這個名字是由數個不同區域的首字母縮寫拼寫而成的，由一位名叫喬杜里·拉赫馬特·阿里（Choudhary Rahmat Ali）的劍橋學生發明。1933年，他寫下了一個夢想，就是為“三千萬住在PAKSTAN的穆斯林兄弟——PAKSTAN在這里指的是印度的五個北方行政單位，即Punjab（旁遮普）、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Afghan Province）（西北邊境省，即阿富汗省）、Kashmir（克什米爾）、Sind（信德）和Baluchistan（俾路支）”——提供一個共同的家園。選定了這個新詞后，巴基斯坦首任總統穆罕默德·阿里·真納（Mohammad Ali Jinnah）發現，邊界另一邊的新國家準備把自己叫作“印度”，這令他非常憤怒。他曾想象他的鄰居們會拋棄這個英國人的詞匯以及一切會與殖民時代產生關聯的東西，為將要到來的新時代創造一個純潔無垢的名字。它把自己叫作“印度”，是把一個新生的國家冒充成那個古老的存在，假裝所有和這個名字聯系在一起的歷史都是他們的，假裝數千年來整個地區所有的偉大文明、對于印度河（一條在巴基斯坦的河！）對岸土地的爭奪——無論過去是否存在于現在這個新印度的領土內，都唯獨屬于他們那片縮水了的土地。

印度不僅拿走了這個名字，還得到了德里。過去的兩個帝國都曾將首都搬到德里，而且這兩個帝國都是偉大的建造者，他們在德里建成了那些不朽的建筑和景觀，讓人能夠直接感受到國家的威嚴。就在巴基斯坦政府在卡拉奇（Karachi）暫居了超過十年，等待新首都建成時，用來彰顯英國在印度權力的令人嘆為觀止的議會建筑全都歸印度官員享用。在這些設施上，大英帝國用上了多名國內最優秀的設計師，花費了數百萬英鎊。當英國管理者收拾完行李登船之后，印度的新部長們就搬進了他們留下的種著三角梅的小木屋。

但是這座城市永遠不會再像英國人過去熟悉的那個行政中心一樣了。當獨立印度的旗幟飄揚在他們這座花園城市的上方，這座城市很快就被數以百萬逃離帝國分治恐怖的人淹沒了。而當代德里不是誕生于別的，正是誕生于此。

這片英屬次大陸的領土分治為新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后，就導致了被稱為“歷史上最大的人類動蕩之一”的浩劫。[[1]](#Urvashi_Butalia)數月的時間里，一千四百萬人跨過西北和東邊的新邊界，從一邊到另一邊。多達一千兩百萬難民穿過西北邊的邊界，這條離德里不到四百公里的邊界把旁遮普邦一分為二：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主要搬往印度這一邊，穆斯林則搬往巴基斯坦那一邊。很多人搬離的原因是害怕身為宗教少數派的自己，將在把他們團團圍住的新國家中遭到暴力對待。而事實上，這些宗教信徒本來融合得很好，其分解的過程卻伴隨著驚人的暴力。約一百萬人在印巴分治過程中死亡——有些是因為饑餓和疾病，但是大多數是死于大規模的屠殺，這痛苦的回憶至今依然深藏在旁遮普的家庭里——不僅僅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而是在全世界。生活在成為印度的穆斯林和生活在成為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在自己的家里和街上被砍倒，或是從要出發的轎車和巴士里被拖出來殺死。在一個后來被說爛了的關于分治的故事里，載滿難民的火車遭遇猛烈襲擊，車上所有的人都被殺死，然后火車仍然行駛到分治的另一邊，就像來自地獄的預兆。七萬五千名婦女在這場大混戰中被強奸或被綁架，在次大陸的這個地區，這件事依然影響著兩性關系的結構。簡短來說，印巴分治是一場巨大的災難，是20世紀中由于官僚主義的草率導致難以想象的大規模苦難和死亡的例子之一。在這個例子中，英國政府和等待接管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都是極其草率的，但沒有任何一個政府為其在這么多人被趕出家園、被殺死這件事中承擔過責任。

是什么造成了如此放縱的暴力？很難有令人完全滿意的方法來弄清楚這些事件的核心。回顧過去的時候，甚至施暴者自己都難以理解。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在那個時刻，他們是被憤怒操縱的工具，而不是憤怒的主人；自那時起，憤怒把他們從自己緊握的手里放開，讓他們和其他人一樣只剩下困惑。顯然，沒有任何實際的解釋——比如自我防衛或者為財產抗爭——能給予分治過程中異乎尋常的強烈暴力公正的評判。阿姆利則和拉合爾等城市之前是如此愜意平和，但分治期間卻完全變了樣子，這是完全不遵循常理的那種自發的大眾狂想的結果。看上去，這種狂想的目標是要完全消滅其他宗教社群。過去，社會生活一直以來都是和這些社群親密分享的，但是現在一切都被一條“國界”動搖，突然之間這些社群似乎變得讓人厭惡。（德語中有一個詞“unheimlich”，通常譯作“離奇的”，但其字面意思是“不像家的”，用在這里很適合。）這就是人們從暴力的滅絕行為中必然會得出的結論。就像之前各個社群幾乎無法區分，然后在政治分離中爆發騷亂的地區——比如前南斯拉夫——一樣，這里發生的不是無形的瘋狂。它具有特定的結構，不僅針對人群，而且嚴重地針對其生殖潛力：不僅有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還有重復暴露未出生的胎兒、展示閹割的儀式，以及大規模的強奸，其目的是基因征服：他們的孩子不會是自己的。

這些社群就只是互相憎恨嗎？僅僅是文明狀態的中止就讓一直存在的兇殘激情涌現出來了嗎？當然，沖突和緊張一直都有。人們通過加入不同的宗教和種姓社群了解自己，所造成的分歧和懷疑被所有統治政權利用（不僅是莫臥兒人和英國人，還有后來獨立印度的各個邦政府和聯邦政府），并具有可預測的腐蝕性結果。也許并不奇怪的是，“社群”這個詞在英語世界的其他地方指的都是和諧和共享的東西，而在印度卻被用來談論社會的崩潰——因為“社群”被認為必須是局部的、沙文主義的，它的利益總是與整個社會的利益相抵觸。

但是這些日常沖突在宗教團體內部也一樣激烈——比如不同種姓的印度教徒經常被卷入沖突。而且奇怪的是，分治前，北印度文化中的主流記憶里并不包含敵意，反而是不同宗教間的尊敬與和諧：像歐貝羅伊上校還有我父親這樣的人，生活在英屬印度教派雜處的環境中，反而胸襟開闊，感覺充實。當他們憶起往昔，總是快樂和懊悔交織。那時候的文化是由所有的宗教共同創造的，而且，幾個世紀以來，無論他們之間有何種歷史矛盾，他們共有的那個世界都比隨之而來分裂的世界更加豐富。關鍵就在于此。

很難向不了解它的人們表達，一種文化的死亡是怎樣一種巨大打擊——那就像是一個社會的所有根基都灰飛煙滅了，由此其成員的自我也不復存在了。1947年的分治消滅了一種文化——一種古老的共有文化，于是物質生活中的暴力作為瘋狂熱潮中的一部分讓人在這種心靈的死亡中生存下來。獨立國家的新政權比舊文化更狹隘，為了使人民能夠擠進來，需要有巨大的犧牲——凈化和根除的進程基本上是無止境的，因為它真正的舞臺不在外部，而是在自我之中。不僅是穆斯林害怕在新印度沒有一席之地，有些印度教徒已經太“穆斯林”了，也會因此無法生活在新印度。在暴怒的狂潮中，他們殺死的不是穆斯林，而是伊斯蘭教——作為他們自我一部分的伊斯蘭教，他們自己內在的伊斯蘭教——如果他們曾經屬于過它，那么現在就必須消滅它。

人們通常認為仇恨是導致暴力的一大原因，但或許連仇恨也沒有這樣大的力量。愛和生存的力量更強。分治的暴力是想要活下來的人的暴力，不僅是身體上的，還是精神上和政治上的。而他們的生存取決于犧牲掉一種愛，一種在現代世界中已被禁止的愛。

對于一般大眾來說，恐懼和暴力是在幾乎沒有預警的情況下突然爆發的，根本沒有時間計劃如何逃跑——他們鎖上屋子，開車、乘公共汽車或者火車出發，但大部分人是隨著成千上萬的人的隊伍步行。穆斯林往一個方向走，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往另一個方向走，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會回來。除了某些例外，這次可怕出走中的幸存者將失去所有沒能帶走的東西——房子、財產、土地、生意，他們1947年以后的生活要從零開始。

在印度這邊，難民只要有地方就安頓下來。有些人和自己大家族的成員住在一起。許多人被安排住在難民營，有的在里面住了長達五年之久。在旁遮普古魯格舍德拉（Kurukshetra）一個迅速聚集起來的營地里住了二十萬人，這些居民很快把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臨時的城市，熱熱鬧鬧地搞起學校、醫院、市場和宗教節日，其中一些節日是為了紀念《摩訶婆羅多》中的事件，這部古代史詩描繪了在古魯格舍德拉發生的一場兩個家族間的毀滅性戰爭。所有人都一定很清楚這個故事在當代的回響。

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數量龐大的難民在德里定居下來。相比到其他地方去，進入德里要更簡單些——作為新國家的首都，德里在為分治難民提供住所、福利和商業貸款方面顯示出了最大的決心，同時作為在一片廣闊空地的中心新建起的城市，德里在為人們提供長期居住地方面的靈活性也很大。在20世紀的上半葉，也就是這座英屬首都建立的時期，德里的人口從大約十五萬攀升至近一百萬；分治后，這里一夜之間多了一百萬新居民，而更多的分治難民在隨后的許多年中不斷到來。1947年后，這座城市的一項偉大工作，就是為這些新來者分配之前屬于地主（多數是1911年時的貴族）而現在屬于國家的土地。

然而在所有這些巨大的混亂和破裂中，并非全是輸家。逃走的穆斯林留下的房產被早有準備的印度教鄰居搶占，特別是在舊德里。德里有很多擁有地產的家庭無法解釋清楚財富來源。國家也從離開的難民那里獲得了數量巨大的財產，包括曾屬于老穆斯林貴族的無價財富。然而，大體而言，精英比其他人過得更好，原因不僅僅是他們有逃離的錢，更重要的是他們有情報來源。大多數人不知道將會發生什么事，只能相信流言，但是那些和政治機構有聯系的人能更清晰地了解到未來會是什么樣子，以及自己怎樣在其中拔得頭籌。擁有重要房產和生意的人總是特別積極地去獲取關于收購分區言論的最新情報，他們中的許多人很早就出手變賣手中的產業，只為安妥。這樣的精英也能將國家資源為個人目的所用——很多情況下，是軍隊幫助他們將家庭成員和財產向南邊和東邊轉移至分治后屬于“印度”的領土。許多人趕在分治沖擊前就在德里購買了房產，并建立了生意，他們的后代現在仍舊屬于這座城市里最富有的人群。

通過它的贏家和輸家，通過那些到來者的文化和離去者的缺席，正是分治而不是別的成為了當代德里文化誕生的標記。這座當代城市誕生于一場規模宏大的創傷，而它的文化正是一種創傷文化。即使是那些分治后出生的人，即使是那些從其他地方和歷史背景中來到德里的人，比如我自己，也很快就染上了這座城市的許多很突出、來自創傷后的“抽搐”。這就是為什么對于那些從別的印度城市來的人來說，這座城市在情感層面似乎非常支離破碎，同時也非常駭人。

和通過政治、法律、紀錄片等多種手段廣為傳播的猶太人大屠殺不同，英屬印度分治過程中的多數事件仍舊塵封在沉默中。大屠殺為新成立的以色列國帶來了巨大的凝聚力，但是對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來說，分治中的暴力是污染其獨立的恥辱，他們不會將其廣而告之。這兩個國家都沒有關于分治的官方檔案，也沒有國家紀念碑或紀念儀式。在個人生活中，經歷過那些事件的人民通常不曾告訴任何人他們當時的所見所為。到現在，虛假的記憶已取代真實的回憶，因為能回到那些事件中的一連串經驗被切斷了。每個經歷了印巴分治的家庭都講述著同樣的故事：武裝的穆斯林成群結隊地從天而降，家家戶戶驚恐萬分，婦女為了避免受辱跳到井里，到處血流成河，嬰兒在屠殺中奇跡般得以脫逃，在某些村子“他們沒放過一個女孩兒”——這些委婉的說法比直接說出來聽上去更恐怖。“他們揮舞著明晃晃的彎刀。”那些人說。這里提到的彎刀，是指和中世紀穆斯林統治者有關的華麗彎刀，顯示出1947年的恐怖是如何在述說中崩解成一個關于永恒而神秘的脆弱性的故事。對于從那場災難中幸存下來的錫克教和印度教家庭來說，他們有一種超驗的恐怖感，并且這種恐怖感等同于伊斯蘭本身。分治發生時已經成年的人，有和穆斯林一起生活的真實經驗，這為他們的臆想設定了界限。但他們的孩子沒有這些經驗，這些孩子和最可怕最猥瑣的怪物一起，住在成人沉默的真空里。他們在自己孩子的周圍復制那些沉默，以至于當所有的事實都漸行漸遠的時候，殘余的創傷像食物鏈里的毒素般隨著時間逐漸濃縮。折磨德里的，是一場無論多少年過去都不會離開的災難。

從伊斯蘭教的手中逃到德里，這些家庭對于在穆斯林的土地上開始新生活是非常介意的，而且即使他們將過往塵封并與自己隔絕，惡魔還是不斷地從地下出來。20世紀50年代居住的新居民區建于過去穆斯林墓地之上（還記得艾瑪·羅伯茨俯視“屬于忠誠的十八萬名圣人和殉道者的墳墓”吧？），伊斯蘭鬼魂飄入他們的噩夢中。盡管他們叫來祭司驅魔，在門楣貼上咒語和護符，惡魔的攻擊還是輕而易舉地讓他們無法輕松度日。他們通過佩戴戒指和護身符保護自己，但是低頭看地的時候仍然心生恐怖。他們不會挖這片地，滿園子的花都種在盆里，樹則種在水泥槽中。因為他們不愿意想象如果挖開地來種花草，會有什么樣的東西冒出來。父親們告訴自己的孩子不要撿任何石頭，因為可能有穆斯林用這塊石頭做過“istibra”——一種小便后清潔陰莖的儀式。這片土地是腐壞的。

分治難民帶到德里的“旁遮普文化”常常被諷刺為只關心金錢、財產和外在炫耀。這是旁遮普文化，也是一種“創傷后的”文化。事實上，這種文化和蘇菲派的觀點完全相反，后者在之前對于旁遮普的文化影響很大。蘇菲派認為，只有內在的精神生活才是真實的，而對其他的東西——權力、金錢、財產的態度應該是超脫的。一切都天翻地覆了。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就像受過創傷的患者，為了不再輕易受到相同的傷害，轉變成和原來相反的個性。過去的個性，所有的容忍和言語都是柔弱的，他們好像是說，這些只是讓我們受欺負。現在我們不會再在乎摸不到的東西，不會讓任何東西阻擋我們獲得更多。

德里的司機花很多時間凝視前面車子靜止的后車窗，凝視的角度能完美地觀察沉靜的天空：在那些車窗上，孤獨的云朵飄浮著，燕尾風箏打著轉兒。但也是在這些后車窗上，人們寫上各種文字，仿佛是為了與車海中的匿名性戰斗。有些內容很有風度，比如：“桑妮塔和拉凱什”。有些內容又長又挑釁：“你開這么快超過我就為了能多等一會兒紅燈？”男孩子喜歡看上去很壞：“我是你最可怕的噩夢”，或“我這么開就為了氣！死！你！”更聰明一點的車主會列出全球通吃的大牌：“杜克大學”或者“我的孩子在西北大學”。美國大學實際上會制作這樣的貼紙。很多情況下，進口車上的字關乎靈性方面居多：有時候是“基督愛你”，還有很多貼著賽巴巴（Sai Baba）大師的照片。刀表示的是錫克教的尚武勇氣。一次，我看見一輪新月和一柄彎刀——在一個很早以前（遠早于“9·11”事件）就確信了伊斯蘭內在好斗天性的地方，這樣自找麻煩讓我震驚，而且我意識到之前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東西。

然而，所有這些內容中最常見的是“羅摩”——一個單獨的詞語，有時候伴隨著一把滿上了鋒利箭頭的弓。

羅摩是守護神毗濕奴（Vishnu）的化身，他化作人形從惡魔拉瓦納（Ravana）手里拯救世界，后者從自己幾千年的冥想、克己和對身體的自律中，獲得了無邊的力量。最終，羅摩摧毀了拉瓦納，并被加冕為世界之王，凈化和統治了世界一萬一千年。羅摩打敗拉瓦納后回到阿約提亞（Ayodhya），每年的排燈節就是對此的紀念，這個節日可能是所有印度教主流節日中最重要和最受喜愛的節日，而他統治的那幾千年則是地球上的極樂時光，那時美德遍生大地，君主關心所有人的疾苦，所有人都享受著和平與公正。

在幾個世紀非印度教侵略者的統治下，這種關于印度力量和美德的想法顯然獲得了一層額外的意義。在羅摩身上，有一種印度教式的憂郁得到了體現——如果上一個千年不是那樣，這里的生活本可以是什么樣的？把羅摩的名字放在車后面，部分是為了抗議這一千年里的一切錯誤，包括今天腐敗和反應遲鈍的政府。受過創傷的地方夢想著出現可以扭轉歷史磨難的超凡英雄。

但也有可能，羅摩對德里司機的吸引不僅是因為力量和他身上關于復興印度教的幻想，而是他擁有一種更親和的吸引力。

關于羅摩廣為流傳的故事是這樣的：他是一個完美的人，是所有美德的化身，以至于懷孕的婦女會大聲朗讀關于他生平的史詩《羅摩衍那》（Ramayana），把他的完美教給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希望是男孩）。這種智慧讓人奇怪的地方是，初看上去，好像和我們實際知道的關于羅摩的故事很不相符，在我們知道的故事里，他似乎是個有很多缺點且很脆弱的人。

羅摩是一個偉大的勇士，也是國王第一任妻子的兒子，他是作為阿約提亞王位的繼承人長大的。然而，國王的第二任妻子從國王那里獲得了一個可以無條件兌現的請求，于是她要求讓羅摩流亡，從而讓她自己的兒子巴拉塔（Bharata）繼承王位。國王的承諾不能撤回，而羅摩也沒有提出異議，他和妻子悉多、弟弟拉希瑪納（Lakshmana）一起離開，在森林里挨過了多年痛苦而艱辛的生活。那期間，羅摩遇見了一個流浪的寡婦蘇里帕那卡（Surpanakha），她愛上了羅摩的美貌，拼命對他獻殷勤。但是羅摩告訴她自己已經和悉多結婚并拒絕了她，后來還和拉希瑪納一起取笑她丑陋的外貌。出于嫉妒，蘇里帕那卡攻擊了悉多，而拉希瑪納割掉了她的鼻子。

然而，蘇里帕那卡是大魔王拉瓦納的妹妹，魔王因為自己的妹妹被毀容而憤怒無比。他劫走悉多，把她帶到自己在楞伽（Lanka）的華麗宮殿。拉瓦納通過學識和對毀滅之神濕婆的奉獻獲得了力量，他向悉多承諾財富和奢華，想要引誘她，但是她拒絕了他的求愛。最終羅摩和拉希瑪納在猴神哈奴曼（Hanuman）的幫助下攻入楞伽，殺死拉瓦納并救出悉多。

但是羅摩深受折磨，他懷疑悉多被掠走后和拉瓦納之間可能發生了什么，所以拒絕帶她回去。悉多傷心落淚，她決定沖入火中以示清白。之后，她從火里現身，毫發無損。羅摩欣喜若狂，他帶著悉多回到阿約提亞，獲得了應得的王位。隨后，美德的新紀元就開始了。

然而阿約提亞的人民卻為羅摩樹立的榜樣而緊張：他們覺得如果這個王國的婦女看到國王歡迎曾和惡魔住在一起的妻子回來，她們會受到腐化。羅摩對自己的獨立判斷沒有信心，于是把悉多流放到叢林里，她在那里生下一對雙胞胎男孩兒，并被一位圣人收留。羅摩后來遇到了這位圣人，聽說了悉多和孩子們的事。他想起了和妻子在一起的過往，有所觸動，他讓妻子來找他，并再一次證明自己的貞潔。圣人發誓說她對他絕對忠誠，所有從天而降的神靈也說了同樣的話，但是羅摩依然要求更多保證。悉多說：“我真的從來沒有，連一個念頭都沒有想過除了羅摩以外的別的男人，愿大地之神向我張開她的雙臂！”話音剛落，大地就裂開了，她被裂縫吞噬了。顯然，悉多的死使羅摩徹底相信了她的純潔。現在他心中的愛洶涌噴薄，他祈禱她能回到自己身邊，但是已經太遲了。

毫無疑問，羅摩是一個擁有非凡行動力的人——他愿意放棄政治野心在森林中生活，展示出他對父親諾言的驚人遵守。但即使這樣，依然能感覺到羅摩少了些什么東西：他的服從不是偏執的嗎？他仿佛缺乏遠見，為了不迷失方向而正在尋找理由，甚至是一個負面的理由。他難道不像是一個沒有價值觀的人，并因此變得脆弱和無情，最后成為極端的規則遵守者？羅摩個性嚴肅，拋棄別人的時候相當冷酷。他的話很少，幾乎從不鼓舞或溫暖他人。他沉溺于自我否定中——他開始崩潰的時候不是在森林的逆境中，而恰恰是在一切都回到他身邊時——他的妻子、他的城市和他的寶座。雖然他會為了找回妻子而瘋狂地戰斗——因為他明白被打破的規則意味著冒犯，但當她回到家他卻討厭她，不是因為她的作為，而是因為別人對她的作為。被這樣的男人愛著是危險的：當你被奪走時，他也許會為你率軍作戰，但當你在他身邊時，他就會被懷疑和怨恨所困擾。不斷糾纏他的，是其他人可能不會有像他那樣否認自己的念頭以及他們可能享受奢侈樂趣的愿景。

有趣的是，幾乎看不到有人把克利希那神的名字貼在車子的后窗上，因為似乎在表面上，毗濕奴的第八個化身相比他的第七個化身擁有一個更有吸引力的理想自我。根據習俗，羅摩雖完美但仍有不足，克利希那卻是理論和神學上的完美——他是“完美化身”，體現人類完美的十六個屬性。羅摩只擁有十三個，缺少舉世無雙的風流浪漫、無可匹敵的音樂造詣、甜蜜感性的個人脾性。[[2]](#Jian_Pavan_K__Varma)和羅摩一樣，克利希那也是一名戰士、一個在智慧和道德方面非常嚴肅的人，但他還擁有羅摩所缺乏的幽默、口才和精神的廣度。他對自己的感性和欲望毫不羞澀——他對女人的愛是富有愛欲和強烈的，他了解愛慕遠方心上人時那種詩意的痛苦。像羅摩一樣，克利希那很美，但愛慕他的女人的結局不會是被割掉鼻子，而是被他用長笛吹奏的小夜曲縈繞并愛著。

不過，除了俘獲眾多追求者之外，他大量多愁善感的情緒和他在林中的長笛演奏，是他沒能成為我們這個野心勃勃的年代里令人滿意的吉祥物的原因嗎？或者，至少對男人來說是這樣？在克利希那主要節日的慶祝活動上，你會發現周圍都是婦女和兒童，他們注視著一個頑皮的嬰兒和一個演奏著長笛的敏感男人的形象。在羅摩的節日里，你會發現男人們是帶頭的，比如說為十勝節夜晚的拉瓦納肖像燃起火焰。我發現，如果德里這么多車窗后面都寫著“羅摩”，可能不僅僅是因為他是一個遙遠而難以企及的英雄，而是因為他是一個讓人感覺很親密的人，一個有令人感動的缺陷的人，同時間歇性爆發的暴力恰恰讓他成為令人心安而熟悉的榜樣。

殖民地國家常常用“萎而復勃”想象自己的解放。英國統治時期，被政府排除在外的印度自治運動者抱怨印度男性遭到了政治閹割和嬰兒化，并且渴望總有一天，他們的男性特征能夠再次完整。然而，在夢想治愈到來的那一刻，當印度人認為自己在政治上控制了自己的國家之時，實際上在這個國家的北方，他們已經被更邪惡和難忘的方式永遠地閹割了。有些人在分治的暴力中真實地被閹割了，更多人的男性權威感遭到了狠狠地嘲笑，因為他們的女人被強奸、被謀殺、被毀容，甚至被帶走。殖民主義令人痛苦的去勢已被證明是暫時的，但它終結于一場暴力屠殺，其中發生的真實和隱喻性的生殖器切斷則不可逆轉。正是這些傷口的記憶為我們看到的一切關于北印度男性的脆弱性提供了歷史深度，使他們的女人渴望孟買或其他更遙遠地方的男人更完整的情感結構。

對于許多北印度的家庭來說，尤其是對被綁架的婦女來說，這些不僅僅是神話故事。分治期間有成千上萬名婦女被抓走，她們的家人到了新邊界的另一邊，而她們被留下來和綁架者在一起。

如果說印度這個新國家如此關心從巴基斯坦接回被綁架的錫克教徒和印度教婦女的話，那是因為印度的男子氣概取決于此：正如神話所清楚表明的，對于男性的責任來說，沒有什么比救回被奪走的女人更重要的了。正如每件綁架都是對父親或丈夫的侮辱，綁架從整體上也被視為對國家權威的踐踏；對于這個新民族的氣概來說，必須把失去的婦女帶回家。印度國大黨于1947年11月宣布：

……在這些騷亂期間，任意一邊都有大量婦女被綁架，并且大規模地被強迫改變宗教。沒有一個文明開化的人能認可這種轉變，沒有什么比劫持婦女更令人發指。因此，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在有關政府的合作下，將婦女帶回原來的家園。[[3]](#Veena_Das)

隨后，經過雙方大規模的調查，數以千計的婦女被找到，并被送回其父母家中。然而，這一行動并沒有考慮到婦女自身的愿望，許多人并不想被送回去。畢竟很多年過去了，不少人已經過上新的生活。當國家派人來帶走她們的時候，她們經常說自己對新的宗教感到滿意，和新丈夫在一起也很開心，現在還有了孩子，不想再一次失去一切——但她們還是被強行帶走送到了邊界的另一邊。除此之外，許多婦女認為返回“家園”才是真正的恐怖。如社會工作者與被綁架的婦女互動后向政府報告的：

長官，我們這些與（解救）工作密切相關的社工接近婦女時遇到了很多問題。她們說：“你們來救我們；你說來帶我們回親戚那里。你們告訴我們，親戚們急切地等著我們回去。你們不了解我們的社會。那是個地獄。他們會殺了我們。所以，不要送我們回去。”[[4]](#Das)

這些婦女完全有理由擔心。在印度教家庭中，在人們講述的“分治”的恐怖故事里，“貞潔的”婦女跳入水井，不讓異教人羞辱她們——她們像悉多一樣，讓大地將她們吞噬，用死亡來表明自己的貞操。這就是史詩應該結束的方式。這故事在這些已經在惡魔宮殿里生活多年、之后又在自己的家庭中尋找安身之地的婦女之間，引起了巨大的驚恐。許多人已經接受了穆斯林男人的愛，但因為他們的性能力在印度教徒眼中有如夢魘，她們已經無法再被認可為合法的印度婦女。她們面臨著比死亡更糟的處境——她們活著，提醒著自己的父親、兄弟和丈夫作為男性的失敗，這實在讓人難以忍受。有些婦女仍然沒有回來，但更多的人被趕出家門，而有些人則確實遭到了謀殺。幾乎所有人都從記憶中被刪除了。從那時起，無數女性從家庭故事中消失了，孩子們長大的過程中，對阿姨和姐姐們的印象稍縱即逝，之后再也沒見過或者聽說過她們。

關于歷史閹割的意識并沒有從北印度社會消失。情況恰恰相反。搬到德里的人最先學習的規則之一是：不要在公共場合侮辱一個人，或提醒他的缺點，因為后果可能難以置信地嚴重。這座城市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人因此死去，就因為他們說別人開車開得不好或聲音太響，或對一個女性說下流話。正如《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2010年初回顧前一年的謀殺案時所評論的：

德里外圍的冉豪拉（Ranhola）村，一個男人謀殺了他的鄰居，因為他踢了他的狗。還有一個人因為在北部德里的公民路一個公廁插隊而被殺。德里南部的新朋友商業區（New Friends Colony），有一個男人因為拒絕另一個人用他的手機打電話而被殺。

德里警察局去年記錄在案的殺人案有五百二十三起，2008年有五百二十八起。其中，15%的都是出于“突然挑釁”，這是描述德里聲名狼藉的壞脾氣的法律措辭。還有17%是沖動殺人。只有16%的案件有明確的犯罪意圖。

“去年，我們遇見了一些至今為止見過的動機最奇怪的謀殺案。”警察局局長Y. S. 德瓦爾（Y.S. Dadwal）在1月2日的警察年會上說。

精神病醫生認為，缺乏適當的出口釋放憤怒以及關于管理憤怒情緒的基本信息的缺失是這些案件背后的原因。“很多事，從大男子主義到沖動是每個大都市文化中都有的，都是這些案件背后的原因。”AIIMS的高級精神醫師拉杰什·薩加博士（Dr Rajesh Sagar）說。

“城市里的人隨著城市改變。他們發現很難控制情緒。”拉雅·米特拉博士（Dr Rajat Mitra）說。他所在的非政府組織正在與德里警察局合作。[[5]](#_What_Makes_Delhiites_Kill)

這座首都越來越被一種具有高度侵略性的男性氣質所定義，而這種氣質似乎在1991年以后就失去了一切約束。你是什么人，可以對我指指點點？當一個男人扇別人耳光時，他會這么喊——因為在這個全球市場的時代中，對行為的所有限制都終結了，現在沒有人可以告訴你該做什么，尤其是一個陌生人。人們很喜歡用“奴隸”這個詞來描述已經過去的歷史：“我們已經做了太久奴隸了；現在沒人可以對我們發號施令。”在德里，正在崛起的“政客商人”完美地體現了這種新印度力量。這座城市成了一種新的、精神異常的男性氣質典范的舞臺，在其對陽性崇拜的關注中，這種氣質拋棄了所有社會的甚至是法律的約束。2000年前后，德里報紙中充斥著一類權勢家庭孩子的故事，他們似乎認為，社會地位的主要好處就是可以無限度地表現自己的男性權力。例如，1999年，一個名叫馬努·沙瑪（Manu Sharma）的國大黨議員之子開槍打死了名模杰西卡·拉爾（Jessica Lal），因為她在一個酒吧里的名流派對服務時拒絕給他一杯酒。沙瑪的父親靠著政治地位建立了一個價值幾十億美元的帝國，包括娛樂業、糖廠和農業。當時沙瑪和一群朋友在一起，其中包括另一位政客富翁的兒子維卡斯·亞達夫（Vikas Yadav）。這位富翁不斷成功地逃脫別人對他強盜行徑的起訴，這一定也是這些年輕人覺得自己可以胡作非為的大部分原因。拉爾告訴年輕人他們來得太晚了，酒吧關了。沙瑪要給她1000盧比，她表示還是一口酒都不能給。“我可以用1000盧比喝一口你。”沙瑪回應，并拿出一把槍威脅她。他朝空中開了一槍，然后朝她的頭開了一槍，接著和朋友們離開了酒吧。

餐廳里滿滿都是證人，而且沙瑪自己對著鏡頭也說他朝她開了槍：“即使1000塊錢也喝不了一口酒，這讓我很丟臉。”但在隨后的審判中，他被判謀殺罪不成立，主要是因為有三十二名證人撤回了他們最初的證詞。審判后來被重啟，部分原因是一家批評性報紙《熱門新聞報》（Tehelka）下了個套，拿到了馬努·沙瑪家人的證詞，包括他的政客父親脅迫和賄賂證人的證據，于是沙瑪被判處無期徒刑。

后來，輪到馬努的朋友維卡斯·亞達夫出現在新聞頭條里。2002年，維卡斯和他的弟弟維沙（Vishal），公然從一個婚禮上把妹妹二十四歲的男友帶走，他們把他帶進了一輛塔塔SUV并殺了他。他們不喜歡妹妹和這個人之間的關系，如我們所知，失去對家中女人的控制是最可能激起北印度男性憤怒的事情之一。

在聚會上看到尼蒂什（Nitish）的時候，維沙和我認定這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大好機會，過了這村就沒有這店了……我讓維沙把他帶出來。那時候是半夜。我們讓尼蒂什坐在我們塔塔Safari的前座。維沙和蘇克戴夫·波哈文（Sukhdev Pehalwan）坐在后排。我開車。我們凌晨1點30分左右到了巴爾文·拉伊梅塔巷，并停了車。我們讓尼蒂什換去后座，這時維沙和波哈文緊緊地抓住他。我再次開車，把車停在了布蘭德薩和庫里亞之間的某個地方。然后我用盡全力用一把錘子砸了尼蒂什的頭。他暈了過去，過不一會兒就死了。我們又開了一公里，然后把他的尸體扔在路上。維沙從尼蒂什的庫爾塔衫口袋里拿走了他的手機，他還拿走了尼蒂什的手表，把這些都藏在附近的灌木叢里。我把殺尼蒂什的錘子也藏在灌木叢里。然后，我們把車子油箱里的柴油倒在尼蒂什的尸體上，點了火。然后開車返回德里。[[6]](#_Confession_of_Vikas_Before_Cops)

維卡斯·亞達夫以前曾從謀殺案的定罪中逃脫過，但這一次，即使他的家人在這個領域有高超造詣也不夠幫他脫罪。兩兄弟最終被判處終身監禁（盡管上訴仍在進行中）。然而，在德里權力青年周圍發生的許多其他暴力死亡，不知何故突然從報紙上消失了，或者被私下解決了。

這座城市靈魂的核心是黑暗而致命的。然而，如同所有黑暗的東西，德里散發著強大的吸引力。它向人們承諾可怕的、禁絕的歡愉。表現出這座城市瘋狂和無常個性的，不僅僅是1947年到來的難民家庭，新的到來者也感受到了暗中的暴力，并迅速采納了這種方式。德里的影響力令人惡心，也令人暗暗覺得美味——你把自己交給它，直到和外人說話的時候，你才意識到自己已經變得那么腐敗。人們涌向這里，不是因為它擁有某種紐約風格的壯麗承諾：比如“如果我能在那里成功，我就能在任何地方成功”——盡管“成功”從財務意義上說當然非常關鍵；而是因為德里即使向最純凈的靈魂也輕聲承諾著暴力和惡魔般的樂趣。到我這里來，你們這些一直被欺侮的人，它說，我會告訴你們如何欺侮別人。

一天晚上，我去印度國際中心（India Internationl Centre）的花園里參加一個卡瓦里音樂會，印度國際中心是德里市中心一個著名的文化機構。傍晚的時候，一群巴基斯坦音樂家上臺了。遙遠的天空中，一群群長尾小鸚鵡尖聲鳴叫著，在太陽觸及地平線時重新找到方向感，排成一排穿過天空回家。最早出來的一些蝙蝠在樹林中振翅飛翔。

這天是工作日，觀眾都是下了班過來的。嘴唇緊閉的印度官僚穿著西裝，打著領帶，在成排的塑料椅子中間亂走、爭吵，并不關注音樂。

音樂家們不為周圍的混亂所動。音樂直接以一種充滿狂喜和渴望的非凡調子開場，歌聲越發高昂地沖向疲憊的天空，鼓點讓安靜的花園里充滿了跳舞和高舉雙手打節拍的人。領唱歌手是一個散發著世俗吸引力的男人，身材肥胖，有雙下巴。他的手指在空氣中輕盈地繪出音樂，他的聲音里充滿了所有種類的欲望，精神的、肉體的。他穿著一件領子周圍有刺繡的亮白色庫爾塔衫，戴著一條圍巾。他把圍巾甩來甩去，就像在甩著金色的鬃毛。

在第一個四十分鐘左右，觀眾中發生了驚人的事。男人們因為快樂而搖動起身體——但一開始他們覺得尷尬，每次做了一個完全張開手臂的動作后，他們都要快速環顧四周，害怕受到非議。但愉悅的精神蔓延開來，很快人人都被感動了——自我約束消失了，他們興高采烈地在椅子上跳起來，全心全意地鼓掌、搖擺和哭泣。某些東西從外面進入了他們——他們的身體正做著不熟悉的動作，他們正因來自別處的歌詞嗚咽。他們去舞臺上給錢！而印度教的婦女在這些外國人面前戴起了頭巾，還低下頭行了額手禮！伊斯蘭正在從這些人身上涌出來——這些人因為害怕自己的女兒可能嫁給穆斯林而夜不能寐。這些人甚至不是出生在把這種手勢當作見面禮節的年代，但他們也知道這種手勢。

看看觀眾中的男人。這些人缺乏想象力，每個星期二齋戒，他們相信自己品德高尚，因為他們拒絕享樂；這些人滿腹疑心，婆羅門種姓的憂慮使他們不能在外面吃飯，與陌生人混在一起，或在大街上走；這些盡職的人努力工作，但不太會說話。看看這些男人，他們如此受情況所迫，要將自己內在的女性氣質殺死，以至于面對女性時只能一直拒絕。現在，看看他們對舞臺上這個蘇菲教徒有著怎樣的渴望——哭泣著歌唱的美麗穆斯林，激情四溢。他是詩人和雄辯家，帶著普世的欲望，沒有犧牲自己的感覺，從來不認為狂喜和歌謠是一種娘娘腔。看看這些男人是如何把他帶進自己的內在，并試用他把自己填滿。他的手勢如何感染他們，他的激情如何照亮他們的臉龐。看看這個穆斯林如何在這些印度教徒心中升起了一團火，并使他們得以自由——看看他如何讓他們重新回到他們曾經的模樣。

注釋

[[1]](#_1_10)Urvashi Butalia,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Penguin, 1998), p. 3; 后文中的歷史性概括同樣參考自此書。

[[2]](#_2_10)見Pavan K. Varma, Krishna: The Playful Divine (Penguin India, 1995), pp. 61, 206 and note 19.

[[3]](#_3_9)Veena Das, Life and Words: Violence and the Descent into the Ordin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23.

[[4]](#_4_7)Das, Life and Words, p. 29.

[[5]](#_5_4)‘What Makes Delhiites Kill?’, Hindustan Times, 10 January 2010.

[[6]](#_6_4)‘Confession of Vikas Before Cops’, Times of India, 29 May 2008.

## 十一　旁遮普的商業帝國

一個有錢的珠寶商給自己買了輛蘭博基尼，價值3500萬盧比。然后他發現不可能在德里這么擠的路上開這輛車，希望把車降價賣掉。一個買家花2200萬盧比買下了這輛車，他是一名房地產商的兒子，二十七歲。這個年輕人正值新婚，他沒把買車的事告訴家里，而是把車藏起來晚上才開。有一天凌晨5點半，時速兩百公里的車子失去了控制，撞上了路邊的柵欄，年輕人當場死亡，一名騎自行車的路人重傷。

受傷的男人五十五歲，是一所學校的看門人，他每天早上騎一小時自行車去上班，因為他覺得這樣比坐公共汽車更健康。他已經在這所學校工作了二十年，因為要開門，他每天早上要在所有人來之前趕到學校。

出事那天早上，他受傷很嚴重，被立刻送到醫院。學校為緊急手術提供了資金支持，但接下來還需要進一步手術，以避免癱瘓。看門人的兒子說他不知道家里要怎么負擔治療，讓人害怕的是：手術可能要花15萬盧比。

幾年前，我在找新公寓的時候被帶到一個很美的地方，那里靠近德里的一座古城。房子的租金大大超過我的預算，但那個地方太完美了，我不知怎地就向房東交了押金支票。房東是一名旁遮普商人，八十歲了，仍然在經營自己創辦的企業，制造大型電子設備，產品銷往全世界。他很成功，在德里擁有很多房產。他的太太端出茶和甜點，慶祝我們達成交易。他給我講1947年的時候，作為年輕的海軍官員，他是如何從巴基斯坦逃出來，在德里做起生意，并把弟弟一個一個帶來這個城市，給他們找活干。

“現在我們互相之間不說話，”他說。“旁遮普家庭在逆境里瘋狂地互相扶持，但富有了之后，一切就支離破碎了。這就是為什么馬爾瓦爾人建成了最大的商業地產。他們把生意放在第一位。”

晚上躺在床上，我完全不相信自己白天的所作所為。我租不起這個地方。第二天早上，我給房東打電話，告訴他我很抱歉，但我不能租他的房子了。他說他也很遺憾，尤其是因為他拒絕了其他有意向的租客。他問我是否能補償他半個月的房租。我答應去他家給他送一張半個月房租的支票，他說到時候會把我前一天給他的押金支票退還給我。打完電話，我就把前一天的那張支票止付了。

一個小時以后他打電話給我。“違約金漲了。今天早上10點04分你止付了你的支票。”

我問他是怎么知道的。

“你認為我會不知道這些事？”

然后他繼續羅列我所有銀行賬戶的號碼和金額，這時候我才明白自己遇到了什么情況。

“你侮辱了我，”他說，“現在我要你給我一張兩個月房租的支票。”

那是很大一筆錢。我爭辯說這和他可能受到的損失不匹配。

“這和損失沒關系，這是因為侮辱。”

我說很抱歉讓他覺得受辱，但是能不能商量一個其他的補償方法。

“達斯古普塔先生，你會發現，在未通知另一方的情況下止付支票是違反印度法律的。當然，你要付我多少錢由你自己決定。我只告訴你，我每天早晨在德里高爾夫俱樂部打高爾夫，和我在一起的是這個國家最有權力的律師和法官。我能讓你沒法兒在這個城市生活工作。畢竟，你是個外國人。”

然后他補充說，

“我不是在威脅你。我只是讓你知道。”

我去尋求法律建議，律師建議我付給他他要求的金額。在這種情況下止付支票確實是被禁止的。“而且那樣的人能把你的生活毀掉。”

那天，房東給我打了大概十次電話。他因為受到輕視而發狂了，抓著這件事不肯放。他嚇我、哄我，還讓我要知道廉恥。

我帶著支票本到他家時，他突然就放松下來了，甚至可以說興高采烈。我把支票給他，他花了很長時間寫收據給我，這樣就可以教育我該怎么生活。

“要記得，有兩件事很重要。要愛國，這是我從海軍那里學到的，還有誠實，這是我從做生意里學到的。如果不誠實，什么也干不成。”

他把我原來給他的那張支票還給我。

“我會關注你的銀行戶頭。以后你在這座城市做的事沒有我不知道的。”

在德里，有些巨額財富是小心謹慎地建立在聲譽和人脈上的，這位房東的財富也是如此。維持這種事的一個方法就是聲譽一旦出了問題，哪怕是最輕微的問題，也馬上會被處理掉，并且受到懲罰，絕不容忍。

當代風尚里，有一種對穩定心境的贊賞，贊賞“無煩惱”、“自在自得”的心態。真正的力量被認為源自這樣的心靈。因此，一個人要變得更強，要做的事里就包括對自己心理上的平整，也就是所謂的心靈治療。

由此說來，有著曲折歷史和持續傷痛的德里應該是一個脆弱的地方。然而，在21世紀早期造訪過這里的人，都會對完全相反的狀況感到震驚——德里人個個雄心勃勃、自信滿滿。這是因為“撫平”創傷并不是唯一防止創傷使你無能的方法。你也可以利用它的能量來為一個完全不同、更加充滿活力的反應提供燃料。你可以成為一個戰士——既然所有歷史和整個世界都是一個戰場。

這就是很多人，尤其是商人在分治以后選擇看待自己的方式。而且完全放開的市場自由化更深化了對于好戰決心的需要。當西方世界的大多數商人把自己視作平民，和其他相似地方的商人一起進入全球化體系的時候，德里人把自己看作戰士。對于其他人，他們有時候似乎不講道德，也不講原則——不怎么在乎整個社會的規則，比如說，不怎么關心那些比他們處境更脆弱的人——那不是他們自己對于事物的概念。他們當然不關心平民所想，因為戰士這個職業要求他們高居平民之上。但就像所有的戰士一樣，他們的行動實際上基于一種強大的道德規范。他們的行動單位是家庭，若想讓它維持強大的武力，是需要智慧、正直和犧牲的。

這里的人們，正如我們所見，總是很堅忍不拔、獨立自主，對逆境隨時做好準備。分治沒有摧毀這種精神，只是確認了它的前提：一切都可能被帶走。財產和金錢消失了——財富的命運一貫如此，所以旁遮普人拿起武器反抗厄運，開始把一切再創造起來。分治之后，德里馬上多出了一百萬新公民，商業機會比比皆是。

企業家在剛剛獨立的印度并不起眼。國家的“好公民”是農民、士兵和工人，以及為國家服務的專業人員，比如教師、醫生、工程師和官員。但對于未來的全球經濟，也許正是那些永遠在規則以外工作的人（印度的創業斗士們）的活動才是意義最重大的。

我去見拉胡爾·卡普爾（Rahul Kapoor）的時候[[1]](#Wei_Bao_Hu_Yin_Si__Ci_Chu_You_Li)，他不在，去健身房了。但他的祖父在家，老爺子很高興能向別人炫耀一下他剛剛裝修好的浴室。浴室一直擴建到花園，所以現在三面都有陽光，而且房間很長。他用指節敲著墻壁原來的部分。“看到了嗎？意大利大理石。”然后他走到擴建的地方又敲了敲，聲音是空心的。“這個新建的部分只是石膏板，漆成像意大利大理石的樣子。你能看出區別嗎？”

他笑得開心極了。

“來我書房瞧瞧吧。”他說。

他大約八十歲，體格驚人地結實，步伐矯健。他把我帶到一個灑滿陽光的小房間，讓我坐下。他自己也坐了下來，坐進一張皮革扶手椅里，戴上眼鏡，開始按手機按鈕。我環顧四周，看到一些銀質鏡框，里面的照片上是他已經成年了的孫輩們——所有的人，無論男女，都一副魅力十足的樣子。房間中央有一張樣式奇特的桌子，桌子的一條腿是一本巨大的石頭書。一面墻上掛著一張大尺寸油畫，畫上是幾個農村婦女，另一面墻上有一尊象頭神迦尼薩（Ganesh）的塑像。我們的頭頂上是一盞裝飾著玻璃玫瑰的水晶燈。

“喂？親愛的，”他對電話里說道，“我在和一位非常好的先生聊天，他來找拉胡爾。你知道他什么時候回來嗎？他沒帶手機。是嗎？太好了。謝謝你，親愛的，待會兒見。很快見。”

他轉向我。

“他隨時會回來。現在給你來點兒茶或者咖啡好嗎？”

他按了一個按鈕，出現了一個侍者，他非常仔細地把我點的說了一遍。

“你一定要見見我太太。她是德里最美的女性之一。我追了她很多年，因為我長得并不帥。甚至到現在她都是非常美的。”

于是我開始思考，就像我以前就想過的那樣，這代男性——在印巴分治以前就成年的男性，似乎比他們的兒子和孫輩更能夠充分地去愛一個女人。

“她也是最棒的女主人。當我和別人討論事情的時候，她會送來五十盤不一樣的點心。最棒的是，她還會給司機也送去。我們裝修這棟房子的時候，她總是確保工人們有飯吃，有冰鎮飲料喝。”

卡普爾先生全心愛著他太太，也全心愛著所有事。事實上，他很開心能活著。

他給我介紹照片上的年輕人：有些在倫敦，有些在加利福尼亞，有些在德里的家族企業里工作。

“我的孫輩們仍然想和我一起度假，”他笑著說，“這讓我很自豪。愛是最重要的事。無論我工作多努力，晚上我總是花時間和孩子們在一起。”

我問他想把什么東西傳給孫輩。

“我教他們什么是美德,如何對待別人。我認識這里最有錢的人,但我會照顧每個人。而且有一件事是我自豪的，就是走進來向我求助的人，沒有一個會失望地離開。這些福氣會給你回報的。”

茶送來了，托盤里還有餅干和一個盛著糖的碗。我問卡普爾先生他老家是什么地方的。

“分治之前我們住在錫亞爾科特（Sialkot），”他說，“我們在那里生活得很好。1947年逃跑的時候，我們只帶了一身換洗衣服，大家跳進車，然后就來到了德里。”

1947年，卡普爾二十歲出頭。他告訴我自己是如何在新家重振家族已經失去的醫療器械生意。一切發生得很快，速度讓人驚異。很清楚的一點是，即使他所在的階層中，許多人在1947年失去了自己的有形資產，他們的社會關系網卻幾乎完整無缺地跟隨他們遷徙，并且他們仍然能夠像以往那樣，在關系網中獲得同樣的幫助和引薦。在對向德里擴展的新住房供給的設想中，之前的等級、種姓、民族和職業劃分實際上保留了下來，同時能輕易地重新培育起社會關系網。在一個新的首都城市，新的人口族群需要各種商品。對于那些有良好關系網和創業動力的人來說，幾乎在找到住房前就發現自己的生意已經一派繁榮。到20世紀50年代早期，卡普爾先生就已經在北印度建立了壟斷企業，在致富的路上一帆風順了。

“坦白說，我做的事沒什么特別難的，”他說，“我就是工作非常努力，一路學習。你得喜歡自己做的事，要不然，你就應該去做別的。”

到20世紀60年代，卡普爾先生賺足了錢。他建了一座大酒店，隨后又做了多項房地產投資。分治難民失去了所有資產，不動產對他們來說有著磁石一般的吸引力，帶給他們安慰，于是他們竭盡全力去獲取不動產，越多越好。長遠看來，這給他們帶來的好處遠遠大于他們的想象——隨著最近房地產價格的上漲，他們發現自己的財富數量變得驚人。卡普爾在德里最好的街區有房產，在城外還有一棟“農舍”，這種類型的房產目前價值確定在5000萬到1億美元之間。過去的數年內，正是這輪房地產行情使這座城市的有產階級變得極度自信。現在這些人發現，他們在全球范圍里都算是富有的，而且還不用做什么事。因為自己的“非工資收入”讓他們和這座城市里的其他人區別開來——如果德里的高級餐廳在工作日的下午奇怪地坐滿了正值勞動年齡、無憂無慮的男男女女，那就是因為他們的“非工資收入”太多了。

我聽到走廊里傳來拉胡爾的聲音，然后就看到他沖進了房間。

“對不起，”他說，“我遲到了。”

“別擔心，”他爺爺心平氣和他說，“我們聊得正高興。”

拉胡爾剛從健身房回來，滿身是汗。今天天氣不錯，他想坐在外面。我拿起自己的茶杯跟他出去。

“放著吧，”他說，“我讓人幫你拿出來。”

我們走出去坐在陽臺上，陽臺下面是一個圍起來的花園，花園四周都是參天大樹。一個巨大空曠的會客室，全部以米白色皮革和大理石裝飾著，朝著陽臺敞開。

“你覺得我爺爺怎么樣？”拉胡爾問。

我說了點好話。

“那家伙很有種，”他由衷地說，“他一手打造了我們擁有的一切。他們那代人用整個生命創造這些東西，累積成了不起的故事。年輕人只是揮霍，做的事算不上什么。”

拉胡爾二十五歲，身材纖瘦，為人熱情。他穿著健身的運動服，外表考究時髦。我們的飲料放在托盤上送來了，他吸著鮮檸檬蘇打水。

“那代人很強。我爺爺快九十了，但和他喝威士忌的時候，都是我先不行。”

附近有一幢房子在施工，拉胡爾受電鉆噪音干擾很大（甚至都有點過分了）。他等電鉆停了才開始講他的故事，讓人感覺他是一個有些挑剔的人。

“我們家來自錫亞爾科特，現在屬于巴基斯坦。英殖民時期的錫亞爾科特是制造手術器械的中心，我們家控制著這個行業。1947年我們家族離開錫亞爾科特，分散到印度各地，然后重新白手起家。

“我的外祖父也是個傳奇人物。他去了印度南部，因為知道那里不會有什么競爭。最開始，他騎著車在各個醫院周圍賣產品，產品就裝在一個大箱子里。現在，他的公司是印度南部最大的醫藥器械供應商。對一個旁遮普人來說，去印度南部是很精明的一步，那里的人不擅長做生意。他們是學者型的，不是很強硬。如果有醫院招標，外祖父和他的兄弟們就會擋在收標書的房間外面，有競爭對手想要來遞標書，就會被打。他的對手們對此束手無策。但是有一次，他們聚到一起，伏擊了外祖父，打了他一頓作為報復。

“他是一個出色的人，是個大慈善家，在馬德拉斯（Madras）建了好幾所最好的學校。但他有一個缺點——他跟穆斯林有仇。在分治過境的過程中，他的兒子被穆斯林殺害了。之后他試了很多次，想再要一個兒子，但只是成功地生了五個女兒。所以一直到去世，他都痛恨穆斯林。只要提起穆斯林，他就會勃然大怒。對旁遮普人來說，必須要有一個繼承人來繼承你的產業。他去世之后，生意就停掉了。他的女兒們都是被寵壞的富家女孩兒，什么也不想干。而且男人涉足妻子家里的生意也不好，這樣就好像他們自己的生意失敗了一樣。”

和德里大多數商業精英一樣，拉胡爾的家族來自旁遮普的卡特里（khatri）子種姓，這個種姓中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數量相當。卡特里很可能是從事貿易的種姓里地位較低的成員，但他們喜歡號稱自己來自更高貴的血統，說“卡特里”一詞源于“剎帝利”（kshatriya）——高級戰士種姓的名字。他們說自己在數千年穆斯林統治期間受到了壓迫，過程富有英雄色彩，但他們的精神從未被征服。通過獲得的財富和教育，他們從莫臥兒軍政府中崛起，開始擔任重要職位。他們說，是沙文主義的皇帝奧朗則布（Aurangzeb）把他們從官僚體系中趕了出去，強迫他們開店營商。然而，即使是扮演商人角色，他們也保留著自己尚武的身份特征。

拉胡爾回憶外祖父的方式正是這種身份特征在今天運作的典型方式。由于家族因財富和舒適的生活變得松懈下來，許多年輕的旁遮普邦企業家對這種變化方式感到失意沮喪，他們一再講述祖父母的故事——從一貧如洗到千金復來。為了保留尚武品格，他們將這種歷史的痛苦和其祖父母應對這種痛苦的好斗勁頭抓住不放。

然而，如拉胡爾的故事所表明，并不是每個人都為旁遮普商人建立其商業帝國所用的策略感到高興。這些策略的受害者也把其看作是好戰的，而且不是那種好的好戰。印度的許多地區都對旁遮普人企圖壟斷商業的兇殘意圖感到憤怒，西部和南部的本土主義運動就是專門為保護當地經濟免受北方商人的沖擊而發起的。

“直到最近我才意識到我們是富人。我們家的價值觀是非常中產階級的價值觀。祖父經常讓我們不要忘記關燈。我母親如果看到我們浪費食物，會非常生氣。他們在金錢上非常保守，所有錢都存了定期，然后就把錢放在那里。他們從來不貸款，也不花什么錢。

“我小時候到家里的工廠去，會有上千個人排好隊來看我們，所以我覺得自己像個王子。但是一直到上大學我才意識到我們很富有。當時我成了家族企業的股東，看了資產負債表，看到父親的收入和我們擁有的所有，這個時候我才明白。

“但現在，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已經完全停產了。父親停掉了生產線，我們現在只賣別人的產品：德國貨、美國貨和中國貨。祖父還保留了一家聽診器廠，因為他喜歡，雖然說這家廠在虧錢。盡管他年紀大了，并不需要每天去廠里，他還是每天都去，因為他對制造東西很有熱情。我從來沒在父親那一輩人身上見過這種‘激情’。他們快樂但沒有野心。他們開派對，讓孩子和家世好的人結婚——他們所有人都很快樂，太快樂了。每個人都有個大公司，賣的東西別家都比不過，也不需要營銷。我有個阿姨是尼康相機在印度的獨家代理，錢就這么潮水一樣源源不斷地進來。”

拉胡爾曾在美國一所常春藤名校念書，他覺得美國很多地方都比這里更讓他自在，有段時間還考慮要不要回去。但他的父親希望他負責公司的一大塊業務，最后他決定投入一試。

“當然我也想過是否應該做別的事。有時候，管理這家公司讓我覺得我要死了。但是每種生活都有妥協。而且我想，有多少人能有這樣的機會？我本可以在美國找個工作，現在或許就是一個分析員，在努力幫一家超市節約1%的成本。那樣，我就只是一架機器上的一個零件。但是我希望成為那架機器。或者說我想控制那架機器。

“我大學時代的朋友大部分都傾向于搞藝術。到我三十歲的時候，我已經做的事會比他們多得多。生意、金錢——都只是達成結果的手段。我希望留下點什么。這就是我想說的。我不想死的時候什么都沒留下。”

我們談商業戰略。他正在對公司進行全面改革，拓展業務范圍和下游。現在，他正要開連鎖醫院，用的是家族幾十年前取得的土地。最終，這項連鎖業務將成為跨國企業。在那之后，他希望投資藥物研發，也許會收購一家外國醫療器械制造商，這樣公司就可以生產自己的產品，而不是只賣別人的。他甚至當場就開始預測新的投資。

“也許這樣做并不正確，但我現在的想法就是這樣。我經常超越自己。除非你用最先進的方式來做事，否則就沒必要做。”

他說話的時候一直在抖腿——讓人感覺他內心充滿了緊張，部分原因是他這么做即使在家族里也是冒著巨大風險的。

“在旁遮普商人家族里，要改變生意的方向非常難，因為家族想規避風險。你就老老實實做自己知道的事，做融在你血液里的事。以前業務這塊，我可以向三十個人去尋求建議，但是這些新的投資，我得從零做起。但這就是我和他們多數人不一樣的地方。他們中的大部分永遠不會有任何重大成就，因為個人得失對他們來說意味太多。他們并不愿意長遠考慮。當然印度商人必須要繼續自己的商業傳統，而且毫無疑問，十個商人里有三到四個肯定會比他們的美國同行或者歐洲同行走得更遠，這是我們的家族和社會結構的關系。但如果他們要做真正偉大的事，那就必須打破陳規。”

為了這些，拉胡爾再次大大背離傳統的家族倫理，向外尋求金融支持。這方面，他是新一代的典型，經歷了市場自由化的這代人對于金錢的觀念已經深刻改變。以前，金錢——“dhan”，或財富，是靜態的，其象征是黃金，需要被鎖起來保存。金錢不是用來賭博、揮霍或是投資不確定計劃的。金錢不會增長，卻很容易縮水，所以每一筆花費，無論多小，都是潛在的損失。不管是掙1盧比還是100萬盧比，旁遮普人的熱情是一樣的，因為別人的利潤就是他們自己的損失。但到了市場經濟時代，金錢不再是有形和靜態的，而是變得抽象和動態。把錢拿出來不再自動指向損失，實際上，不這么做反而會在不斷擴張的金錢世界里吃虧。一夜之間，錢生出更多錢，這也是北印度更年輕的一代人突然對買東西不再焦慮的原因之一。來錢的地方總會生出更多錢。

“最終，我會拆分這些公司，并且像一個風險投資者一樣運營，根據需要為公司注資。最后，我會讓一些公司上市。牢牢掌握一個集團公司確實不錯，但我寧愿擁有1000億盧比的40%，而不是50億盧比的100%。

“跟你說，這件事并不容易。我剛剛從倫敦的財務會議上回來。我沒有什么經驗，要從那些五十幾歲的家伙手里拿到投資是很有挑戰性的。為了這個項目我頭發都白了，這項目簡直催人老。”

“你看著像個孩子。”

“我看上去多大？”

“大概二十一。”

“哦，謝謝你！我覺得自己看上去有五十歲。我覺得自己已經五十歲了。今天早上照鏡子的時候，我覺得自己開始禿頂了。”

拉胡爾仿佛覺得自己和家族企業做了一場浮士德式的交易，這場交易將吸盡他所有的青春和精力，判決他照鏡子的時候一輩子帶著恐懼。然后他飛快地說了一段話，仿佛直接來自這部哥特歌劇的臺詞，他的意思是，這場交易將為他帶來巨大的生產力提升：

“當我去到那里，看到一個個巨大的土堆，看到他們在巨大的挖掘現場建造新醫院，我興奮地發抖。如果我能做成這件事，滿足感會是無與倫比的。”

那些巨大的泥土堆、挖掘場——都是雜志上經常使用的圖片，用來講述殘酷無情的資本的恐怖。資本不斷拆毀現有的東西，是為了積聚新的——更多、更大、更遠、更快的東西。但拉胡爾望著這片被鑿開的土地，覺得自己完滿了、擴展了、成長了。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好像在溺水。我在下沉，就快要被淹死了。但有時候，我的感覺是，哇哦。”

我問他為什么要過這樣危險的生活，他變得郁郁寡歡起來，開始談家族企業的歷史。公司被分給了他父親那代的好幾個男性，他認為分家的方式不公正。

“我本來應該管理一個更大的集團，想到這件事就讓我如鯁在喉。所以我的一部分動機來自想要補償以往的損失。我們損失了很重要的幾塊（業務），這讓我們損失慘重。”

“同性戀的身份大概也影響了你的觀點吧？”

“噢，那是另一個讓我希望比其他人更出色的動機。我的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出色。我知道這聽上去很自負。部分原因是我必須表現優秀，以此來挑戰所有的成見，然后他們就永遠不能說‘他不是一個真正的男人’。我不是那種身材魁梧的旁遮普人，所以我得證明自己。”

實際上，拉胡爾擁有所有旁遮普商人的典型品質——輕視歷史、面對現今世界掙扎逆反以及無窮盡的追趕心理。這些使得他精神緊張、缺乏耐心、雄心勃勃。

“你剛才說想留下些什么，是指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建一所學校，讓一百個孩子受教育。你也可以捐款給慈善機構。這些可能都是好事，但不能算作留下的東西。從更廣的角度看，這些事都太小了，完全無關緊要。你看見洛克菲勒家族做的事情了嗎？那才算留下了東西。美國的每個大學和學院都有洛克菲勒家族捐贈的東西。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那個國家的每個人都受到他們家族作為的影響。那才算是留下了東西。

“看看我們身邊的商人。這兒的（商人）。他們造些面目可憎的房子，自己的小孩都胖得要命，能一口氣吃到死。還有無盡的財產糾紛。然后怎么樣？然后怎么樣呢？他們對生活的愿景是什么？你賺錢，然后死了。你只是積累了一大筆財富，然后你繼續不停賺錢，永遠不做其他的事。然后怎么樣？我是說我需要多少錢？我在紐約有了公寓，坐飛機到任何地方都是頭等艙，之后我真的還要多少錢？我要用我的錢改變這個世界，這就是我要賺那么多錢的原因。”

“所以你是為了幫助那些不如你富有的人而做事？”

“我不會這么說。我的意思是，我確實曾經在宣揚自由主義的美國大學念書，那是我心底里的自己。但我管理公司的時候，是典型的邪惡資本家。我就像《艱難時世》（Hard Times）里面的人物。我使喚別人，讓他們擦亮我的鞋子，確保傭人們不會忘乎所以。”

實際上，來拉胡爾家之前，我剛剛去了一個工地宿舍。這是為來德里建設英聯邦運動會基礎設施的工人而造的數個工地宿舍之一。我還沒從剛剛的經歷里緩過來，忍不住用我所見到的景象回應拉胡爾的話。那個地方太擁擠了，擁擠到讓人覺得可悲。工人們和家人睡在沒有窗戶的瓦楞鐵皮棚屋里，約三千個人，但大概只有十個廁所。季風季節下雨的時候，整個地方都泡在水里——有游蕩的孩子掉進地上看不見的洞里，淹死了；蚊蟲大量滋生，在整個營地傳播瘧疾。我整個下午都在和那些病得無法工作的人聊天。他們生病時拿不到工資，也不能看醫生。他們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回到遙遠的家鄉。

“那里并不一定只能那么差，”我說，“是設計的問題，硬生生弄得那么差，絕對會讓人覺得這種設計是故意虐待人。”

“如果我看到那個場景肯定會有同感。”拉胡爾說。他停頓了一下，思考著自己的感覺，又加了一句，“但如果我看見那些人，同時肯定也會有看不起他們的感覺。”

拉胡爾的祖父走出來到了車道上，朝我們高興地揮揮手，然后鉆進了一輛奔馳車的后座。車子發動了，保安打開大門，車開走了。拉胡爾和我看著他離開。

“他真是個不同尋常的非凡人物。”我說。

“沒錯，”拉胡爾說，“他是我最敬仰的人。但別以為他一直是這樣的，過去管事的時候，他就是個混蛋，像個暴君一樣統治著這個家。”

與人情味更少的公司相比，家族企業有好幾項明顯的優勢，這些優勢尤其來自他們尚武的家族文化，這樣的文化培養出的不是員工而是信徒——他們的動機不僅僅是賺錢，還要贏得榮耀。家庭成員會接受公司員工不會接受的專制。兒子們一夜之間被派去世界的另一頭，一去就是好幾年。妻子們管理著富豪商人的大量社會和家庭責任，這樣他們自己就不需要操心了。這是一種充滿活力的結構，用遠比普通公司更原始的方法剝削自己的人力資源。通常，公司完全由家族自己擁有，沒有其他人妨礙商業戰略，重大決策可能在晚飯桌上就決定了。

所以家族確實需要“經營”。養育孩子是極其重要的商業技能。父親的權威是必要的，但當整個家族的產業要依靠兒子從父親那里接手，就不能隨便使用這種權威。父親們知道，如果兒子只看到權威和專制而不知道其他，那么他們要么會逃跑，要么就會變成傻瓜。他們精心謀劃，仿佛為自己的青少年兒女設計了一場優雅的共舞，允許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擁有大量自由，甚至當這些年輕人最終回來加入家族企業的時候，還讓他們覺得這是出于自由意志的選擇。母親們常常擁有非凡的個性，利用龐大的資源驚人地管理著人與人之間復雜而不斷變動的關系，并確保家庭結構盡管缺乏靈活性，卻有豐富的靈性意義和騎士般的精神。

所有這一切的好處之一是，即使在市場自由化后的白熱經濟環境下，商業家族的目標仍然具有很大的連續性。他們不必應對同一時期更自由的“中產階級”家庭遭受的存在危機。對那些家庭來說，突然之間，一切都改變了。在從商的家庭中，兒子的工作和父親的一樣，同時婚姻也是令人放心的父權制的，所以他們才有可能在印度社會的其余部分迷失蹣跚時冷靜旁觀，并從混亂中獲利。如我們所見，北印度的商業家族一直認為自己處于戰爭中，看到災難和毀滅反而使他們的精神復甦。21世紀早期的動蕩使得這些家庭更具前瞻性的思考大大增加了其經濟影響力。他們明白，無盡的積累需要的是不斷生產新的東西，而這只有在反復的破壞中才會實現，很多中產階級不明白這點。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所說的，他于1862年在倫敦看到“那表面上的混亂實際上是最高程度的資產階級秩序”。[[2]](#Yin_Zi_Marshall_Berman)商業家族是一種精心設計的結構，能鎮定地通過無序的暴風雨，并從中獲利。

但其中的風險也很高。關于完美戰士的傳奇如此激動人心的一個原因是，他或她，是一種極端罕見的存在。騎士們遠不完美，他們脆弱，還經常因為難以理解的沖動偏離自己的使命。

父親們短暫地贊助孩子攝影或音樂愛好，給他們買最貴的相機或架子鼓，給他們交女朋友的自由，允許他們連續幾個月在外面旅游。而那些年輕人們縱情享樂，因為他們知道這些樂趣終會有結束的一天。當結婚和回到家族企業的時間一到，他們會順從地執行，因為他們的生活從來就不是關于“個人滿足”，或是任何這種平民階級的蠢話——戰士精神建諸犧牲之上，他們一直都知道自己最終會獻身于自己的使命。離開自己愛的女朋友和生活方式是痛苦的，但恰恰是這種痛苦讓他們的戰斗更有決心。他們投入工作，懷著一股不前進毋寧死的熱情。

然而，事情并不總是這樣順利。很多事情都可能出錯。如果說父親過于關注自己兒子的性格和生活選擇，那是因為戰士精神的代際傳承是非常困難的。有時，那些年輕人所有的夢想都被酒精和其他上癮物取代了。他們毆打被塞給自己的妻子，而妻子則沉溺于一種把生孩子當成自己主要意義的生活中。

在某些例子中，情況甚至會變得致命。我聽說有個企業家沒有繼承人，因此從一個有好幾個兒子的兄弟那里收養了一個兒子。男孩子現在已經十幾歲了，擅長運動，對商業沒有興趣。他的親生父母認為，如果不見他，他會在新環境里更好地適應。而他的新父母開始培養他去接管一攤子規模巨大的業務。他們給他娶了另一個有錢商人家的女孩。他告訴家人他不快樂，但他們沒有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他知道自己對有些事無能為力，最終這種負擔變得太大，讓他無法承受，于是他自殺了。

商業家庭在21世紀初經歷了權力的巨大擴張，這也使得權力轉移給年輕一代的時候更加讓人擔心。這些年輕人的力量更強大，更不穩定，德里充滿了大量落敗而風流的武士。

希姆蘭（Simran）說：“我確實發現我丈夫喝很多酒。每個人時不時都會喝多一點，那沒關系，但他喝得太多了，開始影響到我們的生活。他家是一個旁遮普家族，家里分了一部分生意讓他管，而他應付不了。他喝很多酒，從來沒有酒后暴力，他就只是醉倒了。因為宿醉，他從來不去上班。家里人追著我打電話，問我‘他在哪兒？為什么不接電話？’我總是撒謊說‘他身體不舒服，他胃疼，他在床上躺著’。我應付不了這些。

“我沒有馬上要孩子，因為不太肯定是不是希望自己的婚姻里有孩子。因為我丈夫是酒鬼。但我愛他。

“家里人試著想辦法讓普萊尚特（Prashant）心情好點，這樣他就會停止喝酒，做自己該做的事。他們去找我公公，說他現在已經結婚了，很安定，還負責部分生意，應該給他一些家族企業的股份，這樣他會更負責任。于是我公公第一次給了他一批股份作為禮物。你知道拿到股份的第一件事他做了什么？買了一臺蘭博基尼蝙蝠（Murciélago）跑車。這樣很好，他也覺得自己很重要，而且很開心。但我只是一直有種感覺，覺得有些事情不對勁。

“普萊尚特酗酒的情況沒有改善，最后因為這個被家族企業趕了出去。他做了些很蠢的事。于是他離開公司，不知道要做什么。公婆家還把我們從他們的房子里也趕了出去，我們搬到一套租來的公寓里。他沒事可做，就是喝酒睡覺。我們的生活開始崩潰。

“后來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我突然陷入昏迷，要動腦部手術，并且兩年內不能要孩子。這件事以后，他很受震動，決定要洗心革面。他去了英國的戒酒所。

“他回來的時候，我的治療也結束了，醫生告訴我們可以要孩子了，他也完全把酒戒了。那樣很棒，也是在那時候我們決定開始組建一個真正的家庭。然后我兒子出生了，普萊尚特是個很好的父親，他的生意也開始順風順水，做出了在任何人想象中都是最棒的產品。我很為他驕傲。

“但我和他之間又開始出現問題。他漸漸對生意沒了興趣，每天很晚才去上班，這讓我很生氣。因為他會一覺睡到中午，房間都沒辦法打掃。到他起床的時候，他的早飯已經被清走了，因為已經是午飯時間了，還有……但我試著應對。有時候，我對他說：‘普萊尚特，你想要公司的股份，希望父親尊重你，你的行為就要負責任。你不能飯來張口，沒有東西會自己送上門來的。每天去上班吧，這不難，對嗎？你一直在網上，在Skype上和隨便認識的陌生女人聊天，或者看電影看到凌晨4點，那你肯定白天一整天要睡覺。所以，從現在開始，負起責任來，你的孩子們需要這些——紀律和有規律的生活。’

“我們還在錢方面起了很多沖突。普萊尚特小時候是被儉樸地養大的。我的意思是，他擁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旅行、教育等，但不知道為什么，他總有一種匱乏感。這就是為什么之前他會這么荒唐地去買蘭博基尼。我常對他說，‘錢不是從樹上長的’或者‘錢買不來愛’，他就會爆發。他覺得我在管他。我們走到哪兒，他都會‘哦，這個表好漂亮，我們買吧！’我會說，‘哦天哪，這個表的價格都能買一棟房子了！你到底哪里不對勁？’于是他很生氣，我就說，‘我考慮幾天好嗎？’這是在花6萬美元買一塊表之前！他會因為這個恨我。我穿著很自然，不穿戴那些超級華麗的東西，大家還是很喜歡我，但他恨我這一點。他所有的朋友都真的很喜歡我，他父母也是。他對這點很恐懼，因為在他自己的整個生活里，他從來不覺得自己是被別人接受的，這就是他要這樣招搖的原因。他看見我穿著普通的衣服，打扮就是自己原本的樣子，這就像一個傷口一樣會激怒他。他說我穿得像個乞丐，不能穿成那樣坐在他的蘭博基尼里。我有一塊寶璣和一塊勞力士，但我就戴一個大大的斯沃琪，我喜歡它的大表盤。我是個斯沃琪女孩兒，就像我這條圍巾，只要400盧比。

“所以我已經對他很生氣了，而且我會表現出來。那時候我剛生完孩子，很胖，這點讓他受不了。之后，我們之間又因為一個祭司出了問題。當時我兄弟的工廠著火燒掉了，他的工廠制造的是出口金屬手工藝品。所以有朋友介紹了這位祭司給我兄弟，說肯定是我們家布局有問題。你知道‘風水’[[3]](#Yuan_Wen_Wei_vastu_Shi_Yi_Zhong)吧，就是房子和家居的朝向會影響好運或噩運什么的。所以我想，既然我們的生活也不順利，為什么不讓這個祭司也來我們家看看風水呢？于是我就讓他進入了我們的生活。他很高興能結識我們這樣的大家族，隨后他逐漸發現，我們這對‘外表光鮮而且腦袋不知道是不是從屁股里長出來的’夫婦很有錢，所以就想利用我們。他開始做的事情讓我真的很氣憤。”

希姆蘭的茶里飛進了一只蒼蠅，她有點分心。她叫服務生再給她拿一杯茶來。

“我剛說到哪兒了？”她問。“對不起，我記性有點問題。我一共做了十個半小時腦部手術，說話說到一半總會忘記。”

“你在說那個祭司。”

“對。后來，我發現這個風水先生，這個每個人都說他好的祭司，實際上在用很多黑巫術。我和普萊尚特之間越來越差，他決定要離開我。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我和他對峙，事情更糟了，他走掉了。祭司問我怎么了，我說，‘你知道怎么了，普萊尚特和那個捷克女人在一起，現在他搬去和她住了。你應該知道，你們兩個每天都說話的。’于是他讓我去做一件荒唐的事，我覺得這完全是錯的。他讓我用黑巫術。他說，‘如果你做了，這女人就會從你生活里消失。’他說會做一個金屬的東西，上面有她名字，我每天要往上面澆沸水。聽上去就很嚇人，對吧！我說，‘我做不了那種事。我是個單純的人。讓她活著吧！讓她活著和我丈夫在一起，花光他的錢。我無所謂。我不想殺掉任何人。我丈夫已經把自己搞得一團糟，我不會阻止他。如果他什么時候想明白回頭了，我再決定要不要和他在一起。眼下我有自己的職責——保持清醒，花時間和孩子們在一起，把孩子養大成人，讓他們成為負責任、有擔當的好公民——這就是我關注的，他做什么都沒關系。’所以我沒有用黑巫術。

“普萊尚特之前已經有一段時間行事古怪。他不再把自己去海外旅行的行程報告給家里。之前他們全家人都會為旅行做一個行程留在家里，上面有備用電話號碼還有所有其他交代事項。普萊尚特就不這么做。所以我公公問我他在哪兒的時候，我會說‘上次我聽說他在法蘭克福’。我公公說，‘你們不是每天打電話嗎？’我說，‘他從來不接電話。’我公公開始明白過來。我把自己知道的告訴他，他說，‘有些事情不太對，因為普萊尚特剛剛從銀行取了很大一筆錢，本來準備要帶走。我不得不從我們的一個助理那里沒收了一箱子錢。他本來是要拿去給普萊尚特。這樣是不行的，會有各種各樣的人去追他，包括稅務人員。’

“于是我公公沒收了他所有的錢，兩人大吵了一架。我公公說，‘我不會把這些錢還給你的。’因為他能看出來普萊尚特在做錯的事。普萊尚特直接上飛機走了，到現在也沒回來。他迷失了自己，這是肯定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過比現在更高端的生活，還是他最終想要棄絕一切。不對，我覺得他只是想把自己的錢要回來，這就是他想要的一切。

“我公公知道發生的事情后，非常生氣。他照顧我和孩子們，每個月給我生活費，還幫助我對他兒子采取法律行動來保護財產。

“他在倫敦每個月要花10萬美元，所以很需要錢，而且因為他不在，他的公司一直在虧損。所以他需要把財產變現。但這很難，因為所有東西同時也在我名下。一次他來找我，像拿著匕首一樣拿著一支鋼筆戳著我的臉，威脅我說，‘現在就簽字！’我說，‘我能抽支煙然后想一想嗎？’他說，‘現在就簽！’于是我就簽了，因為孩子們在隔壁，我怕他會做出什么事來。我公公問我，‘你為什么要簽字？’我把當時的情況告訴他，他就理解了。所以后來我們為其他財產申請了禁止令，普萊尚特氣瘋了。有一處很值錢的財產，他本來想賣掉，好在英國買棟美麗的‘農舍’，再買三十輛車，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我能怎么辦？他想把所有的東西都賣掉，然后干什么？把他所有的錢丟進馬桶里沖走。我要教育孩子，要維持家庭，為了自尊，我還需要錢投資生意，因為從公公那里拿錢讓我覺得很難堪。

“鋼筆那件事發生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進出都帶著保鏢，因為我很害怕普萊尚特會為了財產對我做出什么事。我把孩子們的護照藏起來，因為怕他會讓他母親來把孩子們帶走。他母親是個非常漂亮的女人：一米五高，一頭金發，手很漂亮，五官無可挑剔——她是個尤物，你知道嗎，她皮膚非常細，因為她家來自巴基斯坦西北部。她出身很低微，因為長得美而嫁給了我公公，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相愛過。所以她住在倫敦，她說自己在皇家阿爾伯特廳（Royal Albert Hall）唱歌劇（她以前唱過歌劇），但那純粹是個幻想。她喝酒喝得很兇，除了喝酒幾乎不做別的事。

“但普萊尚特和他母親關系很好，我能想象她會來帶走孩子。她會說‘跟我去倫敦吧，你們可以坐在我粉紅色的捷豹里到處兜風，我會帶你們去哈羅斯百貨商店（Harrods）買東西，帶你們去迪士尼’，孩子們當然會跟她走。

“我不知道會發生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會不會回來。我只是盡力照顧一切。我的孩子們很可愛，僅僅是做一名母親就讓我心情很好。只是我始終很害怕。我怕他會說我因為腦部手術變瘋了，然后把孩子們帶走。

“我告訴過你我的腦部手術嗎？和他也有關系。事情發生在他買了蘭博基尼以后。”

“我得了一種病叫AVM，”希姆蘭說，“也就是腦動靜脈畸形，這種病很常見，也沒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大腦部分動脈比較薄。你就算一輩子都有這個病也沒問題，不會對生活有任何妨礙。

“我記得那是我公公生日，我們在家喝了酒，之后和客人告完別，我就上床睡覺了。第二天普萊尚特要去參加一個高爾夫球賽，所以他很早就起床了。事實上他一整晚都在喝酒——我去睡覺了，他還熬夜喝酒看電視什么的，自己一個人。第二天早上，他很早就走了，而且明顯在高爾夫包里帶了一瓶伏特加。他把手機忘在家里了，所以我聯系不到他。我給他的朋友打電話，問他有沒有安全到達，他們說，‘沒有，但是我們看見他開著蘭博基尼，拿著一瓶伏特加——他太酷了，太有種了，簡直就是搖滾明星，一邊喝著伏特加，一邊開車。’我說，‘你們覺得這樣好玩嗎？’他們說，‘他是個瘋子，你丈夫，但我們愛他！’——你知道，對那些人來說這是個玩笑，但這種壓力讓我承受不住了。他一整晚都在喝酒，他一邊開車還一邊喝酒，他開車到離德里一小時以外的地方。我焦慮得心力交瘁了。于是我的血壓上升，漲破了腦子里的血管。我跑去睡覺，二十二個小時沒醒。我婆婆一直對我的女傭說，‘她只是喝得太多了，多讓她喝點水，她會好的。’然后我母親打電話來，很是擔心。隨后她打給醫生，醫生說，‘馬上送她去醫院。’我婆婆說，‘不用，我了解希姆蘭（說得好像她真的了解我一樣），她只是喝太多了，就讓她睡吧。’然后醫生又打來，她說，‘哦，她還在睡覺。’醫生說，‘我告訴你，她非常不對勁，需要去醫院。’然后我母親又打來，‘我不管你，我要帶我女兒去醫院。’她來了，把我裹在一條毯子里，我沒有醒。直到那時候，我才被帶出去。醫生沒辦法和我說話。他們把我放進核磁共振機，說，‘如果你再晚五分鐘帶她來，她就救不過來了。’那是救命的關鍵時刻。

“我昏迷了九天。當時脫離昏迷的機會很小。由于破了的血管在語言和記憶的區域，醫生說，‘如果她能醒過來，要么失憶，要么再也不會說話了。她可能只能發出像布谷鳥那樣的聲音，你們得要面對那樣的情況。她痊愈的機率只有一成。所以你知道嗎，我們已經做了能做的一切，剩下的就只能靠祈禱和祝福了。’所以真正救了我的是祈禱。有一百零一名祭司為我誦經。普萊尚特的祖母和我的祖母把他們召集到一起。因為每個人的好意、大家希望我活著的愿望，還有所有這些積極的能量，我活下來了，完好無損，成了那一成完全康復的人。”

注釋

[[1]](#_1_11)為保護隱私，此處由兩段獨立的采訪改編而成。

[[2]](#_2_11)引自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Verso, 1983), p. 88.

[[3]](#_3_10)原文為vastu，是一種印度風水學。

## 十二　巴爾斯瓦的垃圾山

一名年輕女性準備在一個電影節上致開幕詞，她發現把講稿落在家里了，于是讓男朋友趕回家拿。他騎了輛自行車沖回去。家很近，他十分鐘就拿回來了。

但保安把他攔在文化中心門口，說自行車不能騎進去。他和他們爭，說自己要送的東西很緊急。就在他飛快地要闖過去的時候，保安們用棍子襲擊他，打中了他的頭和身體。

等他爬起來，已經來不及送那份講稿了。他走進禮堂，坐在我旁邊，他女朋友正在臺上臨場發揮。他大聲喘著氣。我轉頭看他，發現他的頭在流血。我們走出去，找到了文化中心總監的辦公室。

“很抱歉你受了傷，”聽完整件事后他說，“但我想說，如果你當時說的是英語，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他們看見你騎著自行車，又和他們說印地語，他們怎么知道你是中產階級？”

巴爾斯瓦定居點（Bhalswa Colony）的垃圾山令人驚嘆，人們可能會想，只有大自然才能造出如此龐大的東西。它從平地拔地而起，粗糙的陡坡上有一條歪歪扭扭的路，一輛接一輛的卡車轟鳴著慢慢開上坡頂。從下面，你能看見這些卡車沿著坡的平頂卸貨，為這座山添上更多垃圾。卡車周圍有些人，從山下看只是一個個小點兒，他們的工作是從這堆大都市的棄絕之物中，挑出仍然能用的東西。

我四周是一片用于垃圾分類的空地。裝滿塑料瓶的麻袋每個都有一輛汽車那么大。有一塊區域是成堆的靠墊、床墊和沙發，男孩子們把這些東西劃開，拿走塞在里面的棉花。還有一個區域，震天響的錘子以不均勻的節奏敲打著鋼質的垃圾桶和舊空調的外殼，要把它們敲平。還有成堆扭曲的輪胎，數量驚人。

最近一直在下雨，地上到處都是積水。豬和狗在散發著化學品臭味的水里洗澡。

我們在離市中心很遠的城市北部。經歷過市區的交通堵塞后，走在這里有一種古怪的感受，因為這里空間太大了。頭頂上的天空一望無際，地形幾乎是田園式的開闊。地勢緩緩向下，下面是一個水庫，里面有水牛和一直看著岸邊的鸛鳥。大家把牛糞收集起來做燃料（村莊的風格）——這些牛糞被堆成錐形，大小如同身材魁梧的成年男人，為了防雨還在上面罩了油布，隨處可見。

巴爾斯瓦定居點被擠進這大片土地的一個小區域，一堆厚厚的磚塊堆積在彼此頂部，像森林里的樹苗一樣，向著任何還沒被占用的空間伸展。房子上都是檸檬綠色的斑駁——這些磚塊來自以前的建筑物，那些建筑物上過色的墻壁變成了碎片在這里又被用上了。從外面看，整個鎮子似乎是瞎的——墻上沒有窗戶，所以從這些房子里看不到四面圍繞著它們的巨大垃圾袋。

我們朝定居點走，路上冒出來的每個人好像都穿著制服。先是一群大笑著的女學生，穿著藍色連衣裙，晃著辮子，辮子上系著緞帶。然后是一個樂隊，每個人都戴著軍隊式樣的帽子和肩章，拿著小號和鼓，出發去參加某個遠處的婚禮。

和我在一起的是米納克什（Meenakshi），她不住在這個定居點，但自發地保衛著這里。她三十出頭，語速很快，神情嚴肅。

“他們想要創造一座城市的時候，得請其他地方的人來讓城市運作起來，因為他們自己沒有勞動力。住豪宅的人是不可能讓一座城市運作起來的。城市的運作靠的是那些住在棚屋和貧民窟里的人——人力車夫、賣菜小販、皮匠、建筑工人，等等，這些才是讓任何一座城市運作起來的人。

“所以比哈爾邦（Bihar）、拉賈斯坦邦和北方邦里找不到工作的人便從自己的村子搬來德里。在德里，他們發現自己能找到工作，但沒地方住，所以他們開始在城市邊緣的空地上造一些小房子。對政府來說，他們代表了一個可以爭取的選民群體，所以政府決定把他們注冊成德里的選民，并為他們提供水電和配給卡。后來他們的家人也搬來了，并一起在這里正常生活了三十年。

“人們不斷來到德里，這里有很多工作機會。德里地鐵需要成千上萬的工人。他們在政府眼皮底下造了很多棚屋，政府什么都沒說。但后來政府覺得‘這些人很臟，影響了市容’。加上城市擴張后，他們住的地區已經不再是城市邊緣，政府想要從這塊土地中獲利，所以就對這些人說，住在這里是非法的，讓他們走。

“其中一個定居點在亞穆納河的岸邊，有大約三萬戶人家。2000年，政府為了美化城市，決定把這些居民趕走。他們在那塊地上建起了德里政府的新辦公樓，那棟樓是世界上最難看的樓之一。

“那三萬戶家庭里，兩萬戶被認定是非法定居，在無處可去的情況下就直接被趕走了，沒人知道他們去哪兒了。其他人被重新安置到城市外圍的數個地點。1990年之前來德里的人獲得了18平方米的土地，1990年到1998年之間來的人則獲得了12平方米的土地。每戶人家要付7000盧比（相當于那時候的160美元）。

“有些被安置的家庭到了巴爾斯瓦這里。但是搬遷計劃很狡猾——三萬戶家庭里，只有五百二十九戶被安置在巴爾斯瓦，其他人被搬到了別的地方。他們要確保同一個鎮子的人被分散到不同地方，這樣人們就沒法兒聯合起來了。

“政府同時也在拆除其他定居點，所以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也來了巴爾斯瓦。從尼札姆丁來的是穆斯林，從亞穆納河岸來的是印度教徒，還有從賤民（dalit）社區來的人。所有人的文化和宗教都不一樣，政府知道如果把他們都放在同一個地方生活，他們彼此肯定會起沖突。這樣做非常聰明。

“‘安置’對你來說是什么意思？我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是什么意思。安置的意思是把人民完完全全安頓好，是說在新的地方為他們提供原來有的設施。

“但情況完全不是這樣。人們被從自己花了四十多年建起的鎮子里趕出來，丟到甚至連最基本的生活必需設施都沒有的地方。沒有商店，沒有配給品店，沒有學校，沒有公車。更別提水和電了。那地方完全是一片荒蕪，什么都沒有。第一批來的人只能從頭開始。政府什么都沒提供。

“孩子們不得不輟學，因為那里沒有學校。大部分男性丟了工作。人力車夫被拋到離家三十五公里以外的荒野里，那里從來沒人去，當然也沒有乘客。同樣情況的還有商店店主，他們再也進不到蔬菜了，也沒有顧客。一切都完蛋了。

“那個貧民窟的婦女過去大多在德里南部的中產家庭里當女傭。她們不能放棄這份工作，因為丈夫已經沒有收入了。所以她們常常早上5點就出發，一路趕到工作的地方，然后晚上6點才回家。她們沒辦法照顧孩子，孩子們都在家里，因為沒有學校可上。”

我們走進了定居點，和德里南部高尚社區的街道相比，這里的街道造得驚人地好。街道表面鋪著磚，微微帶著弧度。洗過的明黃色和藍色衣物掛在街對面；房子前面停著自行車。屋子里，人們正在做家用掃帚——一間房子有人在切割鬃毛，另一間房里的人在做手柄。空氣里有炸大蒜的味道。

米納克什在一戶人家門口停下來，朝著里面喊，“你好！你收到配給卡了嗎？”

“收到了。到了一陣兒了！”

“你為什么不告訴我？”她有些生氣。“這些事你得告訴我！”

米納克什給自己安排的任務（因為沒人讓她做這個）是做這個社區的政治代表。她為大家整理官方文件（很多人是文盲），代表他們游說市政當局，還在必要的時候組織政治行動。我能看出來，她非常在意這個角色。

“就像我告訴過你的，這些社區居民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政府計劃為他們建造公寓街區，在社區中央規劃了公共空間。我們說這種布局會出問題，每個人都會和其他人爭那些公共空間。穆斯林想要在那里屠宰牲畜，但這會冒犯婆羅門，因為婆羅門想在同一個地方祈禱和敬拜。絕對會起沖突的。

“居民說他們希望有獨立的房屋，并且拒絕接受政府的規劃。政府說房子是一個斯堪的納維亞建筑師設計的，所以不能改。他們說，‘如果你們不接受這個規劃，我們會把你留在那片荒地里。’于是居民說，‘我們已經在荒地里生活了六個月了，沒理由住不下去。’所以有一整年他們都住在露天的小帳篷里。他們抗議、上法庭、找媒體、游行，最后迫使政府放棄了原來的設計，重新規劃了成排的房子，把土地分配給各家各戶，讓他們各管各的。”

我們在一棟房子前停下，并走了進去。房主是一位叫賈哈娜拉（Jahanara）的婦女，正和她的朋友薩茹阿斯瓦蒂（Saraswati）坐在一張墊子上。兩個人都代表這個定居點參與了很多米納克什組織的政治運動。

已經近中午了，光線穿過敞開的門照進來，屋子很亮。房間看上去很大，因為里面除了一臺冰箱和一個爐子，幾乎沒有別的東西了。墻壁被漆成奶油色，在地板反射的陽光中幽幽發亮。房間里側有樓梯通到上面的樓層。

賈哈娜拉要給我們泡茶，所以起身去準備。米納克什繼續她的話題。

“你可以看到這地方有多糟。土地濕軟，很容易就被淹掉。第一批來這里定居的人在建造前，不得不挖排水溝。即使是這樣，這里在雨季也經常被淹。今年有個孩子在洪水里淹死了，因為水位高過了房子。即便如此，這里也沒有水可以飲用。蓄水池里的水是咸的，而這里的地下水嘗起來有酸味，因為垃圾堆里的化學品滲進了土地深層。這些東西太毒了，連蚊子都活不下去。那是純酸，有腐蝕性。孩子們因為在水里玩，全都得了皮疹，婦女也都得了很嚴重的陰道炎。

“這些人用自己的雙手建起了這座鎮子。他們不能年復一年地等著政府來鋪路、鋪下水道，所以他們只能自己動手。他們不得不為了每塊磚和每袋水泥去游說，供電也得去游說。已經十年了，他們還在游說。這里還是連座中學都沒有。最近的一所學校不收這些孩子，因為他們是‘貧民窟的孩子’。所以孩子們不得不走很遠的路去另一所學校，那里每個班有一百個孩子，沒地方可坐，沒水也沒廁所。這對那些要去上學的孩子來說非常艱難。你看到通到這里的路了嗎？一下雨就完全沒法走。”

“我們為什么來到這個城市？”賈哈娜拉插話說。“首先是為了工作，因為我們在北方邦的村子里什么都沒有。我們認識一些人，他們被包工頭帶到德里，收入不錯，所以后來我們很多人都跟著來了。還有一個理由是因為學校。我們自己是文盲，所以希望孩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村子里的學校很遠，你沒辦法檢查孩子有沒有真的去上學。而且女孩子要走那么遠的路很危險，這就是我們覺得和丈夫一起生活在城市里會更好的原因，這就是我們來到這里的原因——為了給我們的孩子一個更好的未來，特別是女兒們。

“我們剛來的時候，想辦法讓兩個孩子進了一所德里的學校。但學校很遠，而且老師不了解孩子的情況。他們給孩子們不及格，因為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學校里有貧民窟的小孩。孩子們覺得很灰心，半途就輟學了，現在他們在當工人。這是這里發生的一切當中最壞的事，我們的孩子失學了。”

對面的一棟房子里，有一個年輕的女性剛剛從浴室出來，穿著一件桃紅色的紗麗，頭發還是濕的。她站在一面鏡子前梳頭，往臉上抹面霜。她花了很久化一整套妝，然后拿了一把掃帚掃地。在這里，因為巷子很狹窄，沒有窗戶的屋子要靠從門口照進來的陽光采光，一切都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

我們在房間里喝著茶。薩茹阿斯瓦蒂默不作聲地玩著賈哈娜拉的腳趾頭。兩個女人都穿著棉布的紗麗克米茲，薩茹阿斯瓦蒂手臂上戴著一排金屬和塑料的手鐲，一直戴到手肘。她說：

“我丈夫的姐姐和姐夫離開村子去了德里，之后就再也沒有他們的消息了。我婆婆很擔心，每天為女兒以淚洗面，因為她已經兩年沒有她的消息了。她不停地讓我丈夫去德里找她，于是他就去了。他找遍了這座巨大的城市，到每個定居點去問有沒有人聽說過這對夫婦。過了很多個星期，他到了亞穆納河另一邊的一個地方。他問是不是有人知道他倆，結果有人說，‘他們住在這兒。’他們讓我丈夫去井旁邊等著。到了那兒，他看見有幾個婦女在打水。他朝她們大聲問，‘姐妹們，有沒有一個叫這個名字的人住在這里？’他的姐妹正好在其中，聽到他提她的名字，馬上向他跑過去，一看到他就開始哭。‘弟弟，你怎么會在這里？’她問。我丈夫說，‘你為什么兩年沒有和我們有任何聯系？媽媽擔心得都病了。’她說，‘我丈夫沒有假期，所以我們回不來。但我給你們寫了很多信，從來都沒收到過回信。’我丈夫也哭了，‘我們從來都沒收到過任何信！’

“之后，我姐夫幫我丈夫在德里找了份工作。他開始時在一個建筑工地干活，建造橫跨亞穆納河的新橋。但五個月后，他丟了工作，沒事干了。有一天，他發現了把椅子，于是決定在河岸上擺個理發攤。那時候，那地方還沒有鎮子，除了一個巨大的垃圾坑以外，別的什么都沒有。于是我丈夫在一個人都沒有的地方做了一名理發師。他整天和自己的椅子一起，在一片巨大的荒地中等待。那地方完全是一片荒蕪，晚上一片漆黑。

“白天他幾乎掙不到錢，所以只能晚上也工作。他得到了一份工作，每天把亞穆納橋建筑工地周圍堆起來的垃圾搬走。他要在一片漆黑里從河里游到工地，什么都看不見，只能在無盡的黑暗里游。他一整個晚上都在工作，把卡在河里的尸體拖走，弄走各種各樣的垃圾。這份活的工資是每月500盧比。

“最后，政府把亞穆納岸邊的垃圾坑用土填起來，平整了整塊地方，我丈夫和他的姐夫在那兒建了個小屋，后來越來越多的人搬到那里去住了。但我丈夫覺得很孤獨，他開始吃不下飯。他無法停止想念他的孩子們，只有孩子讓他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不是完全孤單的。所以他叫我來德里陪他。

“我們在那兒住了快二十五年，一點點把那個地方弄得能住，靠自己一磚一瓦地建起了每樣東西。我們在那里建了一棟兩層樓的家，最終那個地方什么都有了——電、自來水、一座公立學校，旁邊還有一座公立醫院。但是隨后，我們建造的所有東西都被拆掉了，說是為了給邦長蓋辦公室。

“他們承諾說會給我們真正的房子，有廁所和浴室，讓我們不再是貧民窟居民。大家都討厭住在貧民窟的人，所以我們很開心。他們說‘貧民窟’這個詞會從你們的生命里被抹掉。他們說會帶我們到一個新的地方，那里有好的學校、公園和供水供電。孩子們也很高興。那時候沒人知道這一切都是騙人的。

“他們向我們收了7000盧比作為造新房子的錢。我們很多人的錢都是借來的，或是賣掉珠寶換來的。但他們拒絕事先給我們看這個地方。他們把我們全都裝上一輛卡車。路上，我們問卡車司機，‘我們要去的是哪里？那個地方好嗎？那里的人好嗎？’他什么都沒和我們說。他怎么能這樣？但畢竟他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我們到這里的時候，這里只是一片空蕩蕩的沼澤地，他們承諾我們的房子根本不存在。卡車司機自己都說，‘這地方不好，你們怎么能住在這里？’我們有些人把之前房子的磚頭帶來了，但大多數人連磚頭都沒有。這里整個地方都泡在水里，到處都是蛇和老鼠，最后用了六卡車泥和五千多塊磚才把整個地方墊起來。”

她們說關于建筑施工的事時，有大量非常精確的細節。她們知道怎么造下水道和門廊，知道要用多少水泥和磚頭。實際上，這些婦女讓人如此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她們的生活里沒有任何事是讓別人代辦的。她們不只專長于一件事，她們自己既是建筑工人，也是鎮子的規劃師，還是政治家。她們對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近距離地全面了解，而對其他人來說，這些事都是模糊而遙遠的。她們擁有自己的方式和我所認識的大部分人都不一樣。

賈哈娜拉的故事也差不多。她剛來德里的時候住在尼札姆丁附近的穆斯林貧民窟。

“那里有一口很大的井，我們就住在它附近。那時候，那里有片空地，當地的頭頭在當地警察的幫助下造了一個貧民窟。一開始，我們有個茶攤，很快那片地區變得熱鬧起來，我們就建了一棟臨時旅館。我們有水電，而且因為尼札姆丁火車站離得很近，所以很多人到我們旅館來吃飯。

“隨后他們來了，對我們說，不管你過得多好，不管你在這里掙多少錢，別人會一直叫你貧民窟里的人。他們說要把我們帶去一個新的地方，那里有好的學校、公園和水電。還說我們在那里會有自己的房子，帶衛生間和浴室。孩子們很高興。那時候，我們不知道這一切都是謊言。

“他們讓我們把自己親手造的房子拆掉。我們中有些人說不相信這個頭頭的承諾。但是有天大概凌晨3點，他親手把自己家的三層樓房拆了。人們開始恐慌。他們說，‘如果政府官員來拆我們的房子，會是一團糟，我們會失去所有的東西，還是我們自己拆更好一點。’所以我們就拆了。之后他們就把我們所有的東西都裝上一輛卡車，并把我們扔在這里。”

我們談話的氣氛莫名其妙地平靜。那是一個很美的早晨，她們說話的時候都很鎮定，時不時互相肯定，就像每個人都是在替另一個人說話一樣。我能感受到她們在一起的方式是中產階級人群里少有的。她們生活中不確定的地方太多了，互相依存是活下來的唯一形式，甚至在她們的語法中，多數用“我們”，很少用到“我”。

米納克什給我看各種信和照片，她們把這些文件寄給各種政府部門，試圖把巴爾斯瓦變得適宜居住。

“十年了，我們還在做這些事。我們還是連一些最基礎的東西都沒有。我們還在游說，要求發放配給卡，這是任何人過日子都需要的最重要的東西。如果有配給卡，至少能吃得上餅，即使只是就著鹽一起吃。沒有配給卡，人們生存不下來。你知道現在的通貨膨脹率吧？在公開市場上，大家是買不起任何東西的。

“事實上，這些事情讓人很憤怒。每次我們去市政公司，那里的官僚會滿臉厭惡地說，‘為什么這些垃圾一直來找我？’這種情況下你還能繼續斗爭多久？這里的人能做的，要么是把時間用在為供水做斗爭上，要么用在日常工作上，為自己家掙點錢。

“我發現政府每個月花5.6萬盧比為我們提供水罐車，每年將近70萬盧比。建一條水管通到這個定居點只要花一半的錢，但他們不愿意。他們知道，沒有供水的話，這里永遠不會是個適宜的住處，這樣他們就能再把人趕出去。”

對多數中產階級家庭來說，政府在過去二十年里從社會和經濟活動中大規模退出，達到了這些家庭幾乎再也看不到政府角色的程度。他們喜歡這種狀況——他們將政府的退出和“放松管制”理想化。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意識到，市政府做了多少工作來保護他們的階級，將他們與包圍著他們的大范圍的赤貧隔離開來，不讓這些貧困人口占用任何城市的空間或資源。恰恰是窮人才理解城市的真實管理方式。比起中產階級，他們和政府打交道的距離近得多，并且背負著大得多的官僚負擔。如我所理解，翻看這些文件——米納克什挑起的擔子是意義重大的。

對面的房子里，出現了一個男人，他是穿桃紅色紗麗女子的丈夫。他裹著一條毛巾，光著上身，肌肉很發達，體毛濃密，胸前一條銀色的項鏈在黝黑皮膚的襯托下發著光。他出來坐在外面的臺階上，手指上的戒指在陽光里閃爍。

“對男人們來說，情況很艱難，”米納克什說，“到了這里，他們全都丟了工作。沒人雇男人做家務活。現在有些男人做的日常工作，比如給豆子剝殼，做一天那活兒能掙30盧比，而且常常還需要全家的幫助。有些男人做掃帚拿到附近的居住區去賣，有些開始在建筑工地干活兒，但那都是少數。

“所以他們大多數人坐在家里，變得意志消沉，整個人封閉起來。他們氣自己的妻子總是不在家里而是在外面工作，于是打她們。他們不喜歡妻子涉足政治，會跑來我們的會議，滿身酒氣地胡亂罵人。他們朝我們喊：‘你們女人什么事都做不了。你們什么都改變不了。’

“而且這個社區受毒品和藥物的影響很嚴重。我不是說一兩個家庭，我說的是整個社區。甚至孩子都受到了影響。因為沒有學校，所以他們沒事可做，慢慢地就被影響了。他們會去聞做鞋子用的膠水。還有一種1盧比的藥片，可以讓孩子們忘記正在發生的一切。最便宜的藥給了他們最大的快樂。

“男人們喝酒，抽黃糖[[1]](#Hei_Hua__Zhi_Hai_Luo_Yin)。他們一看見妻子身上有錢，就拿去買酒，把瓶子藏在衣服里回家。我問他們，‘你們家里什么吃的都沒有，你們真的想要買那瓶酒嗎？’”

薩茹阿斯瓦蒂挖苦說，“政府在這方面的表現好極了。他們還沒開始蓋醫院和學校，就開了一家賣酒的商店，甚至還派了個警察看店。造學校花錢，賣酒的店則會為政府掙錢。

“人們說我們總是在責備政府。為什么不怪他們？我們賴以生存的東西都被他們拿走了。而那些能殺死我們的東西，能讓我們的家庭破產的東西，政府卻在開新店供應，而且非常大方。”

對面房子里，穿桃紅色紗麗的女孩子從送貨員那里接收了上百把新做的塑料掃帚，現在正給每把掃帚單獨包上塑料套。她丈夫坐在外面的臺階上抽煙。

米納克什說：“所以這就是問題。你能看到人們在這里造的房子和街道。十年了，現在他們有了點值價的東西，政府卻宣布這個地方是非法的，讓他們離開。這塊之前政府給的地現在變成非法的，因為他們只給了十年用地許可。他們不會在這個城市里給窮人一個永久的棲身之地。”

“你來的時候肯定經過那塊空地了，”薩茹阿斯瓦蒂說，“現在政府想在那塊地上造公寓，并且想把我們趕走。他們為什么想在那里造公寓？因為我們花了十年讓這個地方變得適合居住。是我們給土地排水，鋪好了街道，安排了供電，還讓公交車開進來。是我們使這塊土地有足夠的價值讓政府能把它賣出去。我們不會離開的。我們這輩子已經建了兩座城市，我們不會再建另一座。”

“我們不會走的，”賈哈娜拉也說，“他們已經騙了我們一次，騙不了我們第二次。”

米納克什說：“他們說要讓所有人走的時候，巴爾斯瓦來的人都知道，如果不反抗就什么都守不住。為了這個，大家做好了被警察毆打的準備。我們決定在英聯邦運動會的時候去游行抗議，給政府施壓讓他們尋找別的解決辦法。他們花數以百萬計的盧比在一個對誰都沒好處的大型體育賽事上，但真正需要錢的人卻什么也得不到，實際上，政府還要從他們手里拿走錢，拆掉他們的房子。所以我們決定走上街頭——整個社區的人堵住了附近的主要高速公路。德里大學的師生和我們一起組織了游行，他們中很多人對我們的處境感興趣，除此以外沒有人在意我們。

“那段時間巴爾斯瓦受洪水影響很厲害，但每個人都認為參加這次抗議很重要。大約有五千名婦女走出家門，堵住了道路，高速公路堵塞了四十五分鐘。一開始，有個警察局的警察來了，隨后他們叫來了其他分局的警察。警察局局長助理下令用警棍襲擊我們。婦女們被打得很厲害，有個人被打骨折了需要去醫院，我們叫了一輛救護車，但是他們拒絕幫助我們。德里大學的一些學生也被捕了。

“我要說，我們婦女也反擊了警察。她們搶了警棍，回擊他們。讓我們很震驚的是，警察認出了其中一個人，并且開始威脅她。他們抓住了她兒子，問出了她工作的地方。之后，警察去了那里，告誡她以后不準再做這樣的事。他們喜歡單獨針對個人，因為一個人沒有那么強。但是我們永遠不會放棄的。”

“他們讓我們給他們投票的時候，不會坐汽車來，”賈哈娜拉說，“他們走著來，對我們說，‘姐妹，拜托了。’是我們讓他們贏得選舉，讓他們稱王稱霸，但他們卻強取豪奪我們的錢。所以，和政府斗爭是我們的權利。我們也是這個國家的公民。

“我們都受到過很多威脅。有幾個男人來我家，帶著很粗的棍子威脅我丈夫。他們說，‘管好你老婆，否則后果很嚴重。’從那以后，我丈夫開始和我吵架。我讓他不要管這些，是我在照顧這個家。

“他們是政府，可以編造事由隨時把我們關進牢里。他們控制著一切。如果他們撥給我們1億盧比，最后只有2000萬能到我們手里。我唯一害怕的就是政府，他們會拿走我們所有的東西。”

薩茹阿斯瓦蒂很憤怒。

“如果讓我見到德里的首席部長，我會把她揍得找不著北。他們靠撒謊把我們騙到這里來。如果事先讓我們看過這片地，我們是絕對不會來的。這是整個德里倒垃圾的地方，她覺得我們也能被倒在這里。讓她住在這里看看，她就會知道這是什么感覺。現在他們又想趕我們走！如果他們要強迫我們離開這個地方，我們會打破他們的腦袋！當年我們不得不把自己在村子里的房子賣了來買這里的地。十年了，我們當中很多人還在向債主還債，還什么都沒買到的7000盧比。我們是不會走的。”

郵遞員來放下了一封信，他的一只手臂在手肘那兒斷了。

米納克什說：“大多數人，那些真正讓這座城市運作起來的人被這座城市排除在外。這里不再歡迎他們。這座城市正在為富人重建。只有有車的人才能住在這里。看看城市的基礎設施結構——立交橋、商場、酒店還有其他奢華的地方，都是為有錢人造的。看看他們在立交橋上花了多少錢，然后又是誰在使用這些立交橋？只有那些有錢人。這些橋對走路的人有什么用？你不能在上面走。走路的人在這座城市沒法兒行動——沒有讓他們走路的地方。

“地鐵只連接那些有寫字樓或高端居民區的地方，沒有通到任何勞工階層或者窮人住的地方，所以地鐵只服務于有錢人。窮人也買不起地鐵票。而且有很多行李的窮人不能把行李帶進地鐵，他們只能乘公交車。

“但是現在他們引進了新的公交車，但這些公交車也不服務窮人。車子是些漂亮的環保公交車，讓這座城市在英聯邦運動會的時候面子上好看。車子的底盤特別低，讓人們很容易上車，甚至坐輪椅的人也能上去。但是這些公交車只能在平整的路面上行駛，所以他們取消了所有過去通到這個地區的公交車。交通部門的人只是說這里沒有路，所以車子不能來。

“每件事都在往壞的方向發展。每件事。最終不僅僅是窮人會受苦。我來自一個中產家庭，我能從自己的個人經歷告訴你，在德里，很快會發展到連中產階級家庭都會養不起孩子。巴爾斯瓦的人為自己的將來擔心，我也在內心深處覺得恐懼。因為我不知道將來在我們身上會發生什么事。不只是窮人。”

薩茹阿斯瓦蒂說：“有時候我們會想是不是不應該離開之前的村子。很多留下來的人情況比我們好。很多男人去沙特阿拉伯或迪拜的建筑工地做工，在那兒掙的錢更多。我們卻什么都沒有。我們之前擁有的一切都已經賣掉了，只是為了在德里買一塊更好的地方。我們以為，有一天我們會在德里擁有自己的公寓。”

賈哈娜拉說：“我們離開以后，村子也發生了變化。學校變得更好了。我們留在那兒的親戚養孩子養得比我們好。過去幾年村子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但我們永遠回不去了。我們把自己在村子里的財產賣掉了，剩下的也被親戚拿走了。和家里人爭不如和政府爭，和家里人爭的話，你會死的。所以我們無論如何都會待在這里。”

我走的時候，米納克什來送我。“你是怎么到這兒的？”她問。“我在地鐵站坐了輛三輪車過來。”“你很幸運，”她說，“大多數三輪車都不肯來這兒。”我們穿過鎮子，我發現來時的路是最好的，其他路的路況則差很多。有些路面被雨水沖走了，居民們正在往上鋪新水泥修補。拾荒人住的街道到處是垃圾，而這些垃圾的分類都在家里進行。

鎮子盡頭是一個吸毒窩點，男人們在一塊油布后面吸食快克可卡因，他們的孩子在外面坐著。一個女孩子用碎了的花盆碎片拼了一個圖案。其他孩子在給垃圾分類或把從樹上摘的果子放進盒子里。雞在一旁覓食。水塘上成團的小蒼蠅以一種我從來沒見過的奇怪方式飛舞：整團蒼蠅以最輕盈的動作起飛，但一直像一團云一樣有機地組織在一起，然后一下子再全部降落在水塘上。

要從這個地方出去，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輛社區公共汽車。我們坐了上去。車子以一種慢得不可思議的速度繞著地上的坑洼前進，每隔幾分鐘就停下來讓人們上下。我們花了一個小時才開出巴爾斯瓦，部分原因是有人沒付錢，引起了一場爭吵。司機停車抗議，讓三名男乘客要么下車要么付錢，然而他們都不肯。米納克什出來調解，說她可以替他們付車錢。但是他們寧愿下車也不愿意付錢，于是就下車了。

要說清楚這個地方有多遠和多難以到達是不可能的，盡管它就位于全球最大的都市之一。我們很容易理解國家的邊境線對人群的分隔使他們和全球經濟聯結時呈現出巨大差異，但若要想象一個城市內部竟然也有這樣的分化，那可就要難得多了。然而在這個都市里，許多人正在用他們的資本、觀念和勞動力徹底重構全球經濟，因此在這里你有時候能感覺到身處全球所有力量的聚合處，但也正是這個地方有一群人和這個體系完全無關。巴爾斯瓦不是一個存在資本主義壓迫的地方——實際上，許多這里的居民會希望多一點資本主義壓迫。這是個多余人之地，這里的人幾乎找不到和身邊的經濟繁榮之間的聯系。他們是一個“剩余”的群體，他們無處可去，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從一個垃圾堆到下一個垃圾堆的流離之間求得生存。

米納克什和我坐地鐵到了康諾特廣場。我們坐在印度咖啡屋（India Coffee House）里——這是一個尼赫魯時代建立的機構，由一家咖啡工人組成的全國合作社運營，在這里，你仍然可以只花五盧比就買到一杯熱飲。[[2]](#Sui_Zhu_Shang_Ye_Lian_Suo_Ka_Fei)然而米納克什沒點任何東西，她包里帶著一瓶水。

“我父親來自北阿肯德邦（Uttarakhand）的一個村子。我們的情況就像你今天見到的：種地在我們村子里非常不穩定。我們是梯田耕種，產量不太高，而且非常依賴于雨水。我爺爺在父親兩歲時就去世了，所以父親和叔叔干各種各樣不同的工作來謀生——他們給別人放牧，在別人的田里干活，生活很困苦，也吃不飽。父親七歲的時候，和叔叔一起跑到了德里。

“那時候，城市里的人更真誠。有個男人看到我父親和叔叔的困境，把他們帶到一個耆那教的修行處，于是他們在那兒住下，并在那里學習。我父親十五歲的時候，中斷了學業，開始做工。他的工作是修剪古堡周圍的灌木，所以他的手每天都流血流得厲害。后來，他到一個在阿里格爾（Aligarh）的穆斯林家里工作，再后來，他被選去為情報局工作。

“他從來沒有真正告訴過我們到底為他們做什么工作。他說一開始他的工作是洗碗。村子里的人常說，‘對于一個洗碗工來說，他太清高了！’但是在做這么枯燥工作的同時，他想辦法獲得了培訓資格，最終被指派了正式職位，并作為督查從情報局退休。

“那時候的機會更多。現在的人得不到我父親當時有的那些選擇。

“我成長的過程中，他被派到德里以外的地方。他被派到邊境地區的一個村子，負責逮捕非法移民。他對他們窮追猛打。他有間諜和線人，會為他提供非法越境人員的信息。

“我在村子里不是很開心。我不得不去一所破破爛爛的學校，在一塊很小的板上寫字。這是附近八個村子里唯一一所學校，即使這樣，學校里也只有四十個孩子。從城里的學校轉到鄉村學校很不順，我的成績落后了。而且等我回到德里時，我的英語成績不及格了。甚至到今天，我都沒有足夠的自信看著別人的眼睛說英語。

“高中畢業以后，父親說我不能再念書了，于是我就進了一家工廠工作。那時候我十六歲。那是家紡織廠，我的工作里有一些設計的成分。我以為自己想做時尚設計，但后來發現時尚設計對我完全沒有吸引力。我腦子里想的全是在那里工作的女工，她們全都生活在地獄里，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個小時，卻什么回報都得不到。我為工人爭取到了合適的衣服，還組織活動為她們爭取到了最低工資。我和公司老板斗爭了三年，最終我們贏了，公司為她們發放固定薪水，每年還有幾天假期。當然，公司把我開除了，還扣了我的薪水。但是這讓我更自信了，之后我做了很多不同的事。

“后來，我去德里大學讀了本科學位，又讀了碩士。但是當我回頭看時，我發現自己沒能跟上這個世界。我覺得自己落后它很多。如果我上了一所好學校，而且沒有浪費生活中最重要的那幾年，現在我會是一個更好的人。我作為旁觀者看著這個世界上的自己時，覺得自己沒有立足之地。

“有些事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我有我的，你有你的。我的情況是我總是獨自一人。我沒有遇到其他和我想法相似的人。我總是一個人吃飯，一個人坐，獨自思考。十五六歲的時候，我開始寫詩。當你孤身一人，并且認為沒人理解你的時候，你會感覺很沉重。但是當你把想法寫到紙上，你就會覺得身上似乎輕了些。”

米納克什拿出了一本筆記本，讀了一些她寫的詩。這些詩寫的是可怕的、破壞性的力量。隔壁桌的一個男人專心地聽著，深深地被她打動了。米納克什的外表和舉止有些男性化，但這無法掩蓋她很美麗這一事實。那個男人站起來向她表示祝賀，并且詢問她的情況，他想坐到我們這一桌和她講話。但她的沉默令人生畏，于是他只好默默退回到自己的位置。

她談起自己的童年。

“那時候村子里有權勢的人常常會毆打比他們地位低的人，還有很多和種姓有關的限制。我是婆羅門，有很多事都不能做。如果一個婆羅門做了手工活兒，另一個婆羅門就不能吃飯。這些事常常讓我覺得有點受傷。我看見女孩兒的遭遇從來不會發生在她們兄弟身上。到城里來之后，我和班上的一個穆斯林女孩兒成了朋友，我們會互相吃對方帶的午飯。我把這件事告訴父親的時候，他說我變得什么都不是了，不是印度教徒也不是穆斯林。之后，我決定再也不和他們說任何事。慢慢地，反抗的念頭在我心里點燃了。我會整夜整夜地想這些事。過去我常常問：‘誰發明了這些界限？為什么會有這些界限存在？’但是沒人回答我這些問題。所以這就是給予我新想法的源頭。”

我懷疑，要想徹底了解米納克什是很難的，她異乎尋常地獨立。從她做事時流露出來的那股憤怒的能量，你能感覺到她在內心的探索，那初具雛形而激烈的探索。聽她說話讓我耳目一新。她也是這座城市的一部分，讓我想起這里的朋友身上讓我喜愛的東西——狂熱地在智識方面尋求對這個世界更好的安排。這也是德里的文化，但這是少數族群的文化，很少浮上水面。

“碩士畢業以后，我開始為一個非政府組織工作，并被派到巴爾斯瓦，這改變了我的生活。”

米納克什的父親努力工作，使家庭過上了中產階級的生活，而她自己卻從親近窮人中獲得終極滿足。她談自己在社群的工作時，我很想知道這種依賴關系是怎樣的：是他們需要她還是她需要他們？

米納克什發現自己和所在的非政府組織產生了分歧。“他們關心的實際上并不是人，”她說，“他們只關心自己的項目。因為是項目給他們錢，而不是人。”最后，她對那個組織的反對意見太多了，于是被解雇了。出乎意料的是，她繼續為巴爾斯瓦做同樣的事情，沒有職位也沒有薪水。

“我把自己的生活奉獻給了這個工作。我單身，所以我把一切都獻給了事業。我每周工作八十個小時，回家也要干，因為事情是做不完的。我有錢的時候，也把錢用在這份工作上。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沒有什么花錢的需要。早年我做的是紡織進出口，我離開了那個行業，因為不喜歡。我不想在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里只是掙錢，然后把生活看作銀行賬戶上的數字。我熱愛為人工作，我喜歡工作能幫到某人或者真正地影響他或她的生活。

“如果今天我去參加巴爾斯瓦的議會選舉，我肯定會贏的。甚至連我的兄弟都說我應該去參加選舉，這樣就能賺很多錢，改變我的生活。但我不想去。我兄弟說企圖理解我就像拿頭往石頭上撞。

“我不知道自己將來會怎樣，但是我知道自己永遠不會過‘正常’的生活。我知道明天會和今天一樣，這是一場持久戰。所以我已經為未來做好了準備，準備好一無所有地生活。我現在擁有很多東西，因為我和父母住在一起。但是我試著不買牛奶，不買水果，因為將來我自己可能沒能力買這些東西。我試著看自己如果獨自生活或者沒有食物的話，是否能生存下來。

“我的父親很不喜歡我整天待在貧民窟里。他不信任移民和窮人。在他以前工作的地方，如果他看見四個人聚在一起說話，他會琢磨他們在講什么，是不是在批評國家？他的思考方式是情報部門式的。如果他聽見別人講孟加拉語，他就會認為他們是孟加拉的非法移民，因為他受的訓練就是那樣。

“他的思維方式是中產階級的思維方式，所以我不和他討論問題，和他吵他無法理解的事是沒有用的。他說我變成了貧民窟女孩兒。我覺得很對不起他，但我不得不這樣做。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知道自己沒有錢，但我仍然覺得自己比另外的那個世界優秀。

“小時候，母親常常對我說，‘你死的時候，沒人會想起你。’我常回答她說，‘媽媽，我死的時候，會有一千個人在我身后哭泣。’”

注釋

[[1]](#_1_12)黑話，指海洛因。

[[2]](#_2_12)隨著商業連鎖咖啡店的出現，印度咖啡屋的收入減少。2011年，該店宣布無法支付房租，并將歇業。《印度斯坦時報》的報道中，該店的歷史被少算了十多年：“四十二年后，太陽終將于印度咖啡屋落下。”Hindustan Times, 14 July 2011.

## 十三　經濟難民的痛苦深淵

［資產階級］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和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1]](#Yi_Wen_Yin_Zi_Zhong_Gong_Zhong_Y)

——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共產黨宣言》，1848年

戰士精神里沒有太多空間用來關心弱者，這沒什么好驚訝的。生活就是戰爭，這對那些不能戰斗的人來說真是太糟糕了。

正在蓬勃壯大的布爾喬亞群體是構建這本書的主題。盡管他們只是德里一個小小的少數群體，但他們的很多財富實際上來自他們身處在一片貧窮海洋之中這一事實。從德里東南邊界延伸出去的是北方邦和比哈爾邦的大片土地，那里有三億人口年平均收入為500美元。這些人不僅貧窮，而且在政治上還處于弱勢，生活越來越糟糕。因此，他們成了勞動密集型產業（諸如建筑、采礦和制造）廉價和幾乎用之不竭的勞動力資源——也正是這一點造就了印度的財富。

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差這一事實，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趕上印度經濟的繁榮，而正是因為印度的繁榮。印度經濟繁榮的部分推動力來自企業對農村的占領，大量的投資與窮困的農業和部落社群的利益相背，把印度農村變成了一片動蕩混亂的戰場。商業擴張需要土地，而印度大多數土地在小農手里，其對土地的合法所有權在尼赫魯時代十分穩固。由于多數農民每人只擁有一兩公頃土地，而且大多數人不愿意出賣，既要合法又要達到企業創辦要求獲得成百上千公頃的連片土地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印度市場自由化后，人們見證了各種形式的巧取豪奪，其中涉及數百萬公頃的農村土地。

有時候，獲取土地的任務是由所謂的土地黑手黨完成的。那些年里，許多巨大的財富由“土地整合人”取得。這些人中，有些使用黑社會暴力把農民從土地上趕走，有些利用政治機構的人脈，不僅專橫地重新分配土地，還非法使用國家資源（比如警察）來執行這些命令。但在很多情況下，對土地的奪取是由國家根據1894年的《土地征收法》（Land Acquisition Act）中的條款來實施的，這部法令由大英帝國頒布，目的是將殖民者從土地的歷史所有者那里征用土地的行為合法化。印度本土精英在自己國家里引發的暴怒和19世紀歐洲帝國主義者在其他國家引發的暴怒極其相似。土地根據專制法律規定被收回，之前土地的賴以生存者只得到很少的補償，有些甚至沒有補償。隨后，土地被出售給企業，價格往往是原來的十倍，這些企業使用土地的方式顯然摧毀了當地的生計。他們能很方便地雇傭土地原來的所有者作為建筑工人、礦工和工廠工人，因為這些人現在一貧如洗。

抗議自己的土地被強行征用以建造特別經濟開發區或汽車工廠的農民們有時會被關進監獄，甚至在一些極端情況下會直接被開槍射殺。但是如此大規模且具有破壞性的巨變不可能不遭遇抵抗。全國隨時隨地都有上百起抗議游行，都是針對征地的。最讓政治集團頭疼的是，一支毛派武裝團體橫掃了這個國家受破壞最嚴重的農村地區，而且在很多地方奪取了控制權。到2006年，武裝團體在東部比哈爾邦、恰爾肯德邦（Jharkhand）、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和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到處組織起來，據說占領了印度五分之一的森林。總理曼莫漢·辛格當年宣布這些組織是“我們國家從未面臨過的最大安全挑戰”[[2]](#Philip_Bowring___Maoists_Who_Men)，這一說法讓城市精英們感到震驚，因為即使到那個時候，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很難想象自己是和數億身處困境的農民、獵人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神話中才有的生物分享著這個國家。

他們沒有卷入這場戰爭，大部分人依然保持著幸福的無知狀態，但這場戰爭卻是暴力而影響重大的。在礦產豐富的切蒂斯格爾邦（Chhattisgarh），政府出售土地的礦產租賃權，在這些土地上，有大量人口以打獵和采集為生。為了把這些人趕走，邦政府動用了民兵組織“和平行動”（Salwa Judum，意為“凈化狩獵”）。和平行動是一個由主流政黨扶植的武裝運動，政府期望其能夠消耗并擊敗在那幾年絕望的日子里威脅國家的叛亂團體。在新政治任務的促動下，這個組織行為狂暴，掠奪焚燒村莊，強奸屠殺，并把部落人口趕進監獄。有幾十萬村民為了躲避襲擊而逃走，因此把矛盾和對資源的競爭帶到了別的地方。

然而，那些從土地斗爭中成功逃走的農村社區也發現，靠以前的謀生手段越來越難以生存下去。由于他們依賴降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雨量，很多農民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在努力平衡盈虧。市場自由化的進程使天平不可逆地偏向了虧損的那一邊。

其中部分原因是生態條件的改變，尤其是水。不斷擴張的城市發現自身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水資源短缺，這就不得不從越來越遠的地方取水，逐漸抽干了方圓數百公里村莊和農業的用水。在農村建起的新工廠需要大量可預知的供水——畢竟有些工廠生產的是汽水，甚至瓶裝水——只有當國家能夠確保無論雨季還是旱季都能供水時，有投資意向的企業才會進行投資。在水源不穩定的地方，情況已經岌岌可危。

但市場自由化也改變了農業經濟，為農民帶來了新的收入選擇，雖然這也使他們承擔了更高的風險。總之，許多農民向前邁入了這樣的新選擇，因為20世紀60年代引入的高強度農業，即“綠色革命”已經耗盡了土地肥力，迫使他們去探索新作物和新化肥。與此同時，進入印度的跨國公司希望印度農民為加工食品提供原材料，這給他們帶來了新收入和新生活方式的機遇。許多農民因此選擇不再種植糧食，而是通過種植經濟作物，如甘蔗、咖啡、棉花、香料或鮮花，來追求更高的回報。但這使他們成了一個在財務上非常脆弱的群體，嚴重受到市場波動的影響。例如，食品成了他們不得不購買的東西，而食品價格在那些年里一路飆升——這種賭博有時會在一無所有中收場。

另外，1991年后印度歷屆政府簽署了各種國際貿易協定，承諾接受和執行外國公司對使用其產品的要求，其中包括保護跨國生物技術公司發布的新一代專利種子。農民大量定購這些產品的原因，是因為農業條件太差，而這些種子被視作解決方案。但根據許可證的規定，農民每個季節都必須從生產商那里購買這些種子，但其中許多種子被設計成無法繁殖的，使農民不能按照傳統做法為下一個季節的種植留種。這些種子還常常被設計成要配合特定的化肥和殺蟲劑產品一起使用，這樣不僅需要大量的現金支出，還需要許多培訓，而培訓卻經常是缺失的。在環境背景已經變得更加嚴峻的情況下，許多農民使用新型化學品耗盡他們的土地，并進入了一種很難應對的債務螺旋。他們往往和當地放高利貸的人牽扯在一起（這種情況正如在許多其他事情上，窮人要付出更多才能獲得和富人同樣的資源）。

所有這些，對農民來說是致命的。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每年約有一萬五千名印度農民自殺。這是他們唯一的出路。

鑒于受印度農村危機影響的人數眾多，情況的輕微惡化就足以釋放出大量的難民潮，而這些難民自然而然地涌向城市。1991年和2011年的人口普查之間，德里人口增加了七百萬，大多數都是來自農村的貧困移民。他們是已經備受推崇的現代化戲碼中的定型角色：因為土地被開挖采礦而支離破碎的部落，無法再用自己的土地喂飽自己的絕望農民，以及因為新工廠的出現而被淘汰的刺繡師、窯匠和木雕師——而他們正是古老傳承的最后一代。

這些人中，有的最終成為破壞他們生活的那些富人的保護者和生活保障者——因為德里的富裕家庭非常需要仆人。事實上，對城市的中產階級來說，能夠輕易買到廉價勞動力是至關重要的。即使是小康家庭也經常雇用司機，而一個女傭大清早到家里來打掃地板上前一天積累的灰塵也是必備的。富裕一些的家庭永遠有保安坐在家門外的塑料椅子上。對于這種不用做事的工作，主要的資質要求就是他們還活著，還沒死掉。

勞工的前呼后擁讓富人們覺得自己更加尊貴，而且這也為他們的“得體”標示出絕對的界限。對于富人來說，做某些特定的事情是不正常或不恰當的，這種想法影響了整個城市的構造。比如說，沒地方停車對他們來說不是困擾，因為他們不是自己開車——司機把他們放到餐廳門口，然后去兜圈，直到他們出來。每件普通的任務——從寄一封信到買一張火車票，都需要在人群中經歷冗長的推擠，這樣的事實沒有受到中產階級的譴責，因為他們幾乎從來沒做過這些事。一般來說，這個城市的富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他們會按鈴叫一個傭人來找車鑰匙，或是叫一個服務生端起就在面前的紅酒瓶，為他們把酒倒進杯子里。

雇傭勞動力的力量是真正的力量。許多歐洲和美國中產階級的日常——洗盤子、洗衣服、給孩子做飯——對印度的中產階級來說是陌生的，其結果就是印度的中產階級常常能在其他方面更有生產力。然而他們和家里傭人的關系卻往往離奇地充滿戾氣。如果你聽到中產階級抱怨他們的女傭，你會產生體諒他們的感覺，因為你覺得這些婦女的作用不是在房子里進行必要的勞動，而是弄丟鑰匙、偷竊珠寶、打破碟子、浪費電、弄壞衣服、把東西放在錯誤的地方、教孩子壞習慣、讓水果腐爛，而且最主要的是，她們會一整天不來工作，從而摧毀其他每個人的生活。原因是（按照她們的說法）：她們病了，或者孩子被野狗咬了，或者因為碰到積水里帶電的電線觸電了，或者她們的貧民窟正在被拆毀，或者丈夫死了，或者姐妹要在某個很遠的村莊結婚，或者某些其他同等荒謬的故事。這一類由女傭造成的痛苦是中產階級談話的主要內容，其程度會讓人想知道，為什么那么多有特權的人似乎為窮人的背信棄義投入了那么多東西。這些中產階級把他們生活中的每件錯誤都歸咎于他們的女傭，似乎已經達到了有史以來最激烈的程度。畢竟幾代人以前，很多德里的有產階級自己本身就是難民。現在，他們看著這些新移民的眼睛，這些為他們做飯、替他們照看孩子的人，似乎會讓他們想起那些寧愿不再記得的暴力和不愉快的事情。

所有這一切的推論是：在中產階級心里，傭人們配不上他們的薪水。傭人的薪水不是他們對中產階級家庭貢獻的回報，而是對無能者的慈善捐贈。中產階級喜歡把自己看成不被重視的恩人，他們并非把窮人看作生產引擎，而是當成一群仰賴他們的智慧和辛勤工作而活的寄生蟲。正是他們——中產階級，為經濟貢獻了真正的價值，他們決心要確保經濟增長的成果僅限于自己和同類人群享受。即使自己的收入增加了很多，他們仍然會憤怒地反對給為他們服務的人加薪。當你搬到一個新的中產階級社群，老居民們（其中一些是百萬富翁）會告訴你，收垃圾的人每月會問你要100盧比，但你只能給他50盧比。“否則對我們所有人的收費都會上漲。”在要花費3000盧比的晚餐上，人們不斷討論著一個女傭的閑話，因為她要求把2000盧比的月工資提高到3000盧比。

抱怨這些事情的人應該知道工薪階層的房租上漲速度和其他人一樣快，他們肯定知道食物價格每年上漲幅度高達12%，但工人階級的這些要求仍然被視為純粹的機會主義。這座城市的中產階級近乎偏執地認為自己在被窮人“掠奪”。他們把上門賣蔬菜的小販描述為“小偷”，而眾所周知，人力車夫們全力以赴就是為了“載你一程”。印度的繁榮屬于中產階級——這是他們的時刻，他們會為之瘋狂戰斗。在一個家庭平均年收入為1400美元的國家，平均收入的輕微變動對于極少數（比如年收入為6萬美元）的家庭來說都是災難性的。所以九成的人從印度崛起的中產階級中被逐出，他們對于更高收入和更好生活的要求是非法的。經濟自由化后的一段時期內，有一條反復出現的口號——“記住窮人！”仿佛是為了回應這條口號，現在似乎是時候要忘記它了。

然而，窮人對中產階級財富的新積累起到了推動作用，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印度農村的災難不僅創造出了唾手可得的家庭傭人，也為建筑公司和工廠主提供了大量勞動力。數以百萬計的勞動力為工廠主創造了財富，同時這些人也為有專業人才工作的管理咨詢公司和廣告公司提供了勞動力。他們通過對采礦和建筑公司的投資創造出可喜的股票市場回報，還為有車階級建造了道路和住宅。但是，再一次，天平牢牢地掌握在精英手中。因為愿意勞動的人絕對數量龐大，雇主從來不必擔心上哪兒找下一批工人，所以他們幾乎不用付錢就能要求工人進行任何強度的勞動。工廠工人每天工作十六小時、全年無休的情況很常見。大部分人的收入都不到每天4美元的最低工資標準，而且幾乎沒有人有養老金或保險。印度工廠現在為世界各地的消費者生產產品，這增加了工人勞動的強度，但對他們的工資幾乎沒有任何改變——如果說自由化給整個體系帶來了額外收入，那么這些收入通常是被承包商而不是被工人拿走了。

事實上，經濟自由化后的十年里，廠主對工人的談判力量發起了侵略性攻擊。最初，德里工廠約九成的工人都是永久雇工，這意味著他們不僅享有更高的工資，還有養老金和健康保險，并受到各種法律保護。許多工人一輩子都在同一家工廠工作。但隨著全球化帶來的新壓力，這種情況對工廠所有者來說變得越來越沒有吸引力，他們找借口開除工人，而且常常是大批量開除。到了2000年，七到八成的工人是臨時工，相應地，他們的法律和經濟狀況也更加不穩定。工人個體無法對自己的情況提出申訴，因為有一大堆人等著取代他們的位置，而大規模抗議會遭到嚴厲的處置，經常伴隨著警棍和催淚瓦斯。警察似乎總是毫無疑義地站在工廠那邊，哪怕抗議的起因是由于工人死亡或管理層離奇和帶有虐待性質的暴力。

與中國不同（那里很多工人吃住在宿舍，然后由班車送到工廠），印度雇主對工人在工作以外的生活設施投資很少。工人只有臨時工棚，而且往往沒有活水可用，因此工人很難實現對自身最低限度的保護——包括維持健康，以及在幾小時后回到工作崗位之前能獲得足夠的休息。不用說，工廠生產出了大量的“人類邊角料”——生病了不再能工作的人；年滿三十五歲，年紀太大的人；那些在機器上失去了手指和手，因此除了在街上乞求，別的什么都干不了的人。

但這種不受控制的情況對雇主來說也不方便，因為他們的工人和企業之間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可以不打招呼，說走就走。他們會突然就回比哈爾邦去了，因為有傳聞說當地的就業前景有所改善；他們會請一個星期的假去參加某個宗教節日；或者他們只是換到隔壁的工廠，因為那家廠主為完成緊急訂單，臨時開出更高的工資。為西方大連鎖店供貨的紡織品制造商通常有六十至九十天的生產和交付時間，否則會面臨嚴厲的懲罰。在之前提到的勞動條件下，要確保一切都按時完成，這才是個大問題。但雇主似乎認為他們的工人是外星人，是不服從到骨子里的生命，不相信與他們之間有達成任何和解的可能性。他們與神秘莫測的工人心靈的唯一接合點就是金錢，所以這是他們施加壓力的地方。在一些工廠中，工人每月拿的是最低工資，約6000盧比，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全勤獎”——如果他們有一天沒有上工，甚至哪怕是因為得病，這筆錢也會被扣掉。但即使是這樣的措施也無法完全保障工廠這個機械化、可預測的空間里不會出現人力資源的劇烈動蕩。這些工人生活在各種各樣的邊緣，受各種緊急情況所困擾——這牽涉到他們在這個國家偏遠地區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孩子（和中國不同，這里工廠的大多數工人是男性）。即使財務上的損失和這些緊急情況一樣嚴重，通常他們也不可能在所有醒著的時間里每天都來上班。

21世紀印度窮人的情況當然和當地動態有很大的關系，比如傳統的種姓等級制度以及城市和農村居民之間缺乏同情心。但從許多方面來說，在這里工作的窮人不僅僅是“印度的”窮人，他們還屬于世界。到21世紀初，事實上，可以說全球經濟的很大部分正在亞洲農村的絕望中運行。在20世紀90年代，那么多制造業轉移到了像印度這樣的地方，原因正在于這些地方運作的制度（盡管運作方式不同）。“正常的”資產階級生活，無論在德里還是紐約，都需要大量參與其中的勞動，而這只有當勞動力保持在非常廉價的水平時才有可能。最終作用于印度勞動力身上的力量不是印度富人的階級藐視，而是全球消費主義的邏輯：新、快、廉價。這種邏輯是無情的，并對人類勞動充滿了無限渴求。亞洲農村生活的死亡影響了上億人，并成為一個絕望的水庫，供這個邏輯取水。

一位具有不同尋常自我批判精神的紡織廠主對此有自己的觀察，她思考了這個自己在其中扮演節點角色的系統：“曾經有過那么一段時間，你可以做一個有個性的資本家。你可以自己決定想要創造怎樣的風氣。現在，你是不是個‘好人’沒關系。完全無所謂。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都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很惡心，但仍然照做不誤。整個系統以絕望為食，而我們是這個系統的一部分。”

當被問及如何解決農村問題時，一名國大黨財政部長說，他要讓這個問題從根本上消失。他說，現在八成五的印度人需要住到城市里。而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七成也就是超過七億的人口還住在農村——仿佛他金口一開，百分比就會神話般地發生翻天覆地的劇變。這些數字反映的事實是，城市精英已經丟掉了想象農村的能力，并由此丟棄了自己絕大多數的同胞，他們只是希望這些人消失掉。一派田園風情的廣告牌為叫“普羅旺斯”的地產項目和類似的印度鄉村做廣告，就像有這么多空著的“生存空間”[[3]](#Yuan_Wen_Wei_De_Yu_lebensraum_Zh)等待著中產階級搬入似的。但城市居民不再理解的是，農業可以支持的人遠遠多于工業，而且如果農業遭到破壞，印度將面臨暴力危機。21世紀早期印度勞動力的廉價源于一個事實，即巨大的過剩，這意味著勞動力不僅易于獲取，同時根據“過剩”的定義，也意味著不是所有的勞動力都能被使用。大量印度窮人并沒有進入資本主義的體系中，他們只是被剩下了。就像巴爾斯瓦的居民，他們和主流經濟的狂熱只維持著最微弱的聯系，并被拋到了一個充滿倦怠和衰敗的荒謬的平行宇宙中。

“我們正在為自己累積巨大的問題，”一名大型私募股票基金的所有者說，“人們談論印度的‘人口紅利’，指的是最近的高出生率可能帶來的年輕而精力充沛的人口的優勢。但我無法這樣看問題。我們每年有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而市場上沒有可以給他們做的工作。唯一能吸收這個量級勞動力的是電子和紡織品制造行業，但是所需的行業規模和我們現有的規模不相稱。

“我們的IT行業很發達，但印度的IT和BPO行業一共只雇傭了兩百萬人。零售和餐館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但那只能再增加四百萬到五百萬個崗位。相比之下，中國的電子和紡織制造業能為一億人提供崗位。印度沒有完全掌握這樣的行業，而且沒有跡象表明我們能為年輕人提供工作。這是個巨大的失敗。”

這樣的失敗對印度這類社會的未來提出了深刻的問題。更多具有歷史意識的觀察者回想起歐洲工業革命期間遭到破壞的農村生活，當時也給城市帶來了巨大的新貧困人口浪潮。同樣，這些人口也遠遠超過了監獄、救濟所或基礎設施項目用工需求所能容納的數量。對傳統農業生活方式的切割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場災難，之后歷經數個世代才能愈合，而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他們是大量剩余的“下層”，無望獲得更好的命運。但不同之處在于，19世紀的歐洲擁有一種21世紀亞洲所沒有的驚人可能性，那就是“新世界”。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亞，尤其是北美對歐洲的工業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工業化造成了大量人口無家可歸和失業，而這些國家扮演了安全閥的角色。在拿破侖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約七千萬人離開歐洲前往“新世界”，這個數字是工業化初期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另外，還有大約一億三千萬歐洲人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死亡。（當然，在同一時期，數以千萬計的“新世界”原住民被同時發生的戰爭和疾病消滅了。）

21世紀的情況則不同。印度人口的三分之一已經是接近四億人了，很顯然，地球上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安置這么多的多余人口。要如何使他們融入一個快速變化的社會，且不用涉及種族滅絕或世界大戰，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我們不應該想當然地認為，這個問題沒有被解決是因為沒有投入大量的智力和物質資源；對于這個問題也不是沒有辯論、沖突或突破。恰恰相反，21世紀初的印度還是一個巨型的社會和經濟實驗室，社會的各個部門都參與其中。農民（有時在政府或在印度農村工作的無數非政府組織的幫助下）在發展新經濟和農業戰略方面展現出了極大的聰明才智，這些戰略是為了降低其處境的不穩定性，讓他們不會放棄土地而去加入大規模的出走。工廠工人抗爭對其權利逐漸侵蝕的方式，變得更有創造力和組織性——到21世紀頭十年結束時，古爾岡汽車制造商無法再指望工人自己的內耗，他們發現自己不得不坐下來進行認真的談判。政府也是如此，盡管無能和腐敗的名聲在外，它還是有能力進行一些有遠見的創新。這些年來，政府為農村社區引入了首個金融安全網，為成年人提供每年一百天、每天100盧比的就業保險，這項措施對于那些受金融不可預測性影響的社區而言至關重要。這段時間里還出現了開創性的《信息權利法》（Right to Information Act)，這部關于信息透明的法律在為貧困社區賦權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我們所見，這些社區的命運以往被政府的詭計玩弄于股掌之中，有了這部法律，他們現在能發現自己什么時候正在遭到欺騙，或者到他們手里的錢比已撥付的款項少了多少。

在印度經濟轉型的風格和人道成本這些問題上，富人們也產生了嚴重的分歧。電視上，農民抗議國家征用肥沃的農業土地，并將其轉換成工廠用地，與代表國家的武裝力量進行血腥對決。這讓所有各種各樣的人都開始沉思自己與這個“新印度”的關系。一些感到失望的城市富裕階層成員已經開始行動，以減輕變革帶來的負面影響。至于非政府組織，其中一些對于“現代生活該是什么樣子，其收益該如何更好地分配”這樣的問題懷著非凡的、創造性的愿景，并將受過教育的人派到國家最偏遠的角落。另外一些則由外國政府和基金會資助，這些資助方在這一時期向印度投入了幾十億美元的發展援助。新聞在大多數情況下仍然是自由的，媒體對當代社會的不公平現象也會給予大力曝光和尖銳評論。

該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也見證了這座城市向腐敗和殘酷發出抗議的浪潮。城市被十幾萬人集會占領的情況越來越常見，人們在對社會弊病或統治者詭計的憤慨中聯合起來。雖然有些不滿可以被歸為利己主義的盛行，例如中產階級對腐敗政客財富的不滿就是這樣，但從這樣的集會所展示的悲痛和興奮中可以很清楚地發現，這些集會關乎的利害遠超過以上這些。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還有更謙卑的雄心，即：對生活在一個更溫柔的社會的渴望，對一種更崇高的人際關系的渴望，對利己主義以外的東西的真誠渴望，還有，從這個世界的公然殘酷中獲得喘息空間的渴望。殘酷的社會往往是最有活力和生產力的。19世紀的歐洲是歷史上最富創造力的社會之一，但哪怕你是擁有這種活力的人，與殘酷共同生活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只有最鐵石心腸的戰士才承擔得起殘酷的全部成本和全然無情的資本主義。印度的中產階級實際上并不比加拿大或瑞典的中產階級更愿意為殘酷負責。在我們“新自由主義”時期的意識形態中，有觀點認為只有自我伸張對人類來說才是“自然的”驅動力，但實際上，對他人的同情比我們想象中的更難擊敗。

比如在德里，引人注意的一點是，很多最富有家庭的女性在對待自己的下人時雖帶著存心的恐懼和輕蔑，卻用空余時間來照顧流浪狗——給它們拿食物和毯子，受傷的時候帶它們看獸醫，生病的時候帶它們回家。

但是，在印度經濟難民這個巨大群體身上會發生什么，要回答這個問題讓人異常傷腦筋，而且善良心軟是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的。事實上，這是一個破壞印度新經濟乃至全球資本主義本身全部邏輯的問題。然而，似乎無法想象可能有另一種組織方式，因為現在所有的一切都已經以那種方式運作。因此，問題最終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不管它，而這差不多就是印度中產階級的作為。國家數億的貧困人口在他們的世界里醒目地缺席，不僅是在個人層面漠視的問題，還有政策上的遺忘。德里的官方戰略是無視那上億人，把他們當作幽靈：他們定期為宴會貢獻勞力，本身卻不需要食物、住所或任何東西。

工人宿舍——這種對工人身體存在的簡單承認，是沒有的。工業城市法里達巴德（Faridabad）建于1947年，但沒有建工人宿舍，工人要自己找到或建一個住所——隨便在什么地方，只要他們能找得到。這成了德里地區所有“規劃過”的城市如歐克拉（Okhla）、諾伊達（Noida）和古爾岡的標準做法。這些城市有巨大的勞動力需求，但明顯而固執地沒有安排任何工人們生活的地方，就好像勞動力是一種非物質的力量，能神奇地操作機器、建造房屋，但并沒有物理存在或需求一樣。大量工人在德里和自己的村莊之間往返。尤其是男人，他們把家人留在鄉下，到德里來幾個月，在建筑工地干活或駕駛機動三輪車，盡力賺錢，同時在住宿或者其他事情上盡可能少花錢。他們租15盧比一天的地下室，睡在建筑工地的帳篷里、三輪車或人行道上。但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人，他們的工作讓他們一整年都要待在城市里，他們得想辦法在其中生存下去。這就是為什么德里除了房地產以外，還有另一種巨大的繁榮，即非正式住房。據估計，20世紀70年代末，德里總的貧民窟人口是兩萬。到21世紀初，數以百萬計的人（也許是城市人口的一半）生活在某種未經批準的住房里——貧民窟、棚戶區、披屋，等等，同時還有成千上萬人沒有任何住所。[[4]](#Delhi_Human_Development_Report)

窮人聚集的地方經常受到當局的攻擊，他們想要不惜一切代價，以保證窮人永遠不會開始想象自己能擁有對于城市空間的物權。20世紀70年代，尼赫魯的孫子桑賈伊·甘地（Sanjay Gandhi)對貧民窟進行了一系列毀滅性的拆除，之后許多在德里工作的窮人在新的貧民區買了地皮，以求保障自己在一個突然變得更不適宜居住的城市里生活。貧民窟擁有繁榮的房地產市場，經營購買和租賃業務，而且實際上和城市其他地方的房地產交易沒什么太大不同，除了整個經營都是未經官方認可之外——土地理論上屬于政府，后者可以隨心所欲地取締整個系統，奪走人們一輩子的投資。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印度政府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就行使了這些權利。對貧民窟的大規模拆除，使得那些即使早在70年代和80年代就已經來到德里的工薪階層也常常突然發現自己無家可歸。那段時期，每年有數十萬或更多的貧困移民從農村來到德里，農村的情況變得非常絕望，使他們無法在那里生存下去。而在德里，窮人可以建造半永久的家的地方正系統性地減少。“剩余”人口達到了數百萬，人們回不去，也留不下來。

一些貧民窟被官方以2010年英聯邦運動會的名義下令拆除，法源依據就是《土地征收法》。當時，有一系列來得正好的可疑的火災燒毀了貧民窟，并驅散了居民，其中一些征地正是在那之后進行的。許多這樣的貧民窟是在20世紀70年代的拆除活動后不久建起來的，現在每個貧民窟大約住著十萬人，這些人在那段時間里已經建造了磚房、供水和下水系統、學校、印度教神廟和清真寺。這些地方都是充滿活力的鎮子，是整個城市的一項重要資源，因為這里住著這個城市那么多工人、家庭傭工、保安，等等。當推土機被派到這些地方，讓人想到的是這一切就像一場毀滅性的軍事打擊。成年男女坐在堆成山的磚頭上哭泣，被毀掉的很多房子是他們親手搭建的；其中一些人與前來監督的警察和官員們理論。孩子們在曾經是街道的地方游蕩，看到房子和學校不可思議地被夷為平地，瞪大了眼睛。很多孩子已經領了任務，要收集沒壞的磚給新的造房人用——他們把磚堆成巨大的墻，堆在拆遷工地邊，每揀一百塊磚兩盧比。在主路上，浩浩蕩蕩的難民排成隊，帶著鍋碗瓢盆和成捆的衣服，尋找落腳的地方。

盡管過程非常曲折，但那些能夠證明自己在這些地方住了很多年的人獲得了土地作為補償。由于補償地塊數量有限，每當政府發現符合要求的人太多的時候，就不得不提高要求。“我們之前說你要能證明自己從2000年起就住在這里。唔，現在你要證明1998年起就住在這里……”當有人去看新的定居點時，比如巴爾斯瓦，他會發現土地條件和那里到工作地點的距離都讓人難以接受。但大多數人什么也沒得到。有些人回到農村去看那里還剩下些什么能為自己所用；有些去康諾特廣場周圍的地下通道和流浪者生活在一起，裹著破爛的毛毯發抖，任憑噪音炸裂自己的腦袋；有些人加入了工廠及建筑工地周圍的施工大隊，生活在藍黃相間的油布下。

以下我們還會看到，他們受到的懲罰將進一步加劇。否定工人的物理空間還不夠，實際上，還要證明他們只是從印度無窮大眾中脫落出來的完全可有可無的部分，他們不應該得到任何東西。通常，建造德里備受吹捧的房地產的建筑工人無法分到鞋子或手套，因為提供這些裝備可能讓人誤以為工人的身體健康是重要的。建筑工人經常受傷，甚至死亡——因為他們沒有頭盔或安全帶，而且對自己在做的工作只有最基本的了解。在英聯邦運動會之前的城市“美化行動”期間，到處都能看到男人、婦女和兒童赤著手為路緣和欄桿上漆，他們的手臂到手肘上沾滿了油漆。整件事就好像拿下層人民開了一個冷酷的玩笑，不斷提醒他們，除了自己的勞動這一純粹事實之外，他們的存在什么都不是，永遠不會被承認。建筑承包商想盡辦法克扣工人的工資，而他們中的很多人則在房地產的繁榮期賺到了巨大的財富。他們不僅不付最低工資（更不用說支付強制社保了），還向在工地支帳篷的工人收取租金，并扣掉發放的靴子和手套的錢。這些細微小事簡直像是在強調一種觀點，讓人覺得甚至遠遠不是錢的問題。它似乎不太像一種財務策略，而是作為一種階級訓導——像你這樣的人沒有要求舒適和安全的權力，你和我們這樣的人不一樣，你不屬于這個故事，而且可能永遠和這個故事無關。

這種策略——選擇不去考慮哺育著印度繁榮的巨大人身痛苦——大體上是成功的。印度的富人沒有花太多時間思考窮困工人的苦難，他們在這方面花的時間并不比美國或者澳大利亞的富人多，因為這些事對他們來說，遙遠程度是一樣的。但有些時候，“大魚吃小魚”的原則還是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還施彼身。

20世紀70年代的貧民窟拆除工程期間，諾伊達的郊區被構想為首都的一處現代化延伸區，用來吸收其增長的人口和擴張的工業。它位于北方邦亞穆納河對岸，該邦的首席部長們逐漸獲得了該項目的土地，并設計了網格式的結構布局，以適應這個得到理性規劃的新鎮。到了90年代末，諾伊達已經完全實現其城市規劃，新中產階級和他們的公寓、辦公室以及商場讓它呈現出一派繁華景象。

2005年，住在諾伊達的尼薩里（Nithari）貧民窟的移民勞工開始向警方報案說，他們的孩子在不斷失蹤。警方沒有立案——這些是沒有影響力的窮人，全國有數十萬或數百萬這樣的兒童失蹤，沒有人會花時間嘗試追查這些報告。然而，在尼薩里的社群中，有人懷疑某個有計劃有預謀的拐騙犯正在肆意行動，這些懷疑開始指向一個商人和其傭人居住的房子。這棟房子后面有一個巨大的排水溝，有些人相信失蹤兒童的遺體被丟棄在那里。

2006年12月，兩名一直無法讓警察對其女兒的失蹤案感興趣的男子找到了當地居民協會的負責人，他同意陪他們檢查那個排水溝。當開始清空堆積的垃圾時，他們發現了一只斷手，于是報了警。接下來的日子里，警方從這個溝里取回了一系列可怕的謀殺案證據——四名婦女、十一名女孩和四名男孩的全部或部分遺骸，大多集中裝在約四十個塑料袋中。而在這棟房子里，警察找到了手術刀、手套、沾了血跡的衣服和幾個孩子的書包。那名商人和他的傭人立即被捕了。

事件發生時，另一位警方領導已經開始帶領警方審訊這位住在房子里的五十二歲商人，莫寧德·辛·潘德赫爾（Moninder Singh Pandher）。潘德赫爾來自旁遮普一個頗有社會關系的家庭，畢業于德里著名的圣斯蒂芬學院（St Stephens’s College)，北印度精英團體中的許多成員都可以算作他的朋友。多數認識他的人對他的評價都不錯。他們說，他熱愛生活，并且是個“正常”人，雖然家庭關系緊張。他與妻子分居了，和兄弟發生了激烈的土地糾紛，并卷入了六起法律訴訟案。兄弟的家人由于害怕潘德赫爾的政治影響，已經向警方提出控告，說他們懷疑潘德赫爾可能有濫用司法的行為。

潘德赫爾在諾伊達過著單身漢的生活，他的家是各種政治家、官僚和警察深夜喝酒休息的地方。除此之外，他還經常邀請應召女郎到他家，進行之后被記者稱為“狂歡”的活動。一個叫為帕雅（Payal）的女子在應召去了一次之后就再也沒出現過。她的父親從一位知道她動向的當地老鴇那里直接收到了她的報酬，這名擔心的父親提醒警察潘德赫爾可能和她的失蹤有關。警察已經知道，直到帕雅失蹤之前，潘德赫爾每天要和她打數次電話。并且在過去六個月中，警察曾三次問他關于帕雅的事，甚至最近還搜查過他的房子。后來，有人質疑潘德赫爾是怎么擺脫這項調查的——是因為警察從中獲利，還是本身就參與嫖娼？

由于DNA測試將發現的人類遺骸與尼薩里的失蹤兒童聯系起來，當地居民聚集在潘德赫爾的房子外面。父母帶著自己死去孩子的照片。人群朝警察大喊虐待，用花盆和磚塊攻擊潘德赫爾的住所，砸破了門和窗戶。警察意識到情況極度敏感，立即試圖彌補過去的失職——好幾名警察因未對報案做出響應而被停職，同時根據居民的要求將排水溝徹底挖開一遍。

調查由北方邦官員移交給了印度中央調查局，后者可以在各個邦收集線索。他們搜查了潘德赫爾在盧迪亞納（Ludhiana）和昌迪加爾（Chandigarh）的房產，并在昌迪加爾重新開始調查一系列兒童綁架事件——這里是潘德赫爾的家鄉。有確鑿證據表明，潘德赫爾是嫖客，一些人認為他可能施行變態行為，也有人猜測，那些殘缺的尸體可能是因為拍攝某種特別可怕的色情作品而留下的。警察公布說他們已經復原了一些照片，上面潘德赫爾被裸體的兒童包圍，這個消息更加強了之前的猜測。但照片上那些完全無辜的孩子們隨后被發現是潘德赫爾的孫子，使這一條線索的調查無法進行下去。

但數量龐大的尸體使得人們普遍懷疑，這件事情的中心不是變態欲望的發作，而是涉及某些更系統性甚至工業性的產業。對許多人來說，從一開始就可以明顯看出，排水溝里的尸體是一家大規模器官偷竊組織丟棄的廢料。據調查發現，潘德赫爾的一個鄰居是醫生，幾年前他被指控涉及這種交易（雖然從未被定罪），而對尼薩里的村民來說，器官偷竊是個令人信服的解釋，他們包圍了醫生的家，并向其投石塊。

器官偷竊的傳聞彌漫在當時的空氣中。尼薩里案案發后的一年，案件審判仍在進行中的時候，古爾岡發現了一個數百萬美元的腎臟盜竊計劃。來自北方邦的貧窮移民被以提供工作為借口，誘騙到一棟私人住宅。等他們到了那里，對方開價要買他們的腎臟，價格據說是3萬盧比。那些拒絕賣腎的人被下了藥，腎臟被強行摘除。然后，這些腎臟被移植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有錢病患身上，費用約5萬美元。后來，據估計，這個買賣已經進行了六年，在此期間進行了大約六百次移植手術。主犯醫生阿米特·庫瑪爾（Amit Kumar）在多倫多郊區擁有一座大房子，在那里他的家庭獲得了全世界資產階級的夢想——SUV、游泳池、孩子在私立學校上學。2008年，他在藏身之地尼泊爾被捕。

印度報紙鋪天蓋地地報道這一樁事件時，尼薩里的居民開始認為這件事和他們自己的悲劇有關聯。他們說曾多次看到庫瑪爾來拜訪潘德赫爾。他們還說看到過救護車停在后者的房子外面，還有護士從里面出來。據觀察說，在溝渠中發現的遺體缺少許多身體部位。正如一位父親提到八歲女兒的遺骸時所說：“他們只發現了我女兒的手、腿和頭骨。那軀干呢？”[[5]](#_Parents_of_Nithari_Kids_Claim_t)

不過，警察很快就不再認為這個案子是器官偷竊手術。他們發現了足夠多的完好器官，所以不可能是器官偷竊，而且他們覺得這種有風險和低效率的手術和潘德赫爾在重型機械生意上的巨大成功并不相符。但關于器官偷竊的懷疑持續了很長時間。這個故事符合很多人對其所生活的社會的想象：一個富人對窮人的殘酷冷漠，把他們的器官偷給自己階級的人，并從中牟利。印度記者和他們的讀者都習慣于尋找和金錢有關的動機，他們認為這是大多數神秘事件的原動力。他們通常不相信神秘的解釋，比如精神病理學，這對他們來說似乎太“美國”了。然而，事情正是朝著這個方向有了進展。

潘德赫爾和他的管家兼廚師蘇倫德·科利（Surender Koli）都在一種叫作“吐真劑”的麻醉藥物作用下接受了審訊。由于這些供述不是法庭可接受的證據，因此沒有公開。但似乎兩人和謀殺案都有牽連，都受到了指控。媒體對兩人關系的性質進行了無盡的猜測。兩個連環殺手這樣找到了彼此，多不同尋常！一位來自金奈的精神科醫生評論道：“這個案件中，一段普通的雇傭關系發展成一種互利關系，可能是巧合。富有的那個人擁有肆無忌憚表達自己力量的信心，而另一個，也少有顧忌，并用自己黑暗的一面和主人配合，碰巧找到了一個危險的出口。”[[6]](#Yin_Zi_N__Lan_Jia_La_Ha_En_Yi_Sh)故事是這樣的：科利被賦予責任，要滿足潘德赫爾對貧窮軟弱的婦女和女孩永無止境的性需求。他出去找能找到的任何人，把她們帶回家。潘德赫爾和她們發生關系之后，庫利再強奸她們，然后把她們殺掉。有時科利錯帶了男孩回來，他們就只是把他殺掉了事。

法醫司編寫的心理概況將他們描述為“情感方面匱乏，同時性方面偏離正常的男人，與妻子和家庭分居，生活在一棟單獨的房子里，試圖以不同的方式應對自己，而并不擔心或在意彼此”。[[7]](#Yin_Zi__Inside_Nithari_Killer_s)

2009年2月，潘德赫爾和科利被判有罪，罪名是謀殺一名名叫琳帕·哈爾達（Rimpa Haldar）的十四歲女孩，兩人都被判處死刑。科利后來還被判犯有其他謀殺罪，并再一次被判處死刑。

雇主潘德赫爾最初被認為是這個陰暗馬戲團的邪惡領袖，但后來，人們對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起了越來越大的懷疑。雖然，如之后最高法院在判決中提到的，31區D-5號“……幾乎成了屠宰場，無辜的孩子定期遭到屠殺”[[8]](#Yin_Zi__Nithari_Murder__SC_Uphol)，我們不可能相信潘德赫爾對正在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盡管他有證據證明某幾次謀殺發生的時候自己人在國外），但是科利的供述一直如此骯臟，以至于讓人覺得不需要有第二個人的參與。

科利自愿在法庭上進行陳述，他說，是因為他需要“為自己減負”。科利描述自己如何利用工作機會或糖果把孩子（通常是女孩）引誘到家里去。（該社群有兩個女孩作證說，科利試圖誘騙自己進屋，但她們沒有同意。）一旦她們進了屋子，他就會勒死她們。他還經常試圖奸尸，但承認自己沒能成功。然后他會把尸體切開，有時還煮了吃。他第一次嘗某個受害者（一個年輕女孩子）時，他說自己吐了，但他還是繼續……

陳述中，他說自己可以為警察帶路，去能找到藏有更多刀、個人物品和身體部位的地方；后來他這樣做了，而他所說的也被證明是真的。

科利來自喜馬拉雅北阿肯德邦的一個小鎮，他為潘德赫爾擔任管家和仆人時，他的妻子和年輕的女兒都留在了鎮上——案發時他的妻子正懷孕八個月。潘德赫爾不在的時候，房子里只有他一個人；而潘德赫爾在的時候，他經常能目睹荒淫的聚會以及妓女的來來往往。他為潘德赫爾的客人做飯，并且十分清楚房子里發生的事。他說，有時候潘德赫爾在自己的床上和兩三個女孩兒一起過夜。他聲稱這一切都使他累積了因激情和欲望產生的巨大壓力。正如他在口供中所說：“潘德赫爾的妻子一搬到昌迪加爾，他就開始每天把應召女郎帶到家里。我會為那些女孩子做飯，并為她們服務。我會看到她們，然后非常渴望性。后來，我腦子里出現了不好的想法——殺死她們，吃掉她們。”大多數情況下，科利殺死的不是這些女孩，而是其他人。然而，遇到帕雅時，科利滿足了自己殺害和“消費”潘德赫爾本人性伴侶的沖動。

有段時間，有一名房客在他們家呆了六個月，使潘德赫爾不能在家里和妓女玩樂。科利說那時候他覺得平靜，沒有要殺人的沖動。

科利還告訴警察，他經常夢到一個穿著飄逸白色連衣裙的女孩，嘲笑他、奚落他。每次夢見她，他就會發抖，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直到找到一個受害者才能解脫。

盡管如此，2009年底，當潘德赫爾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高等法院被判定謀殺罪不成立時，人們普遍持懷疑態度。有一本雜志寫道：“盡管諾伊達警察的辦案方式搞砸了這個案子，但毫無疑問，潘德赫爾與實際犯下連環殺人案的人——他的同伙科利，一樣有罪。”[[9]](#_Portrait_of_Evil)記者們有自己的階級偏見，在這種偏見下，窮人沒有自己的見識，只能服從上司的命令——對這種觀念來說，潘德赫爾必然在其中居于領導地位。仆人最終會同時承擔兩個人的懲罰，這與被印度社會廣泛接受的想法是一致的，因此一旦出事，精英們總是設法把過失推給替罪羊。

潘德赫爾與旁遮普和德里的政治和商業精英之間有許多被記錄在案的來往，加上他派對上經常出現的高級警官，對很多人來說，這一切很容易讓人想象他是如何為自己爭取到無罪釋放的。

蘇倫德·科利的罪責是無可置疑的，而如果要說莫寧德·辛·潘德赫爾在這些謀殺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那么還有待證明。也許他與這些毫無干系。也許真相就是看上去的樣子。也許潘德赫爾對下屬的生活太不在意，沒有注意到任何不對的地方，即使這個在家里和自己一起生活的傭人從附近的街道上誘騙了至少十七個年輕人到他家，謀殺了他們，切塊，并丟在房子后面。

但也許這個故事中還有隱藏的意義。也許這是個寓言，也許故事的可怕之處甚至超過任何人的想象。

潘德赫爾是JCB在諾伊達的一個經銷商，為德里地區提供當時需求很旺盛的掘土設備——正是這種機器被用來摧毀德里的貧民窟，平整好土地，并為建造精英的住房和購物新景象做好了準備。據稱，他從這個生意里每月賺約300萬盧比。用這筆錢，他和權勢小圈子成員夜夜笙歌，隨心所欲地享受著許多窮苦女性的性服務以及科利的勞動。

面對這一切，科利的內在爆發和反應并不是某種希望廢除富人特權的民粹情緒，恰恰相反，科利想要的正是潘德赫爾擁有的——啃噬窮人的權利。如果他無法用和潘德赫爾一樣抽象的胃口來啃噬他們，他就在實質意義上把他們“吃掉”。

潘德赫爾的兒子在科利實施罪行的幾個月里拜訪過他的父親，他觀察到父親的傭人發生了一些變化。“我們雇蘇倫德的時候，他很溫順聽話。但最近他的行為有些不太對。11月去諾伊達的時候，我發現他自大而粗魯，我以前認識的他不是這樣的。我發現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屋頂上打電話。我曾把他的自大行為告訴過我母親。”[[10]](#Yin_Zi__Portrait_of_Evil)也許科利已經攝取了說這番話的人的階級精神，也許他希望自己和這些人一樣自大——那些只占社會很少比例的、得意洋洋且不斷消費的有錢精英。也許他想要模仿這些精英的“胃口”，正是這“胃口”定義了這些精英，并把他們穩穩地置于所有人之上。

我和一位參與尼薩里案受害者父母心理輔導的心理學家見了面。

“怎么會有那樣一個地方存在？”他說，“很多警官去那里參加派對。那個地方就是警察和腐敗企業家串通的最惡劣表現。那里有放蕩的狂歡和應召女郎，但當有人失蹤的時候卻無人質疑。這些人完全沒受到懲罰。像那樣的商人把賄賂警察和為他們安排女孩子作為正常業務運作的一部分。

“這樣的人為我們創造了什么樣的文化？他們把每個人都當作卑賤的來對待，而人們也因此變得卑賤。

“有一次，我正在為尼薩里案的受害者父母做哀傷治療。有人進來說外面來了個政客。除了一位家長，其他人都跑出了房間，因為有人謠傳說會發賠償金。但傳言不是真的，所以過了一會兒大家就又回來了。房間里，大家開始討論傳聞中的賠償金金額——50萬盧比。家長們說：‘如果我們知道死一個孩子會有50萬盧比，我們會送兩個孩子去。’

“我坐在那兒想，為什么我要花力氣來，我為什么在這兒。

“你認為有些原始的東西是超越一切的。你認為，比方說，沒有比父母失去孩子更大的痛苦了。但有些事情甚至更糟糕，痛苦如此之大，以至于人們無情地對待自己孩子的死亡。你可以看到這些事在這個國家無處不在。”

注釋

[[1]](#_1_13)譯文引自中共中央著作編譯局出版的《共產黨宣言》1997年8月第三版。——譯注

[[2]](#_2_13)Philip Bowring, ‘Maoists Who Menace India’, New York Times, 17 April 2006.

[[3]](#_3_11)原文為德語lebensraum，指通過種族清洗而為純種日耳曼民族創造出的生存空間。

[[4]](#_4_8)Delhi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Delhi, 2006.

[[5]](#_5_5)‘Parents of Nithari Kids Claim to Have Seen Dr Amit Kumar at the Infamous D-5 House of Pandher’, Midday, 11 February 2008.

[[6]](#_6_5)引自N. 蘭加拉哈恩醫生（Dr N. Rangarajan）, teesutalk.blogspot.in.

[[7]](#_7_4)引自‘Inside Nithari Killer’s Mind:“Would Watch Girls Come In, Even I Felt the Urge”’, The Indian Express, 12 October 2009.

[[8]](#_8_4)引自‘Nithari Murder: SC Upholds Death Sentence for Koli’, The Indian Express, 16 February 2011.

[[9]](#_9_2)‘Portrait of Evil’, India Today, 22 January 2007; 關于尼薩里案的大部分細節都出自這篇文章。

[[10]](#_10_2)引自‘Portrait of Evil’, India Today, 22 January 2007.

# 縮影

芒果肯定是最具文學性的水果。有數不清的故事講述芒果的神奇力量，更多故事關心的是可愛的盜賊（孩子或是猴子）從吝嗇的芒果園主人那里成功偷到芒果的狡猾計謀。芒果在涉及性欲的文學中也有突出的地位，因為盡管它的短絨毛葉子不像人類的任何器官，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但它仍然能成功地挑逗起神秘的情色想法。

在德里熾熱的5月，小販的手推車上開始堆起芒果，這時候很容易讓人覺得這些芒果是從一個童話故事里掉出來的。想象一下：四十五攝氏度的下午，天空都凋萎成了白色，來自苦澀平原的風吹進來，如同從烤爐撲面而來的一陣熱氣，沒有任何水分能幸免于蒸發。洗好的衣物掛在外面，五分鐘內就被干燥的空氣吸干了。這空氣也吸著人的身體，吸人的眼睛和舌頭，讓內臟脫水。

在這樣漫天的干燥里，突然有許多種芒果涌入這個城市——它們毫不羞澀、令人垂涎欲滴的濕潤質感是一個奇跡。這無情的自然為自己造成的破壞提供慰藉，在同一時刻展現出殘酷的沖擊和微妙的撫慰，這本身就是文學了。就像破爛變成財富、傻瓜欺蒙國王——芒果會吸引故事，是因為它們推翻了世界通常的邏輯。

切成小塊，如陽光般的橙色是其對這個季節的妥協，這就是現在出現在桌子上的芒果。我的朋友高塔姆（Gautam）和我各自拿了一碗，帶著一種解脫感吃著。水果是從冰箱里拿出來的，在我們剛剛經歷了某種氣候上的緊急狀態之后，這些芒果讓我們的身體恢復到了某種平衡。

我們坐在半明半暗中，為了遮擋外面毒辣的陽光，把所有的百葉窗都合上了。房間的角落里有一束安靜的光射出來——有個玻璃盒子里裝著一個塑料的泰姬陵模型，交替閃著不同顏色的熒光。風扇像直升機的旋翼一樣轉動著。

高塔姆和我路過這里是來接一個朋友——蘭吉特（Ranjit），但他還沒下班，于是我們坐在前廳和他的父親巴捷特（Baljeet）聊天，他母親則從廚房拿來更多點心。我們坐在鋪著白色沙發巾的沙發上。因為我們的到來，蘭吉特的母親打開了熒光燈，于是整個房間沉浸在一片綠光里。

巴捷特身材矮胖，整個人的重量都靠一把舊扶手椅支撐著。他告訴我們他最新的計劃，且這個計劃最近有了些樂觀的發展。他從身上的白色庫爾塔衫口袋里拿出一張皺巴巴的紙遞給我，然后帶著一股得意的神情鬼鬼祟祟地笑起來。這是一張2000盧比的收據，上面的日期是1980年4月。

“這是一張DDA彩票的收據。”

德里開發局（DDA）是尼赫魯政府設立的，合并自德里的各個規劃和開發部門，全權負責首都的開發。為了實現開發目的，該局有權強制征收土地或大幅壓低征地的價格。這是一家壟斷的開發機構，其排他性由法律保障，使私人個體或者企業不可能在德里界內擁有多于數公頃的土地。但時不時地，開發局會通過抽獎把土地發放給個人。參與抽獎的人要支付一筆不退還的費用，然后就等著，有時候要等上好幾年才能知道是否抽中了一塊土地。如果被抽中的話，他們就能以一個之前說好的價格把地買下來。

“這位女士1980年參與了抽獎，現在她還沒得到任何消息。但是今年，她可能會獲得一塊土地。我是說，她將得到一塊土地。當然，她不知道自己能拿到地。但是我知道。因為我在DDA有人。所以我試著從她那里把抽獎收據買下來。已經三十年了，她不會再在意這個，她會很高興放棄的。其實她已經說了她想把收據賣掉，所以那塊地會被分給我。那地應該值150萬盧比。”

他緊緊地抓著扶手椅，就像這椅子是個寶座一樣，然后坐起來盯著我，在我臉上尋找贊許。

“要做這種生意，你得認識DDA里的人。為了防止腐敗，DDA的官員每兩到三年都會換崗，所以你得不斷建立關系，帶他們出去，給他們送禮。

“等最后我拿到了地，我會付錢給我所有的關系。這里給兩萬，那里給兩萬。”

在巴捷特的世界里，這就叫作生意。生意是由作弊操控的抽獎，任何涉入其中的人最好對結果有所準備。這一輪，你可能夠幸運，騙贏了別人，下一次可能就不一定了。

“我已經賺了上千萬盧比，也損失了上千萬。因為遇到詐騙，我大約已經損失了600萬盧比。有個人賣給我一處根本不存在的房產。我付了400萬，大部分是現金。但這房產的賬面價值只有60萬，所以340萬就這么沒了，但我為了另外的60萬提起了上訴。DDA回復我說，我沒辦法打官司。因為是DDA里有個人用一處房產同時騙了兩個人，從兩個人那里都收了錢。”

巴捷特已經退休一陣子了，之前他為馬哈拉施特拉邦銀行（Bank of Maharashtra）工作了很久。這家銀行是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總理任期內國有化的數家銀行之一，所以巴捷特實際上是印度政府的雇員。他工作的很多內容都是為實現甘地夫人對國有銀行的民粹主義承諾——他在印度最偏遠的一些地方工作，開設支行。在很多情況下，這些支行是那些地區里最早提供正規銀行業務的網點。1976年，在為銀行服務的同時，巴捷特開始投機房地產，這也是他現在花時間和特別花精力做的事情。

“還有一次我在這附近的市場里買了一家店鋪。我開始經營這家店鋪，而且生意很好。但我不知道的是（賣給我的人知道），這個鋪位很快就要被拆掉了，因為一個很有權勢的房地產開發商想開發那里。他有政治支持。而且我的店鋪不在獲批準的集市界內，是違法建筑，所以在官方意義上，店鋪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也沒有得到補償金。我損失了230萬盧比。”

一陣陰郁的沉默。

高塔姆頗有哲學意味地說：“但你情況還可以。你還是有兩棟房子。你給兩個兒子都供了房子。”

巴捷特悶悶不樂地咕噥了兩聲作為回應，然后開始講另一樁失敗的生意。

“1976年，桑賈伊·甘地想整頓德里，他把城里的乳制品廠都關掉了。DDA占用了城市外圍一些村莊的土地，并把這些地給了奶農作為補償。但是那些地方，部分地區現在根本不再是在城市外圍了，并且自那以后變得非常時髦。所以現在那些乳制品廠的老板試圖獲得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蓋房產的許可。

“獲得大塊土地的標準方法，”他說，“是以某些公共用途為目的，用包含高額補貼的價格把地買下來——比如用作學校、寺廟、體育設施等，然后你再付錢給某個官員，將土地的用途做變更。但這是一場賭博，因為土地用途可能無法變更，然后你手里就只剩一座破廟了。

“三四年前，有些人想把他們的奶牛場以高得離譜的價格賣掉，他們說，以后土地用途可以變更，可以被開發成房地產。他們已經把奶牛場分成了一塊塊的土地，每塊賣120萬盧比。”

高塔姆說：“我們所有人都對他說，‘別買！別買！那不是個好投資。’但是他們真的更改了土地用途！”

“現在那些土地上的房子售價7000萬盧比。”巴捷特說。

他大聲苦笑起來。

“如果你每樁交易都賺錢，那每個人都會來做這生意。這生意風險很高，每次投資你都得當作錢已經沒了。你要對自己說：‘錢已經沒了。’然后錢可能會被成倍成倍地賺回來。”

他突然咳嗽起來，他的健康狀況不太好。

“過去，他總是手里拿杯酒，”高塔姆說，“他每天晚上都喝酒，每天要抽兩到三包煙。去年，他的肺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不得不去醫院，差一點死掉。現在他戒煙了。”

巴捷特不好意思地笑笑，做了個無可奈何的手勢。他把話題轉回到生意，向我們傳授他的經驗——如何區分好的交易和壞的交易，如何攜帶大量現金。

“同一條路線我從來不走兩次，每次我都變換路線。而且我不把現金帶到家里，而是放進手提箱留在汽車里。別人永遠想不到會有人瘋到把300萬留在車里。”

我們正聊著，巴捷特的另一個兒子吉米（Jimmy）來了。他在遛狗——他就住在附近另一棟家族房產里。他穿著水洗風的牛仔褲，戴著墨鏡，滿頭大汗。他媽媽拿了杯水給他，他一口氣喝完了，把杯子放回托盤，她一直耐心地捧著那個托盤站在他面前。吉米滿身是金飾，金項鏈、金手鐲、金表。他也在做房地產生意，他和高塔姆開始說到一處剛開建的新公寓，他覺得會賺很多錢。

巴捷特插進來，表示不同意兒子的觀點。他對我說：“他不是他老爸那樣的專家，他跟我比還差得遠呢。”

似乎為了回應父親，吉米開始吹噓自己在國外旅游的事。他父親從來沒離開過印度，所以這是吉米唯一能夠勝他一籌的地方。他一有機會就去迪拜和曼谷。他給我們講迪拜能買到的東西，還有黃金市場。

“旅游的時候你帶太太去嗎？”我問。

“我帶她去迪拜，去買東西。不帶她去曼谷，誰會帶老婆去曼谷？”

大家齷齪地笑起來。

“反正我也不讓她喝酒，”吉米說，“所以她去也沒什么意義。”

他開始說起最近癡迷的網絡撲克，說話的時候眼睛看著地板。他是個吹牛大王，不過是特別容易緊張的那種。他的內在是分裂的，他的一部分人格壓倒了另一部分。

“吉米不肯去歐洲，”高塔姆說，“因為他對自己的英語不夠自信。我告訴他，在歐洲有很多地方都不說英語，但沒用。對他來說，白人就是說英語的。”

巴捷特的太太拿來了茶和炸蔬菜。房間里很安靜，因為父子倆成功地讓對方閉了嘴。他們很高興聽高塔姆說話。高塔姆很健談，說話的時候很放松。他最近買了輛新車，大家都喜歡聽新車的故事。

“幫我買車的那家伙，就是幫我買第一輛車的那個人。那時候，我有輛摩托車，但那車讓我的背出了嚴重的問題。我就和那家伙提了一下，他說：‘買輛車啊！’他說如果我有7.5萬盧比的話，他就能幫我安排其余部分。我說：‘讓我想想。’

“第二天他打電話給我。‘你還想買嗎？’我說，‘好啊。’他說，‘那你想買什么車？什么顏色？’等等。然后他打電話給車庫，五分鐘后再打給我說，‘再過四十五分鐘車會停在你家外面。’我們連一張書面的東西都沒弄，過了幾分鐘，一輛嶄新的車就出現在我家門口了。

“所以我想買這輛車的時候，又打給他了。這輛車的價格是60萬盧比。我給了他一張10萬盧比的支票，他就把車給我了。‘我會安排剩下的事。’他說。又一次，我們沒有簽任何紙質協議，一拿到車我就開去山里了。在山里的時候，這位朋友打給我說，我的支票跳票了。我覺得很抱歉，因為感覺就像我故意給了他一張空頭支票，然后拿了車逃跑似的。但是他一點兒也沒煩心。‘別擔心。’他在電話里一直說，好像是他在安撫我。”

這時候蘭吉特出現了，并為自己的遲到向我們道歉。他很快喝光了一杯他媽媽為他準備的茶。

“我們走吧。”他說。

我們和他父母告別。吉米跟著我們出了門，這樣他可以查看下拴在樓下的狗。他的狗是一條年輕的獒，體型很大、精力旺盛，看到我們下樓簡直激動得歇斯底里。我們冒險跑到了外面。吉米把狗放了，即使在這種讓人窒息的熱浪里，它還是威風凜凜地跑遠了。我們到了德里北郊的夏利馬爾花園（Shalimar Bagh），那是個已經被遺忘很久的沙賈汗皇帝建造的花園舊址。這里的空間很寬闊，就像在巴爾斯瓦一樣。雖然巴爾斯瓦似乎是另一個世界，但離這里只有二十分鐘步行的距離。公寓樓前面是一大片下坡空地，坡下是一條閃閃發光的運河，這條河本身就是莫臥兒水系的一處遺跡。雖然建筑物有些衰敗，但這里有一種安逸的感覺——四處懶散地停著汽車，樹木自由生長。

我們一路走著，吉米問我是否認識誰可能有興趣買房。他說了一串房子的特點：意大利大理石地板、組裝式廚房，還問我要了郵件地址，這樣就能發樓層平面圖給我。我們到了高塔姆的車跟前，車子新得連座椅上的塑料套都還沒拆掉。坐進去以后，我從搖下的車窗里把自己的郵件地址拼給吉米。等我一關上車窗，空調馬上就呼呼地運行起來，吹干了我們的汗水。我們開走了，運河上方的太陽慢慢下沉，那只獒在后面歡快地追著我們。

“吉米很厲害，”高塔姆說，“他不會錯過任何一個機會。那家伙和每個人都有生意做。你想借50萬盧比？他當天就能給你辦好。你要兩萬個衛生棉條？他直接送到你店里。他能幫你偽造任何你想要的文件。任何你想在夏利馬爾花園做的事情，他都能幫你牽線搭橋，比如找誰，出多少錢啥的。”

蘭吉特在車上打電話。他開了一家小旅行社。他在試著幫一個客戶解決問題，這個客戶被加拿大拒簽了。“那家伙，”蘭吉特在打電話的間隙說，“每年付700萬所得稅。他是個生意人，有妻子和兩個小孩，但他的旅行紀錄太單薄了。問題就出在這里。”

夜晚才剛剛開始。我們還要去接高塔姆的另一個朋友，他在沙德集市（Sadar Bataar）自己的店里。那個市場是火車站附近一個巨大的批發市場，那附近的路很熱鬧，很快我們就被一堆商販和人群堵住了。我們前面的司機趁機打開車門，往街上啐了一口檳榔。人力腳踏車從我們旁邊繞過，車上堆滿了裝著化學品的桶和一袋袋包裝盒。我看著幾個婦女坐在人行道上做掃帚。遠一點的地方，機械師正在為一輛加長的“悍馬”豪華轎車做涂飾。他們完全是用一輛吉普的部件，然后把它們焊接在一起成了這個東西。但它看起來很像一輛悍馬，車前還放了一個悍馬標志。現在他們正在把它噴成金色。

我們一點點往前挪。一輛人力腳踏車湊到我們旁邊，司機是個臉色明亮的少年，滴著汗，大聲尖叫著，完美地模仿著汽車喇叭。他穿著一件T恤，上面寫著“我可以治愈你的童貞”。旁邊和我們平齊的是一間紡織品作坊，老板坐在外面的一張長凳上，把剪下來的報紙粘在一起做成紙袋子。我能看得出來他為什么不待在作坊里——他把正常高度的房間分成了兩層，這樣就可以裝下兩倍數量的裁縫和機器。但是，在那里面是不可能站直的。

這些作坊的屋頂上建了宿舍，人們用梯子爬上去。工人的內衣像許多灰色的旗幟，飄在頭頂上。每個房間里，你都可以看到大量用于儲水的容器——收集和儲存水是這附近一項龐大的業務。路邊的水泵永遠在運行。人們帶著桶和瓶子成群結隊地涌向它。水泵旁是一棵巨大而茂盛的菩提樹，被撐起來的濕婆和杜爾迦女神的雕像圍繞著樹干，一個身材魁梧且暴露著胸部的女人坐在那里喃喃自語。

我們到了普拉塔普（Pratap）的金屬店。他不在。我們在熱浪里等著。店的前門正對馬路開著，大小不夠一輛小汽車開進去。普拉塔普的兒子阿米特巴（Amitabh）正站在一堆巨大的一公斤重鎳板上打電話。店門口正在卸更多的板，這些板被放下來的時候發出了很大的乒乒乓乓的聲音，但對于汽車喇叭和電動三輪車發動機的喧囂背景來說，這些聲音完全不算什么。阿米特巴必須大喊才能讓對方聽見他要的交易。

普拉塔普將金屬批發賣給大客戶，比如汽車零件、自行車、衛浴產品，等等。整個生意依賴于不停波動的金屬材料價格。阿米特巴把手機掛在墻上，這樣他就可以時刻盯著倫敦金屬交易所不斷變化的行情。

“做這門生意很緊張，”阿米特巴過來加入了我們，“你把錢投資在一定量的金屬上，然后你得把錢掙回來，但是價格隨時會跌。當然，我們也讀報告，關注金屬市場的任何風吹草動，但價格基本上是無法預測的。現在，除了從經銷商那里買，我們也開始自己進口金屬。從簽單開始要整整一個月才能到貨，期間價格可能會發生任何變化。價格就是一切。你比別人貴1盧比，就沒人從你這里買了。

“心理壓力會很大。有時候，幾分鐘里就賺了1000萬，有時候損失也是那么多。有時候你得賣掉房產來填補虧空。做這一行的，有人因為壓力每天晚上得喝一整瓶威士忌，而且還會發泄到妻子和孩子身上。我父親從來不那樣，即使他損失了很多錢，他每天回家也從來不談這些。他知道怎么釋放壓力，周末他帶我們去香港或者曼谷，這樣我們大家都能放松。”

“你們的生意賺多少？”

“我們每年的營業額是10億盧比。”

“只有你和你父親？”

“還有我表兄弟，父親讓姑媽的兒子也來做了。”

普拉塔普1980年從北方邦的一個小鎮來到德里。和他同村的一個朋友幾年前搬來了沙德集市，在一個叫“金屬大王”的成功金屬貿易商手下找了一份經紀人的工作。這個朋友安排普拉塔普在同一個貿易商這里當學徒。由于經紀人要經手很多現金，他向老板保證，如果普拉塔普消失了，他自己會賠償損失。普拉塔普的月收入是600盧比（當時等于75美元）。

“他工作很努力，而且學會了很多東西。他有一個夢想。他把錢存起來——他常常走三公里路去上班，只是為了節省50派薩（當時值6美分）。他想擺脫‘經紀人’的頭銜。經紀人什么都不是，沒人在意。他們有些人賺很多錢，但也只是中間人。他們進到房間里，沒人會抬一抬眼。企業家則是另一回事，企業家受別人重視。”

學習和存了十五年錢之后，普拉塔普闖出了自己的公司。他買了自己的庫存，開了這家店。他做事很有條理，從來不冒太大風險，而且總是清楚自己的局限。

“我父親滿足于一般的風險和一般的利潤，不喜歡做太讓人睡不著覺的生意，也不愿承擔太多風險。他總是說：‘記住金屬大王！’”

幾年前，金屬大王倒了。他買了太多鎳，后來鎳的價格一下子崩盤，使他欠了上千萬美元的債。他賣掉了自己的房產來還債，然后從金屬市場退出了。他幾個兒子之前在做地毯制造的生意，他投奔他們去了。

“想想看，你在那個市場呼風喚雨了二十年，然后失去了一切。他已經做地毯生意好幾年了，但是大家還是叫他金屬大王。”

我們站在店門口抽煙。旁邊有個男人在炸薩莫薩三角餃，香得要命。人行道和店墻之間的縫隙里長出了一簇草，有一頭山羊在咀嚼那草，它尾巴那里有一個很大的瘤垂下來，這讓我們討論了一會兒。這羊散發著一股讓人毛骨悚然的吸引力。

一臺大豐田車開了進來，普拉塔普的工人跑上去把自己的自行車挪開，這些自行車之前都堆在普拉塔普的車位上，這樣別人就不能占他的車位了。普拉塔普從車里出來，西裝像個斗篷一樣披在肩上。他一直在和其他金屬貿易商交換信息，就像他每晚都做的那樣，任何錯過這個部分的人都會在第二天的交易日處于不利位置。他站了一會兒，像家長一樣朝我們揮手，然后縮回車里躲避熱浪。高塔姆去找他的車，并停到店外讓蘭吉特和我上去。

“你來嗎？”我問阿米特巴。

“我得留下來關店。”他推脫說。讓他和父親一起去喝酒顯然有點尷尬。

我坐進車里，跟在普拉塔普后面出發了。

“看到他開的那輛豐田了嗎？”高塔姆說，“他買的時候遇到了很多麻煩。他每天賺100萬到150萬盧比，但是這些錢都是不進銀行的。他幾乎不交稅，他掙的錢沒有任何記錄，所以沒人會給他貸款來買車，而買車是不能用現金的。最后，他不得不抵押了自己的財產來貸款，就為了買輛車。”

天色暗了下來。高塔姆用音響放著印度老電影里的歌。

“不要覺得他不誠實，恰恰相反。他有一套很嚴格的道德準則。對他來說，國家才是腐敗的。他欺騙警察和稅務官員，是為了不放棄自己的原則。這種非官方的經濟（基本上是這里的整個經濟）以一套不同的道德準則運行著。

“但是現在，他每年要付更多的稅，”他繼續說，“因為如果你不能出示應納稅所得額，辦事就越來越難。政府知道有很多像普拉塔普那樣的人，掙10億盧比，但是只向稅務機關報150萬。但他們一步一步在行動——現在他們只想讓這些人進入稅務系統，這樣就能知道這些人是誰。十年前，這些人完全是隱形的。現在他們都有納稅識別號碼，都交報稅表。這是個很大的改變。”

蘭吉特在打另一個電話。他在改一班去內羅畢（Nairobi）航班的時間。一輛破舊不堪的大巴超過了我們，車子側面全是吵吵鬧鬧的乘客的嘔吐物痕跡。

路上的車流包圍了一個婚禮游行隊伍，有那么一會兒，我們被婚禮樂隊堵住了。三十支喇叭整齊地回應著大鼓的節拍，每個節拍的敲擊同時帶著激情和無聊。街上到處都是跳來跳去穿著西裝的男人，他們肩并肩，舉著有繭子的手指。高高騎在白馬上的新郎看上去帶著一種好奇的孤獨。黑暗的街道上，游行隊伍成了一座耀眼的島嶼：穿制服的男人們肩上扛著明亮的燈，一個個用電線串起。游行隊伍的后部，有個人推著一輛載有一臺顫抖著的柴油發電機的推車，竭力為所有的照明供電。

我面前另一側的玻璃窗外有個人在跳舞，他的肚子裸露在外面，襯衫被舉起的手臂高高吊起，跳動的拳擊短褲褲腰上印著一個沒有元音的品牌：MYYTPPPS。

我們強行從街上開過去，最終到達了一家頂著紅色霓虹燈、看上去頗豪華的餐館。普拉塔普的車開到我們前面停下，服務生們認出了他，沖過來為我們兩輛車服務。我們一下去，兩輛車就迅速被侍者開走了。現在，我們在夜色里，在一種微微發紅的光芒中。餐廳入口上方有一尊壯觀的哈奴曼神雕像。月亮從他的猴頭后面升起，今晚是一輪四分之一的月亮。我經常反復想著，無論在這個地方住多少年，我永遠不會習慣那個月亮。我長大的地方，月亮都是活潑地以四十五度角掛在天上，而這里的月相是平躺的。地球是圓的，我們在其之上以不同的角度朝向天空。

我們走進餐廳。歡迎我們的是另一尊哈奴曼神雕像，雕像上裝飾著金盞花，但除此之外，整個餐廳給人一種脫衣舞俱樂部的感覺：只有少量的局部照明，天花板上鋪滿鏡子。餐廳本身就像一個巨大的洞穴，里面的桌子一望無垠——因為墻壁是黑色的反光玻璃。這里只有男人，是商人們常出沒的地方。

我們在一張巨大的圓桌邊坐下，等會兒會有更多人來。我坐在蘭吉特和普拉塔普中間。侍者彎腰把耳朵湊近普拉塔普，他給每個人點了威士忌。已經有人告訴我這頓飯是普拉塔普的局，這是個傳統，他點菜，他付賬。

蘭吉特對我講起他的第一份工作。

“那時候我做的是彩票詐騙，那是個很粗放的工作。我為兩個兄弟工作，他們在那加蘭邦（Nagaland）國家彩票部門里有認識的人。那是20世紀90年代。每天，他們會給那些人150萬（那時候值5萬美元），在開獎前拿到中獎彩票的最后一位數字。然后，他們會把所有那個數字結尾的彩票都買回來。我們那時候會跑遍整個印度買彩票。我負責旁遮普和哈里亞納邦。我會坐早上6點25分的火車到賈朗達爾（Jalandhar）。到了那里，我會給老板打電話：‘我應該買哪個號碼？’‘7。’然后我就去市場，買下所有7結尾的彩票。接著再坐上另一趟火車，去阿姆利則做同樣的事，然后再去其他城市如法炮制。彩票的價格是10盧比，最后一位數字中獎的彩票能贏70盧比，所以我買的每張彩票都能賺60盧比。最后2位和三位數字中獎的分別能贏5萬和10萬盧比，全部數字都一致的贏100萬。所以，除掉賄賂、工資和支出，我老板每天能賺大概200萬（那時候大約等于7萬美元）。那很瘋狂。我們在一個很大的辦公室辦公，一直都有免費的酒喝，大家整天都在打電話。最后，一個兄弟在那加蘭邦去交一手提箱現金的時候被殺了。一個恐怖組織要他的錢，他不給，他們就開槍殺了他。我們整個彩票業務馬上就關停了。但是想象一下那三年他們賺了多少錢。活下來的那個兄弟現在在德里開了很多家餐廳。”

“你應該看看那時候的蘭吉特，”高塔姆說，“他那時候賺很多錢，穿很貴的衣服，開一輛豪車。他經常有滿滿一箱油，你可以對他說，‘我們開去喜馬拉雅山吧’，然后我們就去了。但那個家伙被槍殺以后，他感到很憂心。”

來了一托盤威士忌。蘭吉特不滿意這頓飯安排在星期二，這天是他不喝酒的日子。酒被分給了除他之外在座的每個人——現在我們桌上有七八個人。工作了一天，第一輪酒他們個個都喝得很豪爽。他們表揚蘭吉特能守戒，然后說道：“很高興知道你可以不喝酒。”他們聊起各種關于酒精成癮的嚇人故事，恐慌籠罩著所有人，對話自然而然轉移到心臟病、糖尿病和腎衰竭上。

普拉塔普完全沒參與這些對話。“我今天輸了600萬，”他說，“你們能都別嘮嘮叨叨了嗎？”但沒人在意他。這里的音樂太響了，坐在桌子對面的人都聽不見對方在說什么，所以他們就和旁邊的人聊。蘭吉特繼續說他的故事。

“我決定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我之前一直都賺很多錢，但我知道那工作沒有未來。你做那種事情的時候，不能對任何人說‘我是干這個的’。所以我開始考慮學做一門真正的生意。”

“但你還是先為那個做有線電視的家伙做事了，”高塔姆大笑起來，“蘭吉特被雇去做打手。”

蘭吉特也哈哈大笑起來。

“那時候德里剛剛有了有線電視，每個居民小區里的競爭都很激烈。有個有線電視運營商雇了我，讓我確保沒有競爭對手進入他的區域，如果有人來，我就揍他們。做那個工作的時候，我打了很多架。有一次我在一個檳榔店，一個男的過來說：‘你為什么站在這里？’我說，‘你是誰，憑什么問我為什么站在這兒？’然后我們三個人就把他打了一頓。隨后，我們才發現他是警察。后來突然之間，整個小區都是警察，他們到處打人，要找出肇事者。我們不得不逃出城。”

蘭吉特是個安靜的人，很難想象他并不魁梧的體格能勝任這種工作。

“我有個朋友，以前在一家旅行社工作，他告訴我旅游這一行的前景不錯。于是我就在一家旅行社找了份工作，工資是每月1300盧比（當時值42美元）。那之前做彩票的時候，我每個月賺3萬盧比（當時值1000美元）。但我想學一些體面的事。頭六個月，我做辦公室助理，端茶送水、做咖啡、洗盤子。然后我又做了六個月跑腿的，為顧客送票。然后我又轉到物流部門，跟著大宗貨物到巴林、迪拜或莫斯科。去巴林的時候，我周六晚上出發，公司給我1000盧比津貼和50美元用來辦巴林的簽證。但是我不想把50美元花在簽證上，所以我會在機場待兩天，等星期一晚上的回程航班。我就會睡兩天覺。

“后來我開始管理大企業客戶的行程。那之前，我不知道怎么和重要的人說話，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們長什么樣子。這些客戶一次旅行會花120萬（當時值3萬美元），我要監控整個行程，如果有一班航班延誤了，我會給身在美國的客戶打電話，把問題告訴他們，然后他們會說：‘給我訂另一個航班。’這份工作很刺激。”

蘭吉特現在開了自己的旅游公司。公司是兩年前成立的，他投資了10萬盧比，現在公司的資產是400萬。

“我提供優質的服務。我工作非常努力，我的錢是有意義的。”

普拉塔普點了很多菜，現在菜突然之間都上來了，有扁豆湯、黃油雞、烤肉、烙餅，都裝在锃亮的銅碗里。每個人都埋頭開吃——這些食物擺在你面前，你就會情不自禁地流口水。

威士忌不斷送上來，我不太習慣，但也開懷暢飲。

蘭吉特說：“我看著父親和兄弟在房地產行業工作，我知道自己不想過那樣的生活。沒有標準，沒有固定收入。每天晚上都得陪警察喝酒——我父親一天要喝兩到三瓶，回家的時候常常醉得不省人事。如果你想做房地產這行，你就得那樣工作。然后到了晚上你還得說：‘神，我今天做了這個。請原諒我。’

“我不喜歡那個世界，不喜歡那些人對錢那么不尊重——錢來得很容易，消失得也很容易，很快就變成了衣服、酒和旅游。如果你的錢是努力工作掙來的，你就會好好地存起來。

“不僅如此，做房地產的人對社會也不尊重。你只需要一張桌子、三把椅子和一個電話就能做那生意。大家都說：‘如果你做不了別的，就去做房產。’我兄弟沒辦法一整天坐在椅子上，把注意力集中在屏幕上。他整天得走來走去，還一直在打電話。

“現在我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只要活著，我就會工作，因為我喜愛這份工作。我希望靠自己做起來。我想照顧自己的孩子，給他們更好的教育。唯一還要解決的是我妻子的事。我不喜歡她在離我太遠的地方上班，我正計劃就旅行社的業務對她進行培訓，這樣她就能和我一起工作了。”

“每天，”高塔姆說，“他自己上班前多開兩個小時車把她送到辦公室，然后再去接她。他不會讓她獨自一人在街上。”

“但是和我最親近的人是朋友，”蘭吉特說，“不是我的家庭，甚至不是我的妻子。如果需要幫忙，我首先會打電話給朋友。有一件我不喜歡的事是，現在我工作太努力了，不像以前那樣經常見朋友。我一直問高塔姆想不想一起去旅游，但他沒時間陪我。”

他說這些的時候語氣有些尖銳。實際上這觸及了他們關系里的一個矛盾。高塔姆最近和一個美國白人女性結了婚，蘭吉特不完全贊同這樁婚姻，所以他倆在一起有時候有點尷尬。

“蘭吉特從來沒和我提過，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高塔姆說，“但他內心深處還是很在意這些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他不能忍受我有穆斯林朋友。”

我有點糊涂了。“但是你妻子不是穆斯林。”我說。

“穆斯林、天主教徒，反正都一樣，都不是印度教徒，都不屬于印度教文化。蘭吉特討厭一切擾亂印度教文化的東西。比如說，我沒和父母住在一起，蘭吉特總是對我說這不是我們的文化，我說，‘但是我姐妹和他們住！’他說，‘不要逃避你的責任，應該是兒子來照顧父母。這是你的責任。’”

我吃完了，離席去洗手。吃這樣的東西，整個過程就是迅速地從純粹強烈地想吃肉，到吃不下，再到后悔。之后你會極度想喝水，因為這些東西里面都是大量的油。你一杯接一杯地喝水，但沒有什么用，因為這已經變成了純粹的脂肪，這些水永遠滋潤不了你。

這時候話題轉到了板球，或者更確切地說，轉到了板球運動員的私生活上。坐在我另一邊的普拉塔普插不進這些體育界的八卦，愣愣地瞪著遠處。我試著讓他從沉默中活躍起來。他給我講他的工作。

“現在生意變得很難做，”他說，“已經變成了一個贏家通吃的市場。規模小一點的人情況越來越差，而行業頂端的爭斗非常殘酷。”

“你能怎么辦？”

“超出了某個點，你就做不了計劃了。沒人知道未來會怎樣。我們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讓收入來源多樣化。我們從金屬貿易起家，后來開始做金屬進口，然后還在德里外圍買地，用作開發。我們在德里也買了一處房產，現在用來開健身房。無論發生什么，我們一直會經營好幾門生意。如果某門生意行不通，還有其他的。”

我問普拉塔普覺不覺得自己是富人。

“我在自己的家族里很受尊敬，”他說，“我給過很多親戚錢，還給了我外甥工作。但我不是富人。按照沙德集市里的說法，我是最小的貿易商之一。很多人已經在這里一個世紀了，他們控制著大得多的市場。”

“《福布斯》（Forbes）雜志的億萬富翁排行榜當然只包括公開身家的億萬富翁，”我說，“那些企業家富翁的財產受到公開審計，但肯定有很多其他的億萬富翁永遠不會受到《福布斯》的關注。那些拿著現金的億萬富翁。”

“10億美元是多少錢？”普拉塔普問。“500億盧比。”“哦，沙德集市里能找出好幾個人有那么多錢。如果降到100億，那就更多了。但你永遠看不出來。”

這個話題吸引了所有人，大家紛紛開始講他們知道的超級富豪的故事。有人說，讀到過純金浴缸的故事。

我問：“誰是德里最富有的人？”

好幾個人都說：“馬杜·柯達（Madhu Koda）!”——這是個玩笑。馬杜·柯達是當時的新聞頭條——關于一個窮苦農民的孩子如何變成了億萬富翁政治家。報紙上充斥著他的生平故事。他最早是個礦工和電焊工，20世紀90年代早期進入比哈爾邦政壇，恰爾肯德邦從前一個邦分出來的時候，他成了恰爾肯德邦的一個部長。他實際上是負責礦業的部長，那個邦擁有大量自然資源，并且剛剛進入市場自由化初期，吸引了來自全世界的采礦公司蜂擁而至。后來，在他作為首席部長的任期內，馬杜·柯達因為侵占了近10億美元的資產和投資而被逮捕。據說，他在利比里亞擁有礦場，在迪拜有價值2億美元的房地產開發項目，在瑞典、泰國和印度尼西亞有商業投資，還在印度擁有很多度假屋和房產，其中兩處在德里最高端的住宅區。這些錢部分來自給企業出售開礦許可換取來的現金。新聞報道說，這是一項龐大商業計劃的一部分，這項計劃原本意在以體面的方式結尾，并在納斯達克上市，但是以那種方式隱瞞一切是不可能的。

就某些方面而言，這是個骯臟的故事，但它也具有那些從赤貧到巨富的所有故事中都有的令人興奮的閃光之處。對印度的窮人來說，政治是最快、最便捷的致富路線，這個故事正是這一真理的絕妙證據。窮人通過商業創造財富的故事很受歡迎，但現實中這樣的故事幾乎從未發生。然而，政治為那些來自最邊緣群體的人提供了許多配額和機會，使許多印度最貧窮的人變成了富人。如果你沒有錢、地位或關系，而你想要在這輩子變富，政治是絕對理性的職業選擇。在這個意義上，腐敗的政治是對社會其余部分殘酷慣性的糾正，因此對許多人來說，這并不是絕望的理由，而成了希望的主要來源。

把柯達稱為德里最富有的人之所以滑稽，是因為他剛來德里不久。事實上，他已經從恰爾肯德邦的一所監獄搬到了德里的提哈監獄（Tihar Jail），這樣他就可以繼續出席議會，而且還有人陪。從提哈監獄到議會大廈的巴士路線可一點都不冷清。

大家還在聊天，但為了趕上最后一班地鐵，我不得不中途退席。我和大家告別，這些人現在都已經醉了。高塔姆和我一起走，把我放到地鐵站，這個地鐵站很空曠。我走進一節空蕩蕩的車廂，車廂里空調很強勁，一路都很順暢。我昏昏欲睡。到了地鐵線另一端的站點，我取了車往家開。

快到家的時候我看到一幅奇怪的景象。一個穿著亮閃閃夜店裝的女人在漆黑的路上走著，步子非常不穩，看上去像是隨時會摔倒的樣子。她身后有兩個男人騎在摩托車上，以步行的速度跟著她。我不太確定要怎么辦。已經是凌晨了，那女人看上去對周圍的一切東西渾然不覺——不是喝醉了，而是嗑了別的藥在飛的樣子。我把車開上去，搖下乘客邊座位的車窗。

“你還好嗎？”我問。她從窗子看進來，無法完全聚焦在我臉上。

“你說什么？”

“我問你還好嗎。”

“我？我很好！”

我看她走開了，搖上車窗，看了下前方，正準備繼續開走。這時候我看到摩托車上兩人中的一個跑到了車子前面，開始用兩只手掌拼命拍我的車，與此同時，另外一個人猛地拉開車門，抓住我的胳膊。

“出來！”

“為什么？”

“她是個妓女，你被逮捕了。”

“因為什么？”

“你對她說什么了？”

“我問她還好嗎。”

“你怎么認識她的？”

“我不認識她。”

“從車里出來。”

“你們是誰？”

“我們是警察。”

我走出車子，環顧四周，那個女人好像徹底消失了。

“駕照？”

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身處這種情況。我拿出駕照，看著他檢查。

“這是哪個國家的駕照？”

“英國。”我說。

“你是英國人？”

“是的。”我說。他用一種奇怪的表情看著我，開始把我的駕照號碼抄下來。這時候，我聽到自己車的引擎發動了，轉身看到另一個人把車開走了。

“他去哪兒？”我大叫。

“警察局。”他泰然自若。我目瞪口呆。他繼續默默地做記錄，然后把駕照還給了我。

“上摩托車。”

我爬上摩托車后座，他飛快地朝著我車剛剛開走的方向開去。我們呼嘯著拐過一個又一個暗影婆娑的街角，扎進了主干道的霓虹海洋里。接著掉頭，開上一條岔道，拐了更多的彎，最后到了警察局。我的車溫順地停在外面，車頂上方有一塊牌子，寫著一條對造訪德里警察局的人很有用的建議：“沒有意見的人很少會錯。”

這句話似乎能引出兩種截然相反的結論，老實說，我不知道放這句話的人本意是哪一種。我被帶到一間破敗不堪的辦公室，里面散發著灰塵、汗水和印臺的氣味。有個警察坐在一張桌子后面。他似乎很高興看到我落在他的網里，抓我的警察向他報告了情況。

“你今晚干什么了？”那位老大問我。“我和朋友吃飯。”“女朋友？”他笑了。“就是朋友。”我能看出來他希望我會表現出在道德上處于劣勢。我決定表現得冷淡一點。我身上沒帶多少錢。

“所以你從一個女朋友那里離開以后，覺得能再搭上另一個女朋友？”

我沒回答。

“為什么你在街上和一個婦女說了話又不說了呢？大半夜的。”

我們又把事情的細節說了一遍。他問我住在哪兒，想估摸一下我在德里的地位。外國人的底細你是永遠也摸不清楚的。

“你喝酒了嗎？”他問。“沒有。”我撒謊了。“我們要不要去醫院檢查？”“好啊。”這話激怒了他。

“你什么意思，‘好啊’？”他氣得喊起來。“把你的駕照給我。”

我把駕照遞給他，他演了一場把每個細節都檢查了一遍的大戲。我不準備讓他從堅持自己的意見里獲得滿足。我環顧四周。實際上，我有點被這個地方迷住了，這里是你能想象到的國家權力中最殘破的一個席位。空的電燈插座里有電線露出來，天花板是紙板搭的，上面粗暴地開了洞，讓旋轉著的風扇能伸出來。墻上寫滿了電話號碼，書寫角度古怪錯亂，每把椅子后面的墻壁上都是一團團臟兮兮的棕色，因為大家的頭一直靠在上面。有人在桌上貼了一張貼紙，上面用拼錯了的英語寫著“性感火熱男孩”。房間角落里是一個神龕，里面供著各種神明的雕像。

這間辦公室實際上只是一間巨大儲藏室里清理出來的一個角落，被一大堆各種各樣的警用裝備包圍著。路標、交通錐、架子上一排排的擴音喇叭、成堆的鞋子和靴子。還有床和一堆堆的舊文件。

房間里響起了鳥鳴，我意識到是那個警察的手機鈴聲。他接起電話。“是的。”他嚴肅地說。然后又一遍，“是的，長官。”我能聽到電話另一頭的人提高了聲音，我意識到他正在被責備。我知道，如果就站在這兒看著他受辱，自己不會有好結果，所以我從開著的后門踱出去，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另一個警察正在往外面停著的許多老式小型摩托車把手上掛洗好的濕衣服。事實上，當我的眼睛適應了外面的光線，能夠看清整個院子的時候，我發現這里停著一大片腐朽的車輛。廢棄的小型摩托車、汽車和機動三輪車，全都又破又扭曲地卡在一起。我游蕩進黑暗里，走到樓的一角。這里的樹木古老而高大，有蝙蝠從頭頂掠過。這片機動車廢墟漫無止境，五六十臺警車肯定有，還有生銹的交通燈和路障。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廢墟的盡頭還有兩架小型飛機，上面一半長滿了草。

我走回樓里。回到房間時，那個警察沒理我，他正用一根手指在電腦鍵盤上打字。我坐下來，另一個人進來坐在我旁邊，對講機里不斷冒出夜晚的聲音。他無精打采地從地板上撿起一張破報紙，試圖搞清楚被撕破的那篇文章講的是什么。

最后，桌子后面的人承認了我的存在。他說：“如果我的人沒有從你手上救下那婦女，會出什么事？”

我覺得他已經詞窮了。他說：“你希望讓每個人都知道你晚上做了什么嗎？”我努力順從他。我叫他“長官”，又給他說了一遍事情的經過。他舉起我的駕照，叫了坐在我旁邊的那個警察。“復印一下。”那人拿了我的駕照，走向房間角落的復印機。那臺機器散發著嶄新的光芒，和整個房間的破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按了下復印按鍵，但是那機器一動不動。他轉身朝向桌子后面的人。

“沒紙了。”

桌子后面的人面前有一整包復印紙。他小心翼翼地從里面拿出一張，遞給他的同事，那個警察打開了復印機的紙盒，把紙放進去，關上盒子，按了按鈕，印出了一張我駕照的復印件。

老大給了我一支筆。

“簽字。”他說。

我在駕照復印件上簽了字，也不知道為了什么。他把原件扔在桌子上。

“再也不要回這地方了。”他說。

我拿回自己的駕照，走出房間，然后開了車回家。這一次，我終于順利地到家了。

家里一整天都沒人，房間里很悶。每年的這個時候，房子的磚頭吸收了太多熱量，到了晚上房間都還被烤著一樣。我打開了所有的風扇。

然后我從冰箱里拿出了兩個熟芒果。

## 十四　1984——甘地之死

一個新的商廈里，有個女人拿著麥克風滔滔不絕，聲音讓人無處躲避：“……七十八個甘地，七十九個甘地，八十個甘地，八十一個甘地……”

你逛進一個店，再走出來，吵鬧聲還在繼續。現在的聲音更興奮，語速也更快了。她用帶著濃重口音的英語喊著：“一百四十個甘地，一百四十一個甘地，一百四十二個甘地……”

你好奇，這是在干什么呢？你尋找那個聲音。在商場中庭，她站在一個公共講臺上，手臂環繞著一對興高采烈的夫婦，她數數的聲音近乎歇斯底里的激動。

“二百二十七個甘地，二百二十八個甘地，二百二十九個！甘！地！——這就是我們的獲勝者！”

那對夫婦兩個胖墩墩的孩子因為勝利而開心得滿地亂跑。主持人舉著一疊紙幣給觀眾看。“大家看看這些甘地！”

原來比賽是這樣的，他們要送出一塊價值2500盧比的銳步手表給今晚這個商廈里帶著最多1000盧比面值紙幣的人——這個面值的紙幣上印著圣雄甘地的頭像。得獎的夫婦從一個手提包里拿出了二百二十九張紙幣（22.9萬盧比），由此展示了對這個國家和其隱士國父的高于所有人的忠誠。[[1]](#Gan_Xie_La_Gu__Qia_Na_De__Raghu)

不必有任何驚訝，這是個高度腐敗的地方。

腐敗的主要來源并非是邪惡或貪婪的個人，而是被毀壞的社會關系。并且，正如我們所見，歷史給德里的社會關系施加了巨大的壓力。在其最慘淡的歲月里，德里已經成了一個不再相信社會理念的社會，這就是國家、宗教身份和其他替代“社會”的概念會在這里受到如此崇拜的原因。當沒有社會意識的時候，你不妨就肆意掠奪，因為你無法危害一個不存在的社會。而且如果你不這樣做，別人也會這樣做，理由是一樣的。

人們常常認為，制止腐敗的是有效執法，當然部分情況下是這樣的。但能防止腐敗的還有內部約束。在德里，這些內部制約已經被嚴重摧毀。你經常會見到一些上了年紀的官員，看到你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從來沒從任何人那里拿過任何東西，我本來可以賺個幾百萬，但我從來沒拿過一個盧比。”你看到，需要怎樣強迫性的熱情，才能守住這一原則。你會好奇他們是否仍在試圖說服自己，讓自己覺得這是個好主意。

德里的玩世不恭源于它的歷史，還有它散發著的一種古老的感覺——讓你覺得人類世界的存在就是為了偷竊、毀滅和褻瀆所擁有的東西。無論如何，德里都注定是腐敗的，只不過到了21世紀初，它的腐敗達到了令人眼花繚亂的程度，其原因在于它是首都和聯邦政治的所在地。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于1964年去世，隨后他的位置被拉爾·巴哈杜爾·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繼任，那是國大黨又一位品格高尚的成員，從自由斗爭時期就是尼赫魯的親密同事。但夏斯特里僅僅將尼赫魯的政策堅持了兩年，1966年國大黨又面臨著繼任問題。

印度自開國起就是一黨統治，但此時到處都出現了裂痕。獨立運動高昂的勢頭已經耗盡，而且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印度的現實開始陷入失調。盡管經歷了二十年的發展，這個國家還是陷入了農業危機，嚴重依賴從美國（其意識形態上的敵人）進口食品。即使這樣，也沒能防止同年（1966）在東部比哈爾邦出現的饑荒。物質匱乏的部分原因在于人口的迅速增長——1947年，印度人口的增長速度是每年1%（也就是說七十年后人口會翻倍），到了1966年，人口增長速度接近每年2.5%（三十年后人口就會翻倍）——當時，對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恐懼再次興起，印度成了國際管理階層偏愛的研究案例。與此同時，與中國（1962）和巴基斯坦（1965）的戰爭迫使印度從國外購買武器，這進一步減少了印度本已岌岌可危的外匯儲備；當時的通貨膨脹率已經高達15%。部分是由于這些問題，許多地區和社區對統一印度的觀念不再抱有幻想：國家在南部安得拉邦和東北地區面臨分離主義斗爭，與克什米爾地區的關系越來越軍事化和無望。在印度南部，到處是示威，甚至自焚，為了抗議政府把對當地來說是外語的北印地語強行規定為官方語言（該政策的目的是逐步淘汰另一種通用語言，即英語，這對不說印地語的南部非常不利）。在《印度斯坦時報》的一篇題為“十九年中最嚴峻的形勢”的文章中，一位高級記者寫道：“這個國家的未來是黑暗的，原因有很多，而所有這些原因都可以直接歸咎于國大黨十九年的統治。”[[2]](#S__Mulgaokar___The_Grimmest_Situ)

對于國大黨和要求靈活務實的人來說，那是一段危險而不穩定的時期。在手握大權的國大黨領導層和被對手稱為“辛迪加”（Syndicate）的首席部長們看來，接下去最好的方式是有一個可以從幕后輕易控制的懦弱領導人。這就是1966年他們支持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作為國大黨候選人的原因。她是個女人，而且年輕（四十八歲），他們以為她會有點兒不愿意，但他們大錯特錯了。英迪拉·甘地，帕西（Parsi）[[3]](#Pa_Xi_Ren_Shi_Guo_Qu_Xin_Yang_Su)政治家和官員費羅茲·甘地（Feroze Gandhi）的寡婦，后來成了20世紀最無情的政治斗士之一。

英迪拉之前在父親的總理任期內與其密切合作過，但沒有跡象表明尼赫魯曾有任何讓她繼任的打算——這種王朝式統治的想法會令他的民主和反封建觀點顯得尷尬。而且他可能根本沒考慮過英迪拉會是個可取的候選人——的確，她與自己異常理智、甚至理智到有些拘謹的父親相比，有著非常不同的特質。比如，她沒能在牛津拿到自己的學位。她的政治演講是實用主義的，充滿了口號，而且不曾表現出任何她父親對宏大理念的關注。實際上，她長期的影響力（一直持續到1984年被刺殺），使印度的政治變成了赤裸和殘酷的權力斗爭，以至于后獨立時期的烏托邦主義完全不見蹤影。對于大多數觀察者來說，自她執政以來，很難相信政治行動中有任何理由不是出于對權力和金錢的單純欲望。事實上，在對于一個事件的可能解釋中，最怯懦的解釋往往會獲得最廣泛的信任。

新上任的英迪拉·甘地對于印度貨幣危機的回應是同意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盧比貶值的要求。盧比對美元匯率原先一直固定在4.76左右，但1966年3月貶值了近60個百分點，變成了7.5。

對很多人，尤其是對那些極左翼人士來說，如此順從于資本帝國主義是一種冒犯。這種做法似乎使總理發出了與自由市場和自由企業同樣的聲音。這種聲音在當時越來越清晰——一個新興政黨——自由黨（Swatantra Party）已經成立。作為對1959年尼赫魯管控政策的回應，該黨旨在推動自由市場。國大黨本身在“辛迪加”的影響下也在進一步向自由市場的方向前進。而路人皆知的是，辛迪加和大企業走得很近。

在1967年的選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對自由市場的熱烈追求在選民中間沒有什么吸引力。尤其是對執政黨不滿的年輕人和窮人，紛紛轉向了左派（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政黨）和優先本地區事務的政黨（比如旁遮普的阿卡利黨［Akali Dal］）。國大黨遭遇了慘敗。

選舉過后，英迪拉·甘地的總理位置雖然勉強保住了，卻仍搖搖欲墜。她突然驚人而激進地轉向了左派。她決心粉碎黨內以商業為導向的右翼——不僅包括辛迪加，也包括其黨內的對手莫拉爾吉·德賽（Morarji Desai），并決心向選民發出一項新的民粹主義呼吁。建立了自己的權力基礎后，她解除了德賽財政部長的職務，將銀行國有化，禁止政黨接受獻金——該政策是對辛迪加的直接攻擊，因為他們的收入正來自企業捐贈。她還對大企業和外國資本提出了更大的限制。

在一場又一場的演講中，英迪拉·甘地發誓要根除那些在暗中剝削不幸大多數的少數人。她的語言是民粹式的，盡管從她的行動來看，也只停留在言論層面，但卻極其有效。她有著與人群溝通的非凡天賦，并且能充分運用那種特殊力量，只有那些在真實生活中見過煽動者的人才會鄙視這種力量。她把之前橫在政治家和群眾之間的企業主、工會領袖和封建地主從政治中趕了出去，從而改變了印度政治關系的結構。在1971年的競選活動中，她站在“Garibi Hatao！”（意為“終止貧困”）的標語下，直接對群眾演講。她的形象獲得了某種光環，原始而令人振奮。她在1971年選舉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她乘勝追擊，對巴基斯坦東西兩翼之間的戰爭進行了判斷準確的軍事干預，并且得到了廣泛的擁護。這次干預是作為東巴或“孟加拉國”分裂主義運動的開始，導致了來自西巴基斯坦的可怕報復——可怕的種族滅絕和成千上萬起掠奪，再次展示了南亞這些恩斷義絕的兄弟姐妹之間的殘暴能量。印巴邊界兩側的軍事行動升級幾個月后，巴基斯坦轟炸了印度北部。戰爭在北部和東部的前線開始了。

大量國際利益也牽涉其中。蘇聯向印度提供支持，而美國則支持巴基斯坦，因為美國擔心印度的勝利可能令蘇聯在該地區的影響擴大。但戰爭幾天內就結束了。對印度來說，這是一場具有強大象征意味的決定性勝利。印度從巴基斯坦帶走了約九萬名戰俘。

英迪拉·甘地春風得意，她的風格受到膜拜。她的形象無處不在，仿佛她是女神，帶來了創造和毀滅的雙重爆發，在那些年里為印度的想象注入了巨大的象征性能量，其中一項便是綠色革命。綠色革命始于她的前任，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才開始對糧食生產水平產生了真正的影響。基于新的肥料和高產作物，綠色革命改變了在旁遮普和哈里亞納邦的德里腹地的小麥產量，乃至改變了這些地區的整個經濟走向。另一項成就是1974年成功的核試驗爆炸，雖然說直到20世紀90年代，核彈頭導彈才成為現實的軍事武力，但這次核爆將尼赫魯在40年代提出的一系列研究帶向最高潮，并使印度成為唯一一個在核五國（中美蘇英法）之外擁有這項技術的國家。

那是一段離奇的歲月，龐大的象征符號歡快地漂浮在僵化的現實之上。今天，當人們輕蔑地談起國家控制和“尼赫魯印度”被扼殺的能量時，他們回憶起的通常不是尼赫魯而是她女兒的執政時期。在英迪拉·甘地時期，企業受到限制。經過二十年的一黨統治，本已盛行的腐敗四處蔓延，成了一種流行病。彼時，“官方”腐敗，也就是尼赫魯時期企業向政黨捐款換取影響力的普遍模式遭到禁止，企業轉而依靠收買個人，“公文包政治”的時代開始了。政治成了一門生意，而官僚體制為一種特別強烈而原始的企業家精神提供了結構。

頗具諷刺意味但不難預料的是，那段時間是德里在意識形態上最反對大企業的時期，但也正是那段時間，大企業開始被德里吸引，從而為這座首都作為21世紀初商業中心的崛起做好了準備。尼赫魯時期的德里是一個行政中心，由于之前它處于英國的統治下，沒有什么進行商業活動的空間，企業的規模很小，大公司都避開這里。然而，在甘地夫人執政期間，情況變了——大公司無法避開德里，因為所有的事都需要政府批準。而英迪拉拉攏了大批地方邦政府來削弱對手，同時將所有權力集中在自己手里，那些遠離德里的人開始覺得被排斥在外。那段時間，數家英殖民時期的商行從加爾各答搬到了德里，以逃離西孟加拉邦的罷工和商業封鎖。國大黨于1967年在該邦敗給了一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聯盟。許多來自其他印度北方邦的公司也遷至德里，以便建立自己的政治關系，從而使公司能進入下一階段的發展。數家在今天具有全球規模的公司都是在英迪拉·甘地時代于德里起步的。即便留在其他幾個商業中心的商人也開始在首都保留住房和公寓，使得后來德里房地產出現了驚人的過高估值。德里的公共生活中充斥著新熱情，大家熱衷于建立人際關系網和拉生意。

總的來說，德里對有驚人商業想法的人沒有吸引力。如我們所見，最好的軟件公司都在班加羅爾，也是在英迪拉·甘地時代起步。那些年被德里拉來的人都是因為需要進入政治機構以便開展自己的業務，包括那些尋求控制基本資源（比如房地產、礦產、石油化工）的人、在高度管制領域（如電信或媒體）經營業務的人或主要客戶是國家（比如建筑業、重工業）的人。要想獲得土地、資源和批準，要想避免關鍵環節的推遲、各種能想象得到的騷擾甚至是整個生意因為某些子虛烏有的理由被關停的話，這些人需要在政治和官僚體制中擁有強大的庇護人。

大多數人是看不見那些為德里高層官僚所建的飛地的。這些地方都是漂亮的小村莊，街道安靜，綠樹環繞，遠離道路，由警衛崗亭把守。飛地內部，司機們為官員的汽車撣灰，園丁們為植物修剪枝葉和澆水。房子都設計精致，維護良好。不同級別的人住在不同等級的住所里——最壯觀的住宅非常大，甚至還用樹籬和私人車道把自己和本已與世隔離的其余部分再隔開。

我來拜訪的這家人的房子不是這樣的。房子在一條街道上，位于一排相似的房子中間。但它是個舒適的地方，車道盡頭有個籃球架，讓人隱隱想起美國的郊區。米努（Meenu）來開門，對我的迷路表示歉意。其實她沒什么可道歉的，這些飛地本來就設計得讓第一次來的人根本找不到地方。

我們落座的大客廳里沒什么東西，空蕩得驚人。你會有一種感覺，覺得這個家庭已經搬了很多次家，而且準備好一旦接到通知，就可以立刻再次搬走。

米努的兒子跑出來看是誰來了。他很開心家里來了個陌生人，特別是一個對現在十歲男孩子的文化一無所知的人。他一樣樣地拿出一堆他覺得我需要知道的東西：書、玩具和游戲。他躺在沙發上，腳舉到墻上，給我講學校里的故事。米努給他穿上鞋，把他從房間趕走，說：“現在我可以談談嗎？”他消失了一會兒，但在晚上余下的時間里，他還會繼續對我開展這場不太正當的教學活動。

“我上的是德里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米努說，“之后我參加了一堆公務員考試。我父親在體制內做事，所以這些對我來說不完全陌生。我一次就通過了考試，從二十三歲起就開始做公務員。”

米努現在快四十歲了，她有一張優雅而充滿思索的臉，很隨意地穿著牛仔褲和白T恤，剪了一頭短發。

“這是唯一會讓我有滿足感的工作。”她說。

“公務員對于普通人的生活有很大影響，包括很遠地方的人們。”

她的丈夫阿米特（Amit）走進房間。他身材高瘦，一進來，我就感覺到他和妻子關系很親密。他們都在鐵路部門工作，所以就認識了。和妻子不一樣，他來自比哈爾邦，他的父親在那里的政府部門里工作。

1947年以后，在德里日益龐大的移民群體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沒有受過教育的窮人。根本不是這樣。德里有兩所規模龐大的頂尖大學，數家科研型醫院，還有舞蹈、戲劇和音樂的國家中心。數不清的研究機構和NGO的總部也在德里。它還是印度新聞業的中心，以及政治和政府機構的中心樞紐。盡管這些對于這座城市的組成非常重要，但它們完全屬于都會區，占本地人口多數的旁遮普人完全沒有份。

“政府機構非常腐敗，這是真的，”米努說，“可以說80%的官員都是腐敗的。在體制內干了十五年之后，我很多同僚有十棟房子和很多車子。”

不用說，這些財產不是用公務員的工資買的，因為公務員的年薪很少有超過1.5萬美元的。

阿米特也加入談話。

“那些不去弄錢的人會受到恐嚇，特別是在像海關這種高度腐敗的部門，我以前就在那兒工作。如果你做的是個肥差，但你不謀私，也不塞錢給周圍的人，就會受到很嚴重的威脅。鐵路系統沒那么糟，他們騷擾你的方法就是給你調崗。”

“成功”，在印度的公務員體系中基本上意味著你所在的位置能為有權勢的人提供他們需要的東西，或者，更好的是你有能力制約他們。所以，海關和稅務部門是最積極創收的地方。這些部門的高官能大肆斂財上千萬美元。然而，這里的競爭也非常激烈，需要非常敏銳。印度的官僚機構一直被列為是亞洲最腐敗的,這實在有點太輕描淡寫了。由于關乎大量金錢，并有異常復雜、互相競爭的利益需要交涉，腐敗的印度官僚絕不是廢物。他們擁有的技能和動力成了其在21世紀生活的優良素質。

“當然，有不同層次的賺錢方式，”米努說，“最底層的是‘快錢’，基本上就是受賄做本來就該你做的事。你實際上沒有做錯任何事，你只是收了兩次錢。比方說，如果是你在決定貨運列車的發車順序（這些火車載的是錢，因為有人在等上面的貨物），你可以把本來就是第一位發車的火車排在第一，你還是會拿到5000盧比快錢。因為人們太習慣付錢了。大家已經陷入了一種心態，就是你付了錢車才會開。你剛參加工作的時候，會有前輩告訴你，‘你就干你的事，錢怎么都會來的。’當然，如果你讓另一列車先發了，你會拿到20萬盧比。”

人們能夠欣賞這種對于市場力量信念的運用。為什么不讓市場來決定列車的運行順序呢？第一發車位是個能被拍賣的商品，讓最想要的人得到它，這就是市場資本主義最純粹的形式。從一片空虛中創造出市場，有能力看出每件東西都有經濟價值——這讓印度官僚脫穎而出，他們不僅僅是資本主義不停轉動的車輪上的輪轂（這是他們通常被刻畫成的形象），他們還是一個有天賦的創業階層，具有深刻的資本主義本能。

“有一次我們被調到費羅茲普（Ferozepur），”阿米特說，“那是北方鐵路系統最腐敗的地方。我們對上司說:‘我們不想去，那里非常腐敗。’上司很驚訝。‘在費羅茲普，’他說，‘你只需要打開你的抽屜，就會有成捆的錢進來。’那是真的。過節的時候，你收到的糖果禮盒里都塞滿了現金，所以那是全國最熱門的崗位。為了得到這些位置，人們會出很多錢，他們知道自己通過受賄能掙到薪水的十或二十倍。”

“還有一次，我們被調到比卡內爾（Bikaner），”米努說，“我有自由的人事權，也就是說權力非常大。”

“米努是那個地方第一位女性官員，”阿米特補充道，“男人們不知道該如何稱呼她，他們叫她先生（Sir）。”

“我們到的時候，所有做小買賣的店主都排著隊來獻殷勤。干洗店老板說:‘請用我們家的服務吧。’于是我就問他要價目表。他覺得很受侮辱:‘免費的，夫人。’因為這些人希望結識高級官員，他們會為這個出錢。回報就是他們會在你的私人時間里，帶人去你家讓你幫忙。‘請不要把我妹夫派去那個不太好的職位。’

“比方說，在開往德里的火車站臺工作的人能掙到很多錢，都是來自想要上車的乘客的小費和賄賂。而往其他方向站臺上工作的人就掙得少得多。大多數官員做的就是讓大家在這些崗位之間流轉。這樣，為了保住位置，那些在油水足的崗位上的人就不得不走動游說。

“還有一次，我負責新德里火車站。每天會有10萬盧比從售票窗口進來，然后在官員之間分掉。”

“你在那些窗口買過票嗎？”阿米特說，“你有沒有想過為什么買票成了這樣的噩夢？都是故意的。印度一半的混亂都是官僚系統故意的策略。因為如果事情都很有效率，就沒理由要付錢賄賂了。車站的售票柜臺是非正式收入的重要來源。”

“這門生意的關鍵是車票預定窗口后面的那個人，”米努解釋說，“我剛到德里的時候，接到一個內閣部長的電話，希望把這個位置安排給某個特定的人。我非常震驚，這個國家最有權力的人之一會親自打電話來，就為了新德里車站售票員這個職位，而這個位置月收入可能就只有6000盧比。

“我希望改善車站的工作條件。我覺得工作人員沒有獲得良好的休息。我把英國人寫的火車站規章找出來，看員工休息是什么規定，然后我發現員工每天應該有兩次十五分鐘的休息。于是我取消了一個男孩子在工作時間為大家送茶水的項目，設了專門的茶室，讓大家可以在休息的時候放松。

“但我不知道的是，這樣做引起了一個大問題。因為這個送茶水的男孩子真正的工作并不是送茶水，而是拿走所有預售票窗口積累的現金。任何時間都可能有突擊檢查，如果被抓住有那么多現金，你根本無法解釋。所以那個送茶水的男孩子會拿走現金，并且一直保管到當天下班。他是他們生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把他的差事取消的時候，他們都氣死了。他現在肯定已經回來了。

“這樣的事讓我很不得人心。我擾亂了車站的整個經濟秩序，每個人都覺得我是他們的敵人。有一次警戒調查員來檢查。他們的工作是調查腐敗，但很明顯他們自己非常腐敗。他們受賄，還滿嘴不干不凈，羞辱每個人。工會希望我不讓他們進來，被我拒絕了——實際上，看見他們來我很開心。

“火車站的工會規模很大。他們和上層有聯系，而且很有權勢。他們組織了五百個人包圍我，齊聲大喊，‘Meenu Sharma murdabad!’（米努·夏爾馬去死吧！）就因為我讓警戒調查員進來了。

“現在，我上任新職位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辦公室所有的椅子都弄走，這樣就不會有很多人能坐下來。他們喜歡用那種方法恐嚇你。一旦有人坐下來，就很難把他們趕走。

“大家還經常打種姓牌。我在車站工作的時候，有個男的曾經每天都來找我，對我說，‘我名字叫夏爾馬（Sharma）。’我之前以為他是個傻子，每天來告訴我他的名字。對這些事情我是很天真的。過了很久我才意識到，他是來告訴我，他和我來自同一種姓，所以期望從我這里得到特殊待遇。

“但我最終在那兒獲得了尊重。因為我一視同仁，沒有例外。如果你開了特例，你就能掙到錢，但也會引起怨恨。我根據規定調換大家的崗位，沒人能通過付錢來躲過換崗。

“在進鐵路系統的最初幾年，我有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老板。他是一個極聰明的人，真的會教我怎么做事。他給我上的一課，就是所有文件必須有很好的論證。你不能就簡單地寫‘駁回申請’幾個字。這些都關系著大量的錢，別人隨后可以一直回頭找事情指責你，質問你為什么拒絕那個申請。對我而言，他是一個很棒的導師，不但工作很勤奮，做的文檔也是最優秀的。

“但后來，我發現他極度腐敗。他可以為任何事情做很精密的論證，而這些論證永遠能為他掙到最多的錢。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時候，他在為印度的火車站尋找清潔設備。他讓我整理出一份市場上所有產品的詳細對比。但之后，我只知道有家跨國公司為了拿到合同付了他一大筆錢。他做了大量調研，然后寫了一份只有這家客戶的設備才符合要求的招標書。當然，這看上去像是公開招標，但只有一家公司和這些條件準則相符。

“他非常聰明，永遠不可能被抓住。他工作時間非常長，那時候經常早上6點從辦公室打電話給我。”

“大家都賺很多錢，”阿米特說，“他們和罪犯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就是要把現金藏在哪兒？幾個禮拜前，我們有一個高級別的同事被發現在馬桶水箱里藏了100萬盧比。”

官僚機構是一臺巨大的印鈔機，這就是德里的經濟體里有那么多現金的原因。在德里市中心的市場里，你看見顧客的錢包里有數千張紙幣。大型珠寶店感覺就像銀行，而從某方面來說，他們確實就是銀行——人們在這里把現金換成黃金，一次上萬美元。收銀員的桌子很吵，都是點鈔機嘩啦嘩啦不停地點錢的聲音。

然而，所有這些現金的最終目的地是房產。比方說，在德里，人們買一處400萬美元的房產會付六成的現金，這種情況仍然很常見。但同樣的行為，比方說孟買，被取締的速度遠遠更快。在德里，數十億美元的蓬勃房地產市場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需要不斷消化大量的現金，所以事情的變化不快。在任何一樁交易中，有兩項信息是關鍵的，一是房產的價格，二是“白錢”和“黑錢”的比例，前者是指公開申報的錢，由支票或銀行轉賬支付，后者就是指現金。

阿米特說：“我父母在巴特那（Patna）的朋友對他們說，‘你們家不止有一個公務員，而是有兩個！很快，你們就會有數不清的車子和房子！’可惜他們不了解我們。”

他咧開嘴笑了。

“他們在警戒調查部門給了我一個職位，”米努說，“工作是調查腐敗。我對好幾個高官提出了控告，這可是巨大的侮辱。所以他們很快就把我調走了。他們從來沒想到我會那么做。

“被別人看作一個很難搞的低級別官員是件很嚴重的事。如果前輩講了笑話你不笑，如果不夠腐敗，如果你讓你的上級在他的老板面前不好看，你就會被看作是難搞，就不會獲得升職。

“同時，你還需要很多技巧來玩這個游戲，而且實話說，我沒那種技巧。如果別人幫了你一個忙——比方說一個上級官員給了你想要的職位，你要怎樣報答？我上司打電話給我說：‘我要帶家人去你那區的一個度假村旅游。我需要住宿、交通等等。’我甚至沒意識到他在要什么。我只是說：‘謝謝你告訴我。’但是他期望的是我幫他安排免費的門票和酒店。之后，他為了懲罰我，在很短的時間內給我調了五次崗位，把我的生活弄得非常苦。但問題是，即使我意識到了他想要什么，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他指望我在邦里有一整個關系網絡，認識這些做小生意的人——旅行社、酒店，從那些人那里我可以要求幫忙。但這是一件維護起來非常復雜的事。一旦你接受了那些人的好處，他們來找你做事時你就很難推脫。

“有個生意人一直提出要為我安排一次豪華旅游，”阿米特說，“他會打電話給我說，‘讓我贊助你們家去一趟果阿吧。還是說你更想去意大利？’如果我接受的話，他會用這個做一輩子的把柄。他希望我推動建一條新鐵路到阿薩姆邦的方案。

“這對官員來說是常見的問題。理想的官員能避免和某個特定的商人關系太近，因為如果他這樣做了，就意味著他無法為其他人提供方便，看上去就排斥了其他人。”

我問他們，他們認為為什么事情會這樣運作。阿米特說：“這些年，政客們在脆弱的聯合政府中變得更安全。政府太需要它的聯合執政伙伴了，所以會保護他們不受任何傷害。他們或許是些軟弱可悲的部長，但對執政聯盟來說，他們太重要了，不能讓他們倒掉。”

米努繼續說：“我認為應該怪商界，他們總是愿意付錢來獲得晉升。每個人都想在快車道上。如果你去負責收入所得稅的人辦的派對，就會看到，好像德里的整個商業界都出來討好他們，帶他們出去，要什么給什么。”

“派對文化非常重要，”阿米特說，“這些派對給你一種很強烈的感覺：在德里經商和從政，發展關系網絡都至關重要。高爾夫——你和誰打高爾夫非常重要。你是和某部的部長打高爾夫還是只是某個下級官員？這決定了你的地位。如今，官員不能像以前一樣，只坐在那里做自己的事，再擺擺架子。你得去參加派對和社交。然后你就能為權貴幫忙，這就是最終目的。這種做法太盛行了，很多人去派對甚至都不是為了錢。他們只是希望能待在這個關系網絡的中心。”

時不時地，你會覺得這個城市的座右銘是：我社交，故我在。大家走到哪兒都帶著自己的關系網，會說某某怎樣，自己認識某某——仿佛沒有這些，自我的存在就會停止一樣。臉書（Facebook）完美地進入了這座城市的生活，仿佛只不過是已存在之物在技術上的表現。有時候，你去德里社交界的派對，會覺得自己在玩真人版的臉書。人們朝你走過來，而你幾乎沒留意到，他們看上去奇怪地甚至過分開心地表示能再次見到你，并且熱情地問候你。你甚至沒覺得你們是朋友，但對方這樣一表示以后，你覺得需要表現出一點好奇心。“你最近怎么樣？”你問。但這個時候，他們已經繼續往前走了，他們驚訝地看著你，好像在說：“你？你還在這兒？”他們已經在掃視尋找下一個邂逅，然后你意識到，剛剛發生的好像不是在現實世界中的一個空間里用真實的身體進行的社交對話，而是某種屬于網絡上的東西：你被“戳”[[4]](#Yuan_Wen_Wei_Poke_Shi_Lian_Shu_S)了一下。

“德里正在被接管，”米努說，“被懂得如何操縱這一切的承包商接管。官員愿意出賣他們自己，部分原因是越來越多人來自經濟條件不太好的背景。他們確實有問題。他們覺得過去受了苦，認為從每個人那里拿回點什么是他們的權利。如果你和他們聊天，他們會告訴你，他們做這些從來都不是為了自己。他們希望改善整個族群的命運。而且這樣的人對于地位的標志非常重視——司機、關系網、聯絡人、邀請函。”

“沒人害怕被發現嗎？”我問。

“當然有。他們非常擔心會被發現。被發現了是很丟臉的。但最近我注意到，這種擔心已經不再有威懾力。會不會被發現越來越和你實際做的事情沒有關系。這里面有一種宿命論。最近有一名高級官員過來給大家做培訓，他問參加的人，做什么樣的事可能會讓他們被抓住。‘接受賄賂’，學生們說。‘不對。’‘違反規程。’‘不對。’‘接受好處。’‘不對’，講師說。‘你走霉運的時候，會被抓住。’你越來越常聽到那種話。還有人最近說，‘做錯事被抓住就像被車撞了，這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但被你碰到了，完全是隨機的。你無論如何都不可能事先知道。’

“除了厄運，再也沒有別的約束了。總之，你對此無能為力。所以你也就繼續做下去了。”

英迪拉·甘地的個人崇拜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憤怒和不滿。1975年，她來到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為自己在1971年選舉中受到的瀆職指控進行辯護。法院裁定對她的兩項指控成立，選舉結果無效，她向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訴。然而，在裁決出來之前，甘地夫人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她在國家廣播電臺中解釋了這個極端的做法。她說，“這沒什么可恐慌的。我肯定，你們都意識到存在著一股深流廣傳的陰謀。自我開始實行某些進步措施來造福普通的印度人民起，這個陰謀就一直在醞釀中。”

作為一個天生的專制者，英迪拉·甘地的勢力在緊急狀態的專制條件下壯大起來。她把反對者關進監獄，包括兩名未來的首相和一名未來的副首相，即莫拉爾吉·德賽、阿塔爾·比哈里·瓦杰帕伊（Atul Bihari Vajpayee）和拉爾·克里希納·阿德瓦尼（Lal Kishanchand Advani），還有非常杰出的賈耶普拉卡希·納拉揚（Jayaprakash Narayan）——他長期以來一直通過被自己稱為非暴力的全面革命來推動印度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大規模革新。納拉揚的入獄尤其引發了眾怒，其中也包括國際媒體。他是一個強有力且原則堅定的領導人，一度和尼赫魯家族走得很近，所以看起來好像甘地夫人把自己的叔叔關進了監獄。但這位總理的狂怒才剛剛開始。她一直不喜歡印度聯邦制結構固有的權力分散，當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和古吉拉特邦的政府任期結束時，她取消了邦政府的選舉，直接由德里來管理這兩個邦。新聞自由也被廢除，憲法進行了重大修改，刪除了對總理權力的約束。據國際特赦組織估計，在實行緊急狀態的二十個月期間，有十四萬人未經審判就被監禁，而且在許多情況下還遭受了酷刑。緊急狀態重創了那些直言不諱反對意見的大學。緊急狀態還給錫克教徒和激進的印度教團體機會以樹立自身崇高的道德地位，許多人在面對英迪拉·甘地的攻擊時堅持出于原則的批評。

對于有些人來說，緊急狀態似乎并沒那么糟。社會生活中出現了一種新建立的緊張秩序，與過去幾年的政治分裂形成了明顯的對比。商業獲得了相對規律的勞動力和資源供給，官僚頒發許可執照的效率也不同尋常地高。很多人認為，印度民主的實驗已經結束了，有些人開始歌頌新的獨裁統治。比如有個擅長雙關語的人，發明了疊句“英迪拉就是印度，印度就是英迪拉”[[5]](#_Ying_Di_La___Indira_He__Yin_Du)。

但英迪拉喜愛的長子桑賈伊在緊急狀態中的上位是出乎意料的，這也使得這段時期為德里留下了一個尤為暴力的印記。桑賈伊是德里政治壞男孩中的第一人，他是那些熱愛“祖國”這一概念卻痛恨其現實的危險愛國主義者之一。以指數級增長的大量民眾被他視作骯臟和噩夢，讓他深受困擾。他渴望的是摧毀和根除，然后強制推行衛生和秩序。1975年，桑賈伊二十九歲，禿頭，微翹的嘴角似乎顯示著某種黑暗和令人不安的淫蕩。他突然變成了和母親關系最親近的顧問，并且確實開始根據個人意志制定主要的社會政策。這是一個信號，表明英迪拉·甘地成功地為自己贏得了何等炫目而非凡的權力，以至于她的兒子，一個本身沒有任何政治地位的人，得以依靠和利用一個非常有權勢的小團體對其獻媚和依順。

在德里，他開展了大規模的貧民窟拆除項目，這讓德里開發局副局長——滿懷雄心壯志的賈格莫漢·馬霍特拉（Jagmohan Malhotra）十分高興。馬霍特拉派出推土機拆毀舊德里的貧民窟，造成七十萬難民流落到城市的南部和東部（在那個地方，他們將于21世紀初遇到另一波無情的拆遷大潮）。但這輪動蕩中還有一個更大的創傷——因為這些人也是桑賈伊在另一個大型男性結扎手術計劃中專門針對的對象。這個計劃通過公務員系統來執行，比如警察和學校教師，他們不僅自己被要求去做手術，每天還要把規定數量的男性送去做這種手術，否則就會丟掉工作和薪水。這個計劃立刻變成了一個殘酷和專橫的過程，其負擔不成比例地落在了最貧窮和最弱勢的人身上。

這兩個計劃使得舊德里貧窮的穆斯林回到了持續的恐懼中，他們開始覺得1947年的清洗總有一天會被完成。同時，緊張的局勢升級為社區居民、警察、拆遷車輛和結扎手術小隊之間最可怕的戰斗。印度這個國家之所以能出現，部分原因就在于人們對英國過分殘酷對待平民的憤怒，現在它似乎也扔掉了自己的外衣，展現出了自身種族滅絕的成分——而且從此以后，其病態和殘酷的水平沖破了想象力的局限，特別是對窮人。

但桑賈伊·甘地的絕育計劃瞄準的絕不僅僅是窮人。這個計劃是一個普適計劃，對所有已經有三個或以上孩子的男性來說都是強制性的，而且第一批計劃對象中就包括那些政府最容易找到的人——自己的雇員。公務員、警察、教師都被迫就范，其方式往往非常粗暴，使得國家和其所有關于私人事務（如生育）的主張全都失去了公信力。

對許多已經接受尼赫魯理想、并努力去擔任國家公仆的中產階級家庭來說，男性結扎計劃的實施代表了另一種對整個國家事業的失望。在印度北部，特別是在那些男人仍然試圖從三十年前分治的（真正和比喻的）閹割中逃離的地方，這種象征性的閹割激起了深深的怨恨，因為這種閹割來自他們避難的國家，他們為之投入生命和力量的國家。

1984年10月31日，英迪拉·甘地總理被她的錫克保鏢刺殺，當時她正在政府大廈的私人花園內散步。幾名保鏢一共對她開了三十槍。保鏢隨即投降并被捕——一人當場被開槍打死，還有兩人被關到提哈監獄，之后被絞死。

在1977年的選舉中，甘地夫人已經在選舉中下臺，新總理是人民黨（Janata Party）的莫拉爾吉·德賽。該黨當時成立不久，是一個反對緊急狀態的聯盟。但印度的首個非國大黨政府在內訌中迅速崩潰。1980年的選舉中，英迪拉·甘地重掌政權，其政治目標不再是幫助窮人，除了自己的權力，她不再有任何宏大設想。然而，維持權力需要一些積極的政治表現。英迪拉需要實現經濟增長以維持執政的合理性，于是她的經濟政策明顯地右轉了。她找來了幾位企業界的新顧問，解除了對水泥和糖等關鍵大宗商品的管制，并從世界銀行那里獲得大筆貸款以提高生產力。

但她自己卻屢遭逆境。英迪拉個人力量的主要來源——她的兒子桑賈伊已是議會的一員，但他在選舉后不久，因駕駛私人飛機在德里上空盤旋時失事而遇難。她發現自己在各邦四面楚歌，各種迎合種族認同、宗教理想和區域自治希望的政黨正到處興起。印度獨立已經過去了一代人的時間，其政治已經從一黨聯邦制朝著有些人說的一個更加多樣化的真正民主制度的方向成長，而英迪拉·甘地卻采取強硬策略來維持中央政權。

在所有戰場中，沒有比旁遮普情況更嚴重的了。在激進、有組織的阿卡利黨領導下，當地對領土和自治的要求一直在增長。為了分化阿卡利黨的支持者，英迪拉·甘地支持極端正統派領袖賈奈爾·辛格·賓德蘭瓦勒（Jarnail Singh Bhindranwale）煽動民眾。但很快，她就無法控制賓德蘭瓦勒的崛起了。他越來越常公開呼吁用武力將旁遮普從印度教徒和德里解放出來，而不久國大黨就遭遇了一個重大問題。1981年，一位一直批評賓德蘭瓦勒的資深記者遭到暗殺。賓德蘭瓦勒被捕，但代價是幾個想要保護他的平民的死亡。三個星期后，因缺乏證據，賓德蘭瓦勒被釋放，整個旁遮普邦一片歡騰。中央政府已經變得令人厭惡而不值得信任。在20世紀80年代的野蠻政治中，政客們無所不用其極，包括政治暗殺。

恐怖主義行為越來越堅持不懈。于是在1984年，甘地夫人決定采取軍事行動。賓德蘭瓦勒和他的戰士們在錫克教的至圣所——阿姆利則的金廟（Golden Temple）避難。他們在那里建造了一個巨大的軍火庫和防御工事。1984年6月5日晚上，印度軍隊的幾個團突襲了這座寺廟。隨后一場大規模戰役爆發，導致賓德蘭瓦勒和其數百名手下死亡。

拉馬錢德拉·古哈寫道：

金廟離札連瓦拉園（Jallianwala Bagh）有十分鐘的步行距離。1919年4月，一名英國準將下令自己的部隊向一群沒有武裝的印度人開火。……該事件[[6]](#Gai_Shi_Jian_Bei_Cheng_Wei__A_Mu)在印度的民族主義神話和記憶中占據了一處神圣的位置；其所激起的集體義憤被圣雄甘地巧妙利用，發動了一場全國性的反殖民統治運動。藍星行動的意圖則不同，它針對的是武裝叛亂分子而不是和平集會，后果卻是相似的。它在錫克教徒的心中留下了一道集體創傷，使其對印度政府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德里政權被比作過去的壓迫者和褻瀆者（如莫臥兒帝國），以及18世紀的阿富汗掠奪者艾哈邁德沙·阿卜達利（Ahmad Shah Abdali）。一名前往旁遮普邦鄉村的記者發現了一個“陰沉而疏離的社群”。正如一位上了年紀的錫克教徒所說：“我們內在的自我受到了傷害。我們信仰的基礎遭到了攻擊，整個傳統已經被摧毀了。”現在，甚至那些曾經反對賓德蘭瓦勒的錫克教徒都開始重新看待他。因為，無論他過去犯了怎樣的錯誤和罪行，是他和他的追隨者面對破壞者并以死捍衛了圣潔的神殿。[[7]](#Guha)

數周以后，德里就發生了總理遇刺案。

刺殺事件后，整個城市掀起了反錫克的憤怒狂潮，謀殺和破壞擊碎了本來就不安的城市心臟。相比伊斯蘭教，錫克教在更大程度上是印度教徒的同胞——它的創始人那納格上師（Guru Nanak）是16世紀印度教內部改革和復興運動的一分子。直到最近，許多旁遮普的印度教家庭都還會讓自己的第一個兒子入錫克教，通常是為了還求子的愿。與1947年的事件類似，1984年爆發的暴力對“家庭”的本質產生了巨大的沖擊。點燃錫克教徒戰斗精神的，是他們感到印度教徒將錫克教徒視為印度的私生子；反過來，錫克教徒也拒斥被他們描述為“陰柔”的印度國，并大聲宣示了自己的原則：男子氣概、尚武勇猛。

在一次演講中，賓德蘭瓦勒提出，錫克教徒被歸入一個將圣雄甘地視為國父的國家是一種侮辱，因為他的戰斗技巧是典型的女性化技巧。他（甘地）的符號是一架旋轉的紡車，這是婦女的象征。“那些英勇上師的子孫們，那些以刀為象征的人，能接受一個像圣雄那樣的女人做他們的國父嗎？”這位好戰的領袖問道。“那些是弱者的技巧，不屬于一個從未向任何不公低頭的民族——這個民族的歷史是用烈士的鮮血寫成的。”……為了能夠稱得上驕傲的上師（錫克教的十個公認創始人）的真正后裔，有人認為，所有由于親近印度教而滲入錫克教特征的腐敗，都要被驅除。“印度教”歷史的危險不僅僅在于錫克教徒被剝奪了在其中的正當地位，還在于尚武的錫克教徒被改造成了一個軟弱的民族：“錫克教徒在過去五十年里被軟化和訓練得能夠承受和容忍對其宗教的侮辱和一切形式的壓迫，而且在陰險說教和非暴力崇拜的咒語下，變得頗為有耐心、無異議。但這些說教和咒語與他們的上師和先知們清晰的教導背道而馳，上師和先知的教導是——不要在暴君面前任他欺凌，不要接受任何對宗教、自尊和人性尊嚴的侮辱。”[[8]](#Das_1)

錫克教男性的特征，包括蓄胡子和佩劍（或者AK-47），自然為他們帶來了與印度國的沖突，并最終導致對其女性領導人的刺殺。但對許多印度教徒來說，至高無上的母親這一觀念是不能被逾越的。英迪拉·甘地的死立刻被視為對他們關于印度“家庭”觀念的下流攻擊。作為憤怒的兒子，跳腳報復是再明白不過的責任。“英迪拉·甘地是我們的母親，而這些人殺了她。”印度教的人群大喊道。

顯然，對于雙方來說，1984年的這場危機與未完成的分治有千絲萬縷的關系，而分治對印度教和錫克教這對兄弟的男子漢氣概提出了很多質疑。那是分治后的第三十七年，許多參與當時暴行的人一生中已是第二次看到這些場景，雙方都是如此。用過去這段時間重建生活的錫克教徒發現自己正再次經歷掠奪和謀殺。再一次，他們失去了家園和生計。而印度教徒不斷想起幾十年前從西旁遮普逃離的恥辱，此刻發現自己正在喪心病狂地報復著曾經的難民同胞。1984年11月1日開始的暴力是由偏執的謠言推動的，其中一些顯然來自1947年未解決的噩夢——據說，一車又一車死去的印度教徒被從旁遮普運來，在那里，錫克教徒發動了滅絕運動。還有謠言說，錫克武裝分子在德里的供水系統里下了毒，城市發生了飲用水危機，人們紛紛到他們認為不受影響的很遠的地方去接水。

整整四天時間，暴力肆虐。暴徒在城市里游蕩，帶著刀槍和一桶桶的煤油，焚燒人、住宅和商店。死亡數目無人知曉，估計在三千到一萬之間。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國家機關在試圖平息報復方面明顯很松懈。事實上，國大黨的成員肯定促成了整個事件，他們為印度教復仇者提供武器和酒，并承諾會獎賞他們的殺戮。擁有加油站的國大黨議員為行動提供煤油，而且在某些情況下派裝有煤油的車輛一起參與突襲。國大黨官員拿出錫克家庭的地址清單，有組織地實施襲擊。警察非但沒有采取行動來遏止印度教暴徒，還進一步散布謠言，煽動他們，說錫克人正企圖秘密推翻國家。醫院拒絕治療錫克教徒受害者，警察局也拒絕為針對錫克教徒的犯罪立案。

英迪拉幸存的兒子拉吉夫（Rajiv），在她去世的當晚宣誓就職成為總理，對暴力現象發表了惡名昭彰的冷漠評論：“大樹倒下，大地震動。”

對德里來說，“錫克暴亂”將“法律”變成了下流的胡言亂語。一位評論員指出在德里西部一個叫作薩特普利（Sultanpuri）的社區，是暴力最激烈的地區之一，在那里一名錫克社區領導人和他的兩個兒子被點火焚燒。這三個人叫喊著讓人拿水來。一名警察一直在旁觀，大聲著制止任何人去幫忙，而他用的字句是：“如果任何人敢出來干涉法律（kanoon ke khilaf kisi ne hath uthaya，字面意思是‘舉手違反法律’），他［會］被開槍打死。”印度教暴民已成為法律，煤油的火焰已成為法律。另一個警察用擴音器宣布，任何印度教徒如果被發現窩藏錫克教徒，他們的房子就會被燒掉，因為這樣做是非法的。[[9]](#Das_2)

法律就這樣被踐踏了。對于德里人來說，日后不管出于何種理由讓他們繼續遵守法律，法律都不再是道德的，因為法律不再有任何道德內涵了。這種印象在之后又獲得了強化——對大屠殺的連續調查未能找到國大黨不法行為的重量級證據。到今天，沒有人因當年的事情被問責。三十年來，官方一直不以為意。法律沒有給出評論。

德里無論如何都是腐敗的。但現在，暴亂發出了一條確定的信息，即法律是印度社會生活的墮落成分，人們只能對自己的道德負責任。人必須照顧好自己，因為沒有人會照顧你，而且現在沒有法律來約束一個人該如何照顧自己。德里住宅區“封閉的院落感”正是從那時開始的。過去的那些溫柔不再有了——過去，中產階級的男孩子會把床拿到街上，在炎熱的夜晚里就這么隨隨便便地睡在露天。這種對外人和街道的信任不復存在了。中產階級家庭用三公尺高、釘著鋼釘的門取代了原來只有大腿那么高的圍墻。隨后，私人發電機的風靡不僅與德里供電的不穩定有關系，還和一種自力更生的心態相關：一個人干擾另一個人用電的情況是不應該出現的。私人水井也是如此。市政供水中的毒藥謠言只流傳了一時，但影響卻一直延續了下來。

暴動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轉折點。許多錫克家族1984年后永遠地離開了德里。但對于那些留下來的人來說，尤其是對于印度教徒來說，德里給人的感覺再也不是原來那樣了。我這一代人中有許多在1984年的時候還是小孩或者青少年，對他們來說，錫克暴亂是一個根本性的成長經驗，揭示了（如看上去的那樣）德里社會關系的深刻真相。流血和殺戮似乎沒有隨著印度的獨立而結束。這一次不能歸咎于英國或巴基斯坦，或內部的任何人，這是這座城市永恒的內在本質。

賈斯萬特（Jaswant）是德里錫克貴族中的一員，是1911年德里建設工程承包商的后裔。他七十出頭，給人一種怒氣沖沖的感覺——他戴著一頂軟帽子，襯衫口袋里放著墨鏡。

“20世紀70年代，一股暗潮涌動，認為精英可以為所欲為的意識變成了一種病癥。人們被權力弄得頭暈目眩。他們向英迪拉·甘地獻媚，而國大黨確保他們只要獻媚就能成功。有太多德里的大企業家是從‘緊急狀態’起家的，那時候支持英迪拉的人獲得了巨大的機遇和偏袒。”

賈斯萬特被德里的精英嚇壞了，而他自己也是這個群體的一部分。他謹慎地算計著自己的行為，部分原因是為了激怒和冒犯這個階層。他圈子里的其他人十分厭惡他。“他是個瘋子，”他們說，“他做各種瘋事。有個派對上，他就那樣拉開了褲子，在眾人面前往灌木叢里小便。他打扮得很瘋，講話更瘋。他還辦一些瘋狂的派對。”

賈斯萬特確實很古怪。他的生活充滿了動蕩、模糊的關系和巨大的私人悲劇。經歷過這一切后，他卻比以往更加頑固逆反。但在所有和我聊過德里的人中，他的獨特之處在于他愿意談論暴力和驅逐，而許多人則因為自身階級而對此諱莫如深。在這方面，他的古怪似乎很有針對性。

“看看德里的這種文化。來自西旁遮普的難民來到德里，成了推手推車的工人。他們展示了驚人的事業心，他們有很棒的故事。但現在他們富得不干不凈，根本沒有社會意識。他們是種族主義者，完全忘了本。他們曾經是難民，但他們對德里今天數以百萬計的難民毫不關心。我們從東北部來德里工作的人每天都遭到騷擾和掠奪。這太恐怖了。我的意思是，我熱血沸騰，我不知道要如何阻止自己，不讓自己到外面去扔石頭。

“如果你想知道德里這座城市的性格，去克什米爾或東北地區吧，看看那里在德里的指令下都發生著什么。印度占領那些領土只是靠軍事暴行、恐嚇和強奸。如果那里有任何法制的話，那么整個監獄就會裝滿了犯強奸和傷害罪的印度士兵，包括下這些命令的我自己的家庭成員。但他們受到《武裝部隊（特別權力）法》（Armed Forces［Special Powers］Act）的保護。當然，這和保障生命權的憲法是對立的，但這些都不再有什么關系了，因為已經沒有法治了。這是個徹底無法無天的社會。沒人對任何人負責。治理這個國家的人都是違法者。”

通過1984年針對錫克教徒的襲擊，賈斯萬特對周圍的恐懼被具體化了，那次攻擊連像他這樣的人都沒能幸免。德里人一直都在找職位，找關系，讓自己和這些殘暴的事情絕緣，但1984年的暴徒把所有錫克教徒都當作目標，無論對方多有權勢。

“英迪拉·甘地遇刺后，在媒體和政客們的鼓勵下，至少有一萬五千名錫克教徒在德里被殺。官方數字是三千，但實際被害者遠遠超過這個數字，而且都是用極盡殘忍的方式。

“我們家在帝國酒店旁邊擁有的加油站被包圍了，他們威脅要燒掉它。經理打電話給我，告訴我情況，我說：‘你為什么不打給警察？’經理說：‘那些人就是警察！’最后，有人在帝國酒店開槍，這才把人群驅散。

“我和我的孩子獨自在家。印度教的朋友為了幫我，來我家陪我住。他們知道我處于什么狀態，希望確保我不會做出任何蠢事。我放棄了自殘行為。我決定把頭發剪掉，而不是等國家養的那伙暴徒來剪。我把我父母的水晶打碎，用碎片割斷了頭發。那些頭發我現在還保留著。

“我對所有人都失去了信心，包括那些試圖幫助我的人。我覺得他們的行為太自以為是了。我是德里人，而他們是從外地來的。他們要保護我，他們以為自己是誰？我的家族建造了這座該死的城市，本應該由我來保護他們。

“兩年后，我的車在一個交通燈前熄火了，因為天很冷。我后面有一輛摩托車，司機很不高興。他靠過來把頭伸進我開著的車窗說：‘你們錫克教徒從來不吸取教訓嗎？’印度教徒沒有一絲悔恨，他們很高興‘給我們上了一課’，然后繼續表現出最恐嚇人、最殘忍的樣子。

“還有一次，我走在康諾特廣場上，有個女孩子看見我，問能不能和我說句話。我以為她要侮辱我。但她卻說：‘我能說你戴著包頭巾有多帥嗎？’她的贊美使我非常感動，你無法想象這對我意味著什么。

“但總體上，我對沒人真正站出來反對種族屠殺而感到憤怒。我周圍的人都在努力討好國大黨，拒絕對已經發生的事發表任何反對意見，甚至錫克教徒也是如此。我兄弟是個名流，也是個商人，但他不愿意受這些事影響，他只是和這個城市的骯臟同流合污。

“有一次，在一個前軍官家舉行的派對上（這個軍官后來因為懷疑有個人和他妻子有染而殺了對方），我正在和別人爭論，說媒體本來不應該說那個謀殺英迪拉的人是錫克教徒。然后那個軍官非常不客氣地對我說：‘你應該小心自己說的話。你清楚像你這樣的人會有什么遭遇。’

“我很了解那些人——前陸軍、前海軍、部長們和地主們。他們都很暴力，都不是什么正派人，他們把自己受到的良好教育變成了笑話。軍火商、承包商、大人物的皮條客，這些人互相賄賂，從別人的血肉里賺錢。軍火交易在這個圈子里很受尊敬，因為它能讓你致富，還能讓你說自己很愛國，在為軍隊提供供給。他們就是這么說的。他們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驕傲，他們的妻子也是如此。如果不得不和一個將軍或者別的什么人上床，她們會去的。

“但他們也非常緊張。他們一直都在逃跑，逃到高爾夫球場或者大橋上。他們逃去倫敦過周末，把錢轉移到海峽群島、瑞士或巴拿馬。他們是一群老朽疲弱的精英，所有人都做過心臟搭橋手術，每個人都裝著心臟起搏器，還患有糖尿病和關節炎。他們的腐敗不僅僅是在賺錢的時候，也深深埋藏在他們的身體和靈魂里。他們非常迷信，手指上戴著各種被認為能夠保護自己不受邪惡力量騷擾的寶石。他們還在房間的每個角落里放上小神像。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誰，他們內在的混亂和困惑只能化作偏見和暴力表達出來。”

賈斯萬特對印度邊緣化群體的浪漫主義情緒激怒了許多同輩，他們覺得他做作、乖張。但是經歷過1984年之后，賈斯萬特在這些被邊緣化的人群中，找到了和同類在一起時感受不到的自在。實際上，他的同類讓他充滿了最深的絕望。只有在窮人和被壓迫的人中間，他才能找到些許對人性樂觀的理由。

“1984年發生在德里的是有組織的屠殺，而且我認為這座城市沒有能力吸收掉發生過的一切。傷疤并沒有愈合。在我心里，就個人來說，傷疤還沒有愈合。唯一能讓我松一口氣的，是我發現那些暴力受害者，盡管他們仍持續遭遇暴力，仍然生活在印度境內。幾乎每一個那加蘭邦的村莊都遭到過印度軍隊的掠奪，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掠奪。他們的村莊被燒毀，于是被重新安置到其他地區，這樣一來，他們就被迫侵占別人的領地，于是制造出更多暴力。隨后，國家介入，以暴制暴。所以東北部就是一口水深火熱的大鍋。

“當我遇到那些人，我意識到自己受的苦和他們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他們遭受的苦難無法估量，但那是他們的力量、他們的韌性。他們的手被砍斷了，村莊被毀了，但他們仍然令高種姓的壓迫者蒙羞，因為他們有尊嚴。他們有能力照顧自己。他們才華橫溢。他們是幸存者。即使所有的一切都爆炸了，他們也會活下來，而那些精英們不會。因為當一切都被摧毀，除了尊嚴和品格，將沒有別的東西可以依靠，而這兩樣東西精英們都沒有。

“在東北地區，人們了解自己周圍的每樣東西，而且什么都吃，不存在食物短缺。他們知道如何在饑荒中活下來，他們了解哪些葉子和水果可以吃。他們能吃狗、吃老鼠，而且他們做的飯菜很美味。他們不會過度烹飪任何東西。而這里的這些印度教風格的人，他們這個不能吃，那個不能吃。如果你問我，我會說他們才是真正生活在饑荒里的人。

“如果這個城市發生了自然災害，這里很容易變成人間地獄。我知道那樣的事會發生。我知道這座城市會變成廢墟，倒塌為塵土。當地震來臨，水源枯竭，德里人不會互相幫助。他們會互相殘殺。”

說這些的時候，賈斯萬特相當愉快。

“有一天我坐在自己的車里，在集市上，聽著音樂。旁邊停著兩輛警車，警察們在玩牌。我下車問他們在做什么，他們說自己在保衛一個內閣部長的兒子。‘他來買點東西，他是個不負責任、一無是處的家伙，只知道追女人和喝酒。我們是他的安保團隊，三輛警車。’

“那就是我們生活的社會。我們的警察不是在為社會做事，而是保護貪婪的精英，把他們和社會分隔開來。但是保護他們的這些人對他們是完全鄙視的。如果事情一直這樣下去，總有一天，保護他們的人會開槍把他們打死。”

注釋

[[1]](#_1_14)感謝拉古·卡納德（Raghu Karnad）提供這段軼事。

[[2]](#_2_14)S. Mulgaokar, ‘The Grimmest Situation in 19 Years’, Hindustan Times, 3 November 1966, quoted in Ramachandra Guha, 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Pan Macmillan Delhi, 2008), p. 415.

[[3]](#_3_12)帕西人是過去信仰瑣羅亞斯德教，不愿改信伊斯蘭教的波斯人，約公元8至10世紀遷移到印度。

[[4]](#_4_9)原文為Poke，是臉書上的一個功能。

[[5]](#_5_6)“英迪拉”（Indira）和“印度”（India）在讀音上非常近似。

[[6]](#_6_6)該事件被稱為“阿姆利則慘案”，又稱“札連瓦拉園屠殺”。

[[7]](#_7_5)Guha, India After Gandhi, p. 569.

[[8]](#_8_5)Das, Life and Words, pp. 113–4.

[[9]](#_9_3)Das, Life and Words, p. 168.

## 十五　印度精英的新帝國主義

每個人都想把自己的房子裝修成俄羅斯寡頭的風格。

——德里富豪的室內設計師

1991年，拉吉夫·甘地遭到暗殺。據報道，暗殺是旨在民族解放的反政府組織泰米爾之虎（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所為。拉吉夫·甘地之前發表公開聲明，反對該組織在斯里蘭卡的恐怖主義行動。他被暗殺之時正值印度爆發最大的金融丑聞期間。“博福斯丑聞”（Bofors Scandal）是指有謠言說瑞典博福斯公司通過向國大黨的數名成員，包括總理拉吉夫·甘地本人支付大筆回扣，獲得了一份數十億美元的武器合同。丑聞觸及了印度政治的核心，不僅因為它涉及的賄賂規模空前——據估計約為4000萬美元[[1]](#_Key_Players_in_Bofors_Scandal)，還因為它觸及了政府的最高層——尼赫魯王朝。

這些指控的真相從未被確切證實，但回想起來，其引發的震動始終讓人覺得離奇。因為拉吉夫·甘地去世幾個月后發生的經濟自由化大大提高了這種“高價”交易決策的規模和頻率。它確實引入了一個全新的資金流動系統，把巨額資金集中在來自政治和商業世界的一小伙互相有聯系的交易者手里，為印度創造了一個新的寡頭群體。

只要公共行政是以盈利為目的，那么短期來看，經濟自由化一定會是災難。許可證發放制度的結束意味著，公務員失去了對企業的傳統制約力。商人希望擴建工廠或者發布新產品的時候，不需要再找他們申請許可證，這對政客和官員來說，意味著大筆收入來源消失了。

公共行政之前本來就是一門生意，就像別的生意一樣，而現在，面對困境它找到了創新的方法。若想獲得新的收入來源，政客和官員們不再從大量申請人那里收些小錢，而是從少數人那里收取大筆金額。他們不再通過為商人消除障礙來賺錢，取而代之的“掙”錢方法是，他們變成企業家的合作伙伴，接管企業運營的整個職能部門，也就是需要國家權力的部門。

這正是大企業迫切需要這種合作伙伴關系的時候。經濟自由化之后的幾年里，基礎資源的所有權經歷了大規模轉移：尼赫魯為國家保留的所謂經濟“制高點”轉移到了私人手中，包括采礦、石油、天然氣以及新經濟的燃料——移動電話頻段，當然還有最好的基本資源——土地。誰能確保控制這些資源，誰就必將獲得無窮的收益。但這個轉移的過程沒有先例——在印度（就如同時期蘇聯的東方集團［Soviet Bloc］）這是一場臨時的爭奪，其結局最終握在政治機構手中。因此，站上頂峰的商人都是那些在政治界有很硬關系的人，這些關系往往在甘地夫人主政時期就開始培育了。由于手中利益已經無法更高——任何能掌握印度新經濟的人終將獲得全球影響力，政治家們也可以通過大手筆的收費來幫他們實現愿望。突然之間，有些交易的金額水平讓“博福斯丑聞”都顯得微不足道。21世紀早期的丑聞都是關于企業以低于正常的價格購買上述提及的移動電信頻段和礦場，所涉及的金額累計達到了幾十甚至幾百億美元。印度的億萬富翁人數迅速增長，其財富從1996年的不到國民收入的1%，增長到了2008年的占國民收入的22%。這些億萬富翁六成的財富來自由政府嚴格控制的行業——房地產開發、基礎設施、建筑、采礦、電信、水泥和媒體。[[2]](#Michael_Walton_and_Aditi_Gandhi)

難怪大多數德里人認為，在這座進行著不少全球最大金額交易的城市中，最富有的人并不是那些通過公司賬戶公開其財富的人，而是那些坐著白色古董大使車并拿著1000美元月薪的人。政客避免以自己的名義獲得貴重資產，但不知何故，他們的兄弟和兒子似乎突然擁有了絕好的土地和房產，并在數家優質企業里都有投資。在印度板球超級聯賽的拍賣中，有那么多政治家族競拍板球隊，這不可疑嗎？每次大選的競選開支都翻倍（反過來又給政治家施加了更多將職位變現的壓力），這難道不是標志著政治地位對現任者來說是多么有價值嗎？[[3]](#_Lok_Sabha_Polls_to_Cost_More_th)有關政治家個人身價的傳言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媒體試圖通過追蹤他們的消費嗜好（房子、汽車、在昂貴的美國學校上學的孩子）來猜測其富裕水平。那些年里，到處都存在著對所謂“公務員”看似光鮮的生活方式的不滿。但從許多方面來說，這種對個人財產和生活方式的興趣并沒有抓住重點。因為這個游戲頂端的人早就超越了以個人致富為目標的層次，他們參與的是比這更宏大的事情，這些事情使他們的企業家合作伙伴比他們自己獲益更多。然而，重點也不在于此。這些人是新印度的權力經紀人，他們正在經營的是一個以私有化商業發展為目的和回報的系統，一個擁有與“正常”經濟完全不同結構的系統——在那個“正常”經濟中，中產階級靠賺錢購物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來自北方邦的政治家馬亞瓦提（Mayawati）說自己是出身賤民的勝利者，她基本上把自己說成是從被壓迫者中走出來的勝利者，在該邦擔任了四屆首席部長。她無疑是所有印度政治家中斂財手段最無情的。馬亞瓦提積累了巨大的個人財富——我們之前遇到的薩迪亞·德維，正是在她購買的德里豪宅里度過了童年。但馬亞瓦提事業的悖論不僅僅在于“粗魯的百萬富翁政治家說自己是窮人的朋友”。在印度政治中，“賺錢”不再是不誠實的證明，特別是自馬亞瓦提這樣一名女性開始——她來自被壓迫階級，管理著一個充斥犯罪的國家，樹敵眾多，如果沒有巨額資金的贊助，她不可能保住自己的位置并獲得連任。馬亞瓦提確實向北方邦的受壓迫階層展示了一種古怪的、狂歡式的奉獻方式。她不僅給他們發宣傳冊和好東西，還為他們的地位塑造尊嚴。她發起了一個建造象征性建筑和公共雕塑的活動，讓自己成為印度政治家中一個罕見的類別——也許在尼赫魯之后，再沒有一個政治家曾表現出對建筑之政治使命的興趣。諾伊達是一個大型郊區，位于德里與北方邦交界處一條公路的北方邦一側，在這里她設計了一個令人困惑的精致公園，里面有二十四頭巨大的砂巖大象（她所在黨的象征），還有十五位賤民名人的雕像，其中就包括她自己。事實上，和許多女性政治家一樣，她也為自己精心設計了女神崇拜，在這種崇拜中，她的低種姓和巨大財富成為一個新秩序的積極形象：她的生日成了重大儀式，活動上她把自己展示給手握成千上萬鈔票的追隨者。

但是，除了這種賤民的自豪感和對財富的象征性展示，她還開始對自己的邦進行激進的重建。這場重建的活力不僅取決于她自己的資金有多少，還取決于她與富商們的伙伴關系，特別是一名從工程師轉行經商的婆羅門商人。在這段伙伴關系中，她的角色是利用國家機器從農民手中奪取土地，并提供土地開發所需的政治支持。而作為回報，這名商人提供金融投資和商業知識，向國家交付執行良好、信譽優秀的項目，并且很可能還與她分享利潤。如果沒有對方，這兩位伙伴是不可能實現今天這樣的成就的。事實上，他們一起打造了一條經濟發展的快車道，這個系統異常專制，因為和國家的支持一同到來的是一整套武裝支持，但特別的是，這個系統是在一個民主國家內運行的。民主背景肯定給企業增加了許多層次的沖突和不確定性，比如馬亞瓦提一直以來的贊助人就極度依賴她在選舉中的勝利。2012年她選舉落敗那天，該公司的股票立刻暴跌。這個系統盡管動蕩頻仍，但卻是印度對公然的專制體制的回應。在經濟自由化后的印度，只有資本是不夠的，因為資本流動處處受到法律和官僚限制的阻礙——只有當大企業與強大且有遠見的政治參與者建立伙伴關系時，它才能為投資開放足夠的出口。

所以，從德里穿越北方邦的邊界，給你帶來視覺沖擊的不只是偶像化的首席部長形象，還有無處不在的建筑公司伙伴的標志。盡管它是一家上市公司，但多數股份仍然掌握在家族手中。這家公司在馬亞瓦提上臺前就已經是地位穩固的巨頭，擁有印度最大的私營電廠和第三大水泥集團。2000年，公司將業務拓展至房地產領域，并在德里周圍建造了眾多高爾夫球場和以公寓為主的復合建筑。公司擁有資金和專業知識，在馬亞瓦提上臺時正處于和她合作的高潮階段。該公司從她那里贏得的第一個合同是建造一條從諾伊達到阿格拉的八車道公路，阿格拉是北方邦最著名景點泰姬陵的所在地。合同要求公司為高速公路投資，但允許其收取三十五年過路費，之后收費權將重歸國家。為了提高這筆交易的吸引力，馬亞瓦提還把高速公路兩邊的土地“給”了該公司，將約2400萬平方米的土地以每平方米580盧比的價格從農民處強制征收。公司決定在這些土地上發展數個企業，包括私營鄉鎮企業和一個估計未來二十年將創造270億美元總收入的私營國際機場。除了以上好處，馬亞瓦提還從農民處購得約1000萬平方米土地，讓這家公司建造了一座私營“運動城”，其中包括印度的F1賽道。由于巨額的稅收減免，這些交易讓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好看了許多。

事后農民才意識到，自己向邦政府上交、用以建造必要基礎設施的土地最終落到了大企業手中，他們開始抗議，堵住道路，焚燒公司辦公室，并試圖破壞一級方程式賽事的開幕。抗議遭到了殘酷鎮壓——警察向一群抗議者開槍并殺死了三人，最終沒有取得任何效果。這家公司毫不在意地繼續擴張，并在礦業、化學品、酒店、水電和食品行業都成立了新企業。

作為法人單位，像這家公司一樣的機構都是多變而不透明的。隸屬于其他集團的子集團擁有數十家或數百家公司，有些公司為私人所有，另一些則公開上市，創始家庭的控股權通常分配給許多家庭成員。掩護大量資金免受公眾監督對他們的成功來說至關重要。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不喜歡繳稅（雖然這是部分原因），還因為他們的業務需要有大量黑錢用于賄賂、購買土地，等等。許多人要擴張企業的時候不是從銀行籌集資金，而是按照在這個“企業紀元”前使用的一種俱樂部式的名譽準則——非正式地相互借款——來籌集資金。在所有這一切背景下，能搞定所有事情的通常是某種金融天才。因為這不僅僅涉及某人知道如何通過復雜的龐大企業系統有效轉移數十億美元的黑錢和來路正當的錢，同時還得使公司不會受到懷疑和調查。

政治和大企業之間的勾結系統蓬勃發展，因為它允許內部人員以極快的速度運作，但它只為少數人留下了空間。實際上，其成功的部分原因正是因為它消除了競爭——特別是跨國公司發現它們幾乎無法與根基穩固的地頭蛇競爭，后者只要有意地利用政治手段就能把自己排除在外。這個制度由少數政治和商業人士控制，他們把巨大的資本集中在自己手中，并且對整個印度進行了一場可怕的動態變革。在新聞媒體對于“腐敗”新精英的想象中，他們是冷漠、自我放縱的人，但他們并非如此。炫耀性消費是他們風格的一部分，但這不應該使他們野心的嚴肅性遭到貶低。他們將自己運作至這個位置的原因是，這樣他們就可以用令人目眩的規模和極危險的速度來經營自己的業務。他們是印度經濟的大投資人，并制造出巨大的經濟影響。有些政治家曾把從腐敗中獲得的大筆收益放到在瑞士的銀行賬戶中，因為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印度經濟增長緩慢，這些錢無處投資。而現在這些人也把這些資金帶回來，投資印度的繁榮。進入印度的大部分國外直接投資根本不是“國外的”，而是非法流入毛里求斯或開曼群島公司的印度資產，隨后又反過來投資印度而已。據估計，2010年，自印度獨立以來流出國外的非法資金現值接近5000億美元[[4]](#Dev_Kar__The_Drivers_and_Dynamic)。但在2000年之后的十年內，小國毛里求斯引人注目地占據了印度外國直接投資的41%以上。正如印度財政部長在一份2012年發布的報告中指出的，“毛里求斯和新加坡這樣的小型經濟體不可能是這種巨額投資的來源，顯然投資是通過這些地區來躲避稅收和/或向稅務局隱瞞實際投資人的身份，這些人中很多人實際上很可能是印度居民。”[[5]](#Pranab_Mukherjee___Black_Money)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腐敗的精英在經濟中成為了高生產力的行動者。政客及其商業伙伴就好像封建式的風險投資人，在特定領域強制收稅，再將其快速注入新的商業企業。

即使是對從外部觀察著這一切的人來說，他也會感到充滿熱血，原因就在這里：政治階級的成員通過這種密室中的發展路徑獲得了大量資本，然后高效投入到發展迅猛的商業項目中，并繞過政治審批和官方財政程序的所有障礙，而這條路徑似乎可能是將印度的混亂能量引導至有意義行動的唯一途徑。當我問本書開篇時遇到的拉曼·羅伊——品行無可指摘的印度商業流程外包之父——對印度經濟有什么樣的預測時，他聲稱在這個政治和商業的灰色地帶發現了巨大的希望，他幾乎帶著愛國之情對其獨特性給予了贊賞。

“在印度，我們很幸運有政治資金這樣的意外所得，使得巨額資本得以進入經濟體系。這樣的資金還蘊含著巨大的能力和前景。公司運營以季度為單位，而政治家擁有五到十年的眼光，這就是兩者結合效果那么好的原因。看看這些新的豪華酒店——政治家收購土地，并與企業合作創造出世界一流的產品。這是一個經過檢驗的模式。現在這個愿景所針對的對象是精英，但之后它將服務大眾，因為現在所有的黑錢都回到了企業活動中。我們的官員行政能力超強，所以當政治財富、官僚技能和企業管理能力結合在一起時，就會產生神奇的效果。”

應該清楚的一點是，那些從這個系統中獲得回報的人擁有在傳統中被認為是“狡詐”的技能，而且他們經常引起“老于世故者”的強烈鄙視。新的億萬富翁中，幾乎沒有人來自傳統的英國化精英團體，對后者來說，這些年來必要的喧囂已經變得陌生。事實上，新富翁中的很多人是從周邊的邦（如北方邦和哈里亞納邦）搬到德里來的。在那里，他們甚至在1991年前就運作著一種政商緊密結合的關系。英語往往不是他們的第一語言，他們也缺乏高雅的品味。他們在家里裝自動扶梯，因為他們在五星級酒店里看到過；他們像封建領主一樣在自己周圍撒鈔票；他們付錢給孟買的演員和洛杉磯的說唱歌手，讓他們在婚禮上表演。但現在，也許這些才是“品味”。看起來，老一輩精英對這些人的鄙視也成了他們已經過氣的另一標志。赤裸裸地擁抱金錢成為新興階層的原則與風格，為他們帶來走向成功的能力。這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不僅僅是在新印度。

在本書的前幾章，我們看到印度常常被天真地拿來和美國做比較。但多數情況下，這種比較只是純粹意識形態層面的。印度明顯是美國的反面——倒是與俄羅斯有更多相似之處。兩國都擁有20世紀80年代之前創立的國營資本體系，創造出了精明的新地下企業家階層，而這些人都是在兩國的舊體制（幾乎同時）崩潰之后出現的。之后，在兩個國家建立的制度中，民主選舉的存在并未妨礙寡頭階層的出現，而他們利用政治制度來控制關鍵資源。在兩國的首都——莫斯科和德里，多數人帶著憤怒旁觀少數人把大國力量用作自己的商業優勢。

然而，也許這些地方之間的所有區別，甚至與美國之間的區別，都在逐漸消失中。21世紀早期，商業精英過于強大的問題似乎出現在所有地方的本地新聞里。全球文化正在走向同一，但并沒有匯集向我們本該期待的方向。事實上，也許一切都趨向俄羅斯。在我們的想象中，俄羅斯一直是全球資本主義的過去，也許它也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未來。

米奇·喬普拉（Mickey Chopra）帶著羞怯走進酒店安靜的酒廊，這里是他約我見面的地點。他戴著黑色頭巾，穿著西裝，身材結實，肌肉發達，說話有些口齒不清。他只有二十八歲。

他不怎么說話。為了打破冷場，我試著提起一個我們都認識的朋友。聊了一會兒那位朋友后，他終于放松下來。

我問他關于他的生活。

“一直到十幾歲，”他說，“我都以為我父親是在為政府工作。我以前總是問，‘為什么我們有這間大房子？’他們告訴我說，‘房子是你爺爺造的，后來我們虧了錢，現在你父親在政府里工作。’”

而真相是，米奇的父親在整個北方邦、哈里亞納邦和旁遮普邦經營著業務范圍龐大的企業。這個企業帝國主營酒類零售，在北方邦這樣的強盜邦，這種業務只有精明、有魅力、性格暴烈的人才能做得好。

“當然，我們也雇了打手。經營這種類型的生意，你不可能沒有厲害的左膀右臂——但我父親總是不讓我們見到那些人。他相信紀律。他說，‘如果你做壞事，比如酒駕被抓住，我是沒辦法把你弄出來的。’而很多有權勢的人對他們的兒子說，不管什么麻煩，老子都給你搞定。這讓我養成了一種不同的心態。當然，后來我發現，不管我做了什么，父親都能幫我擦屁股。”

米奇的父親在他的講述里一直出現，就像某種精神上的試金石。

“公司是我曾祖父1952年建立的。我們家本來是西旁遮普的牧農，他們1947年的時候失去了一切。然后他們在北方邦建立了生意，在那個地方他們得拼命奮斗才能做成大事。

“20世紀80年代我父親接手的時候，家族負債累累。現在集團的年度營業額是10億盧比。我父親擁有渴望成功的驚人意愿，如果他著手做什么事，他就會把事情做成。如果說我希望自己能變成某人的話，那就是他。”

米奇談起家族生意的時候用的是“我們”。他從小到大都在吸收商業構想和技能，這些是他講話中很自然的一部分。

“我們的酒類業務達到頂峰的時候，控制了印度19%的酒類零售。那時候，政府把酒類專營店拍賣給出價最高的人。之后為了防止壟斷，政府引入了一套抽簽系統。但我們的業務還是在增長，因為我們有許多雇員。如果在我們的地區抽簽，一百個抽中的人當中會有八十個是我們的人。”

米奇被送去好幾所很貴的學校，但他不斷被開除。十六歲的時候，他徹底退學了。他去倫敦呆了一兩年，尋歡作樂——俱樂部、派對以及任何年輕富二代能想得到的玩法。

回去以后，他被安排負責家里的糖廠。他的心不在此，但緊接著房地產開始繁榮起來。2001年，家里成立了一家房地產公司，僅僅二十一歲、完全沒受過培訓的米奇被指派去建造北印度最大的商場。

“在英國的時候，我花了很多時間逛商店，學習那些商場是怎么造的。完全沒必要浪費時間重學。我比印度的任何一個人都更了解要怎么開一個商場，怎么布置你的品牌。在專業方面，我父親沒有經驗，所以所有專業方面的事我都是自學的。因為專業的承包商做得不好，我把計算機系統引進公司，還自學了Oracle編程。隨后我自學了所有最新的建造技術。我的第一個商場是用預制構件的鋼柱造的，之前從來沒有一家印度商場用過這種技術。最近，我自學了財務。我在網上閱讀財務方面的內容，每次遇到不知道的詞，我就去查。六個月前，我什么都不懂，而現在我能和普華永道（Price Waterhouse）開財務會議了。”

米奇的商場以擁有德里最奢華和高科技的夜總會聞名。那是米奇最得意的項目，是他的私人派對區。那里為他和他的朋友準備了喝不盡的香檳，而且他每晚來的時候身邊都圍繞著保鏢，始終是全場的焦點。

“有段時間，我就是德里第一人。有數不清的人要和我做朋友。女人想要和我睡覺。我對我太太說，‘如果我還沒結婚，事情會很不一樣。’很多人都非常假。”

像德里很多的富家子弟一樣，家里為米奇安排了一場盛大的婚禮，以此結束他瘋狂的生活。他二十二歲時和青梅竹馬的女孩子結了婚，婚禮上有六千位賓客，還有招牌式的寶萊塢明星獻舞。米奇仍然熱愛派對，在談話過程中，他隨著酒精變得放松風趣，但毫無疑問現在他已經成長為他父親羽翼豐滿的合伙人。他已經準備關掉俱樂部，因為他不再有時間去玩了，而且也不想讓別人來管理。他在印度一共運營著五個商場，還有近570公頃的土地正在開發。而這僅僅是開始。他正朝著更大的計劃前進。

“我們剛剛租下了28萬公頃大的土地，租期是七十五年；我們要開食品加工廠、制糖廠和鮮花種植園。”

他把事實細節說得太清楚，我都不確定自己是不是聽錯了。我們已經討論過在印度拿地有多費力，每次從農民那里買地只有兩公頃或四公頃。我想象不出他能從哪里獲得那樣大規模的土地。

“在哪兒？”我問。

“埃塞俄比亞。我父親有個朋友從埃塞俄比亞總統那兒買了土地做牧場。總統告訴他，還有另一塊地出售。我父親說，‘就是它了，這就是我們一直在找的，我們買下來。’我們和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6]](#Tan_Hua_Fa_Sheng_Yu_2010Nian__Da)一起去的。非洲太棒了。就是這兒了。你嘴上說的數字甚至在你心里都覺得不可思議。信實集團（Reliance）、塔塔集團，所有的印度大公司都在那里設廠，但我們仍然走在前面。我已經決定接下來八年我會親自管這件事。在符合我的愿景之前，我不會把它交給任何一個CEO。那里會變得不可思議。你應該看看那片地——草木繁茂，一片碧綠，有黑土地，還有河流。”

米奇告訴我，他有一百個從旁遮普來的帶著護照的農民，一旦所有的文件簽好，就可以馬上出發去埃塞俄比亞。

“非洲人做不了這工作。旁遮普農民很好，因為他們習慣種植大面積的土地。他們不怕種兩千公頃的地。同時我也會去那里開設技術學院，培訓非洲人，這樣制糖廠開張的時候他們就能做好準備。”

把旁遮普的農民運到非洲種植園工作是一個“帝國”般的計劃，而他說“非洲人”的方式里也帶著一些“帝國”意味。我很震驚。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

“謝謝。”他說。

“現在那塊地上有什么？”我問，并且已經知道他的回答同樣會很“帝國主義”。

“什么都沒有。”

談起這些米奇很興奮，好像完全沒有受到最近充斥著頭條新聞的經濟衰退的影響。盡管約定的時間已經超了，他還是又要了杯啤酒。忽然之間，我覺得他感召力非凡。我能看出來為什么他能把事做成——他已經讓我相信，就像他肯定也讓其他人相信一樣，相信他能做成任何事。我問他是怎么學會像這樣思考的。

“我只有二十八歲，”他說，“為什么不呢？”

他變得浮夸起來。

“我們會成為世界排名前五的食品加工商。你知道我要買的第一個公司是哪家嗎？亨氏。”

我對他的“為什么不呢？”很感興趣。28萬公頃的埃塞俄比亞土地將被清理，上百名農民將被送到世界的另一端，就是因為這脫口而出的原因？我想知道對他來說這是出于一種什么樣的感情。似乎在某個地方，這一切都有點兒像是鬧著玩。

“有時候我也奇怪自己為什么要工作，”他說，“我確實問過這個問題。我不需要工作。但我要做什么呢？你不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坐在海邊的度假村里。所以我會想些瘋狂的事。我喜歡想出一些事情，然后覺得太瘋狂，腦子一熱，想著‘我要怎么才能做到？’——再然后，想法又成了‘為什么不呢？’”

我想要指出，對像他這樣的人來說，生活里有比只是坐在沙灘上更多的可能性。“腦子一熱”聽上去像他從前那些狂野的時光里留下來的語言，仿佛整件事情就是為了尋求刺激。我問他想怎樣花錢。

“現在我開的是一臺寶馬750i，很適合開長途去我正在盧迪亞納造的商場。我真正想要的車是阿斯頓馬丁DBS，但我以后才會買，等到我更配擁有它的時候。三年前，我父親想給我買一臺好的跑車，但我說‘等等’。我給自己定了特定的目標。到四十歲，我想要一艘長五十米的船，還想要一架很好的灣流飛機。我希望自己開它們的時候不會為錢感到心疼。”

米奇說得好像他在存錢想買臺摩托車或者冰箱一樣，而且顯得出奇平淡。這是個想得出用“運土術”來賺錢的人，但他在花錢方面的想法卻是最尋常的那種。他的中產階級詞匯似乎和他數十億美元的資產規模不相稱，我好奇他是不是在故意延后買跑車，這樣就不至于太快沒有東西可買。我好奇他的整個企業是否并不是在無知覺的邊緣搖晃，是否他事實上并不是在等待某人告訴他錢的意義，因為他的生活正是圍繞著這些錢組織起來的。

他突然變得哲學了起來。

“我不是宗教信徒。我相信精神和靈性。我的基本原則是：離開的總會回來。它會回來，絕對肯定。我的生活方式是吠陀式的。自律。沒有偶像崇拜，沒有愚蠢的無條件接受。還有，你不能只讓別人欺負你，從他們那里受到傷害。你要加倍還回去。”

我不確定最后這一點是不是從基本原則里衍生出來的，但我沒有質疑。米奇十分嚴肅，現在他向我分享他對世界的認識。他給我講了個故事。

“我最近去一個派對，服務生在拿飲料給大家，他把托盤拿走的時候拿得快了些，所以有個人沒拿到飲料。然后那個家伙搖了一瓶蘇打水，直接噴在服務生臉上。我去找了派對主人，直接把那人趕出了派對。你得知道什么樣的行為舉止是正確的。有些人覺得自己有錢就能欺負別人。你必須得知道如何對待正常人。你看，有兩種有錢人。一種是已經有錢了很長一段時間的人，他們不在乎你是誰，不管怎么樣他們都會對你態度很好。就像我對別人就很親切。和他們在一起你也許會覺得無聊，因為他們聊的都是自己剛剛從戛納或者圣特羅佩回來，但他們永遠都很和氣。但是，那些最近五年才發跡的人，他們跑來一個派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車鑰匙放在桌子上，顯示自己有臺賓利。他們不知道如何舉止得體。”

米奇有點醉了，他在維護對他來說比對我來說更清晰的邊界。這不是他第一次說，“人們得知道怎么守規矩”。我再一次覺得他越發熱切地反對德里富人的虛無主義，因為他自己也受到了這種虛無主義的攻擊。

他和那些惡劣的壞男孩過從甚密，正是那些人使像他這樣的人背上了壞名聲，而他卻對關于約束的寓言故事印象深刻。

“我有個朋友是億萬富翁，”他說，“我問他買車給孩子的話什么車最好，因為我剛有孩子。他建議買豐田Innova。他能買得起噴氣式飛機給孩子，但是他沒有。他的孩子得自己賺錢買。他只給他們買了臺Innova。你看，大家說的那些壞孩子，其實都是他們父母的錯。完全是父母。他們毀了自己的孩子，而且一旦孩子變壞了，就永遠回不了頭了。有個家伙今天開輛馬魯蒂800，明天開輛奔馳S；他的孩子們才十歲，他就給他們買寶馬，孩子們都瘋了。這些孩子被毀了。”

米奇這樣的人說起德里的時候就像在說某個黃金國，整晚都會有財富涌來，幾乎不用你去要。大家說，在這個國家的這個時刻，只有傻到透頂才會出錯。所有討論都是關于“新錢”，但嚴格來說，德里大多數的財富都不是新的。財富在過去幾年中一直在爆炸式增長，小城鎮中的力量確實變成了大都市甚至是全球的財富發電站。但這些財富依賴于幾十年來建立的影響力、資產和關系，在這個意義上，它們完全是傳統的。一個新的外邦精英暴富不應該使人們認為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變得民主。像米奇這樣的人一直是有錢的，而他們從來都是從他們的那個角度看世界。他們并不知道，在許許多多人的經驗中，德里是一座枯燥難熬的城市。

“你把自己放在德里富豪金字塔的什么位置？”我問，“不會有很多人一年的營業額達到10億美元吧？”

他謙虛地笑笑，“大多數人不公開他們的財產，因為他們不想被審計。我永遠不會讓我的公司上市。”

“誰是德里最有權勢的人？”

“這都取決于政治。你可以有10億，但如果你沒有關系網，這就沒有任何意義。我的家族已經花了兩代人的時間打造和經營關系網，我們認識每個人。我們認識每個政黨里的人，政府換屆的時候從來不會遭殃。”

“那你出門為什么帶著保鏢？”

“北方邦的警察截獲了一些通訊，是關于一個綁架我的計劃。他們告訴了我父親。人們想要錢，他們想到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從有錢的人那里拿。他們自己做不了任何有建設性的事，所以思考方式很短淺。在印度，我們需要更多專業素養，更多企業治理，然后我們會展示給整個世界看。”

米奇有很好的理由感謝印度。

“十四歲起，我就已經意識到印度就是我要待的地方。我熱愛這個地方，這就是印度。在其他地方，你也許像鋼鐵大亨拉克希米·米塔爾那樣有錢，但你仍然是個二等公民。這是你的國家。你應該在這里做事。”

米奇告訴我他對美國的厭惡。

“為什么沃爾瑪應該進入印度？我無所謂古馳和路易威登——它們沒有擾亂任何社會結構，但是別讓沃爾瑪來。我們已經被奴役了七百年，才剛自由了六十年。再給我們三十年時間，我們會買下沃爾瑪。跟你說，有天我在一個派對上，胳膊摟著兩個白人，我突然間把他們推開，說：‘你們為什么在這里？我們不再需要你們這些家伙了。’”

二十八歲，去過很多地方，比這個星球上的大部分人都富有，米奇對白人的憤恨出人意料地強烈。我問他如果這個世界由印度人統治會有怎樣的不同。

“這個世界會更在乎精神和靈性。”他說。但他思考了一會兒，然后說：

“不對。這個世界會和現在完全一樣。”

我結束了我們的談話。米奇付了賬，我們出去走到了安靜的停車場。

“謝謝。”他說，和我握了手。我真的不知道他為什么要謝我。

他的司機打開了寶馬車的后門，米奇坐了進去。大門開了，寶馬絕塵而去，后面跟著一輛坐滿了保鏢的SUV。

米奇住的地方離這里兩百米遠。

我開車回家，想著我們的對話。我思考著一個很小的細節：我去上廁所的時候，他趁我不在發了一條短信給我們共同的朋友，只為查一下我是否真的認識她。米奇對某些東西很警惕，這一點讓人生畏。

我還在開車的時候，收到了一條他的短信，讓我不要引用他說的某些內容。我回復說：

“好的，只要你再回答我一個問題。錢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他馬上就回復了：

“是我辛勤工作的最終產物之一，錢確實意味著很多，我很尊敬它，它為我帶來更多艱難的工作，順帶一點點奢侈的享受：)”

如其他政治強人對衛生和生育的關心，桑賈伊·甘地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個夢想之中——為他的國家開發一款“人民之車”。

桑賈伊熱愛汽車和飛機。他對學問沒興趣，沒有上過大學。不過，他在英國的勞斯萊斯汽車公司當了三年學徒。1967年，當時二十一歲的他回到印度，把自己想成立一個新汽車公司的想法告訴了母親——印度的新總理。他把這個公司叫作馬魯蒂汽車有限公司，“馬魯蒂”是日行千里的猴神哈奴曼的綽號。動用了國會政治機器的力量后，他還在臨近的哈里亞納邦獲得了120公頃的土地用來建設工廠。名稱和土地是他去世前對公司的兩大重要貢獻，之后與鈴木合作還有讓印度中產普及了汽車的馬魯蒂革命就是其他人的工作了。

但從長期來看，桑賈伊·甘地將馬魯蒂放在古爾岡的這一決定非常重要。當時德里的商業房地產已經達到飽和。英國人和尼赫魯都沒有在城市中為20世紀70年代開始出現的大量企業分配空間，許多企業是在住宅和酒店內經營的。城市開發的壟斷機構——德里開發局，為這種需要做出了一個讓步，開發了城市東南部的尼赫魯廣場——一個現在充滿了正走向腐朽的商業建筑的大雜院。但對于任何能夠從二十年的角度來看待這座城市的人來說，這里必將走向繁榮。

K. P. 辛格（Kushal Pal Singh）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是古爾岡非凡崛起的幕后人物。他的父親是旁遮普的一名軍人，在分治時期建立了一家房地產公司，在為到達的難民潮而進行的新街區開發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德里開發局成立后，公司的業務大受打擊。K. P. 辛格被指派去復興公司的業務，這家公司后來被稱為DLF。1979年，由于無法在德里繼續經營下去，他開始在城市南部購買農村土地，位置就在桑賈伊·甘地當時還不存在的工廠附近。他這樣描述其中的過程：

為了說服這些農民相信我，我什么都做。我花了好幾個星期、好幾個月和這些家庭在一起。我穿著庫爾塔，坐在輕便床上，喝著骯臟玻璃杯里被蒼蠅叮過的牛奶。我還參加婚禮，探望病人。要理解為什么這樣做很重要，你有必要了解土地的持有模式。古爾岡的平均地塊面積為兩公頃，大部分由從不分家的印度教家庭持有。在法律上，為了獲得完整的土地所有權，我需要這些家庭的每個成年成員同意。這樣的話，一筆交易可能要涉及三十個人。讓已婚的女兒們簽名往往很棘手，因為男性戶主會拒絕和她們分享賣地的收益。所以我會去她們家，秘密付錢給女兒們。意外的是，古爾岡的農民讓我以信用銷售買地。我會付款給一個農民，然后迅速把這筆錢作為貸款拿回來，并用它來購買更多的土地。公司的良好意圖使他們愿意為DLF提供資金。但這也意味著我必須在支付利息方面特別小心。無論發生什么情況，每月3號早上10點整，利息會被當面交給每個農民。我們在古爾岡買了1400公頃土地，超過一半是利用這種賒銷購買的，而DLF連一次都沒被起訴過。[[7]](#Zhai_Zi_DLFQi_Ye_Wang_Zhan__2010)

就算這種說法有點過分浪漫化了，辛格的企業仍然非常了不起。哪怕事情進展順利，他的投資也需要幾十年才能收回成本。當時是20世紀70年代末，只有擁有超乎尋常的想象力，才能窺見未來的回報。古爾岡是一個干燥、交通不便的地方，除了有一些牧民在被炙烤著的土地上游蕩，幾乎什么都沒有。整個村莊大約有八輛汽車，要打電話到德里需要提前一個小時預約。那里有一家小商店，店主就在人行道上曬他的谷子；唯一能吃飯的地方是當地的小飯館。辛格第一次打電話給德里建筑公司，讓他們跋涉到這片偏遠的叢林來討論為富人和成功人士建設公寓樓群的時候，承包商都認為他瘋了。直到1994年，那里才開了一家有迪斯科和保齡球館的娛樂中心。但德里的消費者害怕去古爾岡的荒野，為了讓訪客覺得安全，娛樂中心的老板只好在小道上沿路安裝了私人照明，并提供安全巡視車。然而隨著90年代末大量公司的涌入，一切都改變了。我2001年第一次去古爾岡時，這里到處是奇形怪狀、令人興奮的摩天大廈，這些閃閃發光的大廈帶著一種不真實感從哈里亞納鄉村的塵土中升起，最終入駐了很多全球最大的經濟實體——微軟、IBM、愛立信，等等。

古爾岡不只有公司。DLF在那里提出了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一個“新的新加坡”，包括封閉社區、高爾夫球場和購物中心。很快，企業的員工也從德里運轉不靈的基礎設施和政治文化中逃離，把家安在了古爾岡。由于有充裕的現金，印度銀行會給任何前來申請貸款的人放款，房價上漲如此之快，使得人人都把儲蓄投入房產這一行為顯得很合理。古爾岡迅速成為亞洲最大的私營鄉鎮。這里，規模龐大、戒備森嚴的公寓大樓蓬勃崛起，在塵土飛揚中俯瞰著一片純粹的商業地產景觀。2007年，K. P. 辛格將其公司在印度證券交易所上市，2008年《福布斯》全球財富榜上他排名第八，擁有300億美元來源清白的資產。

當然，到了那時，首都還有數家其他的房地產巨頭。德里周邊的土地成為絕佳的商品，其價值每三到四年就會翻一倍，而在這些土地上簡單地加上磚塊、混凝土和一點點廉價勞動，其價值就會翻六十倍。因此21世紀初發生了一場絕望的奪地熱潮，數十萬公頃的農業用地被賣給了開發商。以前通過汽車零件或化學品賺錢的公司現在的大部分利潤來自房地產，而德意志銀行和摩根士丹利等大銀行排著隊為他們提供資金。來自加濟阿巴德（Ghaziabad）這樣了無生氣的小鎮的小開發商成了重要的房產巨頭，他們把自己的兒子送到美國的商學院去學習如何管理數十億美元的生意。

德里被房地產這種很特別的財富所主宰。房地產是一場爭奪，如果沒有在政治家、官僚和警察之間用有償的方式建立起一個廣泛的網絡，幾乎是不可能大規模經營的。暴力往往必不可少。房地產黑手黨奪走哈里亞納邦的鄉間別墅，并雇用警察對業主提出偽造的刑事指控，以此來壓制他們。在北方邦，他們用暴力威脅強迫農民和部落社區出售土地，雇用當地警察把當地人從土地上趕走，并以極高的利潤出售土地。犯罪和暴力行為普遍升級，而歷經這一切并獲得了新財富的人強大而可怕。他們知道如何挾持國家權力為自己的私利服務，他們有警察和可怕的勒索幫派支持。這樣的人打破了當代印度的力量平衡，他們唾棄自由主義的陳詞濫調，認為這些不過是一大堆偽善的空話。

土地在他們身上引起了顯著且近乎宗教般的熱情，除此以外沒有其他東西能做到。我們已經說過，幾個世紀的不穩定性導致這里的人認為對土地的所有權和控制權高于一切——甚至往往高于家庭關系，這就是有這么多家庭因為房產斗爭而四分五裂的原因。K. P. 辛格和米奇·喬普拉都來自曾在歷史上遭受過損失和打擊的旁遮普族，而在他們對土地的極度野心中，有些非常“旁遮普”式的東西。K. P. 辛格二十多年來一點點地建立起了他的古爾岡帝國，其癡迷程度超越了單純的商業野心。這是一場個人的遠征，一輩子的事業。初看上去，他做的可能像是純粹的收購，但只有回顧時才能發現，工作完成的時候土地已經變成了金錢。其行為本身帶著某些榮耀乃至無私的東西，使我們回想起之前在北印度商界中觀察到的戰士氣質。在米奇·喬普拉的計劃中也是如此，他計劃在非洲購買28萬公頃土地，并由旁遮普農民來種植——盡管計劃有其商業邏輯，但不該因此被忽視的事實是，這也是一種宏大的戰士壯舉。21世紀初，來自印度北部的戰士馳騁在國外，其狂暴在國外造成的影響和在國內一樣的混亂動蕩。事實上，非洲對印度土地投機者如此有吸引力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非洲農村社區對自己居住的土地的主張往往比印度農民更弱，從他們那里更容易奪得土地的完整所有權。在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烏干達、加納、蘇丹和納米比亞等地，印度商人在這些國家的政客幫助下，爭相收購礦山和（特別是）農業用地。政客們會安排去這些地方的商務旅行，并通知自己的同胞，只有印度能夠憑借其綠色革命的經驗為自己的國家帶來稀缺的技能和知識。雖然有些以前在這些土地上耕種的人理所當然地成了新種植園里的工人，但大多數人并沒有進入種植園。這些土地中有許多是極其肥沃的，并在過去養育了非常密集的人口，而現在，這些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在同一片土地上還留有一席之地。因此，印度的金錢在非洲農村也加速了農民從鄉村的撤離，導致難民涌入城市，貧民窟擴張。

由戰士商人出口的技術不僅僅擴展到土地使用，事實證明，他們在家鄉獲得的政治技能——將政治機構收買為自己商業基礎的延伸——在非洲的新戰場上也極其有用。印度的“強盜爵士”絕非原始落后而瀕臨絕種的一類人，他們在21世紀看到了自己光明的未來。在非洲、中亞和其他當代資源戰爭的主戰場上，他們比美國企業更具競爭優勢。他們擁有大量不受監管的資金，可以變現用以行賄或私下采購。他們遠比美國的首席執行官更知道如何在后殖民國家的政治海洋中游弋。而且，他們有一種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遏制的戰爭使命感。

因此，毫不奇怪的，在印度以外的一些國家，當地人害怕好斗的新印度精英，而且他們經常被視為新帝國主義者。一個例子是有關古普塔（Gupta）兄弟的，他們1994年離開了米奇·喬普拉的家鄉——北方邦，到南非探索商業機遇。他們的父親是小鎮上的一名商人，他讓兒子在武裝保鏢的護送下上了高中。他在德里建立了一家貿易公司，20世紀80年代起公司由三個兒子繼續經營，在印度開始經濟自由化的那兩年，他們的公司在首都獲得了令人鼓舞的商業成功。那段時間里，他們聽說如果是在種族隔離時期就生活在南非的印度人，有可能像黑人一樣獲得特殊的商業特權。他們從未在南非的種族隔離下生活過，因此也沒有參與“黑人經濟賦權”項目的身份資格，但他們設法獲得了同樣的資格。在談到像古普塔兄弟這樣咄咄逼人的商人以這種方式贏得商業優勢時，一家報紙評論道：“對于黑人經濟賦權立法的批評認為，它已經越來越服務于一個小精英團體，創造了享受著巨大財富的俄羅斯式寡頭，卻幾乎沒有為數百萬窮人的困境提供任何幫助。”[[8]](#_Guptas_in_Spotlight_over_South)

三兄弟的父親從德里給他們匯錢，為業務的早期發展提供資金。一到南非，他們就

迅速與新黑人精英中的新秀進行接觸。如今，古普塔家族因其億萬富翁的生活方式和可以隨意進出最高級別官員——包括總統雅各布·祖馬（Jacob Zuma）的家而聞名。古普塔兄弟生活在撒克遜沃德（Saxonwold）一棟價值5200萬蘭特（約650萬美元）的豪宅里，這里位于約翰內斯堡（Johannesburg）郊區，到處是百年老橡樹。（三兄弟在約翰內斯堡還有一棟價值300萬美元的房子，曾經是馬克·撒切爾［Mark Thatcher］的家。）據稱，古普塔家族利用和政治的緊密聯系，參與了本來是為黑人而設的契約立法工作……

人們仍然不清楚三兄弟是如何創造了自己所有的財富，盡管他們確實是南非最大的個人電腦分銷商之一。不過眾所周知的是，古普塔家族與總統二十八歲的兒子杜杜扎內·祖馬（Duduzane Zuma）一起，與很多利潤豐厚的交易有緊密聯系。

三兄弟還是一家財團的成員，該公司持有全球鋼鐵巨頭阿塞洛米塔爾鋼鐵集團（Arcelor Mittal）超過30億蘭特（約3.8億美元）[[9]](#Yuan_Shu_Wu_Zhi_Wei_2_8Yi_Mei_Yu)的股份。三人還和一項建造高鐵系統的計劃有關，該計劃的高鐵造價為3500億蘭特（約450億美元），將使用南非國家資金和中國資金。

據說，他們還通過一家包括迪拜世界集團（Dubai World）在內的財團，以97億蘭特參與收購了開普敦維多利亞阿爾弗雷德碼頭廣場（V＆A Waterfront, Cape Town），這是該國最有價值的一處地產。廣場的買家是一家本地集團，該集團擁有一支國有養老基金。不知何故，古普塔兄弟和杜杜扎內·祖馬得以作為黑人合作伙伴加入，因為根據法律要求，涉及國有實體的任何交易都必須有黑人參與。三兄弟否認在這場交易中有任何不當行為……

古普塔兄弟的生活方式與大多數南非人太不一樣了，這對他們沒有幫助。去年，他們申請在自己的院子里建造直升機升降坪的新聞被媒體廣泛報道。他們成立了一份日報，用以反駁對他們及其與執政黨關系持續的負面宣傳，但也沒起到多大作用。

現在，似乎執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ANC）中有一些人已經受夠了。據稱，古普塔家族已經發展到非常強大，甚至可以把內閣部長召集到自己家并授權任命國有企業的高級官員，這讓一些人忍無可忍。該黨強大的青年聯盟本周表示，這三兄弟在“對這個國家進行殖民”。南非的工會聯合會（Cosatu）是非國大控制聯盟的成員，該組織也表示將因古普塔家族對經濟有“掠奪”嫌疑而發起調查。[[10]](#_Guptas)

古普塔帝國由三兄弟通過一系列家族擁有的投資公司直接控制。這個帝國或許是以電腦業務起家，但很快就轉而進入了其他部門，特別是那些最受政治控制和約束的部門——鈾和煤炭開采、媒體、航空，等等。其業務雖然備受丑聞困擾，但卻設法通過一個商業網絡維持自己的地位，這個網絡里不僅包括南非商人和政治家，還有全世界的印度商業精英，比如鋼鐵大亨拉克希米·米塔爾（他本人那段時間也不得不面對關于對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的英國政府有不當政治影響的指控。在米塔爾的“政治獻金”丑聞曝光一年后，布萊爾政府不得不就另一系列問題進行回答，內容是關于政府與億萬富翁亨度嘉［Hinduja］兄弟的關系，因為這對兄弟英國入籍申請的處理速度似乎加快了許多）。古普塔家族2013年夏天使用戒備森嚴的軍事基地，供婚禮賓客的噴氣式飛機降落，而且還免除了對賓客的簽證要求。該事件經公開披露后引起了恐慌，表明民眾對該家族對于國家體系和設施的控制程度有諸多憂慮。

雖然古普塔家族的財富確實來自他們在非洲的利益，但他們的家庭風格——提及素食主義和人數眾多的大家庭時的虔誠話語，公開贊揚其父的虔誠和其母的單純，與印度電影明星的友誼，以及在個人和財務方面對板球的投資——都有著北印度的根基。他們公司最初的名字也是如此——撒哈拉控股（Sahara Holdings），以北方邦的薩哈蘭普爾（Saharanpur）命名的，但在非洲背景下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兄弟們喜歡開玩笑說，為了競爭，他們將一切都變成了沙漠。[[11]](#_The_Gupta_Interview__A_Peek_Beh)

初見米奇一年多后，我又見了他一次，那天我們一起喝酒。他和一個朋友在一個五星級酒店預定了按摩，按摩之前他和我在酒店見面。

下車之前他似乎剛剛噴了香水，我們握手的時候香水味撲鼻而來。現在他三十歲，看上去比我記憶中更精致優雅。他的西裝很漂亮。除了一臺iPad和一只iPhone，他什么都沒帶。

他的朋友和他一起坐下，自顧自地在一個大觸摸屏上專心干著什么。米奇點了一瓶庫克香檳。服務生招待他的方式很用心，我想這座城市的任何五星級酒店對他都是一樣的吧。

我們開始聊非洲。

“埃塞俄比亞的事失敗了，”他說，“那邊換了政府，新政府的要價是原來的十倍。我們損失了300萬美元，不得不把整個項目轉到了幾內亞。這次我們采取了更多預防措施——現在我們有主權擔保。我們已經把設備運出去了，這很重要。我們在南非的煉糖廠是安全的。

“非洲有很多印度人。有些人種玫瑰，有些人種稻子。中國人不如我們了解種植，所以我們有優勢。我感覺他們不怎么受歡迎，因為他們保證說會給當地很多就業機會，但最后帶了很多自己的人。

“我們的房地產業務在這里增長非常快。我們正在諾伊達建造兩處很大的開發項目。其中一處有一座兩百四十米高的樓，六層上有一個泳池和餐廳。我們已經在跨過北方邦邊界買下了3200公頃的土地，將用來建一座完全私有的城鎮。我們獲得了市政設施授權，我們會自己建所有的基礎設施——垃圾處理和下水道。它將會是一座現代城市，我們會訓練人們如何住在一個現代城市，如何給垃圾分類，而不是扔到街上。我們有一個系統，從所有居民那里收費，來支付所有這些服務的費用。”

我之前就知道這個新開發項目，因為米奇的公司似乎把德里所有的廣告牌都買下來做廣告。電腦生成的圖像展示著一個光彩奪目的大都會，到處都是摩天大樓和玻璃幕墻。有傳聞說，米奇豪擲了不止10億美元為他的新城市買地。算上開發成本和其他現在正在投資的項目，你大概就能對他背后有多少資金支持有個概念了。

“我們把建筑設計外包給美國。在印度，我們找不到能做這個工作的人，現在我們在北卡羅來納有個建筑設計師，他的事務所承擔我們項目在這里的一切工作。”

米奇一邊說話，一邊偷偷地撥了坐在他旁邊的朋友的電話。那位朋友的平板手機響了，他把手機放到耳朵旁。那手機的尺寸大概有一本精裝書那么大。米奇哈哈大笑起來。

“我就是喜歡看他把那東西放到耳朵旁的樣子。那東西太大了，他甚至一只手都拿不了。”

我們聊了些其他事。我問他怎么看德里其他商人的水平。

“大多數人不是很出挑。他們沒有大的思考格局。你應該見見我一個制造汽車零部件的朋友，拉凱什。他在往中東和歐洲擴張，他知道如何同中國競爭——我很仰慕他。我最常聽說的故事就是人們把產業賣掉，去歐洲生活。他們應付不了這里的生活，太難了，上上下下都得打點，并且要深深地卷入政治。他們只想賣掉父輩的產業然后去歐洲。我說，‘你在那里要干什么呢？你要拿這些現金怎么辦？’

“人們放棄家族產業，從父母的房子里搬出去，丟掉了自己的價值。我覺得這是可恥的。你為什么要從家里搬出去？你還是不是印度人？”

我上次見米奇的時候他已經和父母一起搬進了一座巨大的農莊，房子是他花了兩年建成的。我從來沒見過那房子，但是它的規模和豪華引起了各種傳聞，我走到哪里都能聽到——在里面走動要乘高爾夫車，地下游泳池周圍是裝在鋼輥上的防彈玻璃。房間內部的裝潢有貼金、紅絲絨和水晶，由一名英國的夜總會設計師設計。

“那些人都是白癡，”他繼續說，“因為機會就在現在。現在正是你家族上一代積累的財富能真正爆發的時機。我們正離一場全球食品危機越來越近。氣候在變化，很多現有的食品市場正遭遇重大問題。看看澳大利亞，許多食物短缺。下一個能像石油一樣讓人大賺一筆的東西就是食物。”

他說這些的時候很興奮，我從上次和他的對話時就有這種感覺：他是為這個災難紀元而生的商人，他會因為糧食短缺、氣候紊亂和各種動蕩而高興。米奇不像美國的精英，那些人長大的時候，還不太相信未來世界將遭受重大災難；而米奇成熟的年紀使他相信災難才剛剛開始。

“我們在印度的下一家大企業是家禽企業。我們希望每天能交付五十萬只雞。這些雞都經過了妥善的包裝，而且很衛生。現在的養雞場非常臟。他們用的刀和案板都很臟。我們只需要告訴大家，他們用的刀比你家馬桶的坐墊還臟，人們就會拋棄舊的供應商。這會是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產品。”

他似乎比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更精力旺盛了。他管理的眾多項目中的任何一個，其規模都勝過我認識的絕大多數人所管理項目的規模。他工作一定非常努力。

“當然，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我沒時間和我的孩子們在一起。我太太一直和我提這事。我每天早上看到他們半小時，然后可能每周和他們一起呆兩個晚上。但是我對她說，等他們十九歲了，至少他們會有錢。想想看，如果我們沒有錢，而他們在抱怨不能上好的學校或者其他任何事時，我要對他們說什么？‘唔，至少我花時間陪你們了？’”

米奇要去按摩了。

“現在是一個偉大的時刻，”他邊說邊站起來，“印度歷史上最偉大的時刻。遍地都是賺錢的機會，到處都能看到稀缺。腐敗很嚴重——你得非常努力地工作——但是這是一派偉大的景象。”

“你希望腐敗更少一些嗎？”我問。“不希望！”他大笑了很久，愉快地轉向他的朋友。我們走出酒店。他和朋友朝休閑中心走去。我們道了別，我就走了。他突然喊我。“對了！”我轉過身。“我還是想買亨氏！”

我開車經過德里唯一的賓利和蘭博基尼經銷商時，突發奇想，停下來走進去要求見一見經理。他不在，于是我被安排去和做公關的女孩子喝咖啡。她們的魅力恰到好處，并且從戴的鉆石可以判斷出來，她們家境不錯。（“我開過無數保時捷和法拉利，”一個女孩子說，“都是好車，但當你坐進蘭博基尼時，那感覺完全不一樣。”）對她們來說，德里是一個賺錢無止境的地方，她們自己已經迫不及待地想要表現這里神奇的財富增值能力。

“有人來這里想買一輛賓利的時候，我們不問他現在開什么車。他開寶馬并不代表他買得起一輛賓利。我們會問他有沒有噴氣式飛機或游艇，或者問他是不是擁有一個島。”

“德里有飛機的人多嗎？”我問。女孩子們似乎很生氣：“每個人都有一架。而且不只一架——他們有兩架、三架、四架。”我們聊著好車和昂貴的生活。有輛蘭博基尼被開進了展廳，噪音震耳欲聾，我們不得不停下談話，直到它停好。我問了一個很無知的問題：在一座交通堵得動也不動的城市，花3000萬盧比買一輛時速超過三百公里的車到底有什么意義？她們告訴我，晚上在使館區會有汽車俱樂部的活動，那里的道路又直又寬，而且很空曠。

“你至少得有，比方說，一輛寶馬或者奔馳才能加入。他們半夜碰頭賽車。總理辦公室經常打電話給我們投訴。”

“為什么？”

“因為總理沒法兒睡覺。引擎的噪音太大了，吵得他睡不著。所以他打電話給我們投訴，但很明顯，我們也愛莫能助。”

我開車離開的時候，忍不住想著總理曼莫漢·辛格在床上輾轉反側的樣子，他的頭巾已經解掉，白發落在枕頭上，而外面路上富家男孩子開著法拉利的喧叫擾亂了他的夢鄉。很久以前，正是時任財政部長的曼莫奴·辛格向全球資本主義的風暴打開了窗戶，為新寡頭精英們奠定了方向。

注釋

[[1]](#_1_15)‘Key Players in Bofors Scandal’, India Today, 28 April 2009.

[[2]](#_2_15)Michael Walton and Aditi Gandhi, ‘Where Do India’s Billionaires Get Their Wealth?’,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6 October 2012, pp. 10–14.

[[3]](#_3_13)‘Lok Sabha Polls to Cost More than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Mint, 1 March 2009.

[[4]](#_4_10)Dev Kar,‘The Drivers and Dynamics of Illicit Financial Flows from India: 1948–2008’(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 Washington DC, 2010).

[[5]](#_5_7)Pranab Mukherjee, ‘Black Money: White Paper’ (Ministry of Finance, New Delhi, 2012).

[[6]](#_6_7)談話發生于2010年，當時俄羅斯寡頭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正流亡于英格蘭。2013年3月，他被發現死于英國伯克郡（Berkshire）的家中，死因可能為自殺。

[[7]](#_7_6)摘自DLF企業網站（2010）。

[[8]](#_8_6)‘Guptas in Spotlight over South African Dealings’, The National, 19 March 2011.

[[9]](#_9_4)原書誤植為2.8億美元，但依此報導（2011）當時的匯率，30億蘭特約3.8億美元。

[[10]](#_10_3)‘Guptas’, The National.

[[11]](#_11_1)‘The Gupta Interview: A Peek Behind the Sahara Curtain into the “Gupta Desert”’, Business Day, 4 March 2011.

## 十六　上師與富人

你喜歡這張桌子嗎？是我自己設計的。白得發亮。如果有人意外地走進這個房間，他們永遠不會看見桌子上的可卡因。

——一位德里百萬富翁

“德里的派對不好玩，兄弟！在孟買，就算大家都吸可卡因，和那些人在一起也很好玩。這里不是那樣的。德里的人是瘋子，他們去派對只為了自我逃避，因為從根本上來說，他們都太混蛋了。當你進入那種心態，你就會變成一坨悶悶不樂的屎。你去德里的派對，看到這個角落里坐著兩個人，那個角落里坐著三個人，外面有四個人在抽煙。沒人說話。這里就是這個樣子。”

和我聊天的是克里什（Krish），一個退休的毒品販子，這方面的事他什么都知道。

“我的生意是從果阿（Goa）和默納利（Manali）開始的，但我很快就進入了這些城市的關系網。不管德里哪里有派對，我一般都在。在德里，沒有毒品什么都干不成，所以如果沒有我，根本就沒有派對。沒有我，就沒有‘時尚周’。時尚周的時候，他們會給我打電話，確保我會來，然后他們就給我在辦活動的酒店訂一間房。任何要辦秀的設計師都會事先給我打電話說，‘兄弟，你那天一定要到。’為了時尚周，你在一兩天內輕輕松松就需要一兩百克。以前我什么東西都弄得到。我很完美。大家都信任我，因為我從來沒有搞砸過。我會干完自己的事，然后走開。

“每個人都用，老板！大政治家、大企業家、時尚界、媒體——所有人。但是在德里，你在外面看不到太多，都是在‘農舍’里。那些吸很多可卡因的人不出來的。‘農舍’地區就是個毒窩。現在我根本不喜歡去那里。德里以前很好玩。2001年以前，我們常常在‘農舍’里開銳舞派對。那很好玩，大家想聽音樂，派對都是在室外的。沒錯，各種毒品都有，但是沒人抽可卡因。會有搖頭丸，但是沒有可卡因。大家互相都很友愛，派對上人不會很多，大家完全不在乎別人怎么想，他們只是想跳舞。現在這些派對都停了，沒人在乎音樂。大家都穿上自己昂貴的衣服，所以他們需要空調。你不能在封閉的房間里抽搖頭丸，知道嗎，你得在外面跳舞。你不能在房間里抽，然后就坐在那里。所以可卡因對現在的人來說更方便。

“可卡因已經取代了所有的東西。人們想要可卡因帶給他們的那種感覺。為了追到女孩子，為了讓別人崇拜，在自己‘農舍’開派對的富人們不能開一個沒有那種感覺的派對。他們很有錢，但沒有可卡因他們感覺不到自己有錢。如果有人要辦一個‘農舍’派對，他們會花50萬盧比在可卡因上。

“而且可卡因對那些要工作的人來說很好。如果你一整個晚上都在抽搖頭丸或致幻劑，那么第二天你什么事都做不了。換成可卡因的話，第二天你照常工作。我知道有很多人過著二十四小時不停的日子。就像有個政治家，他兩三天不睡覺。他就是過完夜生活，往臉上拍點水，穿上西裝，然后在各種會議上精神好得要命的那種人，你能看得出來的。可卡因對那種生活很好。如果是其他毒品，你沒辦法那樣，第二天你渾身都癱了。所以現在沒有周末——每天都是周末。會有人打電話給我，‘兄弟，你能給我搞點兒嗎？’我心想，‘今天是星期一啊！’

“去五星級酒店，廁所總是人很多的，朋友！甚至在酒吧也一樣，大家都知道。他們知道如果對一個人說不能在那兒抽，其他十個人也就不來了。他們不想丟掉生意，所以他們容忍這種事。你得讓你的酒吧熱鬧，所以你不能惹那些毒蟲，否則下次他們就不來了，還會告訴其他人都不要來。

“你可能會被抓，但并不是真的被抓。警察拿了錢就會走人。一般只有那些黑人被抓的時候，才是真倒霉了。大多數吸可卡因的人都是互相有關系的。所以就算警察抓了某人，他們也會接到另一個人的電話，說‘兄弟，那是我朋友，幫個忙吧’。然后警察就對被抓的人說：‘給我們錢，給完就滾吧。’對他們來說，這就像是某種生意。不管什么時候，如果抓到一個政客的兒子，那就是中了大獎。

“德里吸毒的情況比其他城市更嚴重，因為在德里做事的是那些已經有了錢的人。他們有產業和生意，并靠那些生活，所以他們工不工作都沒關系。在孟買，沒人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因為你身邊不會有其他人。每個人都在上班。即使是富人，他們仍舊要上班。他們這樣那樣地亂來，但是第二天早上，你會看到他們坐在辦公室里。在德里這兒，有一種皇宮的感覺。德里人會下午給別人打電話說：‘哦，你干嘛呢？’‘沒干嘛。’‘好啊，來喝一杯吧親愛的。’然后你就去了。你去他們家里，每天晚上你都會看到十個或者十五個人。在孟買沒時間做那種事。

“這里的富人是真的操蛋。這些人甚至根本就不付錢給傭人和那些為他們工作的人，但是他們能夠隨隨便便一晚上在毒品上面就花掉5萬盧比。特別是男孩子，德里的男孩子花太多錢了——他們去俱樂部、找女人、喝酒、買可卡因。部分原因是德里公共場所的女孩子比孟買的少，男人們瘋了似地競爭。德里的女孩子則更受保護，大多數都和父母住。而在孟買，她們像男孩子一樣自己在外面租房子。

“我認識一個家伙，住在一棟‘農舍’里。我昨天還在他家。他不工作，就自己一個人。進了他家大門以后，你得開一公里才能到他的宮殿。他把自己的房子弄得像倫敦的那種老房子，車子在房子前面排成扇形。他每次買車，花在改裝上的錢比車本身還要貴。不管買了什么車，他都會打電話給改裝的人，讓裝上這個那個的。于是他就有了這排蘭博基尼、法拉利、瑪莎拉蒂和路虎。他還有老爺車。這家伙腦子里想的盡是：‘好吧，哪個家伙能給我弄到最好的可卡因？城里有哪些新的女孩子？’他盡做這些事。他的朋友也和他一樣。他們所有人都那個樣子。他們不需要工作個一百年，就能花那么多錢，而且這些錢仍然花不完。他有一間很大很大的公司，錢都已經賺好了。這座城市里有太多像他這樣的人了。他們都足夠聰明，哥們兒！有些人上過牛津，做過超級厲害的事。但一旦這些東西進了你的腦子，事情就完了，每件事。

“我見過人們失去一切。失掉朋友、家人。失掉自己。他們變得瘋癲，瘋得一塌糊涂。人們毀掉一切，也不工作，徹底迷失了。這些哥們兒抽得太多了，一天到晚都處于興奮狀態。他們沒辦法和人交際，抖得跟傻帽一樣，然后就開始喊。就像《猜火車》（Trainspotting）里一樣，他們都崩潰了。”

這種寡頭快樂嗎？奇怪的是，快樂并不是他們最引人注目的特質。為了理解其中的原因，我們可能會問另一個問題：“你怎么知道自己擁有所擁有的東西？”

在西方社會有一種長期且普遍的資本主義共識，因此這個問題引起的困難較少。與金錢和財產相關的精神問題很久以前就已經解決了——文藝復興的先輩們在思考利潤累積時的那種恐懼精神狀態，當代歐洲人已經完全無法與其產生共鳴了。而在現代民主時代，對于有些人有而有些人沒有某些東西的原因，出現了受到一致認同的解釋——努力工作。比方說，上個世紀美國精英的財富越來越少地來自繼承，而越來越多地來自公司薪水和獎金。富人因此可以將自己的特權解釋為通過自己的優異表現得來：他們在大學里學習出色，在工作場所表現出才智和創意，他們發揮出了全部潛能，而他們的升職是因為自己的技能。對他們來說，獲得財產、奢華和行動自由的獎賞是恰如其分的。他們不需要在晚上開車回家的時候問自己，他們的豪宅是否真的是“他們的”，自己實際上是不是“盤踞”在財富里的騙子、二道販子或罪犯。他們對財產的所有權不僅僅是法律上和理論上的，這種財產權也符合他們自己的內在意識以及社會的一般觀點。一切都被正當化了。它們“真的”是他們的。

這太荒唐了。如果辛苦工作就會得到財產補償，那全世界的許多窮人都應當擁有連綿不絕的房子。如果人才總是能得志，那這個星球上就不會震耳欲聾地回響著對于空有一身好本領卻壯志難酬的抱怨了。但這不是重點。對于社會的運作來說，在什么是財產的合法基礎這一點上達成共識才是最重要的，即使整個都只是妄想。

在經歷過像印度市場自由化這樣的經濟動蕩之后，當巨額財富在一片混亂中落到了富人手里，富人無法輕易解釋財富是如何或為何到了他們那兒的，因為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整件事情是多么專橫。他們獲得財富靠的是幾種要素的結合：運氣、關系、暴力和詭計，這些都和個人沒有任何關系，其他人也都可以做到同樣的事情。在某種意義上，財富仍然是外在的，并沒有一種“我的”財富的感覺。看看他們的房子和噴氣式飛機，他們遭受著一種深刻錯覺的折磨，就像一個心理陽痿的男人，哪怕能夠看到自己雙腿之間的那個東西，也覺得自己沒有陰莖一樣。他們發現很難“感覺到”富有。他們喜歡對資產進行實物上和法律上的控制，但這并沒有轉化為一種對所有權的內在安全感。他們完全知道自己在這個窮困的國家缺乏代表性，而且整個社會并不認為他們所擁有的是他們應得的。他們經常被稱為盜賊和強盜，而對此的激烈否認并不意味著他們不相信這種說法。“為什么這會發生在我身上？”他們問自己。由于答案并不是他們愿意聽到的，他們便沉迷于能讓自己分心的東西。但即使是德里無窮無盡的毒品和派對也無法斬斷他們的焦慮——他們害怕這些東西可能輕易而迅速地從自己手里被拿走。這也是印度教對于財富的看法：代表金幣的女神拉克希米（Lakshmi）一直只是一位訪客。人們得在排燈節的時候把她哄騙到家里，而根據印度教宇宙觀的偉大奇想，她隨時可以離開。每天早上，印度教的商店店主都要向她祈禱：不是今天，拉克希米母親，今天請不要離開我。

這就是精神導師在商業世界中的地位會像會計和律師一樣崇高的原因。富人通過非法途徑進入政治機器獲得自己的財富，為了保證自己不會失去這些財富，他們向那些能非法進入宇宙機器的人花錢購買服務。上師告訴商人，要做什么來讓宇宙中的能量流持續朝他們的方向流動——吃這些食物、開這種顏色的車、選擇這個數字結尾的電話號碼、和叫這個名字的女人結婚、戴這種寶石的戒指。有擅長財產管理的上師、法律糾紛專家上師，還有在專注和能量方面提供幫助的上師。盡管所有跡象都指向相反的方向，但這個商業階層仍然深深地恐懼自己會垮臺，他們會找上師來幫忙維持自己的地位。上師為這個階層驅逐了許多妖魔鬼怪——他們試圖從印度商業的方程式中抽走積累起來的巨大負面感受。

但在德里商人身上，我們也能瞥見一些別的東西，一些比簡單的絕望更自相矛盾的東西，而這些附著在他們所擁有的東西上。我們能看到，他們對于獲得和積累的沖動總是伴隨著另一種恰恰相反的沖動——一種使他們希望擺脫一切的純潔、禁欲和不墮落的沖動。在這一點上，他們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資本家之間的共同點其實比和當代西方資本家更多。

消費主義世界提供了許多種“選擇”，但它并不允許富人不選擇任何東西——然而，在人類歷史上，這種不擁有任何東西的愿望實際上比我們這些消費主義者普遍記得的還要更強大。尤其是在世界的這個角落，放棄物質生活并徘徊著找尋其他東西的沖動非常顯著；同樣顯著的還有權利與金錢、靈性與貧窮之間的有趣關系。當代商業戰士通過金錢和財產的積累來記錄自己的勝利，但在某些方面，這使整個經營活動變得沉悶。因為戰士一直高度重視禁欲，即精神經濟，這種活動使從業者能超越凡俗，實現真正崇高的壯舉。有時，這些人（特別是男性）強烈地感受到禁欲主義的驅動力，他們所信仰的印度教不斷就精神腐敗向他們發出警告。因此，德里的商人們轉向上師，不僅是為了幫助自己保住財富，還要幫助自己忍受財富。

“1999年，我的生活改變了。我和一個漂亮且有兩個孩子的女人開始了一段婚外情。她和丈夫分居了，而我真的很喜歡她。我就是那一年開始做貿易的。

“我和印度最大的小麥出口商一起進入商界。我們開始交易很多不同的商品，回報非常好，好到每個人都愿意往我們的生意里投錢。全世界最有錢的印度人都投錢給我們，他們會給我們1000萬盧比，過六個星期，我們還給他們3000萬。我們從所有能拿到資金的人和地方那里獲得資金。我把自己的財產和投資變現，然后把錢投進去；我所有的朋友都在做同樣的事。

“市場自由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直到1999年，逐步放寬對進口貿易的限制仍在進行。我和合伙人在政府里認識人，所以我們知道內部消息，知道下一步會放寬哪些限制。那種內部消息和其他內部消息一樣，比如所有那些做房地產的家伙都知道新高架的規劃地點，然后他們就在那里買土地，而我們會在別人知道某種商品的進口限制將被取消以前就采購該商品。只要限制一解除，我們就賣掉貨物，于是很快賺了一大堆錢。等那些大公司開始進口那些商品時，我們已經轉向別的東西了。我們賺的錢太多了，多到讓人覺得不好意思。

“隨后這一切都結束了。因為在印度，有一樣東西叫作‘嫉妒’。我的合伙人有另一個商業伙伴，他向警察舉報了我們。這個國家所有的調查機構馬上開始追著我們，問我們是怎樣快速賺到那么多錢的。我們還存著大量黑錢，因為我們得行賄。一船小麥價值4億盧比，而通關需要付的賄賂是500萬盧比。所以他們覺得可疑。

“之后，我所有的銀行賬戶都被凍結了，所有的錢都不能動了。我在銀行里有50億盧比，但是我不能用。所以，在經濟蓬勃發展時其他人都把錢投到房地產里，我卻什么錢也沒賺到。整整四年的審訊。我很受挫敗——我工作賺了錢，卻不能享受自己的工作成果。

“與此同時，我女朋友離開了我，和德里最瘋狂的人之一開始交往，那人是內閣部長的兒子。她知道他很暴力，但她也知道他將變得非常富有，因為她的兄弟也在做同一種交易。所以她就去和他在一起了。”

普尼特（Puneet）現在三十四歲，已經十多年沒有工作過了。他多數時間待在家里，因為他的朋友都很有錢，而他沒有收入。今天知道我要來，他穿了件襯衫和新熨過的褲子，還穿了一雙皮鞋。我們一起坐在寬敞的客廳里，客廳的墻上掛著狩獵畫和古董版畫，上面畫著19世紀英國旅行者眼中的印度城市。

普尼特能獲得不可思議的意外之財，實際上是因為他上的學校是德里最負盛名的學校之一，這所學校是政治和商業精英的首選。他在學校的朋友是這個國家最有權勢的人的兒女，他們陶醉在別人不能拿他們怎么樣的感覺中。這所學校基本就是權力大鱷的實習所。

“有個人和一個軍隊家庭聯姻，成了一名成功的軍火商。他的兩個兒子和我在同一所學校。有一天，我們在凱悅的酒吧玩，他的兩個兒子和別人打架，而且打得很厲害，于是酒店的保安就和他們打了起來。他們叫來自己的父親。他沖到酒店（他自己很高大）把保安打了一頓，拿起大花盆往他們身上砸，然后就把自己的兒子帶走了。之后，為博得同情，他在報紙上登了一張他的兒子們在醫院里纏著繃帶的假照片，還對凱悅酒店提起訴訟。

“那種事無時無刻不在發生。每次出了事，男孩們就會互相攀比，看誰的父親更有權勢來進行干預：‘我來打給我爸。’‘不，我來打給我爸。’

“有個家伙是外交部長的兒子，他爸能管護照。有一天，我朋友下了飛機要入關，到了入境處。他的護照在褲子后面的口袋里折成了兩半。他把護照放在桌子上，移民官說，‘你不能像這樣對待你的護照。你在破壞政府財產。’我朋友回答說，‘你想看看我怎么對待我的護照嗎？’然后他就把護照頁撕下來，一頁一頁地扔在桌子后面那家伙的臉上。

“另一個朋友想要駕駛執照。到了十八歲，每個人都想要駕照。于是他走進了交通局，報了他當警察局局長的叔叔的名字，然后在交通局辦公室到處走，從最低級別的人一直找到最高級別的人，最后他遇到了交通局局長，局長立即為他辦好了正式駕照。這是一樁不可思議的壯舉。通常你得先有臨時駕照，之后才會發正式駕照，而正式駕駛執照是十八歲時你能拿到的最酷的東西。但有人當場給警察局局長打了電話，發現這個家伙是瞎說的，于是當著他的面就把駕照給剪了。

“我的朋友們做所有事都是靠關系。要不然你在這個地方還能怎么做事？之前，我遇到一起交通事故，駕照被沒收了。我打電話給一個朋友的父親，他派警察來把事情解決了，還把對方幾個人打了一頓。然后我給另外一個在內閣的朋友打了電話，他父親有個很了不起的助理，當天就把我的駕照拿回來了。否則，我得要上法庭，還會遇上各種各樣的麻煩。

“這就是這個國家的精英如此瘋狂的原因。他們的快感來自他們能夠做別人不能做的事，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為之戰斗，捍衛特權。還有一個原因是父母養育孩子的方式。這些父母們崇拜權力，所以孩子們也這樣。這就是在我的生活中，失去和失敗是重要教訓的部分原因。只有當你失去一切，你才開始看到自己曾經干的事有多么瘋狂。”

這就是2000年普尼特覺得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情況。而且他覺得這并非一個偶然事件，而是一條精神信息。“有些負能量在攻擊我，我無法應對。我覺得自己在被告知‘你不能再按照過去的方向前進。至少，在繼續老路之前，你必須走另一條路’。為了讓我的錢解凍，我越來越深入靈性生活。我開始去拜訪上師，請他們幫忙尋找到底出了什么問題，讓我無法得到這筆錢。

“我找了一名上師，他是一家大型衛浴設施公司的老板。我有過很多上師，但當我遇到這個家伙時，發生了瘋狂的能量交換，現在我已經和他在一起很長時間了。當時他聽了我的故事。我向他解釋女朋友離開我的原因，當她要我娶她時，我拒絕了，因為我覺得自己不應該在精神道路上分心。他告訴我，我不應該拒絕她。當一個女人要求一個男人與她結婚，隨之而來的是宇宙中的女性能量，不應該被拒絕。他告訴我，我的錢只有在我結婚以后才會被解凍。所以，基本上在我拒絕這個女人婚姻請求的那一天，有人給我的生活按下了暫停按鈕。

“他催我結婚。在某種程度上，一個長得不錯，而且有50億盧比在銀行里很快就要解凍的家伙要結婚很容易。我本來可以有那么多漂亮的女人。但像我這樣有深度的人的一個問題是，我可以看到一個女人心里的東西，如果我發現她沒有正確的態度，我是不會和她上床的。德里社會的一大問題是，如果你和任何一個在這個社交網絡里的女人上床，你可能就像有了一個網絡攝像頭，并開始在網上播放你的性生活，因為一切差不多都是公開的。哥們兒啊，你必須有像色情明星一樣的自信。

“這對我和我的兄弟來說很難。他也沒有結婚，雖說他上了耶魯，現在在倫敦，是一個成功的銀行家。他在性方面的胃口很貪婪，那方面他也無所畏懼。有時候我會被他嚇到。他會在任何地方任何女人那里碰運氣。現在他一點也不好看，禿頭而且身材很矮。但他對人很好。我們的母親個性霸道，這是我們難以結婚的原因之一。然后我們的錢被凍結了，不過反正在父親去世以后，我們的財務狀況就不怎么好了。父親健在的正常家庭所獲得的財富增值也沒有發生在我們身上。你必須理解，當你生活在德里，無論喜歡與否，你都處于一場激烈的競爭之中，而我們未能參與過去十年里其他所有人都搭上的財富增值浪潮。和其他人相比，我們窮得一塌糊涂。我們之前有另一棟房子和租金收入，還有一處商業房產，現在這兩處房產都賣掉了，所以現在我沒有任何非勞動所得。這是德里的每個人都想要的東西，非勞動所得。但我們一點都沒有。所以對未來的新娘來說，這也是一個問題。”

這時候，普尼特和我正在外面的花園里邊談話邊抽煙。他母親從車道上走過來——她在隔壁參加婚禮，為了這個婚禮，似乎整座城市的寶馬和奔馳都出動了。普尼特匆忙把手里的香煙扔到花園墻外。但他的動作不夠快。他的母親朝他大喊；他否認了，但有些漫不經心。

他繼續回到見上師的話題。

“上師告訴我，我犯的另一個錯誤和我叔叔有關。我曾把叔叔告上法庭，而我的上師說，既然我父親去世了，叔叔就是家庭的首領，而你應該永遠和一家之長保持和平的關系。

“這棟房子分給了我父親和我叔叔。叔叔擁有房子的后面一半，但自從我父親去世，他就一直想得到整棟房子。他那部分的房子漆成了和我們不一樣的顏色，有天晚上，他把整個屋頂都漆上了他的顏色，試圖表明我奶奶希望把整棟房子給他。然后他還用自己在警察系統的關系恐嚇我，威脅說如果我們不搬出去，就要逮捕我。后來他又對我母親發出了死亡威脅。你想想，什么人會下作到給我母親發死亡威脅，而那時候我才十六歲。對一個寡婦，你是在對一個寡婦做這些事。我甚至無法想象接下來會發生什么。

“我叔叔對我的生活產生了非常有害的影響。他的家庭很瘋狂。他的大女兒是一個很好看的女人，又妖媚又火辣，身材高挑，皮膚很好，非常苗條，但也非常高傲。她有很多追求者，所以更加自我膨脹。最大工業家族之一向她提親，要讓兒子娶她——如果她夠明智和謙卑的話，本來應該接受這門親事。結果她和一個來頭很大的名媛之子訂了婚，隨即毀掉了原來的婚約。之前的那家伙瘋了，再也沒恢復過來。后來她和一個皮革出口商結了婚，那家伙個性很好。她搬進了他在尼札姆丁的房子，過了一年，她帶著所有的家具和他家所有的鉆石離開了，并和他離了婚。

“她曾經和一個女人是好朋友。那個女人有一家公司，因為大型詐騙和各種破事兒而臭名遠揚。有一次，那女人和她全家都因為詐騙進了監獄，余下的人也跑路了。那個女人賺了很多錢，所以過去愛住在喜來登酒店。她曾經有一輛勞斯萊斯停在酒店外面，成了我們男孩子的地標。后來她去坐牢的時候，勞斯萊斯就停在我們家外面，因為我表姐是她最好的朋友，并負責那家公司所有的文書工作。她為那個女人工作時，遇到了她侄子，并愛上了那個混蛋。有一天我們回家，發現他倆正要結婚。這段婚姻持續了一段時間，她讓那家伙像是生活在地獄里。我記得一個仆人告訴我們（他后來離開了他們），有一天她在仆人面前踢了她丈夫。之后她又離婚了。現在她住在我們房子的另一半里。我有了個很討人喜歡的伴兒。

“她父親，也就是我叔叔，在沒有告訴我或我母親的情況下，賣了我父親的一個工廠，而我們家是擁有一半股權的股東。我把他告上法庭，最終用強硬手段拿回了屬于我們的那份錢。但當我去見我的上師時，他說我的有些問題就是源于這件事。他說，傳統上，在印度教中，任何把家庭首領告上法庭的人都不會受到精神祖先的優待。

“在印度教歷法中，有一段時間叫‘sharadh’。這段時間里，所有你祖先的靈魂都應該從天上回到凡間，而你應該贏得他們的祝福。有祖先在身邊的人會獲得驚人的財富。而當你沒得到他們的祝福，或惹惱了他們，就會發生相反的情況。你試圖做的每件事都會遇到障礙。所以我相信，在我父親和祖父去世以后，我遇到這么多阻礙的原因是我受到了精神術語中所謂的‘祖先的詛咒’，或者叫‘pitra dosh’。

“道理是這樣的。他們死后，即使是活著的時候愛你的父親或祖父，如果他們的靈魂沒能進入下一個階段，他們就會不斷來騷擾你、打攪你，逼你去做任何能讓他們獲得解脫的事。在印度，我們有兩三個圣地，在那里，你可以讓你的祖先獲得解脫，不管他們是被凡間的什么擋住了。但只有兒子可以做這個儀式。這就是為什么印度人那么瘋狂地要有兒子，因為他們相信，只有自己的兒子為他們進行火葬，并且完成了這個儀式，自己才能獲得救贖或轉到生命的下一個階段。所以我今年終于辦了這個儀式，來清除我受到的詛咒。我祖父和父親已經去世大概二十二年了，辦完儀式以后，我確實感覺到明顯的不同。然后，我去了上師那里，他說，“現在事情已經完成一半了。”我實際上能感覺到我的一條脈完全通了，這種情況很特別。我的意思是，基本上當你正在成為一個（印度教）導師時，你所有的三條脈必須是絕對通暢的——這意味著你沒有受到“祖先的詛咒”，你沒有祖先方面的問題，或者祖先累積到你身上的罪過，你都已經還清了。在印度教中，“最后一個兒子”（ultimate son）應該是非常吉祥的，他實際上從某個空間釋放了自己二十一代的祖先，并使他們獲得救贖。那就是一個家庭能擁有的“最后一個兒子”。

“那位做衛浴設施的上師把舊我完全打破，并重塑了我，這是我唯一可以得救的方式。現在情況正在好轉。我的訴訟已接近結案，政府免除了我的稅款——這是一種認可，表明那筆錢將會返回。但我在這個過程中已完全改變了。有些經驗我甚至不能說出來，因為人們會認為我瘋了。我的自我已經被打破。我過著禁欲的獨身生活。我的富人朋友到我這里來尋求平靜。哥們兒，他們崇拜我，他們在某部分想像我一樣，過精神和靈性的生活。有錢人很容易被我吸引。有時，他們在商業生活中遇到問題——比如他們從兩筆交易中掙了大錢，然后就沒有別的進展了——我就會給他們一句名言或一堂課，讓他們茅塞頓開。

“老兄你看，在那段創造財富的日子里，德里的每個人都迷失了。我最好的朋友成了一個可卡因癮君子，整天和妓女在一起。他剛剛給我發了張照片，是他和兩個妓女在新加坡的麗思酒店。我所有的朋友都正在經歷瘋狂的離婚，金錢就是他們所在意的一切。而現在他們意識到，除了錢他們什么都沒有，所以他們來找我。”

我請普尼特今晚帶我去見他的上師，現在該出門了。我們上了車，出發去旁遮普花園（Punjabi Bagh），那里是西德里的商業飛地之一，也是上師住的地方。路上，普尼特心情很愉快。他觀察著我們周圍汽車里的人。我們超過了一輛坐著兩個警察的摩托車，男警察坐在前面，女警察坐在后面。

“兄弟，那個女警正朝我使眼色！”普尼特說，“她對我有意思。”

一輛白色的賓利豪華轎車加速超過了我們，我們看著它分開了前面的車流。它壓低自己，伏在巨大的輪胎上；車尾翅膀形狀的“B”看上去像一枚說唱歌手的獎章。賓利和勞斯萊斯過去像是帶立柱的鄉村豪宅，但那是富人渴望英國貴族風格的年代。現在賓利和勞斯萊斯被弄得像是罪犯開的車，因為21世紀財富的美學是不同的。什么是“品味”已經不再清楚——全世界的富人采用的都是罪犯風。

到了隱修所，那里已擠滿等待的人。我們被告知上師睡著了。我們決定排隊等待，隊伍在偌大的地下室蜿蜒，從樓梯一直排到房子外面。志愿者們給大家發放盛在不銹鋼盤子里的米飯和扁豆湯。我們等著。

“他睡覺的時候，”普尼特說，“不能打擾他，因為他實際上處于某種有意識的狀態，并且正在處理某人的問題。”

我們坐的地方很熱，這個精神避難所吸引了很多蚊子。普尼特開始變得有些沮喪。

“神一直對我很好，”他說，“我的上師一直對我很好。他們把我從很多危險中救了出來。也許過去十年我的生活里沒發生什么好事，但我已經被救了出來，而且擺脫了很多危險。很多！我的意思是，你甚至可能都不會理解有多少。我非常感激。但我已經很久沒能碰我的錢了。曾經的好日子已經過去很久了。”

“等你把錢拿回來，你會做什么？”我問。

“我只想和女人睡覺，兄弟。只想把這一切拋到腦后。我做了太久隱士了。你以為我不想要別人想要的東西嗎？我仍然喜歡住在豪華的房子里，然后開一輛大車。我喜歡漂亮的女人和她們豐滿的臀部。我喜歡有家庭有孩子有各種東西。我已經花了十年來清理我的精神賬戶，而我的錢還沒回來。這讓人很累。”

我相信每個經歷過清修生活的人都有這樣的想法，而且我不完全相信這種想法是真實的。他生命的過去十年是一個“例外狀態”嗎？或者這也許就是他真正的自己？如果他最深的沖動是“和女人睡覺”，難道他不會為此投入比這十年更多的時間嗎？——他并非真的缺少時間。如果他愿意，這些年他可以找到其他方式賺錢，而不是選擇從德里的繁華中抽離出來。我不知道他是否真想要回自己的錢；或者，是否這些錢只是一個大大的借口；或者他每五分鐘提到的這些在銀行里的錢，并不只是讓他過著自己想過的生活的借口。他未來的自由故事——當他拿回了錢，就會有女人、派對和享樂——也許只是一部虛構的小說，小說寫的是一個并不真正喜歡金錢世界的人在這個迷戀積累的時代，掙扎著表現出“正常”反應的故事。

他仿佛能聽到這些想法，他說，

“但我不希望物質的東西扼殺我與神之間的聯系。我兩個都想要，所以我現在有點困惑。因為也許神只是把這些錢放在這里，作為我和他之間的一個障礙。如果你那么大膽地認為自己希望一直在神的身邊——那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想法。在地球上的七十億人里，只有少數人有這樣的志向——我想與神同在。很少有人早上醒來說，這是我今天要實現的，對吧？所以我的上師對我說，在那種情況下，那樣想的人（也就是你的情況），他說，神會用他的力量盡一切所能來讓你氣餒，考驗你。因為他不希望自己身邊有低層次的人。所以如果我走錯了路，他會把我踢出去的。”

周圍有人小聲說上師醒了。盤著腿的人們開始非常緩慢地移動。幾個小時后，我們到了上師房間外臺階的最高處，然后被帶了進去。

房間很大，我們前面還有很多人。如果說我本期待看到上師的時候會有任何偉大洶涌的感覺，那么我失望了。他看上去確實像是房間里唯一正常的人——其他人都有點奇怪，但我不覺得除此之外他有什么特別的。他賣了一天浴室配件，剛剛回來，還穿著西裝和襪子，盤腿坐在一張床上。

人們跪在他面前，每個人都能聽到別人正在說的話：“我女兒在學校表現不好，而我承受著膝蓋疼痛的折磨。”一個女人給上師讀一封信，她在哭。對大多數求助者，上師會給他們一個盛著飲用水的不銹鋼杯子，這個杯子是他事先放在額頭上加持過的。對其他人，他給的是豆蔻種子。

德里商人最喜歡的一句話是：“惡有惡報。”在積累財富的過程中，你必須行賄，從體制中偷竊、恐嚇別人、制造敵人，并且基本上忘記一切不能幫你累積財富的事情。如果你賺了很多錢，那就“證明”你受到世界的偏愛——世界是站在你這邊的，不需要感覺有什么不對。但是有時候，即使是非常大的財富，與這個過程中積累的負面性相比，都可能看起來相形見絀。因此，消除這個負盈余成了商業階級永恒的焦慮。你必須找到其他東西來把你消極的一面帶走，你必須找到可以傾倒這些消極面并且永遠不會讓它們回來的方法。像慈善捐款就不錯——它把你的一些消極面轉移給了受你捐贈的人。朝圣為你賺得信用，用來抵消這種消極面。但人們所夢想的當然是一種可以讓消極面簡單消失的機制。

“那些人身上出現的，是消極面針對他們的表現所做的報應。身體又開始疼痛、孩子在學校表現不好——都是因為消極面。豆蔻的種子能把消極面帶走。上師祝福這個人，于是消極面就轉移到豆蔻種子上。然后種子被投進到亞穆納河，里面的魚會把它們吃掉。”

前提是亞穆納河里還有魚。

“因為魚生活在水里，所以受到土星的保護，于是消極面的循環就在那里終止了。”

但是有許許多多的消極面是世界上所有的豆蔻種子和所有的魚都吸收不了的，和它們的斗爭是一項全職工作。

普尼特問我：“你見到他的時候要問他什么事？”

我感到一陣不安。

“你的意思是？”

“你看，你等了這么些時間來看他。你準備問什么？你為什么在這里？”

普尼特不是這位上師的普通追隨者。上師給他特殊待遇，因為他說普尼特擁有大多數人沒有的精神品質。這和普尼特銀行賬戶里的1億美元可能也有關系。我不知道。關鍵是不知道為什么，在我的想象中，普尼特與我會和上師進行一次私人會面，互相之間平等舒服地聊天。現在我意識到，我只不過是作為眾多崇拜者之一來向他下跪的。

這種情況觸發了我個性中一種深刻的脆弱。我的想法變得混亂，開始頭暈。我不知道該如何在這個人面前為自己說話，尤其是在所有這些人面前。每個人都聽得出來我說的話是編出來的。我開始出汗，卻不是因為熱。

先輪到的是普尼特。床上的人把手放在他頭上。雖然他們兩個周末一起看了足球，但上師的眼睛里沒有一絲認出他來的意思，他問他為什么而來。普尼特告訴他，自己最近經常覺得眼睛刺痛。上師向助手要了一杯裝在不銹鋼杯子里的水，用杯子碰了碰自己的額頭，遞給了普尼特。

我覺得自己內心崩潰了。我選擇的角色是觀察者，而不是被觀察者。我陷入了恐慌，發現自己很卑微。我意識到自己什么都不懂。這個房間里的每個人都懂得一些關于生活非常基本的事，而我不懂。他們生活著，而我只是一個偷聽者。我窺探生活，這樣我就不必真正地去過生活。一陣并不存在的風吹進了我的耳朵，在那一刻，我確信自己已經到了一個年齡，覺得自己從來沒有真正做過任何事。我意識到自己需要和這個上師說話。也許這就是整件事的意義。我需要他說一句話，把我從外面舒適的虛空中帶走，進入他的世界。我意識到，我會對他絕對真誠的。

普尼特被上師的一個助手帶走了。上師把他的手放在我頭上，那種感覺很好。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力量。他看著我的眼睛。

“我能為你做什么？”他溫柔地說。

我謙卑地看著他。

“請告訴我，”我說，“我還應該學什么。”

他愣了一秒鐘。

“你說什么？”

我覺得重復這個問題很尷尬，但我重復了一遍。他笑了。他說，“你在拿我開玩笑嗎？”

“不是！”我說的是真話。

他好奇地看著我。然后他咧開嘴笑了。

“你不應該在這里。”他說。

我不敢相信。他說：“走吧，去過你的生活。別再拿我開玩笑。”

他現在大笑起來。

就這樣結束了。他看著隊伍里的下一個人。我站起來走開了。

我備受打擊。

我做錯了什么？他是怎么看穿我的？

我恍恍惚惚地出了門，走進外面黑暗的夜色里。我看到了普尼特，他彎著腰，拼命流眼淚。現在我明白了為什么這樣的見面會帶出人內心的軟弱。我同情地把手放在他肩上。

“你還好嗎？”我問。

“嗯，”他說，“他們把檸檬汁濺到我眼睛里了，哥們兒。”

我忘了自己的事，大笑起來。他對自己的眼睛太認真了。我們走回車子。他點了兩支煙，我們站在樹下抽了起來。

我問他，我和上師之間到底哪里不對？

“他看穿我了嗎？”我問，“他發現我是個假信徒了嗎？”

“這很難，”他說，“第一次見面一般不會問那樣的問題。得做很多事才能到那種程度。”

除了上師家外面的人群，這條街道很寧靜。我們旁邊的電動大門開了，一輛寶馬敞篷車開了出去。

普尼特說：“不管怎么樣，從某個層面上來說還是挺嚇人的。你必須習慣。這很容易搞砸，因為這不是一個正常的情況。你知道他在看你，你知道如果他想，他可以讓你眩暈。你可不想有那種經歷。甚至我都把視線轉開，只是因為我今天不想被那種能量搞糟。你可能發現我比大多數人眨眼的次數少，那是因為我精神上很干凈。但今天我不想進入那種狀態。

“通常我是少數幾個能做到在精神上完全干凈的時候可以盯著他，直到他低下頭的人。我是他知道的很少幾個能做到這一點的家伙之一。通常，當他看著一個人的眼睛，他可以完全擊敗他們，讓他們不得不轉開視線。但在我身上不是這樣。有時候，我們對看著交換能量有五分鐘，大家會想：“這是在干什么？”然后他不得不對我說：‘普尼特。往下看。’”

## 十七　中產階級的焦慮

現在我們轉向這種躁動的節奏

很多人因為開車魯莽而橫死街頭

8%的增長讓一些人開雷克薩斯竄來竄去

在South Ex買勞力士和鉆石項鏈

土地開發商努力打造權力關系

他們造更多的購物中心

國家民兵清空村莊——下一輪出埃及記

所以你可以從孟買指數里套現

——德里·蘇丹，說唱藝人

“普通”中產階級這些年里有什么感覺？

正如我們在本書開頭所說的，在德里的語境中，中產階級并非真是“普通”的，但他們人數很多。在德里，他們的數量有幾百萬。他們正如任何其他人數相當的群體，本質上存在著無限的經驗——快樂的，不快樂的；非凡的，普通的。

但這座城市自身是一股強大的力量，確實為中產階級的情緒提供了某種類型的一致性。它擁有巨大的能量，無論其效果是什么，這種能量都仿佛具有磁性，所以人們的活力和勤奮都達到了不尋常的程度，直到他們被疲勞壓倒——疲勞也是這座城市的顯著特點。在其千變萬化的轉變和轉型中，德里也有趣得令人難以置信，人們對自己城市的狀況極其關注，無論好壞，總是喋喋不休地反復討論城市的情緒、發展和事件。但德里對于更無憂無慮的心情不是特別友好。除了在老人身上，人們很少能看到滿足自得。除了在小孩身上，純粹的快樂也很罕見。在本世紀的頭十年，自然的處事態度也在減少，隨著時間推移，更輕快的心情變得越發少有。

20世紀90年代，中產階級在他們的生活中看到了許多直接的變化，其中大部分都令人滿意。他們中的許多人看到國家控制的結束，因而松了一口氣。他們受到了一系列激勵，包括新工作、電視頻道、大批商品和旅行機會，并且帶著一種不斷擴大的視野邁入了2000年。他們覺得這是他們的時刻，不僅是在本地，而且還是在全球意義上。世界長久以來由西方主導的情況正在終結，同時終結的還有他們國家的恥辱。他們帶著帝國式的野心朝外面的世界看去，對每一起印度企業收購西方公司的案例都津津樂道。

但這種節日氣氛在這十年的后半段里變得更加陰郁而憤世嫉俗。中產階級仍然在賺錢，他們是這個國家將窮人手中的資源進行再分配的受益者。但他們的生活也變得風險更高，成本也更高，他們不斷增加的資本收入能買到的東西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多。健康和機遇似乎是以這座城市里同步升級的野蠻為代價。他們還發現，即使擁有更好的車，自己也還是變得更加恐懼和焦慮。他們想知道自己正在創造什么樣的社會，于是開始懷念起那些曾經厭惡的東西——街道上的牛以及人行道上賣奇怪商品的小販。他們的“快速致富”精神反過來刺痛了自己，因為在這個驚人的財富創造階段，幾乎無人在意過未來。在這十年中，GDP增長率多次接近兩位數，而當新經濟“唾手可得的果實”全都被采光了之后，比方說2012年GDP增長率放緩至5%左右時，大家才開始想要進行長期規劃和投資。其原因之一是，繁榮仍然局限于那些受過教育的少數群體，對大量無一技之長的人卻幾乎沒有提供什么機會。而且令人沮喪的是，大多數印度人口的處境幾乎沒有獲得任何改善。整個國家的發展指標比更加貧困的鄰國孟加拉國還要低：每千名新生兒中，仍有六十一名兒童會在五歲前死亡（即使在德里也有二十八名兒童會死亡，而中國全國范圍內的數字是十五[[1]](#Shu_Ju_Lai_Yuan_Shi_Lian_He_Guo)[[2]](#_The_State_of_the_World_s_Childr)）——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抵消印度經濟成就中過分的自豪感。而且，中產階級在生活中發現，基礎設施仍然很糟糕，自己的孩子幾乎不可能獲得世界級的教育，官僚制度阻礙了所有的創業沖動——中產階級意識到，他們的持續崛起比自己曾經相信的更不可靠。

這十年中，他們還很不愉快地意識到，自己并不是那個能做主的人。德里的中產階級漸漸明白，他們新興的城市社會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個隱蔽的陰謀集團在管理的，而這個集團的利益和他們的利益非常不同，甚至是敵對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幕后的精英似乎壟斷了城市里越來越多的機會和資源，因為即使是非常小的創業契機，例如開一家咖啡館或書店，其需要的政治關系對于普通人來說都很難，甚至不可能有的。設計師酒吧和時裝精品店這樣的新消費景觀，本來或許說明了資本主義的多樣化和異質性，然而卻讓人有一種奇怪的統一感，實際上是統一的墮落感，因為這些只不過是為同一個腐敗圈子獲取更多利潤的工具。這個十年結束時，盡管有財富流入德里，但這座城市仍然如此破舊、資源不足，許多中產階級人士為此指責非經選舉產生的管理者。他們開始覺得，德里現在就是一個收取私人勒索的地方，對長遠發展的關心稀缺到令人陰郁。他們覺得自己的感覺與意見和德里的演變完全不相關，并且他們關于自己城市的許多夢想永遠都不會實現。他們覺得自己生活在一種幻想里，而現實是另一種——就連報紙也很少提及經濟中比例巨大，但卻能隱身在國家和金融機構視線范圍外運作的那一部分，因為媒體沒有可以獨立驗證的信息。因此，人們從印度新聞里獲得的關于印度商業的圖景完全是關于企業的，但這張圖景并未提及印度新生力量和新金錢的大爆發，也就無法解釋為什么生活是現在這個樣子。這就是社會里充斥著謠言和陰謀論的原因，這似乎是對現實這部小說表示懷疑的最好表達。

中產階級對未來社會的希望是隨著2010年英聯邦運動會之前的丑聞破滅的。對許多人來說，這些丑聞揭露了一套通常被隱藏起來的機制，解釋了他們所見到的景觀為什么是現在這種特定形式。運動會約有六十個國家參加，本來是一個能夠提高國際聲譽的盛會。富裕階層普遍認同德里的政治管理者信誓旦旦的雄心，政客們把運動會看作是可以獲得巨額預算和巨大權力的機會，從而對城市進行深刻變革——建立急需的新交通基礎設施，復興和清理城市，將貧困者從非正式定居點驅逐出去，因為這些定居點所在的土地現在已非常珍貴。對于許多窮人來說，這是一場災難；但對中產階級來說，如果收獲一定需要犧牲，那買單的最好還是那些本來就很悲慘的人。

但是隨著2010年的臨近，很明顯，許多這些所謂的好處將永遠不會實現了。即使是通常情況下對權力和金錢非常迷戀的主流媒體，也每天都在對權力關系進行猛烈抨擊，指責其卷入對運動會預算的爭奪。運動會的預算非常高，而且如事實證明，這一預算具有很大的彈性。因為既然已經同意主辦一個大型活動，關鍵承包商如果在開幕式前幾個月突然漲價，那管理者是幾乎無法拒絕付款的。據估計，運動會的籌備，包括隨之而來的開發項目，最終花掉了公共財政7000億盧比[[3]](#_Sprinting_to_Disaster)，是最初預算的四十倍——顯然，大部分漲價可以歸咎于官僚和他們朋友的大筆勒索。這些朋友從事建筑和貿易，收取了高價，交付的產品卻達不到標準（一個著名的例子是，為組委會提供的衛生紙每卷要80美元）。中產階級所夢想的穩定堅實、設施齊全的城市從未出現，相反地，最終出現的是一個臨時的石膏復制品，而且這復制品和被努力兜售了整整十年的電腦效果圖沒有絲毫相似處。

“雅典奧運會的時候，”一位參加奧運會的外國官員說，“也曾出現很多腐敗，但目的沒變，每個人都一心要辦一屆符合必要要求的奧運會。但在德里，管理者完全愿意犧牲運動會。事實上，目的完全不是運動會本身。

“看看餐飲合同。招標放出后，一家美國公司贏得了標的。這家公司差不多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在德里每天生產八千份膳食，同時還能滿足運動員所需品質的公司。但他們拒絕向組委會主席交10%的賄賂。

“主席拖了一會兒。當他們還沒有付清款項時，他威脅要重新進行投標。他的顧問說，這會是毀滅性的，因為會損失好幾個月的時間，還可能威脅到整個運動會。沒有餐飲承辦商就沒有運動會。他們還警告他說，標的將不可避免地落到同一家公司手里，而那家公司隨后會開出更高的價格。但他還是這么做了。他再次發出招標，并對這家公司設置了一些技術性的阻礙。

“七個月過去了。最終，合同又回到了同一家公司。此外，本來提供廚房設備租賃的英國公司現在收回了他們的租賃合約，并說一切都必須購買。不僅如此，由于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通過海運運輸設備，所以他們不得不用航空運輸。他們試了一架747，但飛機太小，所以他們不得不租了一架安——225——世界上最大的運輸機。你自己想想這樣要多花多少錢。

“人們有四種主要方式從英聯邦運動會的合同中賺錢。第一種是把合同給自己或自己的家庭成員。就算這樣了，他們也不會在這些合同的合法利潤面前止步。他們會哄抬價格，不按規定交貨，而且交上來的也是最簡單、最粗制濫造的東西——這就是那么多道路和建筑物在運動會剛要舉行時就倒塌的原因。

“這些場地的建造標準差得可悲，這些標準全都是垃圾。通常辦這些活動會有直接利益，比如旅游和國際聲望。然后會有長期利益，主要是留下來的建筑物。而德里運動會不會有長期利益，因為建筑質量大打折扣。例如，因為從中抽成的關系，他們為建筑物框架提供的鋼材質量非常差，所以建筑物很快就會開始彎曲變形。于是就要花巨款聘請外國工程顧問對建筑物進行加固。

“賺錢的第二種方式是在一定的范圍內對一切東西進行抽成。這就是組委會會議總是感覺像一群匪徒聚在一起的原因：他們的主要目的就是爭奪勢力范圍。許多對外人來說不能理解的停工就是因為勢力范圍的沖突。比如，一個人拿走所有酒店預訂的10%，另一個人則設法確保為訪問官員建造的宿舍永遠不被批準，這樣他們就不得不一直住在酒店里。事實上，整個運動會的形式就是由內部的賺錢結構決定的。

“第三種方式是在給合同的時候受賄。監管單位用這種方式賺了很多錢，于是商人們為了把錢賺回來，不得不虛抬成本或者提供低于標準的商品。

“從運動會中獲利的第四種方式很簡單，就是偷走所有這些用虛高價格買來的設備。運動會后大部分設備消失了。有些是被德里的警察拿走的，他們把這些家具和電腦放在辦公室里。其他情況下，警察可能收了別人的錢，讓人把東西拿走。平板電視消失了，世界一流的健身器材也不見了。根本沒有物品清單，這也幫了大忙，因為事后沒人可以證明有東西不見了。整個英聯邦運動會的運營用的都是個人計算機和私人電子郵件地址，沒有中央服務器。這不是能力的問題，而是有意采取的策略，以確保沒有系統化的信息。另一種被偷走的東西是硬盤。人們早上來上班，然后發現他們所有的數據都沒了。我相信這是在故意清除數據痕跡。例如，組委會的預算完全消失了，而這種事發生的原因可能是管理系統中有意設置的缺陷。決策完全是捏造的，錢在缺口消失了。”

關于這些錢去了哪里有無數種傳言，但在大多數人的想象中，這些錢被腐敗的精英用來加強對社會和資源的掌控。毫無疑問，有些人將之用于資助政治家的競選活動，有些則將之用于投資新的商業企業。但中產階級自己可以發現其中的一個主要跡象：每次英聯邦運動會發布一部分新預算，德里房價就會進一步超出他們的購買能力。實際上，德里的房地產市場與其他地方不同。德里的房產是數十億美元腐敗資金的出口，這些錢不能存在銀行，這就是房價的浮動和價格與建筑的性質或“普通”人的購買力幾乎沒什么關系的原因。媒體報道說，那些賺錢的人在英聯邦運動會籌備期間購買了800萬美元的房產，但這只是聳人聽聞的冰山一角；大多數資金被投資在更謹慎的交易里——在這里買幾處50萬美元的公寓，在那里再買幾處50萬美元的公寓。這種情況帶來了金融精英與中產階級面對面的交鋒，并且情況對后者越來越不利。

在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產階級仍然有可能想象自己在德里購置房產。但到了十年結束的時候，即使是非常成功的企業員工也無法做到了。別說是三四千萬美元的豪宅，在德里南部新建的三居室公寓，即使是相對普通的也要50萬美元，除了拿著最高工資的人以外，房價與所有人的薪水都是不成比例的。此外，考慮到這些物業遭受著所有在德里常見的問題——建設質量差、斷電和缺水，和用同樣的錢能在倫敦或是紐約買到的房產相比，這似乎大大不值。然而事實還不止如此，為了在德里購買房產，現金首付必須達到五成以上。現在，能拿出100萬美元現金的顯然不是光鮮企業的公關領導或者電視新聞主播。不是他們！拎著一手提箱錢的人很可能是黑錢商人、罪犯或腐敗的公務員。21世紀的頭十年中，正是這些人實質性地擴展了他們對印度首都房地產的掌控。如果說這座城市給人的感覺發生了轉變——變得更黑暗、更無法無天的話，部分原因正在于此。通常，問餐館老板誰是他們的房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因為這簡直就是在詢問印度黑錢精英名人錄，答案可能會從孟買黑手黨的殺手直到在公眾面前非常虔誠的政客。從事專業工作的階層除了搬到古爾岡和諾伊達的新興郊區外，別無選擇。那里的企業氛圍意味著房產的報價非常接近實際價格，工薪階層能通過貸款買房。于是實際上，21世紀初，人們見證了印度的資本從那些1947年以后獲得房產的人手里大量轉移到了一個新黑錢精英群體手里，而正是這個群體越來越多地在美學、商業、社會和道德方面為其他人定下了調子。

那些年中，中產階級的金錢收益分散了評論家的注意力，令他們不再關注自己感受到的逐漸增加的錯位、社會的控制機制，以及即使是生活優裕的人中也存在的不滿。他們住在一個由寡頭控制的社會里，這件事本身是影響他們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這個事實困擾他們和削弱他們能量的程度出人意料。關于自己住的這個地方，他們不知道該再相信什么，對他們來說，這個地方已經變得令人迷惑、富有威脅性。一切似乎都是梅菲斯特般的魔術師用以掩飾自己黑暗目的而創造的視覺錯覺——但這些目的是什么卻完全不可捉摸。德里成為一個超現實的所在，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失去了信念，不再相信任何東西所聲稱的本質是真實的。他們并不是通過自己看到和讀到的來了解自己的社會，而是通過興奮的夜晚里自己推測和夢到的東西。中產階級通過工作讓這個社會繁榮了起來，但他們看不到關于這個社會的圖景——一幅描繪這個社會是什么樣、有什么樣的人、如何變成這樣、為什么變成這樣的圖景。這讓他們煩躁，并且讓他們感覺自己和社會脫了鉤。到這十年結束時，開始出現了大規模抗議和請愿的運動，旨在打破精英在暗處對社會的束縛。腐敗勢力成為中產階級怨恨的頭號對象，不僅因為它吸走了經濟中的金錢和資源（當然確實如此），也因為它否定了他們自己對現實的所有感覺——他們行動的世界似乎不是真實的世界，所有人只是在一片空蕩蕩的地方矩陣式地亂打一氣。

但在中產階級的生活中，這種對寡頭的怨恨與他們自己對財富和權力的幻想交替出現，因為他們很難相信還有其他能夠實現自由的路線。中產階級一般并不懷有溫和而民主的情緒。“中產階級的滿足感”對他們來說也非常可惡。他們是一個貪婪的階級，他們在報紙上看到鄰居億萬美元財富的故事時，不僅怨恨，而且嫉妒。他們帶著一種好奇的樂趣重復著關于天文數字金錢的傳奇，在他們的想象中，腐敗政治家的力量達到了不同凡響的邪惡程度。他們不相信權力和金錢在社會中會公平分配。他們認為中產階級的生活總是奴役和幻覺，只有超級富豪才能真正看到整個故事。但是由于財富的浮動不需要智慧和努力工作，也由于人們普遍不相信那些擁有財富的人比其他任何人更有資格獲得它，因此也有可能相信，有一天財富會在毫無預告的情況下來到自己的生活中。許多人從社會財富分配中得出的結論是，財富這個詞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完全隨機的，這個結論使辛苦工作看起來似乎沒有多大意義，并使人們對于小概率、高價值的意外之財充滿期望。每個月賺400美元的人認為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如果財富真的來了，他們要買哪款奔馳車。

我第一次和阿努拉格（Anurag）對話是在一個酒吧里。事后，他打電話給我說：“我沒辦法在酒吧里講話。如果你想聽聽我的感受，你得跟著我去一個地方。”

我們安排再見面。他讓我在一條主干道一側接他。盡管晚上霓虹迷蒙，車子開近時我還是很容易就認出了他，高一米八的他漫無目的地踢著路緣。我停了車，他坐進來。他為我指路。但是才幾分鐘，他就改變主意了。

“停車，”他說，“我來開。”

我們換了位置，他把司機位置的座椅往后調來適應自己的長腿，然后起步了，車速快得要命。

“照你這么開，我們得開一個晚上。”他說。

他把車停在一個破舊的水泥市場外面，我們進去買酒。大概有二十個男人一起擠在柜臺上，在空中揮舞著破爛的紙幣。已經很晚了，商店要關門了，更多的男人正在匆匆跑下臺階。現在是冬天，所以大多數人戴著羊毛帽。賣酒的店是唯一一家仍然開著的店鋪——骯臟的走道兩旁都是關了的店鋪，朝各個方向延伸出去。

四周，用過的避孕套被丟得滿地都是。這個城市有無數沒有家的人和很多不能在自己的家里過性生活的人。我從來沒在其他地方的街道上見過有那么多性交后的垃圾。

我們帶著一瓶朗姆酒和一瓶伏特加從店里出來，然后又在外面停了一下買可樂。阿努拉格隨后開著車去了尼赫魯公園（Nehru Park），這里是使館區的一大片空地，這時候已經關了。我們爬過欄桿，沿著小道走，頭頂上是樹和滿月，路顯得幽暗而神秘。

“在我改吃素以前，”阿努拉格說，“我常常買了烤雞串，半夜帶到這里來吃。就著我的伏特加。”

“自己一個人？”

“對。有時候警察會來，搞些事。但是看門人喜歡我，他會把他們弄走。”

他帶我到了他最喜歡的長凳那里。我們把酒瓶和塑料杯子放在上面。天氣冷得要命，我坐下的時候抱緊了胳膊。

看門人聽到動靜，從他的小屋里出來。他看起來大概七十歲，拄著根棍子走路。他醉得已經懵了。他很高興看到阿努拉格，問我們要不要再拿一把椅子來。我們說不用了。

“我晚點過來喝一杯，”看門人口齒不清地說。他拖著步子回到小屋。阿努拉格倒上了朗姆酒。

“我過去會帶威士忌給他。他需要喝酒。他得整夜巡邏公園，如果不喝酒，他會生病的。以前有人毆打他，但我認識這里的警察，并且報了案，現在一切都好了。”

看門人再次出現了，費力地拿著一把椅子，坐到我們旁邊。

“我對餐廳不太感興趣，”阿努拉格說，“在這里更舒服。這里有一條很漂亮的狗會來看我。黑白相間的。我不知道它今晚在哪里。我以前有錢的時候，每天晚上都喂雞肉給他。我有太多麻煩的時候——家庭、錢、女朋友，它會讓我感覺好點兒。”

阿努拉格已經沒多少錢了。他在生活上幾乎已從他父親那里獨立了。他的父親靠出租他們樓的幾個樓層掙錢。他自己過去經營一家小型制衣廠，但他的合伙人走了，事業也失敗了。他對那種沉悶的生意不再感興趣了。他不想找穩定工作，也不想創業，只想一夜暴富。他已經成為德里許多想在政治資金里分一杯羹的年輕人之一。

“你必須把高價值的黑錢持有人——比如有5000億盧比黑錢的政客和擁有印度儲備銀行授權、能夠吸收大量現金的合法企業匹配起來。大型房地產公司、度假村開發商、鉆石商。交易完成后，政客把他的錢轉移到那些公司。有些交付給銀行，有些投到房地產。他們往銀行存款不能超過現金限額，對于大公司來說是每天70億盧比。

“他們收到現金以后，要花六個小時點鈔。然后他們把來源干凈的錢轉給拿黑錢的那一方。他們把這筆錢做成無擔保貸款。每當報紙調查政治家的賬戶時，你會看到賬戶里滿是從房地產公司那里來的無擔保貸款。

“轉移這么多現金可是個大活。錢放在倉庫里，要轉移的話你需要一輛卡車。當這些卡車中的一輛開始穿越德里時，每個人都知道。警察從中收了錢，會一路上守衛。他們給卡車司機一個號碼，他可以把這個號碼給任何警察看，他們會讓他通過。德里并不安全，因為總有反對派政治家試圖曝光這些錢。孟買更安全些。我不會再做這種事了。但那是一個可以一次賺到很多錢的機會，我必須試試。

“現在，所有政客都把他們的黑錢帶回來了，因此存在著很大規模的洗錢活動。對印度來說，這將是件美妙的事情，因為所有的錢都將投資在這里，并將改變一切。接下來的十年，印度將無往不勝。直到現在，我們一直在用自己的錢資助瑞士老年人，現在這些錢要回家了。數十億美元將流入印度，我們將從我們腐敗的政治家那里收獲利益。你可以說這是神的旨意。神正在回收這筆錢。人們總是在談論中國，但它永遠無法擊敗孔雀之國，因為我們的政治家已經腐敗了好多年。他們的錢正在建立一個將統治世界的帝國。

“運作黑錢不是我唯一的業務。我還有另一個業務：我在一家某甘地家族成員擁有的公司工作，他為公司提供大筆貸款，這樣就可以把放在瑞士賬戶里的錢拿回來。現在我正在做一項貸款，對象是一名古吉拉特商人，是個很有來頭的人。他需要15萬億盧比來進行業務擴張，我在試著為他安排。”

他從包里翻出一個文件夾，里面都是他和古吉拉特邦一個企業集團之間的信件。他把信給我看。

“我很快會和他們見面簽署文件。”

我喜歡阿努拉格，但他并不怎么文雅，思路也不清楚，我很難想象他竟然被允許進入印度的內部交易圈子。這些信看起來是官方文件，但我看不太懂。

“你確定你是說15萬億盧比？”我問。

“看看這些人，”他說，向我展示寫著集團子公司名字的信頭。采礦、基礎設施、大眾傳媒、航空公司、保險、農業。“看看他們有多大。”

“你是說甘地家族是借出這筆錢的人嗎？”

“很明顯。”

我試圖在腦子里算出這筆錢總數是多少。

阿努拉格拿出他的手機，但上面不夠空間輸入那么多零。我們終于算出來了——3000億美元。

“別鬧了，阿努拉格。”

他稍微退了一步。

“不是一下子交易。會在很多年里進行，有很多不同的項目。電力、農業。”

“3000億美元。得了吧！”

“這是甘地家族！你不能想象他們有多大。想想看：北方邦任何一個首席部長五年任期結束以后口袋里都會有5000億盧比。現在想想國大黨。這是國大黨黨魁！他們從1947年以來就一直在執政！你知道有多少印度企業屬于他們嗎？你根本不懂。對他們來說，這錢根本不算什么。”

“印度的GDP不過是這個數字的五倍。”

“黑錢比GDP多得多！我告訴過你的。政客們正在把他們的錢帶回印度。他們想在印度投資，需要好的合作伙伴，最好的辦法就是將黑錢以大額貸款的形式提供給那些正在搞國家建設的公司，并收取每年24%的利息。”

這時候，有人打電話給他，談話內容是關于提供幾億美元的貸款。阿努拉格信心滿滿地說他將如何把印度領先的房地產公司之一帶進來，為這筆貸款提供一部分融資。他的傭金是1.5%。

這感覺像是一個安排好的電話。我覺得自己在他編造的一個虛構世界里。

阿努拉格的電話打完了。他說：

“原理是這樣的。最大的商人不去銀行融資。這古吉拉特人的公司有很多項目，他們需要15萬億盧比，也知道唯一能拿到這筆錢的地方就是國大黨。他們去找了阿姆巴尼（穆凱什·阿姆巴尼［Mukesh Ambani］，印度商界首富），但阿姆巴尼給不了那么多錢。所以他們來找我們。

“國大黨錢太多了，他們必須投資。這對國家來說好極了。這些錢正在幫助印度成長。很快我會為自己賺到錢，也能為國家做點什么。如果我能從我經手的所有交易里賺1%或2%的傭金，我就真發了。我自己需要100億盧比，如果我做成了交易，賺到這數字不會很難。我有個朋友最近在一筆黑錢交易里就賺了32億。他給自己買了輛布加迪。我不會那樣做的。我會把我的房子裝修得非常好。但我需要錢做其他事情。”

在阿努拉格的故事里，將現實和幻想區分開來的那層薄膜微妙而透明，讓人永遠不知道該如何把兩者區分開來，也不清楚他是不是知道。事實上，我發現他的有趣之處在于，他認為社會是如此極端，以至于幾乎沒什么是不能被確鑿斷言的。他心中的德里是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地方，充斥巨大的怪物，而他們的物種和大小在精神的長夜里已經難以辨別。我明白他為什么這么不知所措，為什么只能用想象自己賺很多很多錢這一種方式來重新找到自我。

“我想讓一切變得更好。如果我只有5000萬盧比，我會就過著好日子，然后開一輛寶馬。但那樣的話，我只是為自己而活，而不能為國家做任何事情。我想讓事情有所改變。我想向人們展示應該如何生活。這就是為什么我需要100億。

“德里是個好地方，但這里的人都是混蛋。他們都是炫耀狂。他們不了解生活。他們心靈很骯臟，只想著錢。我希望讓他們有‘感覺’。金錢已經殺死了他們的‘感覺’。這不是神干的，是我們干的，而我們可以改變。如果我有錢，我會去改變人們的靈魂。”

德里癡迷于金錢，金錢是這座城市唯一理解的語言，要讓自己脫離其庸俗和對金錢的執著，就需要花很多錢。這是一個自我挫敗的奇怪邏輯，顯然把眾所憎恨之物的擴增普遍化了。

“我住的街上有一場婚禮，他們在我家外面搭了一頂大帳篷。有棵樹擋住了路，他們就把它砍了，只為了搭起他們的帳篷。他們砍了一棵長了四十年的樹，就為了一個派對。他們什么都不懂。我去問他們：‘為什么你們要搞這棵樹？’但他們不在乎我的想法。我現在不能和他們斗。這就是為什么我需要錢。我想變得強大，這樣當我再遇到那樣的人，我就能搞砸他們的幸福！你可以說，我心里現在燃燒著怒火。”

看上去的確如此。因為阿努拉格穿著襯衫坐在那里，顯然沒有受到這個寒冷2月夜晚的影響，而我裹在一件外套里抖得厲害。

看門人回來了，要求喝一杯。阿努拉格給他倒了些朗姆酒。

“所有的乖狗都到哪兒去了？”他問他。

守望者一無所知地攤開雙手。

“那條黑白相間的狗非常聰明。”阿努拉格說。

看門人走掉了，消失在公園的黑暗中。

“動物那么純潔，”阿努拉格說，“那么忠于自己的本性。它們不會變。你不知道我有多愛動物。我過去一直給那只黑白的狗帶食物來。過去，如果我晚上醒來發現在下雨，就會開車到這里來，在樹上掛上油布，這樣它就不會淋濕了。以前冬天我還給它帶過外套。

“人類都是混蛋。我已經放棄人類了。每個我信任過的人都傷害了我。我不再有朋友。我女朋友不在乎我。我的父親是個好人，工作很努力，但他從來不相信我。他從來沒有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說，我理解你。唯一忠誠的是動物，不是人類。是動物的單純讓我一直往前走。動物要的東西很少。它們只是想要錢——”他嘲笑了自己的口誤：“我的意思是，它們只要食物。沒有別的。”

他給我看他的手機上動物被致殘和殺害的照片。有數百張。有一只威武強壯的蜥蜴，它的腳斷了，所以不能動了。

“找到那個弄殘這只蜥蜴的家伙之后，我打斷了他的肋骨和下巴。人們不知道要怎么做人。我知道有戶人家的博美把家里人惹生氣了，他們就把它從七樓陽臺扔了出去。我會設立一個單獨的動物警察部門來處理那樣的人。我將引入嚴格的法律，開展宣傳活動，教育人們了解動物權利。我會把稅收的1%用來照顧動物。”

看門人轉回我們身邊，醉醺醺地巡視著公園，夸張地用自己的拐杖敲著地面。

“看見他了嗎？”阿努拉格說，“他是農村來的，已經照看這個地方二十五年了。他是個真正的人類。不像其他人。”

月亮現在升得很高了。公園一片寂靜，城市似乎離我們很遠。貓頭鷹不時地叫著。我們沉默了一會兒。阿努拉格在思考。

“我有個關于房子的想法，”他說，“房子前面是花園和游泳池，后面是停車場。前面和后面都有遙控門，兩扇門之間有一條寬闊的通道，這樣你就可以開車直接穿過房子。所以，晚上走出去開著法拉利，直接開到房子里，停在臥室前面，接上你的姑娘，然后開去派對。”

他停下來，我想了想這個畫面。“你覺得這個想法怎么樣？”他問。

“我不確定，”我說，“你有幾個實際的問題。你需要處理尾氣的問題。而且法拉利在房子里面會有很大的噪音。”

“并不一定需要是輛法拉利。蘭博基尼也可以。”

“也是。”

阿努拉格往我們的塑料杯里又倒了些朗姆酒，然后加上可樂。他繼續回到對“德里人”的痛罵里——同樣的行為也占據了許多被罵的那些德里人的生活。

“德里的人心靈不美。看看他們如何對待婦女就知道了。在孟買，他們不騷擾婦女，但在這里，一個女人十步以內肯定會受虐待。有一次，我看到有人在公共場合虐待一個女孩。我和那個男人有點認識，我說：‘你為什么虐待她，哥們兒？你在這么多人面前虐待她，她在哭。就這樣算了吧。’然后我就走了。回來的時候他還在虐待她。一上來我就扇了他耳光。然后他說：‘你不知道我爸是誰。’于是我說，‘這一拳是給你爸的。’接著我就把他的肋骨打斷了。之后一樁大訴訟就來了。”

阿努拉格深吸了一口氣。

“我只是作為一個人幫助了她。我是一個人，如果我看到無辜的人受苦，我必須幫助他們。

“另一次，我和我的表兄弟在曼谷。他們非常有錢，但如果我要求借個10萬盧比，他們會讓我永遠滾蛋。有一天我在外面海灘上騎自行車，回到酒店的時候，我的表弟和一個女孩子在一起。她沒穿衣服，而他正在拍她的視頻。女孩子在哭。她說她本來應該要結婚了，但現在他說要把她的這個視頻發到世界各地。我對她說，‘他不會這樣做，不要擔心。’我表弟笑了。他說，‘我肯定會的。我會確保每個人都看到。’我說，‘搞什么，兄弟？你和她的事結束了，現在給她錢，讓她走。你想證明什么東西？’然后他開始向她扔錢。1000泰銖，又扔了1000。她只是把錢扔在地板上。我說，‘不是每個人都為錢而生，兄弟。’我從他那里搶過來電話，然后把電話語言改成了泰語，讓她把視頻刪了。然后我握了握她的手，她抱了我，哭了。事實上，這是這個故事里最好的部分。”

我覺得阿努拉格似乎是倒拿著望遠鏡來看待親密關系的。親密關系很誘人，但是離他很遠，輪廓難以辨別。其他人類只是偶爾路過這個靈魂附近，就如這在曼谷酒店里的女人與他的意外接近，但多數情況下，這些路過的人對他帶著敵意，距離遙遠。事實上，人類的關系世界對他來說似乎完全被破壞了。它陷入了金錢的泥潭，對待它的最好方式就是根據它所要求的——把它僅僅作為一個關系、晉升和金錢的來源。要尋找純潔與真正的依戀，你必須到其他物種里找。

他的電話響個不停。

“是我女朋友，”他說，“我不接是因為她以為我在孟買。”

“但是你已經不在孟買好幾個星期了。”

“我知道。這就是接電話很尷尬的原因。但她是個婊子。她只想著錢。她不在乎我是什么樣的人。她認為我是個失敗者。她認為她比我地位高，因為她的家庭很有錢。所以如果她比我更是回事兒，她為什么還要打給我？”

她發來一條短信。

“熱烈恭喜你的新戀情。”

他讀給我聽。

“你有別人了？”我問。

“不是，”他說，“她試圖激怒我。”

他回復：“是的，我和動物在一起很開心。它們不在乎我口袋里有多少錢。”

她馬上打了過來。他接了，開了免提。我好奇如果我不在旁邊的話，還會不會發生這些。她說：

“你能不能放下這些態度，像個正常人一樣和我說話？”

“你想從我這里要什么？”阿努拉格問，一邊轉著眼珠看著我。“你想不想和我在一起？”

“我只想好好說話。我不能說我想和你在一起，因為我覺得我現在一點也不了解你。”

“看，你混亂了對吧？”

“我不是混亂。我只是不知道發生了什么。”

“發生的事就是你把我說得很負面。”

“我對你的負面看法就是剛剛你自己造成的，這是你自找的。我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人。我認為你才是對自己有負面看法的人。”

“你去參加婚禮那件事怎么說？你甚至不讓我和你一起進去。這就是你對我正面看法的表達？我開車送你去，因為我在乎你。我在外面坐在車里，從晚上10點到第二天早上6點，等你，因為我不想讓你自己回家。你一次都沒有出來看看我。你為什么把我留在外面？我不夠好？不能讓別人看見我和你在一起嗎？你為什么不帶我進去？”

“因為我對你不確定。”

“你好像在床上對我很確定，但在別人面前你就對我不確定了？”

“你太惡心了。”她說，掛斷了電話。

阿努拉格很沮喪，喝了一大口酒。

“她覺得對于她的世界來說，我不夠好。她認為她的世界比我的好。所以我對她說，‘那你走吧，去和那個世界在一起。你為什么要纏在我身邊？’但現在她聽說我在和甘地家族合作，她擔心我可能會成為有錢人。這就是她打電話給我的原因。她來自德里西部的商人家庭，只知道錢。她爸爸有十七輛奔馳，但她母親還是離開了他，因為她受不了這些癡迷錢的人。”

她又發來一條信息。

“明天一起吃午飯好嗎？”

他嘆了口氣，努力地勉強同意。“好。”他回信說。

“但是你明天不在孟買。”我說。

“我知道，”他說，“明天早上我會取消的。”

一陣長長的沉默。公園里很舒服。城市的窒息感減少了一些。

“你生活里最美的時刻是什么？”我問他。

“我十七歲的時候，放棄了學業去孟買，想做電影明星。我有一個完美的穆斯林女朋友。她每天都給我做早餐。但后來我們遇到了印度教和伊斯蘭教沖突的問題，現在她已經和別人結婚了，那些日子很美好，我當時在當模特，每天都健身、練武術，看上去很不錯。有一天，我在街上走，一輛大雷克薩斯SUV停在我旁邊。車子的后窗搖了下來，里面是桑杰·達特（Sanjay Dutt）。電影明星。他看著我，什么話都沒說就向我敬禮。因為我的體格。

“我還是想成為一個演員，但做這個需要錢。你需要很多錢才能進入這個行業。”

的確，阿努拉格的體格令人印象深刻。他還不到三十，高大而強壯。他有一頭很厚的黑發。如果不是有些輕微的不自在，他會是一個驚人的美男子，但他的神情里有些苦澀的東西，意味著他有些傷心。他看起來躲躲閃閃而且局促不安。

我們喝了幾個小時，可樂喝完了。我們把瓶子集中起來，把剩下的朗姆酒留給了看門人。我們穿過公園往回走，爬過欄桿，這欄桿比我們來的時候更不穩。找到我的車后，阿努拉格自己開了鎖，就像這車是他的一樣，然后我們就開走了。幾分鐘后，阿努拉格把車停在路邊，讓我把乘客邊的窗戶放下。他吹聲口哨，兩只狗立刻從樹叢里蹦了出來。它們把爪子搭在窗框上，把頭伸到車里。阿努拉格向它們伸出手。狗帶著興奮努力表達著感情。他撫摸著它們，它們舔他的手。

“這是我最喜歡的兩只。”他說。

他對它們說，他要走了，很快會再來看它們的。我們一邊開，他一邊在撥一個號碼。

“我想打電話給我公司的一個家伙。他四十二歲，為很多國大黨政治家管理財產。你可以和他說話。他在印度工作，但他有一個美國電話號碼。想象一下。”

他聽著電話，但是沒有人接。

“他經常不接電話，他有一點糖尿病。”他解釋道。

事實是現在已經是凌晨1點多了，可能這也有關系。

他在一個還開著的路邊烤肉攤停下車。人行道上放了幾把塑料椅子，但阿努拉格不想離開車，因為我們不能在那里喝酒。他閃爍著車燈把服務員叫來——我車上的喇叭壞了。服務員從很多深夜還坐在這里的人手里拿來一張破破爛爛的菜單。阿努拉格為我們點了手抓餅，為他的狗朋友點了烤肉串。

“不要加香料。”他說。

他把窗戶搖上去，把兩個塑料杯放進車子的杯托兒里，為我們兩個倒上了純的伏特加。他的電話響了，是他的同事回的電話。

“我想介紹一個朋友給你，”阿努拉格對著電話說，“他是英國人。他需要一筆大筆貸款來做生意。”

他把手機塞到我手里。電話另一頭的人說話又清楚又快。他什么也沒問我，就好像交易已經完成了。

“我們可以在英國為你提供優厚的條款，”他說，“通過另一家公司，我們也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給你提供資金。所以，只要告訴阿努拉格你需要多少錢，我們就會去辦。”

“好的。”我說。

阿努拉格拿回了電話，繼續說。

“我有好消息，”他說，“我談成了一家加爾各答的公司。他們做糧食的，需要100億。是的，已經簽了。”

電話結束的時候，服務員過來了，阿努拉格放下了窗戶。熱乎乎的食物被遞進來。我們開始吃。

“所以你知道我為什么把電話給你嗎？”阿努拉格說，“我需要你的幫助。你在倫敦有聯系人。等我開始賺大錢的時候，我需要到海外擴張。我需要你幫忙跟那些人談。我們要把印度的這些錢借給全世界。”

我告訴他，我希望他變富了的時候也帶我出去。我想看看那會是什么樣子。我感覺他以后的日子有一半可能都會被用來想象自己未來的暴利，同時卻靠越來越少的租金為生。但另一半我相信他可能是那種不可思議的家伙，打破了一切最小的概率，獲得了某種驚人的成就。這種事情在這里是可能發生的。

我們付了錢，出發往阿努拉格家走。當我們在他家外面停車的時候，六只狗跑出來迎接他。他拿出打包的肉，打開鋁箔，把肉放在地上。狗開始吃起來，他撫摸著它們。

“看看它們，”他說，“多天真。”

我向他道別。他張開手臂擁抱了我。我回到車里，把司機座椅往前拉，這樣我才能夠著踏板，然后發動回家。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很生動的夢，在古爾岡一間公司的辦公室里，一大堆死狗在被焚燒。

第二天早上，阿努拉格打電話給我。

“你是真的喜歡我關于那棟房子的想法嗎？”他問，“還是你那么說只是不想傷害我？”

“我覺得肯定行不通。”我說。

“行不通，”他說，“大概不行吧。”

注釋

[[1]](#_1_16)數據來源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2011年的估計，同年孟加拉的數字是五十四；2016年印度每千名新生兒中，仍有四十八位兒童會在五歲前死亡，孟加拉的數字是三十八，中國則是十一。

[[2]](#_2_16)‘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2013); ‘Delhi Development Report’ (Planning Commission, Government of India, 2013).

[[3]](#_3_14)‘Sprinting to Disaster’, India Today, 25 September 2010.

# 抽象畫

德里接受的養育從來不完整，同時又用炙烤的土地養育著自己的孤兒。

這座城市被從歷史和傳統帶來的母性安慰中連根拔起，并隨著成長逐漸憎惡起自己父親的形象——政治家、官僚還有那些主宰金錢和市場的犬儒家長，甚至由于危險的改變帶來震動和斷裂，現實生活中的父母也漸行漸遠。

這座城市就像一所孤兒院，在根源和方向的問題上備受困擾。它因痙攣和暴怒而搖晃不止。它哭喊著要寬慰，希望父母溫柔地把手放在自己的肩上。

但是，孤兒院偶爾也能培養出異常自由的生命。這樣的個體從來沒有經受過來自父母權威和期望的腐蝕，他們為自己創造了一個宇宙，用自己的獨創性、好奇心和智慧讓人目眩神迷。他們不接受他人的定見，并為最死板的體系帶來奇妙的各種可能性。

在這個方面，德里也像一座孤兒院。它可以孕育一種人，過去的問題和答案似乎完全約束不了他們；他們能想象出無數種將世界組織起來的方式；他們能超越自己的庸常生活，將目光從身邊的具體事物延伸到遠方的星辰。正是在這些人中，我發現了德里的烏托邦潛力。

這些璀璨個體的其中之一就是阿努帕姆·密斯拉[[1]](#Zhen_Ming_______Yuan_Zhu)（Anupam Mishra），現在我正和他站在一起，看著外面的亞穆納河。

天很熱，我們都帶著水。我有一瓶一升裝的可口可樂牌的水，是剛剛在一個路邊攤買的。阿努帕姆從家里帶了一個瓶子，用帶子掛在脖子上。他七十歲，一頭灰白的頭發，穿著一件棕色的庫爾塔衫，整件衣服松垮地掛在他瘦長的輪廓上，腳上穿了一雙涼皮鞋。

在因為英聯邦運動會被拆遷前，我們所在的這片土地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大型鄉鎮，有幾十萬人在這里安家，其中包括我們先前遇到的巴爾斯瓦區的居民。現在盤踞在這里的是兩座巨大的體育場和新的德里秘書處大樓，即德里市政府所在地。這座建筑由兩個呈一定角度的楔形組成，發光的表面像兩個玻璃眼珠一樣俯瞰著河流。事實上，整個建筑群完全對對面的河口視而不見。幾米開外就是一片亞穆納河的漫灘，暗示著德里的原始景觀：一簇簇草長在水面上，差不多有三米高，鸕鶿在陽光中展開濡濕的翅膀——但對那些占領了這片土地并為自己建造現代堡壘的人來說，這種對自然的聯想仿佛是令人厭惡的。每棟建筑物都被高墻環繞，大面積區域被鋪上了混凝土鋪路磚，就好像有人擔心會有植物入侵一樣。在這樣的天氣里，磚塊存儲了許多熱量，露宿街頭的人要往地上倒一瓶水才能坐下。

這些建筑和濱水區之間的土地是一個神秘的死亡地帶，城市的管理者似乎已經將其指定為垃圾傾倒處。秘書處大樓后面是一個放著退役救護車的垃圾場，這些車被雜亂地堆在路邊。還有大量的磚石垃圾——沒用過的鋪路磚、水泥管段以及從被毀掉的鎮子搬來的整堵整堵的墻壁，這些墻互相靠在一起，就像放在架子上的文件一樣。幾百張生銹的鋼椅堆在一塊地上，有幾層樓高。

我們離城市中心非常近，但這座城市的意識仿佛還沒到河邊就終止了。德里背對著水，似乎只有漂泊的底層人民才會來到這里。他們生活的跡象無處不在——灌木叢里的寢具、被丟棄的塑料瓶、人類排泄物，還有生火做飯留下的圓形焦痕。

“以前的德里被建造成統治者可以看見河流的樣式，”阿努帕姆說，“莫臥兒人熱愛亞穆納河，在岸邊建起了紅堡。在下游幾百公里的地方，他們建造了更多俯視這條河流的宏偉建筑——泰姬陵和阿格拉堡。但英國人不喜歡看這條河，他們來了之后就避開它。我認為這是因為他們發現它讓人很不安。歐洲的河流來自平緩的冰川融水，四季恒常。你可以建造墻壁來擋住河水，然后把建筑物建在岸邊。但這是一條雨季河。你必須在兩側留出一個巨大的漫灘，以適應雨季期間河水的暴漲，然后每年余下的時間里，這個漫灘都會泥濘而空曠。我猜英國人覺得它很丑。他們覺得這樣一條不穩定的河流很嚇人。”

我告訴阿努帕姆，我在公民路遇到了一名老婦人，她還記得在20世紀20年代時河水是如何流過她家花園盡頭的。當時有座泥墻把河水攔在外面，每個月，園丁都會在墻上挖一個洞，讓水流進來灌溉花園，孩子們會在草坪上追逐翻騰跳躍的銀色大魚。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從草坪的盡頭跳進河里，就這樣學會了游泳。

“公民路是英國人在現存莫臥兒城墻外的第一個營地，”阿努帕姆說，“但當他們來建造自己的城市時，他們從河邊搬走了，于是這座城市第一次與亞穆納河沒有審美上的聯結。這件事比聽起來更重要。看著一條河，在河里游泳——這是珍惜它的第一步。塞納河永遠不會像亞穆納河一樣被毀掉，因為整個巴黎的建造就是為了人們能看著塞納河。德里過去有大量的生活是圍繞著河展開的——游泳、宗教節日、水上游戲，但這些都沒了。想想宗教沐浴吧，這不只是迷信，而是一種保護水的做法。如果我們的總理每年必須在亞穆納河沐浴一次，這條河會比現在干凈得多。但現在，為了服從現代城市，每個人都對河背過身去，所以它是骯臟和被遺忘的。”

我們走到河邊。黑色的河水有一種化學物質帶來的活力——從深處爆出的泡沫隨著渾濁的河水翻騰。然而，穿越河水的浩瀚能看到的只有鏡子般的天空，這個地方有一種河流帶來的寧靜感，讓人感到心滿意足。離岸邊約二十米的地方有一座濕婆的大型雕像，河水淹到了他的肩膀。白鷺在水面上飛過。

我們頭頂上是河的路橋之一。一對年輕夫婦把車停在橋上，現在正朝著河面往下爬。這很不容易。水泥斜坡很陡，有十五米高。丈夫帶著一個包裹樣子的東西，妻子穿著紗麗和涼鞋。最終，他們爬下來，到了我們站的地方。原來，這個包是一位過世男性祖先的照片，可能是他父親。照片放在相框里，用花裝飾著。他們把照片扔進渾濁的河水里，看著它沉下去，然后開始爬回上面的高速公路。

河邊堵塞著其他類似的供品。花環、破了的椰子、賽巴巴上師的照片，一撮撮剃下來的嬰兒頭發，還有所有用來裝這些東西的塑料袋——這些東西像一張漂浮的毯子，擁抱著被河水拍打著的河沿。

“我覺得我不會把自己父親的照片放在這水里。”我說。

“沒人看水，”阿努帕姆說，“他們都是自然而然地做著這一切，看也不看。”

我們朝上游走去。我們經過了一個穆斯林圣徒的墳墓，周圍干凈得一塵不染，還有用長長的河草束搭的優雅庇蔭處。我們穿過流入河里的散發著惡臭的運河。周圍沒有人，你會以為自己離任何城市都很遠，哪怕我們現在走的路與沿原來河岸新建的高架路相平行。

我們為自己計劃了一次距離很長的散步，但出發時是一天里最熱的時候，很快我們就撤到這條高架的陰影下面。高架路就像頭頂上的一個巨大遮陽篷，這里很涼爽，且出奇地安靜。上百輛人力三輪車一排排停著，男孩子們正忙著修理。男人們則到河邊洗手，然后回到我們旁邊吃午飯。洗過的衣物掛在車上。鳥兒在唱歌。塔架上的電纜來自稍微上游一點的橫跨過河流的電站。

“你覺得人們為什么總是在這個地方建造城市？”阿努帕姆說。我們注視著流動的河水。“因為這塊亞穆納河西岸邊的土地下，有數百公里最豐富的地下水。德里位于亞穆納河最接近阿拉瓦利山的地方，阿拉瓦利山腳就在我們的西南邊。過去，有十七條來自阿拉瓦利的溪流經過這片平原流入亞穆納河，使這片土地擁有充沛干凈的水源。德里歷史上第一個千年里的那些城市都從這里取水。每棟大房子的院子里都有一口井，每個地區有五十口左右的井，還有大型的公共井，人們在水邊生活，也在水邊社交。

“總是有新的入侵和新的城市。但那些王朝都來自平原，而且盡管他們對宗教和政府有不同的觀點，對水的渴望卻是同樣的。每個征服者都繼承了上一任的基礎設施，并為其添磚加瓦。于是，德里在一千年的時間里發展出了一套持續而復雜的用水系統。這套系統的哲學很簡單——如果你用水，你就必須把水還回來。每次他們挖新井的時候，也會建造新的水槽。這些水槽將雨季的雨水收集起來，不讓水逃逸到河里，而是慢慢往地下滲透，為水網補水。”

到了莫臥兒帝國時期，德里有八百個這樣的水體。有些很小，有些像湖一樣大，其中許多和宗教與靈性有聯系，因為人是和神一起來保護自己的用水系統的。今天，人們把這些系統稱為“傳統的”，但這個詞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感覺，也意味著它們已經過時。但它們并沒有過時。在整個技術史上，沒有任何技術對其有所改進，但當電泵和水壩干涸時，這些系統會在許多世紀里依然存在。

“第一個利用河流補充地下水供應的是莫臥兒人。他們大都市的用水需求比以前這里建造的任何城市都更多，所以他們需要從亞穆納河取水。但河流的水位低于他們的城墻，無法把它抬到和城市一樣的高度。因此，他們來到上游一百二十五公里處，那里河流的海拔高于他們城市的海拔，于是他們從那里建造了一條運河，利用重力把水帶到了沙賈漢納巴德。”

這就是我們在前幾章看到過的同一條運河。在夏利馬爾花園，吉米的獒沿著它的河岸渾身是勁地奔跑。

“那個系統的優雅之處在于，運河從西邊進入被城墻圍住的城市，穿過它一直到東邊的紅堡。因此普通市民先從這條運河中獲得了水，而最后取水的是皇帝。即使是在民主社會中，總統通常不會是最后一個獲得必要資源的人。但這些人理解水的政治。他們的系統要保證水一路都是干凈的，因為皇帝是最終的用戶，沒人可以污染他要喝的水。這不是民主，但沒有關系：他們根據對水的認識建造了他們的系統，而對水的需要是民主的需要。只有心中有民主，你才能認可這種用水系統，否則你會拒絕它。”

我們又出發了。河流蜿蜒著，離我們遠去。在我們和河流之間是漫灘的平地，一年中的這個時候，上面種著莊稼。地面很難走，所以我們決定走到路上。我們手腳并用地爬上通往高速公路的陡坡，互相攙扶著保持穩定。水泥斜坡燙得要命。最終，我們爬到了高架上，這里黑色的路面就像一個散熱器。我們翻過屏障，面對著飛快的車流穿越了八個車道。

另一邊是一條寬度較適合人類，還配有人行道的道路。這條路穿過另一個工業垃圾區，到處是窗戶破損的廢棄建筑物。這里的每個人都是拾荒者，撿些塑料和紙板出售。一大堆鞋子纏繞在扭曲帶刺的鐵絲網上。一座老舊的水塔上長滿藤蔓，曾經圍著它回旋而上的樓梯欄桿都已經掉光了，臺階像爛掉的牙齒一樣向外突著。我們經過一間水廠，外面掛著一條橫幅寫著“水是生命”。沿路的樹木都已經干枯死亡。不時地出現一些生銹的瞭望塔，上面的聚光燈早已破損。它們看起來好像是從勞改營里放出來的——我想不出它們在這里是干什么用的。

“英國人最終與德里千年來對水的理解決裂了。他們的統治不同于以前的王國，以前王國的統治不干預人們如何生活。英國人想要完全的統治，把統治延伸到教育、道德等一切東西。當然還有水。但他們對這里的地貌沒有經驗，無法理解這里的用水系統。所以，雖然他們并沒有準備要摧毀這個系統，卻確實毀掉了它。

“英國人沒有注意到地下水，但正是地下水的存在讓這個地方一千多年來一直有城市。他們只對河流感興趣。他們從歐洲引進現代方法，用水壩將亞穆納河攔在了城市北邊一個名叫瓦吉拉巴德（Wazirabad）的地方，并將管道接入城市，以此直接將水送到房屋里。然后污水由排水渠收集，排入河流下游。因此，英國人選擇不看河流是一件很諷刺的事。過去的王國并不使用河流，但他們喜歡看它。英國人住在河邊，卻不能忍受看它。

“英國人習慣從水龍頭取水，這就是他們希望在這里實施的系統。他們也很喜歡這個壟斷系統加強了他們的帝國對這個地方的控制——他們可以讓人們依賴他們，他們可以選擇給某個社區供水，卻不給另一個。但這種做法完全打破了本地的用水習慣，這個城市里許多人抵制水龍頭里出來的水，因為這一直被認為是不吉祥的。有一首老歌里唱道：‘隨便對待我們，隨便傷害我們，但不要在我們的房子里放水龍頭。把它留在你們的小木屋里，不要帶到我們住的地方。’德里人不喜歡管道水的味道，他們習慣了從井里直接取水。打水前，他們會洗干凈自己的器皿和繩子，然后把容器直接放到水源里——他們自己可以看到和維護的水源。管道水的水源他們看不到。水源很遙遠，他們不知道供應者是誰，水有多干凈，或者那些人往里面放了什么化學品。即使是今天，你也會聽到水系統里有毒的謠言——人們還沒有忘掉英國人帶來管道水時引起的無端恐懼。

“但逐漸地，英國人的系統擴展到了所有地方。人們只要打開水龍頭，里面自動流出水，于是水的問題似乎‘解決了’。德里居民不再需要考慮用水‘系統’。漸漸地，那套古老的系統分崩離析了。水道和水庫不再需要維護。人們拆毀它們，因為現在這座城市的人口正在增長，而水槽占用了可以被用作開發房地產的土地。人們拆毀這些東西的時候并不覺得傷心，因為人們已經忘記了它們的功能，所以并不尊重它們。出于對一個系統的尊重，你會保存它，以它為榮。如果這種尊重消失了，人們就不會再關心它。英國人來的時候我們有十七條河流和八百個水體，現在幾乎什么都沒留下。”

我們走過一片奇怪的田園風光，兩側有樹木和耕地。在這個有兩千萬人口的城市里，我們周圍一個人都沒有。此刻太陽在我們頭頂上，熱得我們不停喝水。

“我們仍然使用英國的系統，這套系統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場災難。它是一場災難，因為它不再由人們親手掌握，于是人們失去了把水當作一個‘系統’的感覺。現在，人們認為水就只是從水龍頭里出來的一種濕的物質，如果你需要更多水，你就打開更多的水龍頭。這就是我們現在有那么大問題的原因。德里有水，有很多水。這就是這座城市一開始就建在這里的原因。但水需要一個系統。盡管德里曾經有一個智能科學的系統，但現在這里根本沒有。

“我們認為‘民主’就是投票，這很滑稽。在投票的意義上，我們是個民主國家，但其他的一切——構成我們實際生活的一切，都在往相反的方向走。用水系統以前完全是民主的，每個人都了解這個系統，每個人也都在維護這個系統。現在則是集中供水，只有少數人知道系統是如何工作的，其他人只是對閥門和管道有一個模糊的感覺。甚至管理這個系統的人對于水在這座城市是怎么運作的也沒有深入了解。

“失去水槽以后，德里開始遭受嚴重的洪水。在我們自己的時代，曾經能夠吸收雨季雨水的一切都消失了。水槽沒了，德里所有的農田也沒了。但雨季還在。整個城市現在有一塊堅硬的表層，所以這種突如其來的水流無處可去。德里每年都被洪水淹沒。這完全是個現代現象。

“但是我們也開始出現嚴重缺水的問題。這個曾因豐富的水資源而吸引了來自整個大陸的征服者的地方，現在出現了水危機。河水很快就無法滿足城市的用水需求了——德里現在的人口是英國人建造這個系統時的五十倍，而亞穆納河的流量沒有變。所以德里開始從其他地方取水。現在我們的管道從恒河（Ganges River）、帕吉拉蒂河（Bhagirathi River）和雷努卡湖（Renuka Lake）取水。我們之所以可以這樣做，是因為和先輩相比，我們已經獲得了一些小小的技術力量。但這完全是一個不成熟的解決方案。首先，因為我們快要耗盡這些資源了，而且已經沒有其他可以用重力原理引入德里的水資源了。你能想象我們不得不用電來把水抬高然后供給城市嗎？第二，因為這種辦法根本沒有注意到和水有關的更廣泛的經濟體。數以千計的農民已經在抗議德里奪走了他們的水，他們試圖破壞阻擋河流傳統流向的水壩——但又怎么樣呢？德里想要水，德里是強大的。德里正在使其周圍數百公里變得干旱，也制造了更多的難民。他們離開那些土地來到德里，來到這里以后，他們需要更多水，于是德里奪走的水就更多，就這樣惡性循環下去。

“不僅如此，我們還沒有能力處理這么大量的污水。我們的污水系統是為了處理一條河的水量而建的。現在進入這個系統的水量是以前的三倍之多。這就是我們的污水處理廠每年處理的污水比例越來越小的原因。大多數污水現在直接排入河道。這是一種有毒的混合，污水里都是工業廢水，而德里的污水規模巨大。當你把這一切都倒入一個流域會發生什么？看看亞穆納河現在的水位有多高。現在是夏天，我們離雨季還有一個月。亞穆納河是一條季節性河流，以前每年的這個時候，它只是一條涓涓細流。但現在你看到在那兒流動的不僅有亞穆納河，還有恒河、巴吉拉蒂河和雷努卡湖。我們從這些地方取水，但是用完之后卻把水都倒進一個流域。這就是河的水位之所以這么高的原因，這就是很快我們就會有一場災難性洪水的原因。河水將沖破它的堤岸。”

我們不再向北走，而是停下來吃午飯。阿努帕姆帶了一些扁豆湯、烙餅和煮熟的蔬菜，我們坐在一棵樹下吃了起來。周圍的景色令人振奮，到處都有鳥兒在唱歌。阿努帕姆繼續說道：

“你認為我們的中產階級愿意為目前缺水的情況付出代價嗎？當然不。他們希望自己的生活和任何環境情況都無關。這就是他們期望從資本主義中獲得的獎勵！他們希望隨時打開水龍頭都有水。然而，市政供水是配給的，每天只供應幾小時。那中產階級怎么辦呢？他們記得自己腳下就有豐富的水——需要的時候，他們的歷史學得很好！過去三十年，他們都挖了私人水井，這樣就能根據自己的需要盡可能多地抽水。每個中產階級的家里都有這樣一口井，雖然說這么做是違法的。這些水完全不在監控中，所以城市的水務管理局當然不知道他們需要建設多少污水處理設施。所有這些額外的水也都流入了亞穆納河，又進一步提高了水位。

“但是，現在當然沒有人記得支配了德里水管理一千年的基本知識——如果從地上取水，就必須再補回去。人們正在把水從地下抽出來，用在浴室、洗衣機和游泳池，但他們連一個用來補充地下水的水槽都沒造。所以德里的地下水正在干涸。但他們想都不想這些！只要水龍頭里還有水，就繼續抽！

“這樣的結果是，德里的許多地區現在完全干涸了。城市的許多部分已經徹底用完了地下水，用水只能靠水車。有一個新的五星級酒店沒有水，它的用水需求——浴室、洗衣房、游泳池、桑拿——全都是由卡車供應，超過上百輛的卡車晚上排著隊來送水。雖然有一種方法能擺脫困難，但奇怪的是這個城市對此無動于衷。即使在沒有水的地區，房地產價格還在上漲。

“這些由卡車送來的水從哪里來？它來自經營水的企業家，這些人買一塊土地，從地下抽水然后送到城市各處。根據法律，擁有一塊土地也意味著擁有下面的水。但水是液體！如果你用一臺泵在一塊土地上開始抽水，你并不是簡單地從你自己的土地抽水。你抽的是所有地方的水。哪怕你的地只有手帕大小，你也可以抽出幾公里范圍內的水，每個人的地下水位都在下降。這些卡車并不是一個神奇的解決方案。甚至那些賣水的商人都越來越缺水，所以他們得到離城市越來越遠的地方去找水。人們愿意為水付多少錢？如果沒有了油，我們可以相應地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如果我們用完了水，那就沒有生命了。

“你看到他們在古爾岡和諾伊達造的這些新水上公園嗎？幾千升水從巖石里泵出來，就是讓人們可以在游泳池和水滑梯里到處玩水？ 我喜歡這個詞，‘水上公園’，但我用的是它的另一個意思[[2]](#Ying_Yu_Zhong_De__Gong_Yuan___pa)——‘停車場’里‘停放’的意思。每次見到一個政客，我就說：‘你可以分配土地讓人們停放車。如果你想讓你的城市有未來，你還需要分配土地給我們停放水。德里那些偉大的統治者被記住是因為他們建造的水槽和湖泊，這些工程收集雨水并補充地下水。你也可以是一位偉大的統治者。’但他們不知道我在說什么，因為他們已經忘記了德里的水來自哪里。他們已經忘記了，在德里的歷史里，有許多因為用完了水而撤空的城市。

“我們經常認為，最近幾個世紀出現了很多新知識，但這是因為我們不再承認過去的知識。我把現代時光看作是一段關于遺忘的悠久歷史。即使是國王也不知道過去住在這個地方的每個人都知道的事情。”

可能看起來令人吃驚，在這個非常關心人身安全和生存的地方，水作為最重要的物質資源會被如此忽視。阿努帕姆的看法是，一個失敗的政府系統被中產階級繞了過去，這個階級自己建立了微型系統，并因此將政府的系統更快地推向崩潰。這似乎是關于世界末日的啟示——這的確是啟示。它產生了一種致命的、短視的掠奪心態：當水正在枯竭，而沒有人做任何事來補充，理性的策略就是搶在所有人前面盡可能多地把水拿走。

對一些人來說，這可能會引出一個問題：德里何時會“長大”？政治何時會最終制服這些反社會、不順從的能量，并將其引向一個符合所有人長遠利益的客觀體系？

這個問題被看作是一個游客的問題，在德里很少有人會問——這說明西方城市的歷史和像德里這樣“新興”城市的未來之間有某些差異。因為這個問題并不來自對這個城市的發展有任何了解，而是來自一種輸入的記憶，這種記憶是關于其他城市的演變史。然而在我們的時代，這種記憶正在飛速變化，從普遍變得狹隘。

最好的例子是紐約——過去一個世紀的代表性標志。不知怎的，我們仍然記得，那座城市是在秩序和混亂的宏大斗爭中崛起的。我們的頭腦里閃爍著各種圖像——崛起的年代里那些詭計多端的斂財大亨、幫派和腐敗的政治家，滿是瘦骨嶙峋的無依無靠者的貧民窟。重拳從天而降——頑強的市長們與這些流氓力量展開較量，遏制匪幫，打破政治家和商業大亨之間的舒適聯盟，確保窮人的生活條件，建立起最雄心勃勃的城市基礎設施。當權力集中的當局一眼望去看到的是一座被征服的城市，當它掌握住城市的各種能量并將其引導至無人不知、獨一無二的光榮城市成就（因為這是我們共享的全球神話），此時的主題就不再是戰斗，而是抒情與謳歌。

我們也沒有忘記這一路上發生的大規模破壞。我們知道“成就”下面是什么——為了建造高速公路和公園，社區是如何被毀掉的；語言如何消失得了無痕跡；這么多的生活又是如何被埋葬的：街道上自發的能量、動物、各種民俗、倦怠與惡行。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紐約在某種意義上變少了，總有紐約人哀悼神秘感的逝去、視野的萎縮和生活的理性化。偉大的電影詩人如斯科塞斯（Scorsese）和科波拉（Coppola），為那座更古老、更陰郁的大都市創作了挽歌，那是一座在聚光燈下被遺忘的城市。通過他們，這個世界上許多從來沒有去過紐約的人成了紐約公民。比如說，“教父”系列電影栩栩如生地再現了典型的紐約氛圍——來回往復：是逝去世界那種黑暗的宏偉締造了現代城市，但這種黑暗的宏偉同樣從本質上注定了，逝去的世界必將逝去。這些電影表達了21世紀進程的冷酷無情——以寧靜而富有生產力的大都市之名，丟掉了人類的偉大和多樣性。在現代城市的傳說中，統一、集中的行政權力具有戰勝所有其他事物的絕對必然性。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恐懼，恐懼人類最終將失去所有活力，并且除了自己的控制機制之外，不再了解或愛任何東西——然而這些從來不足以制止這種單向的擴張。

這樣的歷史讓很多西方人（而且不僅僅是西方人）明白，今天“不成熟的”城市的未來將追隨西方過去的路線而發展。其中的邏輯是：在變成現在這樣之前，我們曾和他們一樣，因為現代性無情且不可避免地朝著一個明顯的方向移動，他們也會變得像我們一樣。這只是時間問題。但是正如投資顧問樂于指出的，過去并非未來的指南。并且，有很多理由懷疑德里將走上另一條路線，一條由其他遙遠的城市在不一樣的年代里畫出的路線。世界上的新興之處更有可能走上的是不同的道路，創造出不同的現實。在這樣的地方，“正規”將很可能永遠無法打敗“非正規”，甚至無法與之對抗。那些城市在很大比例上將繼續由不為城市當局所了解，或互相之間也不了解的社群自行管理。他們將繼續建設既巧妙又不為人知的建筑和社會系統。在“全球化”的控制下，他們將繼續保持陌生和野性。

在我描寫的這個地方，連想象集權管理這樣的概念都很難，然而創造了巴黎和紐約的正是這一概念。我們必須記住，早在集權成為政治原則之前的幾個世紀，西方就已經做好了準備。因為關于它的所有想象都來自猶太——基督教對神的看法：善良、全能、全知，還有最重要的——獨一。因此，這種政府的模式在出現前已經為基督教社會所熟悉——它是對普遍存在的靈性假定的一種世俗闡釋，接受這樣的權威并不需要任何形而上意義上的轉向。我所在的地方卻并非如此，甚至很多最西方化的市民都認為，西方國家單一的視角過于迂腐而令人疲憊，他們在印度大量更加矛盾的當權機構中得到了解脫。

但也許，這些神學考量是無關緊要的，重要的是另一項更加基本的事實，即新德里進入西方全球化地帶的時刻，正值國家權力普遍式微之時，甚至在西方也是如此。紐約的崛起恰逢中央集權在所有富裕國家中日益盛行，但現在，有跡象表明這種情況已經結束了。窮困的西方行政主管部門越來越無法從企業和金融精英們那里獲得收入，在這個跨國時代，這些人輕易地就在策略上比他們更勝一籌。行政主管部門越來越多地交出早先的職能，并與他們在擁有更大權力和盈余的年代里的投資日益背離。這是這個時代的要旨。在德里事情似乎確實在朝反方向發展。當代德里的故事中，各個群體逐漸背離其與中央集權的傳統關系。無論在哪個社會階層，幾乎沒有人相信政府能解決自己的問題。窮人與國家之間有著最直接和必然的關系，但在城市中，很多人已經與行政管理者對抗了多年，并且對管理者的期待只是“不要管他們”，讓他們自己建設自己的街道、房屋和社群。中產階級和國家所做的事情之間幾乎沒有關系——他們不希望為國家付出，也不期待從國家那里得到什么。理想情況下，他們會把自己與這個國家的寬闊洪流隔絕開來，并以盡可能私有化的方式存在。于是，他們跑去各種“公司城市”，付錢給公司讓其提供道路、公園和人身安全。同時，許多非常富有的人控制了政治家和政治程序以服務于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反過來。他們已經設計了一套商業系統，其速度和效率源于其繞過并制服了國家的掌控權和獨立性。

有些人會問，這些富人是怎么了？難道他們不能用自己非凡的影響力建立機構和基礎設施，將德里動蕩的能量組織起來，從而更好地滋養未來嗎？事實上，在寡頭時代很多人覺得只有超級富豪才擁有建造持久而重要之物所需的權力和活力。但這個問題的背后同樣是20世紀的紐約。人們記得音樂廳、圖書館、博物館、大學、公共住房和其他所有由紐約“鍍金時代”精英建造的東西，他們想知道德里的新貴什么時候會擔當起這樣的角色。但那些不顧一切的資本家對扶持自己城市和社會的驚人沖動不可能再次出現在德里富人身上。部分原因在于，這些富人是由一群去地域化的精英組成的——就像當今所有地方的富人一樣。

如果說20世紀早期的紐約貴族用自己的金錢建造了圖書館和歌劇院，那是因為他們對于“成功”的概念里有一點至關重要，即他們的城市要和歐洲最偉大的城市相媲美，甚至超過它們。紐約不僅是他們獲得收入的地方，還是他們生活的劇場，是他們到來的簽名。他們將創造一個“新世界”，超越舊世界。他們不會把自己的兒子送到世界的另一頭，在發霉的牛津或劍橋學習，他們會建起嶄新的、更優越的美國學府。他們全神貫注于彌補自己在基礎設施和人口水平上的“落后”，因為這是他們對自己的怠慢。

但與一個世紀前的美國精英相比，今天的全球精英對所在地區乃至所在國家的投資都要小得多。德里之于它的超級富豪，不像紐約之于其早年的主人，并不具有頭等的重要性——它只是他們積累收入的地方，他們幾乎沒有什么意愿要把它變成一件城市杰作。他們沒有這樣的需求，因為他們已經習慣把全世界現有的資源當作自己的。他們并不需要為自己建造偉大的大學，因為這些大學已經為他們建好了——在美國。

這樣的感覺并不局限于德里，它適用于所有地方的精英。德里的精英和巴黎、莫斯科、圣保羅的精英一樣，他們都在倫敦有房子，孩子在美國受教育，到圣特羅佩度假，在洛桑就醫，并把錢放在海外。大量私人財富回頭投入一個地方（“我們的地方”）的需求和關注的情況，不再有了。這里沒有，其他地方也沒有。

或許，我們也可以不僅在空間的意義上，還可以在時間的意義上談論變化。建設偉大的工程需要對未來有極大的信心，而信心在任何地方都在減少。雖然資本主義的投資和回報周期一直都壓制著所謂的永恒，但不知何故，其最殘酷的階段（比如美國奴隸制時期或者歐洲帝國主義時期）反而對未來保持了更慷慨的態度，為世界提供了學校、醫院、博物館、圖書館、大學、公園、公共場所，并持續塑造著今天仍然存在的重要系統。但在歐洲和美國現在所建立的文化機構或學府中，很少在建立時便會考慮和想象其能持續（比方說）兩千五百年。在這方面，當代德里再次符合了一般情況。

有些地方的歷史斷裂的程度較輕，而若是這些地方的某些機構得以蓬勃發展幾百年，則它們往往能夠逐漸獲得全球性的重要意義，部分原因是其包含的時間幅度罕見地廣闊。即使在德里這種具有侵略性的現代城市，有資源和野心的人還是會把孩子送到往往已經發展了四個世紀（哈佛），甚至八個世紀（牛津和劍橋）的大學。這種做法不只是為了“品牌”，而是出于一種認識，認為個體發展的一些方面需要沉浸到比大多數現代生活還要宏大得多的時間流里。學習是其中的一個方面——我們在直覺上就知道，古老的學術機構所擁有的東西不是一夜間就能獲得的。但對自己的時代，我們也知道，運用前人成果所得到的成就，遠勝于自己去為未來奠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德里的短視行為及其不斷加速的發展——每個人都試圖在整個資源耗盡前拿走任何拿得走的東西，不只是德里的問題。確實，這個問題的后果在德里這樣的地方表現得最為明顯。在這里，前現代的機構被暴露無遺，于是無法阻擋21世紀景觀的視野。但這是一個全球體系的問題。只有當我們恢復對于“永恒”的感覺，并不再受制于已被所有人接受的當代思想和情感進程，這個問題才有可能被避免。

如果從全球角度看，德里是個有意思的城市，不過這并不是因為它是一個正在邁向成熟的城市案例。它的有趣之處在于，它已經成熟了，不過它的成熟看上去一點也不像我們在過去被引導、期待的成熟全球城市的樣子。這座城市的公共空間破碎不堪，窮人們密集地住在全世界最寬闊而人口最稀疏的區域旁，那些區域里的階層奮力想把自己從這個城市的可悲狀況里拉出來，進入一個更加可靠并自給自足的世界，那里有私人電力供應和私人安保——這不是世界歷史的倒退，而是世界的未來。

看著當代德里就是在看全球21世紀癥狀最顯眼、最前衛的形式。19世紀和20世紀資本主義的中心仍將在一段時間里繼續其勢頭，但從這些中心本身，我們無法理解從德里那兒了解到的東西——21世紀是一種多么奇怪和令人不安的現實，而我們都朝著這種現實邁進。

阿努帕姆和我，沿著其河岸行走的河流是極其宏大的。這條河源于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它向著東南奔騰了一千多公里，經過德里和阿格拉，匯入和它并行的姐妹河，即另一條源于喜馬拉雅的偉大河流——恒河。在剩下的路程里，恒河帶著它穿越印度次大陸，最終流入孟加拉灣。

這兩條河流之間肥沃的沖積平原孕育了古老的吠陀文化，產生了《摩訶婆羅多》這樣的成就。據說，處于這首史詩中心地位的古魯格舍德拉戰役就發生在德里北部幾百公里處的亞穆納河岸邊。兩條河流交匯的地方就在阿拉哈巴德外，那里有壯麗動人的自然景色：亞穆納河的黑色河水與恒河明亮的河水奔跑著互相追逐，兩股獨立的水流并行地在盆地流過幾公里后，其色調終于融合到一起。每十二年，數以千萬計的人會聚集在這個地方參加大壺節（Kumbh Mela），全世界最大的宗教集會之一，其核心活動就包括在這兩條神圣河流的交匯處進行浸入儀式，從而使靈魂獲得凈化。

兩者之中，亞穆納河擁有更細膩美麗的傳說。“亞穆納河”這個名字與“Yami”同源。根據《梨俱吠陀》記載，亞馬（Yama）和亞米（Yami）是太陽神生下的雙胞胎，也是第一批凡人。亞米對她的哥哥充滿了欲望，并試圖說服他一起生孩子來繁衍地球的人口。亞馬非常恐懼，他寧愿選擇死也不愿意亂倫。由于他沒有后代，所以無法從死者的世界中被解放出來。他成了死神，管理著所有凡人的壽命。在某些描寫中，他是一個可怕的、報復心強的人物；在另一些描寫中，他是一個悲劇人物，永遠哭泣著執行自己痛苦的任務——將生者的性命奪走。

亞米也哭泣——為了曾唾棄她，并且現在再也見不到的哥哥——這些充滿了兄妹情的眼淚就變成了流淌的亞穆納河。這條河的河水生于悲傷，擁有吸收世界上罪惡和悲傷的力量，神和凡人在河水里游泳潔凈自己的厄運，于是河水變得比歡快的恒河更暗沉。亞米的悲傷仍在繼續，因為她愛上了克利希那神。他在她身邊出生，兒童時代在她的河水里玩耍，在她樹木繁茂的岸邊談情說愛，在她身邊宣講其偉大的哲學論述（《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重述了這些論述）。但最終，克利希那神拋下了她，繼續往別處舞蹈。因此，亞穆納河講述的是女性的哀愁——關于對愛情、滿足和完美男性的未獲滿足的欲望。

阿努帕姆和我已經走了很長的路，白天的暑氣已經消退。我們沿著高架的路線，視線里常常很久都看不見河流。我們頭頂上正在建造一座天橋：起重機將巨大的混凝土段舉起放入位。

“我們現在在城市北部，”阿努帕姆說，“你會看到瓦吉拉巴德，英國人在那里用水壩攔住了河流。”

我們翻越了路邊的障礙，朝著河走去。岸邊有一座都是棚屋的鎮子，還有幾塊農田。我們來到一條又寬又臭的水渠邊。

“這是流入這條河的最大一根污水排水管。所有德里北部的污水都從這里來。這條水渠的承載量非常大。要我說這有六七米深。”

這條水渠里的水都像奔騰的焦油，接觸河岸的地方，植被都枯萎了。阿努帕姆和我都因為煙霧咳嗽起來。這種氣味很特別，不是單純的人類排泄物，雖說這是它的底色。里面還有一股濃重的蔬菜味和沖鼻的化學品味道。

“你想聽一些關于這個排水渠的事嗎？莫臥兒人建的運河現在匯到這條排水渠中。那條運河從一百多公里的地方帶來水晶般清澈的水，也是莫臥兒皇帝曾經在他的宮殿喝的水。而現代水務管理人員想不出該拿這些水怎么辦，所以他們就把這水排到這個水渠里，這樣水就可以流回亞穆納河。最近我和水務委員會開會，把這件事告訴他們，委員會的負責人說‘這不可能’。我堅持說是這樣的，他讓工作人員去查，結果他們回來對他說，‘這是真的，長官’。這太瘋狂了，因為我們在這里迫切需要的不是水，而是干凈的水。然而有了干凈的水，我們卻在沒有任何人使用之前就把它和污水混到了一起。”

我想起18世紀詩人米爾的一句詩：“我哭泣的眼睛像一條運河，我被毀壞的心臟像這座城市德里。”

我們爬上一堵墻，低頭看著污水流入河水，兩條水流的大小相當。在下游，黑色的亞穆納河與淺色的恒河交匯處，兩條河流會互相提防地糾纏一段；而這里的亞穆納河是淺色的，城市的污水是黑色的——這兩種顏色在我們腳下并行流過。

“那邊，另一邊，你可以看到大壩。從這里的上游，你可以看到所有輸送干凈水進入城市的管道，水會在城市里進行處理并分配出去。來自城市的污水回到河水中，大多未經處理。這是第一條污水渠——如你所見，離大壩的南面只有幾百米。朝南走，還有更多這樣的水渠把污水送入河流。污水里有許多固體廢物，這就是水位不斷上升的另一個原因。這條河越來越淤塞了。”

人在這里呼吸很困難，我們走回路上。

“現在你明白為什么河是這樣的了吧。”他說，又爬回去翻過了欄桿。我們已經走了好幾個小時，他還是像出發時那樣靈活有力氣。“這就是德里送到河里的破爛，這就是從這里開始向南所有城市看到的河的樣子。馬圖拉（Mathura）的河水被污染了，那里是克利希那神的出生地，每個人都像他那樣去河里洗澡。阿格拉的河水也被污染了，那里的泰姬陵建在這條河的河岸上。只有阿格拉再向南，在昌巴爾河（Chambal River）匯入亞穆納河的地方，河水才又變得干凈。昌巴爾河是另一條巨大的河流，沖走了所有從德里來的污水。”

阿努帕姆能看出，我被剛才的景象驚呆了，他笑起來。

“你不用覺得沮喪，”他說，“人類在地球上的時間很短，不到十萬年。而他們在這個地方只有幾千年。他們自己的生命非常短。確實，我們通過技術聚集了力量，非常迅速地破壞了這條河。這樣的事在我們的有生之年發生了，這讓人很難過。這本不應該發生。但這種破壞不會持續很久。這座城市在和這條河流作戰，但這條河流已經在這里幾百萬年了，德里不可能贏得這場戰斗。當德里不復存在時，亞穆納河仍會流淌，而且它會再一次變得清澈。看到這種破壞確實心痛，但從來沒有讓我沮喪。這條河以后會受到照顧的。當然這不會發生在我有生之年，但我沒有自大到去想象一切都必須在我還活著的這么短時間內發生。會發生的，那就夠了。歷史很長，我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對于世界的大部分人口來說，21世紀是一個越發貧困和迷失的時期，幾乎沒有為他們的境況提供任何力量和靈感來源。許多人用如此驚人的力量抓住21世紀的原因恰恰在于，他們被自己在20世紀的悲慘遭遇用導彈般的力量射入了21世紀。他們在20世紀的經歷不同于歐美人，制造的并不是鄉愁。今天全球資本主義被來自許多地方的戰士攻占，對這些人來說，過去已被切斷，因此，為了找到一個家，他們就必須征服未來。

本書講述的故事中，一個擁有炫目財富和復雜文化的地方被殖民政權接管，財富和文化遭到動搖并被推翻，巨大的權力斗爭導致了一場種族滅絕的災難。還有一個后殖民政府著手開始一個大規模的經濟工程項目，卻最終讓自己疲憊不堪，并讓路給了充滿活力的自由市場反彈力量。這個故事只要稍加變化，正是這個世界的近代史。今天，在兩百多個獨立國家中，大約有一百四十個是1900年后成立的，多數是從二戰后的西歐帝國中獨立出來的——比如印度，或者是1989年之后從蘇聯集團中獨立出來的。這些國家大多會在本書的篇章中找到某些屬于自己的歷史。我的故事是德里的故事，也是全球大多數人的故事。這并不是一個非凡的故事。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普通的故事。

直到最近，完全成熟的市場社會仍然主要存在于美國和西歐這些地區，這些地區一開始就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發明中發揮了最大作用。而在過去幾個世紀，這些地區已經能夠在社會和其動蕩的后裔之間達成某種和解。他們克服了推廣唯物主義和貪婪時的道德反感，發展出一套哲學基礎，讓人感到市場社會是一種正確而有意義的存在。

他們建立了超市場的社會機制來緩解市場本身造成的某些對人類更可怕的摧殘。例如他們對市場支配設置了限制，以確保窮人和病人的福祉，或是保留了閑暇時間和文化的完整性。雖然當資本主義發展的波濤橫掃他們的人民時，他們都經歷了巨大的社會暴力和痛苦（維克多·雨果和查爾斯·狄更斯為這些嘗試提供了不朽的寓言故事），但這些社會繼續“擁抱”資本主義，繼續相信其良性的潛力，繼續覺得它總是會朝向新的和更好的結局。

20世紀末突然被領進全球資本主義的億萬富翁們從來沒有達到過上述歷史情況。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里被告知，全球資本主義是萬惡之源，他們永遠不應該屈從于它。這不是他們要塑造或管理的系統——這個系統是外國人創造的，那些傳統上被認為是無情、沒有靈性的帝國主義者。而20世紀末的富翁們對于這個系統是什么，要怎么用，能為他們做什么，則有著完全不同的感覺。他們往往帶著巨大的興奮和熱情進入這個系統，同時也帶著極大的憂慮擔心這個系統只會帶來不幸，擔心它會破壞太多東西，擔心它會讓他們像那些西方人——那些人的貪婪和缺乏價值曾是這個系統如此重要的道德保證。事實是，在資本主義面前，他們選擇了比西方人更完全地投入和否定自己；事實是，他們帶著非常不同的宗教和哲學歷史來到了資本主義面前。這一系列事實使得用西方的過去來解讀他們的未來不再可能。很明顯，他們會找到非常不同的方式將資本主義容納到他們的社會結構中，這樣他們就將改變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性質。

除了這一切以外，許多地方將其社會中還未被很好處理的巨大歷史創傷遺產帶到了全球面前。許多創傷已經對經濟身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影響著對陌生人和合同的信任和懷疑，影響著對于財富和貧窮、私人和公共財產的概念。因此，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些遺產將大量涌入全球系統的運行中。

我們已經習慣于承擔猶太大屠殺的全球性力量，在大屠殺發生的那一刻，這種力量就開始塑造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但許多其他事件，比如印巴分治，也是“全球性的”事件，只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大多局限于其發生的地方，并且其內部輪廓對于世界的其他地方來說依然是模糊晦澀的。除了印巴分治……還有如巴西軍事獨裁統治這類事件對農村生活造成破壞，并帶來城市化沖擊。……許多最基本的事實仍然含糊不清，所以不可能說清它會對那些幸存者和他們的后代產生什么樣的影響，而這些人現在正與資本主義非常不同的經濟稀缺性和豐富性發生密切的互動。隨著這些舊日的事件在全球空間里姍姍來遲地引爆，它們將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像猶太大屠殺一樣，到處都有學校把這些作為“我們的”歷史來教授。整個世界將繼承它們所帶來的震撼。

全球資本主義范圍的急劇擴張會深刻地將其改變。很顯然，事情會變得瘋狂得多。許多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的新中心已經準備好了戰爭，而不是和平參與，其中許多中心對“社會”概念的信仰嚴重受損。并且，當世界上許多最緊迫的問題需要全球社會集體行動的時候，這些戰士將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是完全不確定的。很明顯，這個“全球社會”的建立，將需要世界各國人民和不同文化之間有巨大的共情。只有這樣，大批的新來者才能感受到是在投資這個系統本身，才能感受到這不是一場贏家通吃的騙局（其中唯一合理的目標就是加入剝削者的小團體，而不是成為被剝削的大眾）。

但同樣明顯的是，這個系統的經驗和哲學基礎將隨著這些新成員的到來被大大拓寬，這些新成員還沒有失去其對資本主義的陌生感。單單這一點就一定會產生出激進的新見解和遠見。這確實可能引起世界文明一次劃時代的繁榮——無論如何，文明的創新和精致化是系統實現其烏托邦潛力，而非帶來末日災難的前提。

還剩最后一處阿努帕姆想帶我去看的地方。我們繼續從瓦吉拉巴德大壩的位置往上游走，視野里看不見水了。阿努帕姆問人們怎么去他正在尋找的地方，每個人都指向不同的方向。要找到這條大河竟然這么難，實在是很奇怪。

“我已經二十年沒來這里了，”他說，“每樣東西都變了。上一次我來的時候，這些都不存在。”我們走到一條繁忙的路上，這條路應該會通往他要去的地方。坑坑洼洼的道路正在重鋪。一輛水車在往一臺水泥攪拌機里注水——像所有運水的卡車那樣，這輛車也是每一個角落都在漏水，搞得路面都被淹了。我們到了路的盡頭，翻過一堵墻。一個男孩子正在焚燒一個泡沫床墊，好從里面的彈簧回收鋼絲。泡沫的火焰燒得很旺，使整個地方都彌漫著有毒的黑色煙霧。阿努帕姆用手帕捂住了嘴。

我們站在一塊類似荒地的地方，這里正在建一排磚瓦房。建設工作似乎已經被遺棄了幾個月，金色的草有三米高，興高采烈地從未完成的長方形結構里冒出來。晾衣繩掛在樹木之間，地上都是沒用過的磚塊。

“這里整個區域都是漫灘，”阿努帕姆，“所有這些房子到了雨季都會被洪水淹掉。這就是在此之前沒有人在這里建房子的原因。但土地已經變得太有價值了，人們甚至在這種一年中有部分時間不適合住人的地方造房子。”

我們能看到遠處的河。我們穿過堅硬的土地。幾段古老的石柱躺在那里，一半埋在地下。又經過了幾座小型寺廟，然后，亞穆納河出現在我們面前——蔚藍、寧靜、氣勢恢宏。

看著它，我驚訝地喘不過氣來。

“是的，”阿努帕姆帶著理解說，“誰都無法相信這條河能是這樣的。”

這不是我們溯流而上一整天看到的那條渾濁的黑色溝渠，這是那條原始的河流，清澈而豐饒。

從任何意義上來說，我們都站在德里“之前”，在這條河流與城市相遇“之前”，在這座城市還沒有出現“之前”。

男孩子們在水中開心地撲騰，成群結隊的黑水雞滑過水面，劃艇泊在河岸邊，那里你能看到往下兩米深的水。河的中間有一片金色的蘆葦。對岸肯定有幾公里之遙。亮藍色的翠鳥在樹上尖著嗓子嘰嘰喳喳地叫著，樹木帶著一股渴望傾俯在水面上。一名婦女在用一個塑料筒打水。

我們在臺階上坐下來，看著河水。附近有一群男人在一棵菩提樹下玩牌。其中有一位是裸體的娑度（sadhu）[[3]](#Yin_Du_Jiao_Sheng_Ren__You_Zhi_L)。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么要造這些寺廟，”阿努帕姆，“這是純粹的侵略：某些商人認為自己需要在亞穆納河旁邊有一個神龕，于是給了某個官員一點錢，獲得許可在這里建廟。如果神會喜歡來逛這種丑陋的東西，我會很驚訝的。”

他接著補充說，“不過這些廟也會不復存在的。河水會做這件事的。”

我們所在之處是一個河口，由于水面的關系，這里的聲音聽上去很清晰。鳥兒的叫聲傳到很遠的地方。

視野是開闊的，令人有一種解脫感。我意識到，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其內在的情感和故事讓我自己有多疲累。我已經忘記了“廣闊”的感覺。在這個大都市里，每件東西都是巨大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使得人們很少有機會看到超越街對面范圍以外的東西。一切都被擋住了。你的眼睛忘記了要怎樣聚焦于“無窮”。

“我很高興你能看到這個地方，”阿努帕姆說，“現在你明白德里為什么要建在這兒了。這是地球上一處美麗的地方。”

注釋

[[1]](#_1_17)真名。——原注

[[2]](#_2_17)英語中的“公園”（park）還有“停車場”和“停放”的意思。——譯注

[[3]](#_3_15)印度教圣人，尤指離群索居的苦行僧。

# 致謝

與出現在本書中的人談話是我生命中最棒的經歷之一。為了保護他們的隱私，我隱去了他們的真名，因此我的致謝詞也必須保持匿名；盡管如此，我真誠地感謝他們中的每一個人，感謝他們講述自己經歷時的坦率和熱情。

我也感謝我的父母，與其說是因為他們與我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不如說是為了他們當初生活的勇氣。

《資本之都》的成書歸功于與許多朋友和熟人進行的討論，他們給了我靈感。以下是一份必定不完整的名單：

Moushmi Basu, Gautam Bhan, Gautam Bhatia, Shalini Bhutani, Arani Bose, Eisha Chopra, Taru Dalmia, William Dalrymple, Puru Das, Veena Das, Sapna Desai, Ashish Dhawan, Raseel Gujral, Satish Gujral, Pankaj Vir Gupta, Deepti Kapoor, Raghu Karnad, Bharti Kher, Martand Khosla, Romi Khosla, Nadine Kreisberger, Siddhartha Lokanandi, Diya Mehra, Pratap Bhanu Mehta, Anurag Mishra, Rajat Mitra, Geetika Narang, Reena Nath, Nandan Nilekani, Ritesh Pandey, Basharat Peer, Gary Reid, Pradip Saha, Vivek Sahni, Aditi Saraf, Chiki Sarkar, Jonathan Shainin, Abhishek Sharan, Sher Singh, Ayesha Sood, Jyoti Thottam, Madhu Trehan和Ashutosh Varshney。

在用印地語進行采訪時，米合爾·潘迪亞（Mihir Pandya）的表現遠遠超出了一名稱職口譯的范疇。

迪帕克·梅塔（Deepak Mehta）和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是我的導師，他們用智慧啟迪了我的靈感。我還從以下幾位有遠見的建議和慷慨的貢獻中獲益匪淺：阿西什·馬哈金（Ashish Mahajan）、坎塔·穆塔里（Kanta Murali）、阿伊莎·普努瓦伊（Ayesha Punvani）和阿南德·維韋克·塔內加（Anand Vivek Taneja）。我尤其感謝最后一位。

感謝布里戈帕迪·辛格（Bhrigupati Singh）和普雷納·辛格（Prerna Singh）在智識或其他方面的陪伴，一如既往地，他們是一切的基礎。

沒有我了不起的女兒阿瑪莉婭（Amália），我根本無法寫出《資本之都》。謝謝你，謝謝你，我的愛。

# 許可聲明

我們已經盡可能地找到了版權持有者，并獲得了使用版權資料的許可。出版社對任何錯誤或遺漏表示歉意，并會對告知在新版中應該進行的修正之處表示感謝。

題記出自《蒙哥馬利城興衰記》（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ity of Mahagonny），作者為庫爾特·魏爾（Kurt Weill）和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hold Brecht），© Kurt Weill ＆ Berthold Brecht, Bloomsbury Methuen Drama。

庫什萬特·辛格（Khushwant Singh）撰寫的《我的建筑師父親》（“My Father the Builder”），摘引自《贊頌德里》（Celebrating Delhi）一書，已獲得出版方企鵝印度（Penguin Books India）和編者馬拉·達亞爾（Mala Dayal）的許可。

對瓦什·布塔利雅（Urvashi Butalia）著的《沉默的彼面：印度分裂的呼號》（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 Voices from the Partition of India）一書之引用，同樣獲得了出版社企鵝印度與編者馬拉·達亞爾的許可。

引自微依那·達斯（Veena Das）的《生命與言辭：暴力與墜入其中的日常》（Life and Words: Violence and the Descent into the Ordinary），由加州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出版，© 2007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引用的《甘地之后的印度: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歷史》（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一書，作者為拉馬錢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由Pan Macmillan于2007年出版。

第十七章題記引用并改編自說唱藝人德里·蘇丹，并得到其善意的許可。

印度和德里的地圖為原書插圖，獲得了繪制者杰米·惠特（Jamie Whyte）的許可。